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周佩箴先生全集

周玉洵端識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周佩箴先生全集

周佩箴先生全集目錄

封面題字……………陳誠

序言……………(五)

圖片

周佩箴先生遺像……………(九)

周先生之雙親合影……………(一〇)

國父與周先生等合影……………(一一)

總統蔣公與周先生等合影……………(一二)

周先生與張靜江先生等合影……………(一三)

周先生與姚琮先生合影……………(一四)

周先生與交通銀行在臺全體同仁合影……………(一五)

周先生與陳其采先生等合影……………(一六)

周先生與子女等全家合影……………(一六)

周先生與陳惠夫先生等合影……………(一七)

周先生與夫人和孫男孫女合影……………(一七)

勳章證書……………(一八)

周先生為夫人洵端女士所書之心經……………(一九)

傳誌

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周君家傳……………姚琮(二三)

周佩箴同志墓誌銘……………于右任(二五)

墨緣

孫總理游普陀山誌奇碑文之說明……………(二九)

告上海商界書……………(三一)

中央銀行籌備成立之經過……………(三五)

周佩箴先生訪問記……………(三九)

十日行役記……………(四五)

生活日記之一斑……………(五三)

附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稿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稿……………(八四)

附哀思錄

總統褒揚令……………(一一三)

總統賜頒匾額……………(一一五)

公祭時靈堂之哀榮……………(一一七)

治喪委員會公祭之祭文……………(一二八)

編者附言……………(一二九)

序言

先夫佩箴，逝世以來，忽已六載！古人謂：「光陰如石火電光，剎那即逝。」而我在這六年之中，孑然一身，形影相弔，甚覺時日悠長。然追思六年前之今日，又覺先夫音容宛在，不禁悲從中來，淚洒沾襟！

先夫在世，以寫日記與書法為樂；而我在此悠長時日——六年之中，除讀佛經祈求先夫增品蓮臺外，觀摩先夫之日記與書法，亦為我之恒課。

佛經云：「人命無常，在呼吸間。」我齒不及先夫，但也年近花甲；髮白耳聾，視線茫茫，想亦不久於人世矣！是以節食儉用，將先夫書篋中之斷簡殘篇，收編成冊，勉力付梓，分贈先夫生前友好諸君指正，以資紀念。

序 言

六

！
我不敢言，此一小冊，可以補正史之不足，或有益於社會之人心；祇願周氏後人，知祖先為官廉隅，有以效法，用慰先夫在天之靈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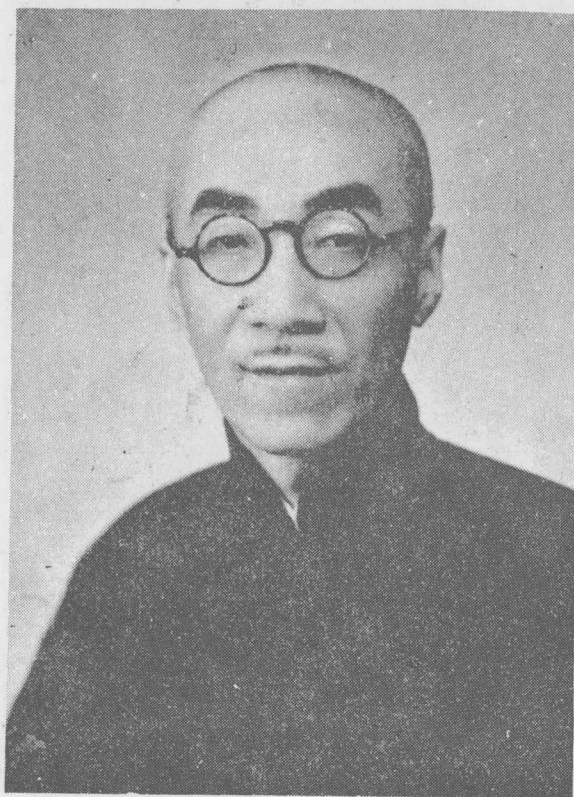
先夫六週年忌日未亡人周王洵端謹識

——四十七年農曆二月初三日——

圖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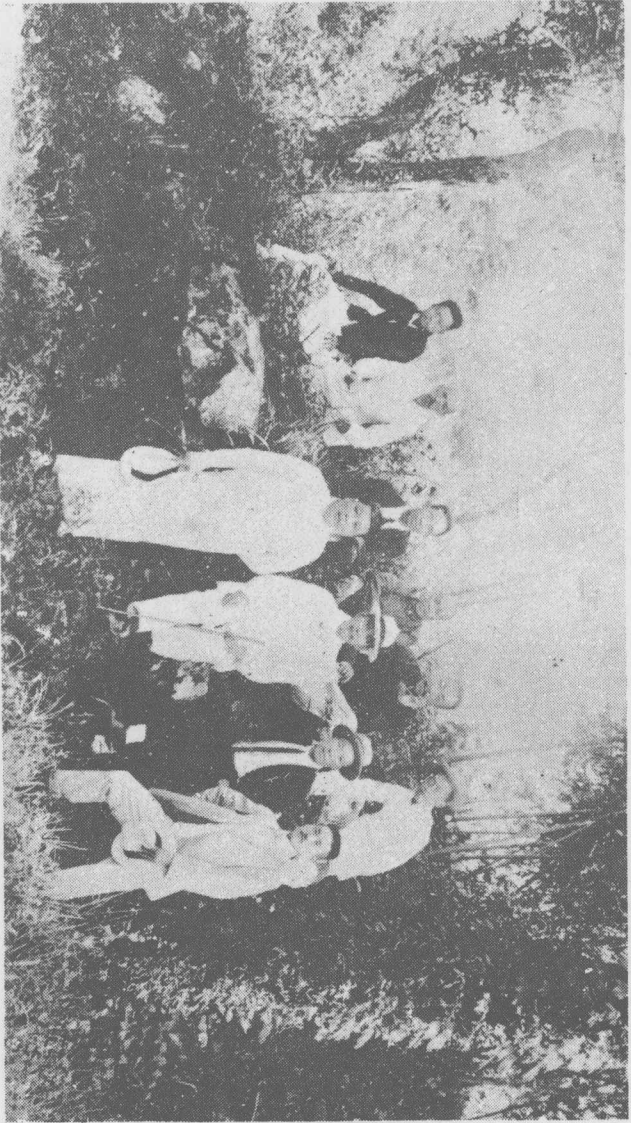
周佩箴先生遺像





一〇

周先生
之父親
慶善公
與母親
蔣太夫
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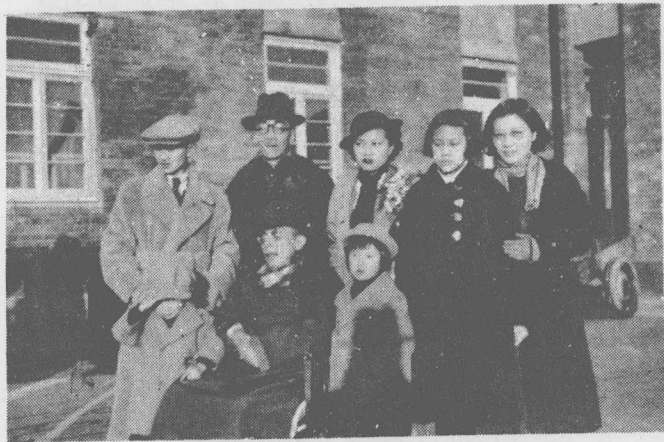


周先生隨國五年中山先生普陀山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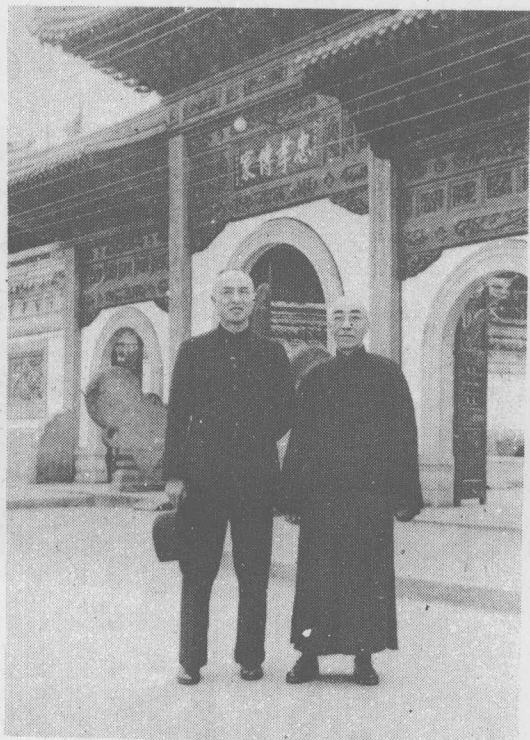


一三

周先
生與
總統
蔣公
等合
影



周先
生與
張靜
江先
生等
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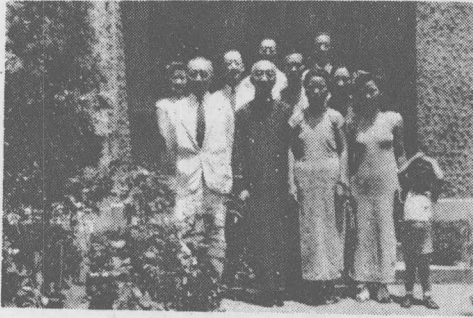


周先生與
姚琮先生
同赴溪口
晉謁
總統蔣公
時在蔣氏
宗祠前合
影



一
五

周先與交通銀行全體同人合影



← 周先生與子女
等全家合影

周先生與陳其采親
家及三女世瑞三女
婿陳漢夫等合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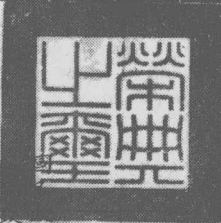
→
周先生與陳惠夫先生等合影



周先生和夫人與孫男孫女合影



勳章證書

 <p>中華民國三十三年</p>		<p>勳章證書 <small>勳字第陸壹號</small> 國民政府為周佩箴著有勳勞 特頒二等景星勳章一座用示獎勵 此證</p>
<p>右給 收執</p>		<p>府主席 蔣中正 院院長 內政部部长 張厲生</p>

服若波柱卷角心經為

也友用何城先生示

忠至其人至簡揮

勃言佛法珠玉持酒

送願東生晚音若尼

所為之記

民國十二年十月

于右任

周先生為夫洵人瑞女士書心之經

此經之功德無量... 凡我眾生... 應以此經... 功德無量... 凡我眾生... 應以此經... 功德無量...

傳

誌

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周君家傳

姚琮

君氏周，諱佩箴，以字行，浙江吳興人；祖諱昌福，父諱慶善，潛德弗耀。君少而歧嶷，厚重寡言笑。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科舉廢，乃從中山先生遊，且與今總統蔣公及先賢陳英士、張人傑、戴傳賢相友善；故一生革命至力。辛亥秋，浙軍收杭州，拔南京，君以首義功，長浙江官產處。無何，袁氏狙殺宋教仁，迺有癸丑之役，君與傳賢各與其謀。後袁氏又密殺陳英士，海內騷然；君與陳果夫，力謀復仇，惜敗於垂成！十二年，任國民黨中央財務部副部長，轉廣東土地廳廳長；整經界，平田賦，民困以蘇。十四年，蔣公帥師北伐，軍須孔亟，特設中央銀行，令君主之，格於法制，請由財政部長兼領，遂調浙江土地廳長。未就時共匪竊據贛南，勦撫連年，生民敝罷！君請設農民銀行，以濟其困。蔣公嘉納之，且令董其事。於

是農安畎畝，家有宿糧；抗戰八年，國用亦足，君之功也。贈二等景星勳章。三十八年秋，隨政府播遷臺北，貧甚。每家祭，俎豆缺如，則嘆曰：「使先人念余久宦而貧，得含笑而少宥之乎？」四十一年春病逝，無以為殮，其友何成濬、俞飛鵬、俞鴻鈞、趙志森、陳惠夫等，為之成禮。享年六十有九，元配邱夫人，前卒，繼配王夫人。子四，曰世傑，曰世棟，高等文官考試及第，分發外交部；曰世堃，曰世翰，侍衛大隊中校大隊長。世傑、世翰皆前卒。女四，長適邱，次適孫，三適陳；四適金，均邱夫人出。孫五孫女七，幼讀。

論曰：世之長國象者，不為聚斂之臣，則為盜臣。腰纏百萬，逍遙異邦，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君獨以廉隅稱，惠加於民，而無德色；用嗇於身，而無戚容，黃髮不懈，何其偉也！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歲次癸巳三月

瑞安姚琮撰書

周佩箴同志墓誌銘

于右任

余民前出亡至滬，識南潯張靜江先生，承介趙劭椒、周佩箴，曰：「有事覓余不得者，可即通知兩君，此皆忠實可靠者。」余辦民呼民吁時期，周君主持世界名人社，繼與族兄柏年，推銷巴黎出版之新世紀，每日接觸益多；而君遇事親切，略無倦怠。余入獄，君奉命奔走，極勞苦。辛亥革命後，仍為靜江先生經理事務，無稍懈，亦無他遷之意。及討袁失敗，聯絡同志如舊，備受他方威脅，而君不顧也。君為同盟會會員，又加入中華革命黨，與兄頌西為同胞同志。當頌西發現「共匪決心破壞本黨，及擬迫使本黨接近蘇俄」之冊後，即邀集同志多人，簽名上書總理，揭發陰謀，君為簽名最早者。君亦吳興之南潯鎮人，祖榆齋公，父鶴濟公，母蔣太夫人，生子女九人。君入洋後，至滬習賈於巨商徐氏，遇靜江先生，約入通運公

司，命接待四方同志。復入粵，任省府委員，兼土地廳廳長，中央銀行行長，又浙江省政府委員兼土地廳廳長，杭州造幣廠廠長，農民、亞東、交通各銀行董事，律已甚嚴，人皆重之。元配邱氏，繼室王氏，子女八人。四十一年二月廿七日以癌疾逝世於臺北，享年六十九歲。銘曰：

張靜江先生之深識遠見，真不可及也！識 國父孫先生，識陳英士都督，識今 總統蔣公，皆在未遇時。革命同志之至滬者亦多得公助；而佩箴為助公者，亦為公識者，即此亦可以自慰矣！

墨

緣

孫總理

遊普陀

山誌寺

碑文之

說明

(碑文

附後照

片見前

墨

緣

余進隨 國父偶侍出游民國五年同往普陀登

山入寺 國父忽言若有奇觀在前所謂牌樓湧

去偉麗道恒仙葩組錦寶幡舞風奇僧數十似

未遑客復有圓輪盤旋不已者皆國父舉以相

告之語余因_因未見即胡鄧諸公亦無所睹 國

父不作妄語_又兼奉基督教基度不言神異故可

信也至於 國父何以獨見餘均無睹則以閣內_本

典殊難妄測頃 元量我先生出示此記忽_已

三十餘載余亦垂_焉老矣進念舊事感愴無已

民國三十有七年七月吳興周佩箴跋

墨



遊普陀法奇

余得登普陀山舟山半港順道遊普陀山同行者為胡君漢氏鄧君孟碩周君佩成朱君
 文及浙江氏以暇秘書陳君去病所來建康繼長則任君先字也抵普陀山驕陽已斜相早登峰達此
 東法海寺沙門道階引至普濟寺小住由寺主了餘與甫行出行一疏靈巖怪石疎林平沙若階
 過迭於道者行迴時降者久之已登臨佛頂山天燈臺崇高攸覺獨遊徘徊已而旋赴慧濟寺繞一
 遍奇觀視夫則見寺前恍惚立一佛龕：階樓仙葩阻掃眉隔舞風而奇得數子窺厥狀似乎來迎
 有殊詩其依觀之或備舉之旋轉行將近盃然見其中有一大圓輪盤柱極遠其識其成何曾達以何
 力方感與間及香然無迹列已過其甚矣既入慧濟寺並向山遊者均無所睹遂說以五奇不已余朕臆中
 素無神異思想竟不知是何靈統然向環眺乎佛頂臺時俯仰間亦有字宙在手：概而空留詩曰
 數表實生平所無似此清勝者耳腹胸奇心淫海印身院澄然在影亦既形化而靈消焉乎此神以
 公道也下件向以徑法向寺鐘鼓聲聲中意向宛有洞而壯者已既乃歸至普濟寺眺卷了餘道
 階稍宣佛理與談令人悠然去遠矣

大國曆二月二十五日孫文休

原稿珍藏字王
 善吃天勝照相攝

告上海商界書

上海商界公鑒：楊嚴經曰：「一人食時，諸人飽否？」今試易其辭以質諸大眾曰：「一國強時，諸國興否？」無論何人，必明認其為不能。蓋國之軀命不同，亦猶之甲食而乙不能飽也，是則吾國人朝朝暮暮，延頸企足，以望日本之變更其侵略壓迫之大陸政策，是猶引饑虎而望其不食我也。其次，吾國人復朝朝暮暮，延頸企足，以望歐美列強伸公道，持公理，以扶助我幼穉之中華民國者，是乞食也。乞食之行出諸我，而與食之權操諸人；當軀命不同之國家主義中，維復能不自顧利害關係，而貿然與我以食耶？國民不幸而丁此時艱，若及今不能組織完美之國家者，卽至世界大同，而此種人類，亦無其組織完美之世界。

商會者，為保商興利而組織者也。謂之為國家之縮影可，謂之為

世界之縮影亦未嘗不可；商人若並一商會而不能有良好之組織，何責乎合多數遊民與無識力者而組織國家。字林報云：「現今外間盛傳，華人將有抵制日貨之舉。以前亦有此種任情舉動，惟因缺乏有組織之辦法，每致無效。此次之事，倘亦如此，則令人不足畏懼矣！」商界諸君！自外交失敗以來，各業所表示者，無不出於公理的愛國心，而商會轉寂然也。及閱商會致北京佳電，不啻出於日本人之口，蓋日本所持（青島問題中日自決）與商會主張（逕與日庭磋商交還手續）若合符節。又與各業商幫協會商業公團所堅持（直接交還）則大相逕庭。商界之表示如此，而商會之主張如彼；是何異國民口口聲聲力爭外交，而北京政府則鬼祟崇拚命賣國。總商會名義，上海衆商所公有，非一二人所得而私也。今商會佳電，與商界相反至此，豈非至奇可駭之事乎？為今之計，第一、各業商宜亟開聯合會，改選商會會長。（甲）抵制日貨，必須提倡國貨，規模較大之經營（如紗布之類）非衆

望允孚，與各商抱同一主義者，不能結合群力同圖精進。(乙)現任商會會長，於箇人人事關係，有急切不能與日本脫離關係之苦衷，各業商未便強其所難。第二、商會改選後須多聘畢業歐美富於商學人員，為商會顧問。(甲)商界中僅恃習慣上固有之經驗，斷不足以組織支配此項之計劃，此後中國商業之大發展，此其良機會也。(乙)例如南京路某某公司及各綢局，日本出品亦錯置其間，若不得相當之學識及群力以處置之，則必陷於積重難返之境。蓋抵制日貨是愛國行為之一種耳！其中一方是消極的（不用日貨），一方是積極的（振興國貨）；其間勞力之支配，資本之運用，非有真確之眼光，及精密之學識，無能收效也。夫愛國不僅此道，今於商言商，是亦必經之途徑，而保商興利之要道，尤必從組織始，願商界諸君急起圖之。周佩箴敬告。

編者按：此文見周先生之舊練習簿中，是報紙剪貼，無有年月日。讀文氣，蓋北政府時代之作品也。

中央銀行籌備成立之經過

民國十六年七月九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英文）云：「中央銀行，初由前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氏組織成立。近在上海設立支行，行址即前道勝銀行舊址，資本五千萬元，並發行鈔票，上海印總理遺像，與漢口中央銀行所發行者相同。該行董事尚未發表，行長已定周佩箴氏，周氏曾任浙江官產處處長，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廣州國民黨財政部副部長，該行並擬在國外銀行設立代理處云

○
L

編者按：周先生在此報後親筆註云：「民國十六年北伐既成，莫都金陵，旋創設中央銀行於滬，上文支行，實係總行之誤，中央銀行總裁兩字，當時中樞諸同志以為字面太有封建色彩，故改用行長。其時江浙甫克復，余尚在粵土

地廳任內，因同志紛紛函電約余返滬，至滬沒有幾天，得蔣總司令電，令速籌備中央銀行，由政府令財政部撥給二五課券乙千萬元，作為基金。但以北伐需款，該課券已售罄，令改發第二批課券，亦以款絀，遲不發下，連開辦費等均由余設法拉借應付，行址覓在道勝銀行原址，副行長王澂字文伯，係由余保薦於總司令發表也。鈔票，政府在粵未出發前，已向美國訂印，由財政部古部長撥下。籌備數月，人事方面等，略有頭緒，正在待財政部將基金撥下，方可開業。忽奉總司令電召，面令在南京先開一分行，以便北伐從速進展。余遂面商財政部次長兼江蘇財政廳長張詠霓兄，他云：可由財廳先借一筆現款，並介紹朱鐸民為南京分行經理，余即發表朱為經理，出納會計亦均派定，房屋亦已覓妥，一面在總

行星夜監印江蘇地方券，藉資應用。不意蔣總司令忽然下野，余深感中央銀行行長職務，非由財政部長兼任不可，否則，在事實上發生種種困難，不易應付，故未請示總司令，即托痛引退。

周佩箴先生訪問記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三日，漢口大光報特寫云：「南潯雖是然浙江的一個小鎮，可是一提起它，誰都知道。南潯的所以被人注意，是因為它產生了许多革命的人物，如張人傑，龐青城，周覺，周頌西等等，在漢市現任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的周佩箴先生，也就是其中的一個。說起周先生的歷史，倒是很有趣味的。」

他青年的時候，目睹滿清的腐敗，每與同志談起，莫不怒形於色，於是毅然相率參加革命工作，革命既成，他旋即掛冠而去，因為他參加革命的動機，祇在求打倒滿清政府，初沒有一些絲毫利己的成分在內。

可是事實上並不許他就此退隱，民國成立以後，皖、直、奉各系軍閥無日不在混戰，同時共產黨徒又在內部搗亂，眼見革命同志流血

造成的民國，將被破壞無餘。所以又出來宣傳籌款奔走呼號，堅持着他的主義，努力苦幹。雖然他因此經過了多少次生命危險，可是，他並不以此停止他的革命工作。「威武不能屈」，原是革命男兒的本色，同時孫總理委任他為中國國民黨本部財政部副部長，上海總商會亦舉他為董事，這是民國十二年的事了。按周先生在民國紀元前，已經是革命黨中之理財能手了，他和張人傑、李石曾等組織了通義銀行於上海，曾任經理職務，該行表面上是一個普通的商業機關，實際上海是革命財政的策源地。光復時，各省響應革命者幾乎莫不和這個銀行有相當關係。

光復後，他雖隱於商界可是每次革命，他無不積極地參加，在民國五六年間，他曾一度出任浙江省官產處處長，嗣以軍閥秉政，叛亂民國，他即拋棄了官印，繼續地去奔走革命，國會南遷時，田桐及諸同志，以會計重要，特邀周先生擔任。

在民國十四年，以諸同志之電召，周先生跑到廣東去襄助北伐，在次年二月即由國民政府任命為廣東土地廳長，同時兼任廣東沙田清理處處長，及黃埔商埠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委員，廣東護沙軍司令，廣東省府委員，同年十一月奉派為福建財政處處長，不久又兼任福建禁烟處處長，能者多勞，這是當然的現象。

民國十六年，北伐雖已很順利的奠定了金陵，可是在財政方面，已遭遇到空前的困難，於是遂設立了中央銀行，以謀統制全國的金融，第一任中央銀行行長就是周先生擔任的。後來他奉國民政府命任浙江省務委員會委員兼土地廳長，接着又做了多年的杭州造幣廠廠長。近年來，政府當局覺悟到農民復興的重要，於是遂於去冬任周先生為中國農民銀行的常務董事。

記者從前和周先生曾經在上海見過多次，所以知之特詳，不知不覺，一別數載，這次特地抽暇前去訪問，詢悉農民銀行業務近來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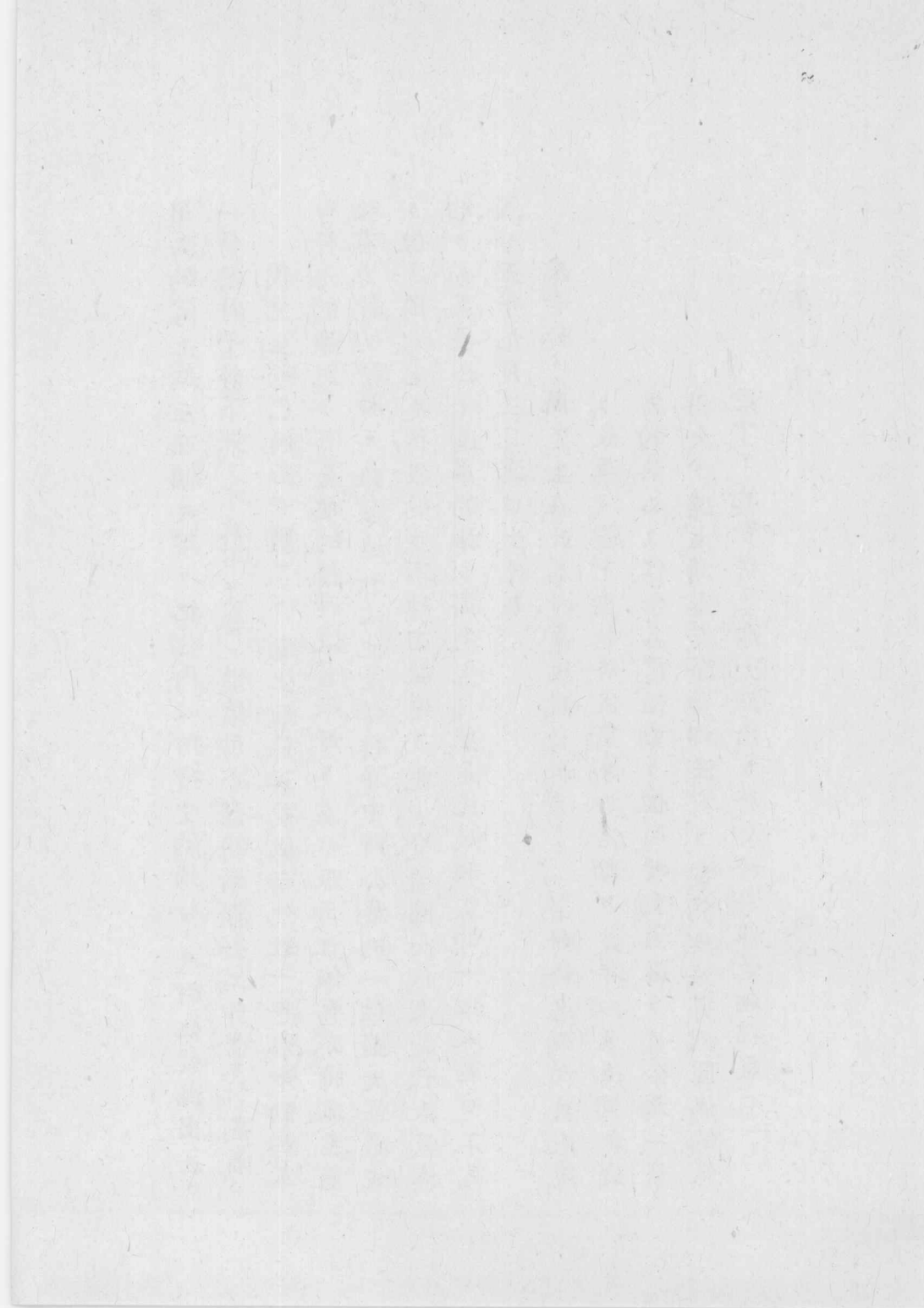
發展，分支行處及分理處已有六十九處，農貸所及倉庫亦達二十餘處，各處合作社直接受該行貸款約計六千多個。他這樣說：『我素主張在邊遠各處多設立一些倉庫及農貸所；因為我們就扶助已破產的農村向着復興繁榮的大道上進行，非多設農貸所來革除土豪劣紳們用高利貸來魚肉農民不可。』

記者正擬告辭而出，忽然注意到在周先生書案上放着幾冊碑帖和一些習字的紙頭，案首放着一個古銅色的筆筒，滿滿地裝着大大小小的狼毫鼠鬚這一類筆，原來周先生生平祇有一種嗜好，那就是研究書法了。他十數年來差不多天天寫，關於這一點，外界知之極鮮，因為他不輕意為他人動筆，記得曾經有一個接近周先生的朋友告訴記者，他說往年每逢革命失敗的時候，周先生正和每個同志一樣地在精神上受到深切的痛苦，同時他所處的環境又是如此艱難，那時內心的苦悶真是無以復加，這時他唯一的辦法，就是閉緊着房門，提起斗大的筆

用勁的寫上二三百個大字，把他內心所遭受的煩苦，悉由此發洩出去，一待精神平靜下來，才放下了筆，繼續用冷靜的頭腦去工作着，計劃着。

周先生年已過五十歲了，額上紋條正是徵示他數十年來辛勤為革命奔走的標記，可是他的精神依舊很好，在他眼角裡依舊不時流露着強有力幹的精神，雖然這一次他是銀行界中所公戴的一位國大候選人，但是周先生是怡然的並不肆力競選，記者覺着國大代表是代表民意的，如果要公平選舉的話，周先生自然是比較相當的一位人物。（民國廿五年九月三日漢口大光報）

編者按：周先生在此篇特寫後親自批云：「余對於名利向甚淡薄，故屢次選中委始終沒有參加活動，是年以在漢同鄉錢君的热心，代余各處活動，但因發動太遲，且余為一窮措大，連大請客交際費都沒有，當然無法得到圓滿的結果了！其實得了國大頭銜，於公於私亦毫無補益。」



十日行役記

中中交農四行，因我國決定長期抵抗，上海首將轉人戰渦，四總行均在滬，或將不能實施指揮，為免機構停頓起見，各行均有分出一部份人員先赴長江上游，設一臨時辦公處之擬議，萬一上海交通梗阻，各分支行處無從接洽時，可逕商承臨時辦公處辦理。

八月十三日，滬戰既開，中央銀行人員首先出動，葉琢堂先生與余商定，由余與陳淮鐘先生偕同孫書城、熊寶蓀、朱榮亭、陳慕安、張國濬諸君出發，預定路線，係乘汽車出南市，經松江、嘉興赴杭，再由杭轉浙贛路火車赴贛。

十四日，早晨七點同人等在余寓環龍別業二號集合，於炮聲隆隆中出發，分乘自備汽車兩輛，卡車一輛，行經市區，我軍步哨林立，出示證明書，按哨通過，哨兵精神振奮，態度沉着，兩軍相遇，哀

者勝矣，我軍蓋哀之深矣。行抵淞江，卡車過重，渡輪不勝乘載，乃折回淞江汽車站，謀換雇小車不得，於是將卡車行李留淞，小車先渡，行抵嘉興十二點半矣，下車午餐後，繼續前駛，至距杭州二十里途中見飛機三架，在我汽車上空，同向飛行，急驟間未及辨認為何方之機，迨抵杭城外，始知敵機正在襲擾，兵警巡邏，斷絕交通，乃入小茶館避焉。時方下午四時三十分，俄聞轟炸聲，隨見救火車、救護車奔馳，詢係向飛機場而去，頃聞機關槍、高射炮聲，隱見空中飛機多架盤旋追逐，知我空軍已飛出圍擊，突見敵機一架低飛近屋，機聲震耳，越余等所止茶館之對面屋頂而過，形極狼狽，似是受傷突圍圖逃，至七時三十分，形勢稍緩，乃乘車駛抵城內清泰第二旅館，時全城燈火熄滅，店門均閉，街道闕無行人，秩序極好，惟旅館洞黑，茶飯均無，至九時始解嚴，就附近麵館餐焉！

十五日：早五點派小汽車往淞江接行李，五時五十分聞空襲警報

，交通管制如昨，十點三十分解除警報，商店照常營業。據友人得來消息，昨日敵機被我空軍擊落三架。午後一時警報又傳，五時解嚴；據聞今日敵機一見我空軍飛出，即行逸去云。時小汽車已接行李回杭，六時各方傳來消息，將有大隊敵機來杭夜襲，頃之，浙行農村工作員蕭覺非君奔來告警，以余等所居在危險地帶，力勸暫避湖濱背山之新新旅館，正經其催促間，突聞警報，知所傳非虛，乃勉徇其意，偕同人等往避焉，子夜始解嚴。

十六日：早三點半回清泰旅館，先詢火車情形，據浙贛路局負責人聲稱，火車擁擠異常，殊無隙地，無法上車。乃決乘汽車先往金華，待轉火車赴贛。已於昨日設法雇定小汽一輛。於是裝上行李，分乘汽車三輛於五時許出發，適警報又傳，乃急駛出城，則城內交通已在管制中矣。一點半行抵蘭谿對岸，得悉前途公路水淹，乃棄車渡河至縣城外旅館小憩，已下午三點矣。七點乘蘭金火車，此係浙贛路支線

由金華至蘭谿為止，程短客少，八時抵金華，寓中國旅行社，詢悉敵機時有經過，尚未襲擾。自己汽車，次日開回杭州，不知能否回滬，刻尚未得報告。

十七日：探知開贛火車無準時，連日旅客擁擠如杭站。下午七時許，火車到站，試往擠乘，乃知諸暨義烏間鐵橋被水衝損，杭車僅止義烏，贛車止諸暨，此次車杭客未及乘上，故不如預想之擁擠，得以從容上車，居然買得三等臥鋪，亦幸運也。

十八日：達贛境，沿途早稻已割，晚禾已栽，惟低處水淹成澤，損農亦甚，下午三時許到南昌，謀寓洪都招待所，至則因茶役逃避已經停業，各旅館情形相同，縱觀馬路兩旁商店大都閉門，聞自十五日被敵機空襲，飛機場受損，城內落彈數枚，勞工大多逃往四鄉，商店整日關門，蓋人心遠不如杭市之鎮定而秩序亦稍差焉。余等晚不得旅館，乃就贛行後面空樓，稍加糞除，以為寄宿之所，同人等長途跋涉，

均能茹苦耐勞，得地休息，於願已足，初不問其塵窗垢壁燭火螢然也。惟時以總行同人在滬地砲聲火光中冒險工作為念耳！

十九日：上午、下午、夜間均有警報，每次經過一小時即行解除；但警聲一傳市面均現張皇失措之狀，而對於各項管制遠不如杭市之嚴切遵守。此種情形於余等將來工作諸多窒礙，中央銀行到贛人員，亦深以為慮。

二十日：警報時傳時解，情形如昨。余等為謀交通上便利，訊息靈通，擬移往漢口，經電總行得覆，未以為謬，遂決遷地之議，惟孫君書城患痢，淮鍾先生亦患水泄，皆以長途辛苦復感受暑熱所致，熊君寶蓀就便回鄉，陳君慕安接洽農村事務，均未能即行，乃決定翌日余及朱君榮亭、張君成濬先批離贛，少數人亦較易得舟車便利也。先是贛行已代租定辦公房一所，余等抵贛時尚未有設備，商店既形成閉市，亦無法佈置，至是乃將此項空屋退租，以免糜費，蓋縱欲在贛辦

公，贛行後樓亦可勉強應用也。

二十一日：中國、交通兩行人員尚未見到，下午二時赴南潯路車站，車上客滿，幸中央委員張定璠先生包有坐位四座，同行僅兩人，即讓出兩座，由余等三人擠坐馬。車行至深家埠站得警報，旅客紛紛逃去車站競匿深草中，一少婦竟失足墮水，幸深僅及腰，經人援手登岸，則衣履全濕矣！車停三小時，始得解除警報開駛，行至離潯一站之沙河地方又傳警報，車乃退駛入山林深處，車警鑿深家埠之紛亂，禁止旅客下車，但猶有少數人奔走山林中，蓋火車確係敵機目標，避險情急亦難怪如是也。經兩小時之久得解除警報，開抵九江已子夜十二點過矣。潯市大水，馬路水深及膝，由站臺坐人力車至大華飯店，車行水中幸未傾覆，旅館在積潦中央，陰溝水浮，臭氣薰鼻，飲水尤不堪入口也。

二十二日：上午八時正探詢輪船間，三北公司副經理趙君來晤，

知招商局有船上駛，即可到潯。十時許由京開漢之江順到埠，即乘小划前往上船，則旅客摩肩擦背，宣告不售客票矣！幸經趙君與船主交涉始得頭等艙一間，舍此即無一席隙地，不覺喜出望外，然自划船扒上躉船於人叢中經過鐵駁，跨越欄干上登本船，已費盡力氣矣！

二十三日：上午四時許抵漢埠登岸到漢行，就樓上為寄宿辦事之處，即總行前此在漢時辦公之房屋也。武漢居長江上游，為陝、豫、皖贛、川、黔、湘、粵水陸交通之樞紐，各方消息靈通，以視南昌之郵電遲滯，交通阻塞便利實多。此間防空力量充足，日來敵機雖屢次圖襲均為我機先出動迎擊，敵機懾於我空軍之威力，於離漢數十里之外，即望影逸去，市面安定，秩序極佳。

周佩箴書於廿六、八、廿三夜。

生 活 日 記 之 一 斑

日記

三十九年
五月十二日五時半起身六時半伴

曾慶慶渡海至半島海酒店航空

公司辦事處辦理登機手續旋即

赴機場至九時始起飛曾慶慶

同行同事王君即乘原車回古機中

曾劉有國兄及陸軍士夫人均沈整實

君乘客僅十元沿途平穩異常

於十二時抵安於台北機場承惠先

及汪武慶兄均與行台洽中事應經理

侯銀恩 警署 兄弟事接施印同赴

峨嵋街總管理處 啟 孫業兄弟

開董監事席會議 已定於十七日舉

行午膳後休息後片惠兄開談並玩板

印弟書愛已港業已安枕以免洵滿體念
訪姚味亭親家

晚上又寄一紙平候晚膳後乘行車訪郭

言崎兄並將何苦想夫人許黃文彼服

一箱索古以寄兄適出差未暇遂將衣

服交梁副官收姓者代收至甚聽適矣

理那兄在座遂与長談久之而別訪朱耿
毅仗儂德中言歸

五月十三日

訪于古任芝生及大哥嫂陳立夫沈
浩升洪茵友諸友好晤訪狀居武邑道
從出香原晚至安某池以深中返鼓周
宏清兄一書謂聖壽陳總裁何日可以
晉謁蓋既至此間數十年老友關係在理
宜互訪彼是否有暇接見乃弟一問題

日記

五五

五月十四日

五六

午閱報以雨未出門下午訪理初兄何雪
竹兄查石村兄徐子禹兄均仗出孝
旋與味亭親翁及其弟小孩同遊北投
並至軍人俱樂部洗溫泉浴該處風
景絕美裝到有風味回城味亭學的
至老大哥吃而次者王姓中租君是東
北人前亦是公務員招待甚殷甚歡
兩日兩茶共計廿八元之巨香校港

由首領畢與味兄同至廟所適飲

兄位儂來白談久之是日辛秋后

武兄及中^時外甥來下午曾訪胡梓

乘元彼畧談開會事

吳煜卿兄來適他出未候

五月十五日

上午徐孝禹兄為延益兄來

赴農行訪趙存屋黃君持兄坐談

片刻訪徐祠周俞鴻館適他出未候

午刻与惠夫兄同赴藤屋君特兄之坊
此午飯同席者第主二兄之夫人及農
行同事多人旋觀動物園於傍晚
回寓小車休息以同惠兄田君巨稜
兄公館晚膳同席有蘭友室竹石村
諸兄邀席正在十時以矣

五月十六日

上午查二石村兄來至十時余應總統
府公召兄即至總統府以由尚早芝

日記

訪談廷植葉一星之周府傳三元四岳
軍情時立談少吹但植之元亦來互談
數法由多學科胡維達同志伴同車
大客廳候見之客均十餘人大批見
過後即由胡伴全車獨往之介紹
精神氣色按在籍口時及佳滿面
笑容似甚興奮約談數分鐘中
回寓方取履已至味辛親家履旋以時
間已過在西菜館午膳各人僅吃三

據許翁拾錄之鉅室在駭人聽聞
也晚膳後至時中外暢談
彼打針旋至朱駒又慶問
談至十時餘返寓話之促促
及李張明春約談至十時始
休息

五月十七日

上午朱李二君來旋同惠
先同出訪居說老鄒海老

仗出未食即至立夫无慮干
膳：畢過廟吃膳及同
惠夫兄弟幾人到本地菜
館別有風味已十時言
歸寓作政河妹

五月十六日

晨六時半即起身隨同惠夫兄
搭大車赴台中必經經過山洞而
處之多煤炭飛入車中滿面切

黑鼻鼻孔在巷乃付臨開車十二
時臨到目的地勸老及市長陳
君與程世傑兄弟均在站迎
候即乘車至果元亭中午後
由至市府迎賓館休息二十
分鐘又

回果元亭是日適為

先烈英士先生成仁紀念日

子采兄前由英士嫂之奉行
家祭余亦奉加行王躬翰禮想
當年是日午四時偕与季陶乞
生及吳仲華兄在子殿飛路散
步至仁和里趙菊叔兄家始
聞此惡耗甫即前往英士兄
生已遠極矣一小時左右若如
同志均痛楚哭失聲所以此行
礼时或欲淚下幾十時即睡以

迎賓館久未住人一切適備

均不完美且房屋甚大前是日

奉皇太子避暑之所故建築華

貴氣狀一祇余一人太覺寂寞

故在弟兄處住初一宵

是晚飯畢曾與弟兄言渴勒

者

五月十九日

去年月勒若忠兄初吳札柳夫人

汝同意之振事言歸適大
哥為陳君來異談旅與田君
真山意之至安幸必洗滌
在山西管心翅以又至冷飲
慶生即回得漢夫十七日
朱君夫婦來談十時睡

五月二十日

午後同致馥至時中履適郭
宗嶠兄亦在中心診所暢談片刻

美和甚琪款前已於今年未此

皆兄約六時半至俱家

晚膳藉可一叙全打針後仍向取

履至味弄款家處未味施至履

元靖

因先兄履訪候適味兄六在夏淡

片刻与味兄至然禁氏兄及郭悔亦

兄履探病以匡戒免客未味時已

六時雖中動郭宅主人廿以未回

是與芸兄累後旋萬君位像六

美味元因事定古常兄弟必至八
時始回詳述舟中撤逆情形非常
嚴密神祕不為匪方所悉所以得免
成此偉大工作此公幹使稍細確可
欽佩飯後於十時左右言歸

五月廿一日

午刻與王老階兄憲夫兄至日岸武科
理吃飯下午味兄及弟兄來訪嗣同

味元至岸延芸元廠吃川菜同席
有標六乘伙懷大香和延芸大旋
即返屬高行改河煉

五月廿二日

下午出北廠場並打針不干開
董事會行中宴出董監發
二席穩至安某池洗澡即返屬
休息

五月廿三日

去年三陽情兄來此長談旋情
夫心身不于同惠兄訪田叢山兄
希望兄均未遇訪陳廷欽兄之
本遇長日無聊至甜石潭一遊
青山綠水景色天然暢遊至
停晚始返晚飯後與惠兄及
陸君步於出遊旋遇田君至
咖啡館小坐又至茶館暑佳是
心十時三刻返寓

五月廿四日

中午陳廷能兄從後溪
此約赴金門午膳

上午訪王亮晴吳維輝先生

下午至時中廠打針晚膳後出

訪勤考及百先希曾兩先生

歸浣溪

是日午榮廷三兄留話為
他向中共銀行具保證書

五月廿五日

上午勸老立夫人來訪飯後請

曾君談相頌靈驗極同田君

惠兄遊草山於五時返廬函

去王立亮疇兄新之克有香晚
住心益履中央銀行去詢由與
兄具保事當即答復晚散步

五月廿六日

上午開常董會十時半同聯袂訪
味辛款家旋同至英大昌而

初傍晚與惠在堂老商電
影晚睡必以蚊香太多吃不
能看書睡又太早三人上出門

散步約十時三刻返廬休息得

韵味為常深亦甚喜行

五月廿七日

是日傍晚延芝友饗
素味凡六菜一糖

上午沈下兄來下午五時中廣

打針施大哥來同到他家吃飯

於九時回廬惠之玉君陸君

同出散步即返廬

五月廿八日

晨八時半同惠之玉車送

勒老

旋与階升名爵同至莫衡君家

用早點

莫是同鄉現在路白服

理髮一喝名之味夫以孝約赴

屠家柵午膳花禍言及來

長談高行改詞條

五月廿九日

午刻与梓華安眾佑崇潜兄赴桂

林元之約至錦法午膳畢回大衙

燈及秋想未五付同志元五時中

廣業兄打針嗣尔依惠兄並安克
司光極應之肺部甚佳回廊晚睡
後与莫老惠兄觀電影吃茶

孔十寸半言歸

五月二十日

恭叔陶妹雲
寄詞敬函

雨冷

上午偕交行同去藝大德元至財政部

請鈕珍錄司長赴張水英領事

館先晤華辦事處君引見黃領

由鈕君說明是代表財長晉謁請

英領給黃傘的至香港入境証
英領云我對於香港政府本有
約定英若是駐港居民其入境
証應由當地政府發給若是台灣
國府的高級官吏因公赴港其入境
証歸駐台領事簽批前日徽部
長的事信一方面說周先生是交行
常董一方面又說是駐港居民照此
寫法使我在工作上甚感為難所矣

在不能過也尚希原宥余還再三進言
要求請彼通融幫忙彼等恩公之物云
我不為周先生者實至誠府商量至
詢駐港駐址所有電報費為定付
五拾之以後再稱施即返屬英烟館在
山坡上面石級頗多不適小天雨若均由
龍共君打傘扶持可感之至回行午膳
晚膳後與田君惠元視電影吃茶
即回休息

二月三十日 雨冷

上午与顾香玉味辛款茶廬坐谈久之
味尤的赴日本料理店吃饭由联元作
东道主彼以吃物不足持向余做乙而乞
饭畢联元回余与味元访惠浩者侯
德浩者侯出来晤与曹太一畧谈访
张莲生元详谈查各行向帳事旋
访吴礼卿元適赴台中晤其世元
畧谈即赴台中廬打針回行晚行

中者同仁公宴至九時盡歡而散以
雨未出門臥後覺暈中背癢微
有咳救涼天時不正受涼了

六月一日致曾慶出雨冷

晨昏趨還來乙右之下午寫候寄

曾公慶並附古稿考一函是勅者託轉的

趙志彝兄

字淳如浙江青田人

來此長談晚膳

後以忠允出外散步

六月首雨冷

洪曉元來十寸龍君得英個事
館實法意香港入境証事已有復
案流前往辦理手續中與龍
君前往因個証者約有數人不得
不尋手續如好後至香港航空公司
接洽購西票據云為款補一往防
疫証故即返行午至兄均至外間
小初三時在行開台北紡織公司
成立會董東會五時至中庭

打針要果必洗浴即返種蘭友
兄來約赴外後約同席者有立惠
二兄及田君十付子休息

六月三日 雨冷

午休兼兄約赴不知同居有真惠

夫二兄下午訪在表王大哥處適他出至

同
取程及在欽兄處中回屬晚膳旋
通田時三兄觀電影吐茶

六月四日

晨舟前起身謝後由惠在及侯君
銘恩龔君德大伴同至機場辦理
一切手續於九時登機起飛同行
者祇六人因不是客棧座位甚不舒
展台北久雨是日甫晴天朗氣
清飛行甚穩不到十時已安抵
香港下機後見兩妹瑞女及二劉
君已候於機場外面彼此甚為
欣慰當即接海互屬房屋已

租出二間故房間客室已另行
佈置矣理發及印至惠夫下
處一時晚力滿其及漢瑞問談
印睡不平波浴因傷風特浸在
熱水中汗如雨不

附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稿

佩箴先生將章太炎先生手墨「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裱成手卷，分請黨國名流題詞，視同瓌寶，並錄副本以資觀摩。三十八年，上海陷匪時，先生因倉卒赴港處理亞東銀行事，原手卷未及携出。來臺後，得此副本於書篋中，朝夕把玩，常有惋惜之聲！

先生珍藏此文，絕非因太炎先生手墨之可貴；蓋以此文雖為告祭先烈之英靈，實乃警誡生者之箴言耳。今觀此文，如照妖鏡，汪兆銘、李濟琛、邵力子、程潛等，賣國求榮，投附匪黨，原形畢露，可以為言行不能相顧者戒！故此副本，雖非原手卷，但為先生之手筆，亦不無有紀念之價值云爾。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稿

錦杭亭太夫先生手墨
永寶 沈定一題籤

吳興周佩箴



引首

日星河嶽

民國七年 孫文題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

民國五年八月某日某：等謹以荼香量幣告癸丑以來
死義諸君嗚呼哀哉自袁氏得位馮恃泗宗賊餘醜
以亂天常始雖假號其有僭逆之心久矣群倫側目未敢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稿

正言獨諸先覺之士扶義發難冀得折其牙角武力
不當咸死鋒刃既而屏營伏竄斃於虞候者先後
蓋四五萬人元凶建號西南始義勝兵用命狂狡燿
沮猶有淫威餘烈制人死命天奪其魄而後假定一
時迨念諸君伏節死義之初豈遽知其有今日事哉
某等以為武昌之師以弑異族雲南之師以蕩帝制
事雜暫濟而皆不可謂有成功則何也異族帝制之
執非一人能成之其支黨盤結於京師者不可賡許京

師未拔正陽之圍未摧雖仆一姓斃一人餘孽猶烏
獸屯聚其間故用力如轉山而收效如毫毛遠以是為
成功者是夸誕自誣之論也人情媮息慨此小原未暇
計復日隱患某等雖長慮卻顧不敢自逸無若衆論
之謹歟何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之大酋終
有瑛丑之變禍患綿延首尾四歲以詔諸君子憂繫
豈小人媮息之咎某等亦與有罪焉今者兵未逾江
元凶自隕于彼所喪一人耳罪魁報將與嘗受偽命之

吏根柢相連不可鉏治彼訟言帝制者亂人也陰佐帝制而陽稱疾不視事者又亂人也以其野心與帝制異議而欲保介袁氏餘業以撓大法而為罪人托命之主者復亂人也三亂不除則袁氏未死國會猶朝露元首若贅旒然而二三躁競之士鑿窟天功以為己力欲弭兵以修文政他日復詭後生之憂其罪將彌甚於某等也乃者國人不知禍亂之幾某等不能正告而諸君子死難於前訖于今茲涉歷稍深矣監前事之敗而知後來之覆某

等無所逃其責終以庸衆愒息莠言相扇憂危之論
不足以儆君子而更以好事方命相誚是使諸君子徒死
于前而異日才俊之士又將累之與諸君子相枕而為積屍
也烏呼死者則已矣其有知耶且無知耶其靈爽猶足
以振起頑悛生者當知之知袁氏未死也知死者之望
猶缺也知死者之不欲徒以生命質人一夕之娛戲也以
是猶豫不虞訓于師干而教之無忘戒守禍其可以少也
不然朝日享月祀薦之馨香樹之表旗豈碑高龍以安

之寓全刻石以像之壇壝廟祀以奉之誠不足安諸君子之
靈而所以為負滋大不及再稔故表未除新表又見告矣
斯亦非諸君子之所遠恨長盼而已者邪烏呼哀哉
右文為太考先生親筆凡四十八行行十五六字或十七八字不
等而疏後表末數行字畧小行畧略因紙幅固仔故耳

正氣一發萬竅應靈鬼新氏屏息聽如佛說法通幽明又如
 屈軼指奸佞養奸如卧屠火焚天下大事烏乎定故喪新喪
 有明證見危猶恐力不勝國民居臣膝國會方墜凡六年六月
十月皆
軍國法動等到大總統無元世解脫國今時雲為有謝會位唐健克著
兵討叛唐不應且有國會墜敵之電施以唐東昌言自主眾兵護法以應
劉建藩衛山之師唐
占強兵佈請國軍 可憐中華十萬里只容北洋兩字耳馮國璋
以副使
統入代大總統兩電群帥
謂當為北洋派効命 民主何嘗嗜殺人蒼生都為非法死人
 烟斷絕戰雲紫望陵迤北婦
瑞鸡犬盡屠 一部共和偏安史國會自集於唐東
即其地組政府
 嗚呼招柝地發四海窮強隣耽飢晴紅海外歸來泣陳

東 殺博瑞宿播國孫沈 東隣相實殉 共同出兵之約 聽風聽雨聲洶

聞道先生居閩中欲往從之阻大輝安得群靈一掃空為文
以慰九原以下之鬼雄

民國五年丙辰表世凱自斃於北京後國軍為小人所惑而

中阻帝制雖之傷餘孽不除去矣先生實一烈之是時祭癸丑

以來死難諸烈士於上海太矣手稿此文以祭告死者實誠生

者也年不及於精軍團後集眾叛國此文語之先覺可寶

者豈徒手墨而已 佩感吾先相祭事得此稿珍之因感於

時裝漢扁題并識之侍諸不朽

七年七月八日 蕭山沈定一

三亂知幾未偶然國殤山鬼劇頑寬鉅儒微意無人識
留作摩挲與後賢

白骨青墳豈澹忍傾車接軫使人悲武林一老聲成血
薰正荒山尚淚垂

佩箴得太矣先生告癸丑以來死我諸君文稿視猶瓌寶
什襲藏之為題二絕 戊午七月 楊庶堪

微言大義

民國七年秋 居正

已傷流血遍神州未見人民得自由
吳郭尚懸子胥目秦庭欲獲於期頭
屢抄瓜蔓傷元氣未闢陰霾盛鬼謀
獨上西臺歌楚些幾人今日屬清流

民國七年雙十節後一日 馬君武題

無復論孤憤空餘弔國殤感君珍重意撫卷一傍徨

无量為 佩箴先生題 七年雙十節後一日

斯文猶未喪吾道竟何之家國心肝造江山血淚支日星河嶽
在天地鬼神知惟有平民志千秋奠國基

佩箴先生屬題

孫洪伊

可憐寧鳳甘惟悴如此江山待祓除且遣先生續天閭人間
不識豫言書

民國八年三月漢民題

莽之中原恨不窮內教為彈血為鐘於今戎馬縱橫日又
見先生哭鬼雄

民國八年三月 佩箴我兄以此卷屬題慨然賦此 汪兆銘
赴義諸賢採不水欲億一死障江河可憐赤血千年碧百
得人間正氣多 民國八年春日

佩箴先生 屬題

李龍徐謙

大好河山懼陸沉 拚將熱血鑄丹忱
黃花岡後諸賢繼 振起寒心億兆心

民國八年三月 徐沈儀彬題

惟鉄骨血壯山河之色 斷脰絕頸萬禩所儀
型邦之昌烈士

之賜拜之不昌吾堂之疾吁嗟手後死不得辭其咎

民國八年五月

佩箴先生以此幃見示素題感而作此 朗西左腕

殺身成仁

佩箴先生屬題 張繼

非今斯今也者如斯奈何以死懼之

佩箴先生屬題 蕭山朱大符

不問動林但觀結果殺身成仁死得其所

佩箴先生

屬題

廖仲愷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壯懷然而涕下

書唐人詩題太夫悼烈士文

季陶

風雨來天未蒼在牀上樓招魂詠楚些、含淚看吳鉤避
諱文章賤偷生姓氏羞故人多慷慨高義足千秋

右錄舊作一律以應

佩箴先生之屬

謝良牧

百年歸丘壑用此空名道

掃掃淵明句應

佩箴先生屬題

鄧家彥

吾輩前輩以文論當推方孝孺其氣格俱不出前代軌迹
謂為是代表革命文學殊為過當此文亦殊非其傑作但
憤懣之心情頗能流露於楮紙而所紀故迹又正足為後世
研史者資此亦足存矣今日展視乃於題跋中見執信書所
謂逝者如斯存何以死懼之始於方矣之文與革命之事
均評得其理不以死懼其執信之為人耶其文其學其才其
人格無不為近代國人之中一鈞柱而今乃死矣余惟於此
人崇之不已而書亦在方矣及諸題跋上執信死矣知執信

者當推為民國殉身者中之第一人此若有此君題跋乃
為至寶嗚呼傷哉特以盛哉佩服其永寶之

民國九年十月廿七日 李洵

赤血與白骨化作河山去莽々乾坤中誰秉此正氣

佩箴元扁題 民國十一年八月烈武

滯血生還日招魂野祭時敗餘羞後死痛定念先知報
國寧論晚成功定有期餘抗餘老淚切莫續哀詞

十一年夏兵敗武功間道來海上

佩箴兄以太夫先生於癸丑以來死難諸烈士文稿屬題因感

賦此

于右任

同聲一哭

癸丑之役距今已十載太夫之弔死義諸君文亦五 而國人之憔悴於武夫虐政者如故餘孽之陰謀煽亂者亦如故何日太夫之文一一吻合乎是不禁為之一哭民國十七年孟冬佩箴示太夫文屬題因識之青城

二十年夏佩箴出示卷屬題展視之則太夫先生所作祭

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稿也。循漢教過誠可寶貴。爰為綴
教語於後。

張人傑

千秋正氣

朱逸民題

浩氣長存

李濟深題

前者仆復者繼奮精神。摧帝制。灑吾同志血。堅吾同志心。
光日星。長千秋。萬歲。

佩箴同志 屬題

顧企韓

死重泰山文同瓌寶痛困難之日深求民族之永葆

二十二年三月

佩箴同志 屬題

邵力子

精神不死

民國二十二年

林森

碧血與青史合流精神共文章不朽

佩箴同志 屬題 右美先生撰祭 癸丑以後 死義烈士

文

李仲公

正氣之節耶 晞髮之集耶 浮丘招魂之辭耶 是宜登西臺
擊鐵如意而讀之 民國二十三年夏

佩箴吾克 扁題 翼如邵元沖

白骨溼黃土 丹心照汗青 斯文垂千古 南卷走精靈

廿三年甲戌秋為 佩箴先生題 湘鄉張默君

楚些詞中墨未乾 江關蕭瑟奈何天 他時國史徵遺事
莫作尋常文體編

佩箴先生為題 廿三年十月於白下 古剡竺鳴濤

奠山河貫日月
驚風雨泣鬼神

佩箴先生命題

敬垣同客秣陵

太矣此文正義卓識二十年来竟為改造歷史之先驅死
義諸君大節得此益彰矣

佩箴先生屬題

鈕永建

二十三年十一月六

心所服者力數之義所宗者躬行之

葉楚傖謹識

惟大節所臨天下不能回其守雖百世之下君子猶將見其風

佩箴先生 屬題

黃復生

茫茫塵劫自生自滅十七年前事休譚留與后人作史看

太矣文章自是千古烈其為革命文之先導而此又為祭告
革命死義志士之文也洵足珍已因題數言以歸

佩箴五兄 寶存 民國廿三年冬 譜笙

檢讀為文感百靈賢良寺裡一燈青沈霾十五年前事不
與重提已涸零

楊天驥

龍泉寺裏青袍客開國志懷獲願文今日滄茫何所問

棲屋江海望吳雲

佩箴老友寶箴 民國廿四年立夏日 劉成禺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佩箴老友寶箴 民國廿四年双十節 焦易堂

三乱早知是禍胎陰霾高里幾時開
絕情一卷傷心史多
少頭虧換得來 廿五年七月二十日為

佩箴先生命題 味辛吊姚琮

授命迄今日堂廿四霜乾坤留浩氣文字亦流芳
聞春鬼

神注揮戈日月光多君珍重意拱壁共收瘡

佩箴先生屬題

何成濟

廿六年元月

大盜僭竊率獸橫行烈士仗義奮不顧身歟竄盜亡國
以安寧皇皇祭告玉振金聲以慰忠魂與日俱存

佩箴先生屬書

程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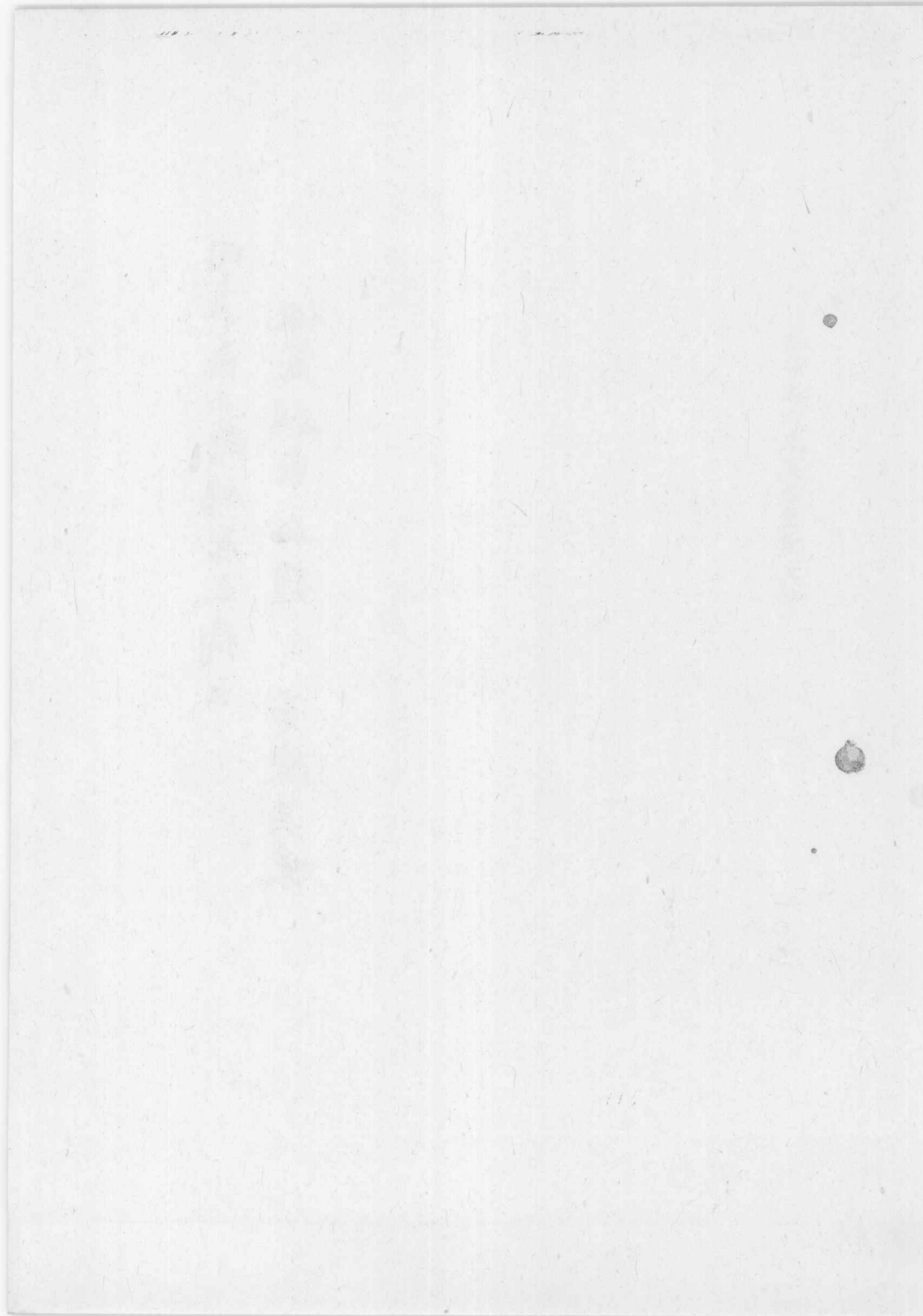
民元以後袁氏叛國之心路人皆知吾黨志士奔走呼號多
遭慘禍先兄英士亦以身殉太矣斯又一字一淚誠為不
朽之作余展讀既竟深敬先烈諸公各有千古而愴懷

同氣益不勝鶴原之痛云

佩箴親家命題

弟陳其采

告癸丑以來死義諸君文稿



附
哀
思
錄

總 統 褒 揚 令

總 統 令

前交通銀行常務董事周佩箴，持躬廉介，賦性忠貞。早歲追隨 國父參加革命，贊襄財務，陳力孔多。北伐以後，歷任廣東、浙江兩省政府委員，土地廳長，及杭州造幣廠廠長；罔辭勞瘁，克著清廉。旋任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經理，交通銀行常務董事；學劃精詳，益彰懋績。迺以積勞病逝，深堪悼惜！應予明令褒揚，用彰政府篤念勤勞之至意。此令！

總 統 蔣 中 正

行 政 院 長 陳 誠

中 華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六 月 五 日

總 統 賜 頒 匾 額



榮哀之堂靈



治喪委員會公祭之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周董事治喪委員會委員陳誠等謹以庶羞香帛之儀，致祭於

周常務董事佩箴先生之靈前。詞曰：翳維先生，黨國之重；痛清政不綱，惟革命早告奮勇。攻武庫，克兵艦，狙擊賊帥，莫不竭其智力而盡其種種。迺整經界，主金融，為民謀厚利，為國効大忠。迄乎北伐，樓船實闕，遂奮其舌，說服節鉞。抗戰八年，兵窮財彈，艱難孳劃，危而後安。田家額首，百穀芊芊，不有農貸，孰使之然。卒奏凱歌，懋賞不愆。平生慕魯仲連之為人，擅計然策，施于國而不謀其身。貧病交迫，忍受無言。惟恨寇盜未平，所志未伸；交深管鮑，痛切人琴。隻雞斗酒，涕泗霑襟！魂兮歸來，鑒此寸心。嗚呼哀哉！尚饗。

編者附言

佩箴先生逝世六週年，周夫人洵端女士，特搜集有關先生紀念照片，傳誌，墨緣等書文印成專集，分送先生生前友好，以資紀念。

先生逝世時，周夫人由哀而病，雖承諸親友照拂，但因人手不敷，致將各機關首長，諸親友好所送之哀輓文字，未能一一抄錄；故此集編排時，經再三考慮，祇好全部割愛，致為歉意！

又此集編印，因時間匆促，難免錯誤，尚祈讀者諸君，予以指正。

校對
編輯

同人謹啓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俞氏紀念
委員會編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目錄

- 一、遺像
- 二、總統題額及褒揚令
- 三、紀念照片
- 四、傳略
- 五、墓誌銘
- 六、紀念文字
- 七、祭文
- 八、誄辭
- 九、輓聯
- 十、幛軸禮箋
- 十一、唁函唁電
- 十二、致送賻金台銜
- 十三、致送花園、花十字架台銜
- 十四、喪葬紀事

遺

像

鴻鈞夫君 靈鑒

一霎痛分飛往事縈心千萬語從何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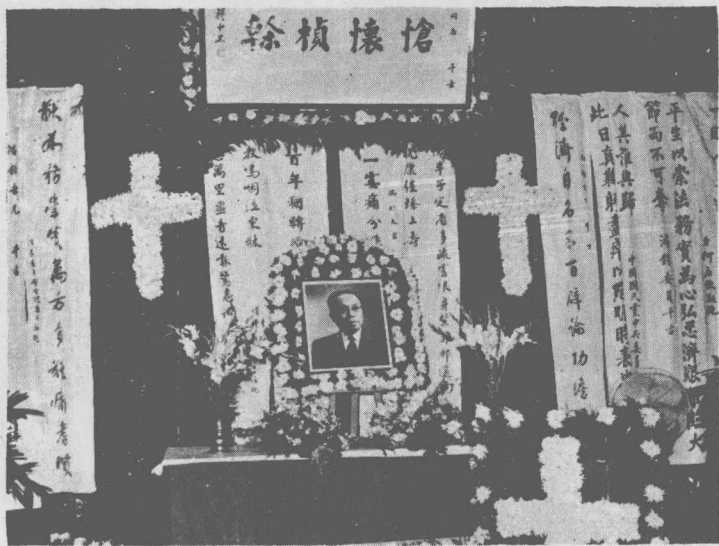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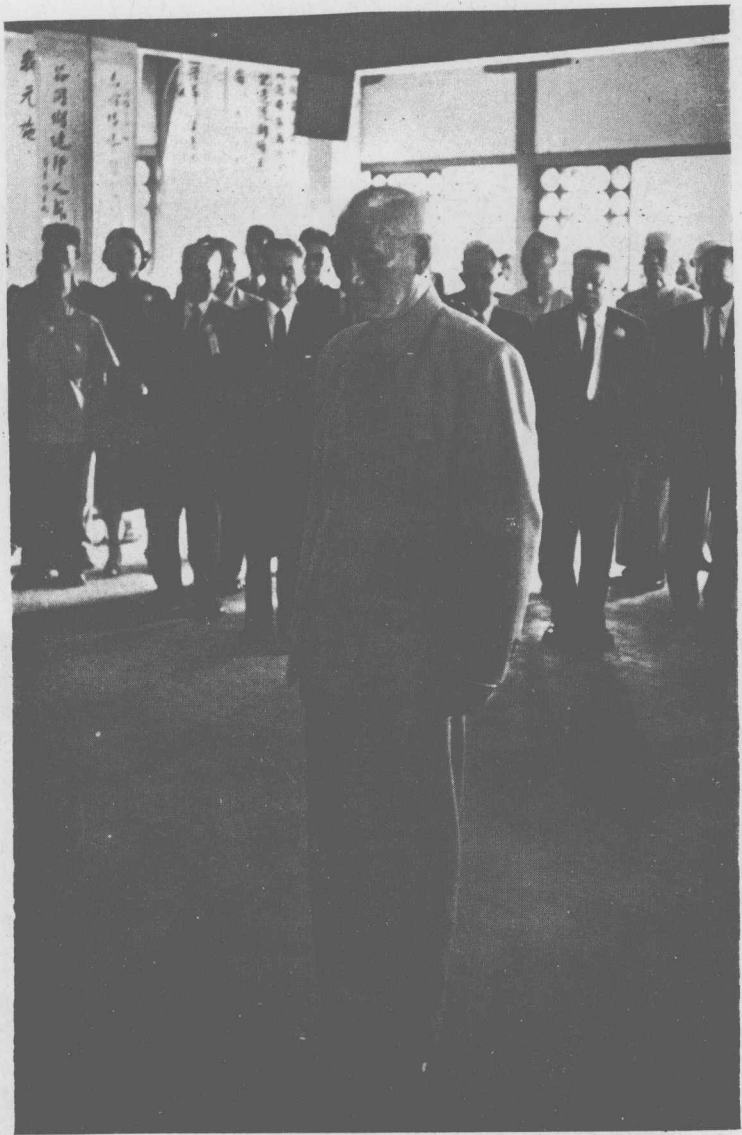
百年猶轉瞬前塵回首四十年艱苦同嘗

妻梁就光泣輓

總統題額及褒揚令

紀念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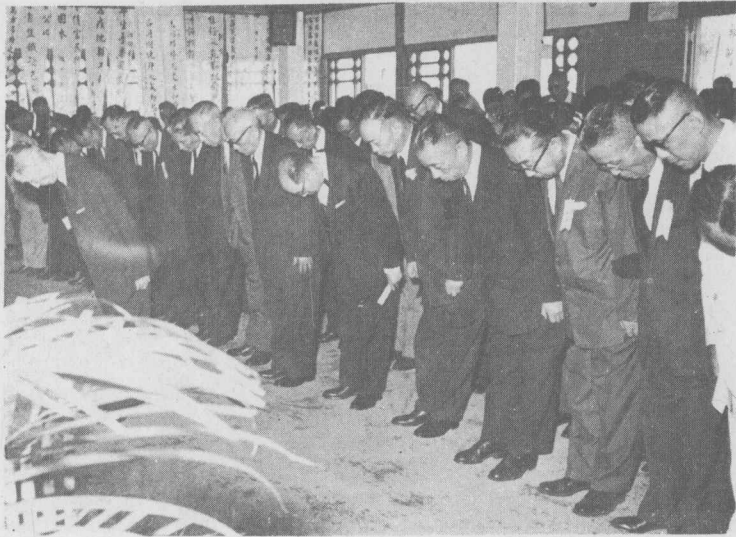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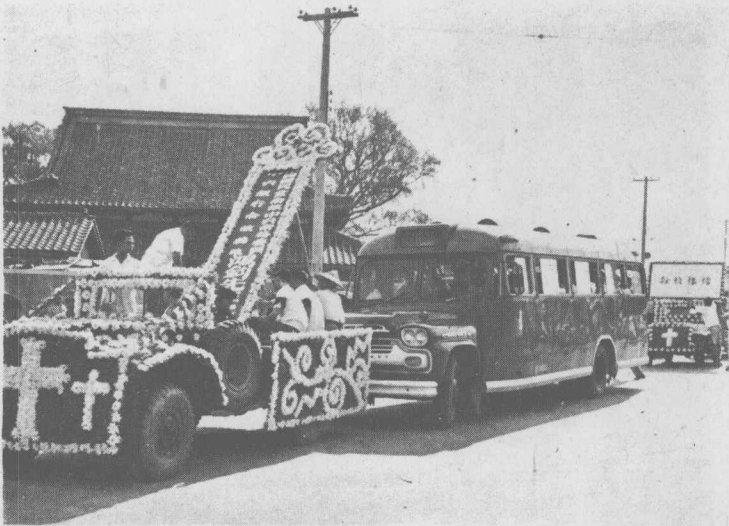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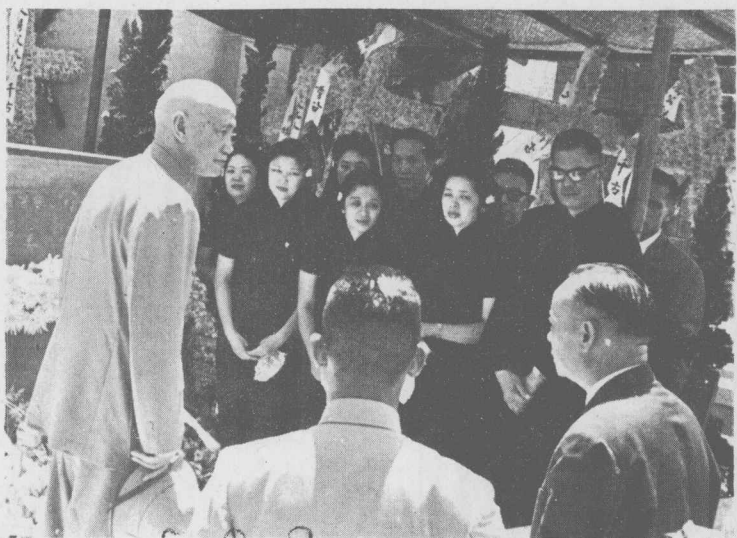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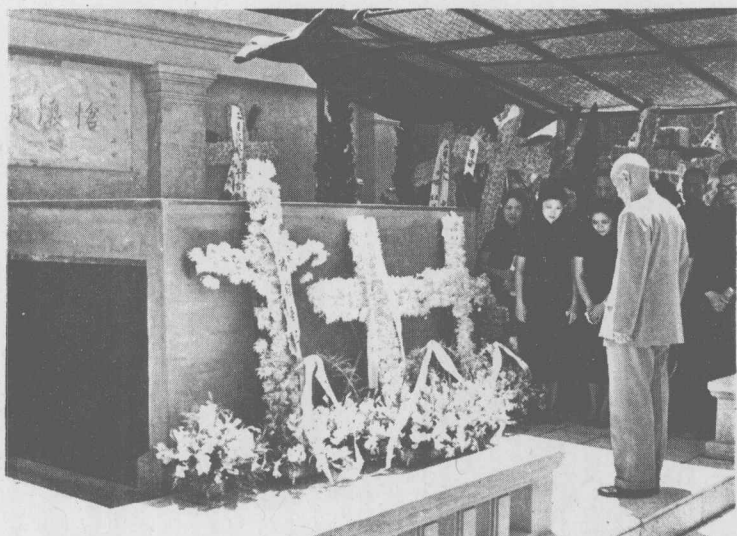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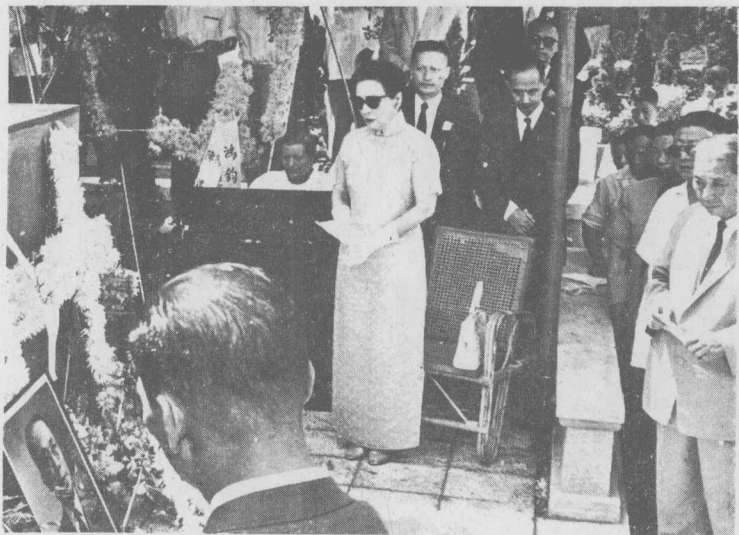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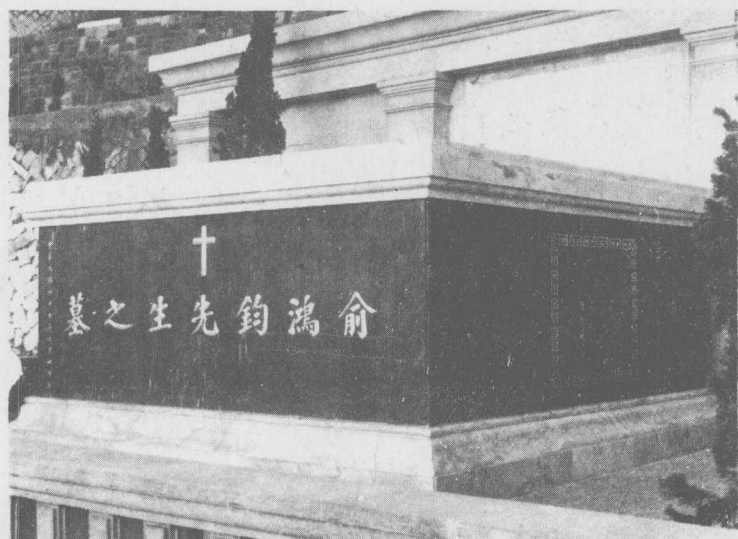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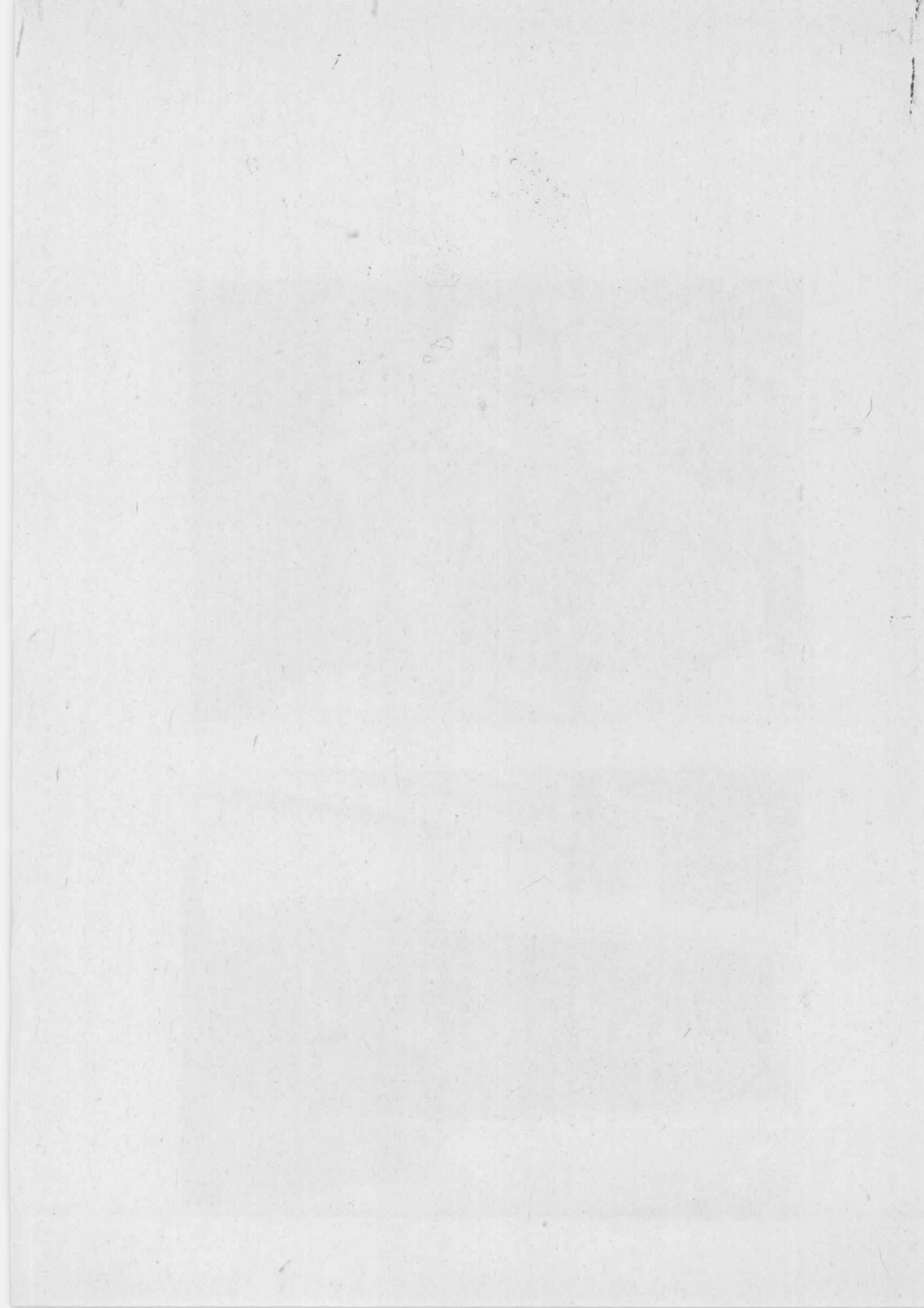












傳

畧

新會俞先生鴻鈞事略

先生姓俞，諱鴻鈞，廣東省新會縣人。先世以商起家，父廷柱先生始遷於滬，母李太夫人生二子三女，先生其長也，幼而岐嶷，敏慧逾恆，賦性厚重果敢，遇事必盡力以赴，抵於成而後已。廷柱先生雖習於商，而於先生始遷於滬，督責甚嚴，於先生企望尤殷。時當有清末造，舊家世族，仍以詩書課子弟。先生生當其時，幼即讀畢羣經，涵濡禮教，此於先生生平之持躬處世，踐履篤實，可以見之，蓋其素養然也。年十九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院肄業，辛勤力學，每試輒冠其曹，於中英文造詣均深，民國八年畢業後，再從事法律研究，尤多心得。迨入社會，初任上海英文大陸報記者，新劍初試，已自不凡，深為該報主者所器重。迨北伐軍興，參加革命，一度任外交部秘書。北伐告成，全國底定，民十六年上海改設特別市，第二任市長張定璠先生稔知先生之能，邀入市府，初任宣傳工作，主編市政週刊，其所著社論，見解精闢，持論平允，讀者歡服。嗣擢市府參議，未幾復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整頓稅收，釐剔弊費，提倡科學管理，收入大增，績效稱最。張岳軍、吳鐵城兩先生繼任市長，均以先生為秘書長，倚重至深。滬市為遠東第一商埠，華洋雜處，梯航輻輳，治理之難，遠非其他各地可比。先生綜其樞要，時其緩急，殫精竭慮，悉洽機宜。其中尤以收回越界築路一事，為當時人士所稱道。先生嘗謂外人亦知講理，如吾理直，則須據理力爭，何懼之有。其時日軍盤據滬北，方欲有事於我，日尋鶻隙，冀起爭端，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役，先生均躬與其事，力任折衝，從容肆應，卒折強梁之氣，用沮鯨鯢之謀，深得當時友邦人士之同情與敬佩。其時先生已繼吳鐵城先生為上海市長。迨滬市撤退，政府西遷，先生乃間關赴渝，初受任為財政部政務次長，旋兼中央信託局局長，至三十三年十一月繼孔庸之先生為財政部長，三十四年復兼任中央銀行總裁，綜財政金融於一身。遭大投艱，仰見我

總統知人之明，先生感懷知遇，力圖報稱，盡心籌維，精勤擊劄。八年抗戰，而財用不匱，四塞受敵，而軍資無虞。此皆由於先生之調度有方，故能克收績效也。迨乎華夏重光，還都事畢，部署大定，三十七年五月，行憲開始，內閣改組，乃辭去財政部長，再任中央銀行總裁。其時時局杌隉，金融劇烈波動，復因改幣關係，全國紛紛，先生力支危局，百計周章，雖未能挽狂瀾於既倒，然盡心盡力，蓋良苦矣。於時共匪凶焰益熾，舉國騷然，庫存黃金，國家命脈所繫，首須謀其安全，毅然排除各方非難阻撓，密將全部庫存黃金，於數夕之間，以海關巡艦，悉數運台。猶慮放途有失，中心沉重，朝夕繞室徬徨，及台灣安抵電至，始欣然若釋重負焉。未幾京滬相繼淪陷，匪騎長驅直入，而庫存獨能免於資敵者，皆先生力也。旋台灣改革幣制，即以部份庫存，移充發行準備，以堅幣信，用能奠定今日新台幣之基礎，使抗俄反共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其功尤足多也。政府念先生前勞，敦復使出，三膺國政，規畫復興，同時兼交通、農林兩銀行董事長。嗣復兼台灣銀行董事長，悉心壁劃，獻替益多。至四十二年受任為台灣省主席，就任之初，即以「從安定中求進步，從進步中求安定」為施政根本。其時適值糧價暴漲，民心惶惶，先生稔知各地存糧尚裕，且收穫有期，不以為慮，且指示主管糧政人員，建立糧食預算制度、整頓倉儲、儘力抑平米價，卒以安渡難關。對於耕者有其田政策，尤澈底執行，以固國本。他如停止林班特賣，革除積弊，政風為之不變，觀感為之一新。並主持經濟安定委員會，以簡化財經機構，推動經濟建設。迨四十二年，總統第二任膺選，提名先生為行政院院長，謙辭不獲，兢兢從事，四年之間，雖叢難多端，而先生身許黨國，昕夕焦慮，不以難易擾心，不因勞怨自餒，肩負重任，悉力以赴，其成政毀譽，非所計也。在其任內所持政策，穩健而開明，以崇法務實之精神，創造良好政治風氣，并使經濟維持長期安定。四十七年辭去行政院院長，專任中央銀行總裁，鑒於時機未熟，一時未能全部復業，居恆引以為念。頃奉

命全部復業，乃計劃甫上，而先生因積勞觸發舊疾，未及兩日，竟以不起，可痛也已。先生忠於黨國，數十年如一日，歷任中央常委及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竭忠盡智，贊劃實多。先生爲一虔誠基督教徒，自奉甚儉，生平不茹烟酒，不事居積，清真廉介，平易近人。早年在滬，暇輒喜馳馬爲樂，後因治事日繁，遂亦不暇及此。然體素強健，除舊患哮喘外，鮮有他病，惟近年飲啖不如從前，識者每以食少事繁爲慮，然不意其委化竟若是之速也。彌留時殷殷詢中央銀行委顧問央行復業事，此即其最後一言也。於此可見先生對事負責之精神，而於央行復業一事，尤念念不忘也。夫人梁就光女士，才而有德，與先生伉儷相偕，四十年如一日。女三：長筱鈞、適繆君啓威；次筱梅、適李君福泰；三筱璉、適李君其昌；均能善相夫子，有聲咸鄴，外孫男女若干人。弟鴻潤現任中央印製廠協理，友于之愛，至老不衰。妹三：妙貞適戴君恩榮、麗芬適陳君忠蔭、麗芳適梁君思成。姪一，現居美，爲工程師。先生功在黨國，事繁不及備述，謹識其聲華大者於此。

俞公鴻鈞墓誌銘

何善垣 謹撰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銀行總裁，新會俞公病歿於任所，飾終之典既備，爰誌公生平功德，銘於墓次，垂之來葉，公諱鴻鈞，先世以商起家，父諱廷柱，始自新會遷上海，後母李太夫人人生二子三女，公其長也，廷柱公於子女教督甚嚴，時富有清末造，舊家世族，仍以詩書課子弟，公幼而明敏，有若成人，既畢羣經，始就外傳，年二十三，卒業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院，兼攻法律，篤志專精，淹通博洽，初嘗從事新聞事業，嗣入政途，歷任外交部秘書，上海市政府秘書、科長、參議、財政局長、秘書長、秘書長、民國二十六年繼任上海市市長，十年之間，崛起府僚，洊膺大任，雖由於中樞知人之明，而公之才識幹濟，蓋亦有以致之，滬市一隅，華洋雜處，號稱難治，國家政令，不及於租界，主權凌替，積久相沿，無如何也，公熟知情勢，籌維贊畫，遇事據理力爭，卒能一反前轍，初則收回越界築路，繼則課征江灣外人賽馬稅，於是外人凜然守中國之法律，凡前此所不敢為或為之而無功者，至是畢舉，後此對日抗戰，二十一年二一八之役，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後，公均躬與其事，踔厲風發，力折強鄰，名動中外，政府西遷，公間關赴渝，奉命為財政部政務次長，兼中央信託局局長，至三十三年，繼任財政部長，三十四年兼中央銀行總裁，艱難重任，集於一身，其時戰事正亟，政費軍費之支出，百倍於前，公昕夕綢繆，多方因應，卒開中興之業，國運重新，還都事畢，三十七年五月，奉命再兼中央銀行總裁，未幾行憲開始，內閣改組，公辭財政部長，卸任之日，國人均思其政而崇其人，其再綜國政也，適值共匪叛亂，舉國騷然，金融波動，不可終日，公履危不亂，以非常機智果敢之精神，不顧各方非難與阻撓，密將庫存黃金悉數運臺，國家終資以興復，大陸淪陷，擊眷來臺，任政府國策顧問，三十九年二月，三任中央銀行總裁，三月復兼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受命危難，力疾任事，四十二年四月出主臺灣省政，並兼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執行國策，推動經建，制定糧食預算制度，停止林班特賣，政風為之不變，四十三年六月，以

總統蔣公特達之知，提任為行政院院長，謙辭不獲，在任四載有餘，一切施政，惟求平實，因勢利導，期於有成，尤以主持簽訂中美安全條約，堅持否決外蒙進入聯合國，為其事之犖犖大者，嗣以事多叢鏗，毅然請辭，專任中央銀行總裁，從事復業準備，不意規劃方成，竟以積勞觸發舊疾，未及兩日遽爾溘逝，嗚呼，以公之勤勞黨國，數十年如一日，不以名位為念，不以致失繁心，險阻艱難，未嘗易其初志，功在國家，謙退有若不及，持躬廉介，清畏人知，求之斯世，有幾人哉，遇事持大體，務實踐，忍讓為國，休休有容，雖拂逆百端，而中懷恬適，有得乎君子自足自樂之旨，蓋其所圖者大，所蓄者遠，非淺近者所得而測也，公於中西文學，造詣均深，能為擊窠大字，得公權神髓，其剛正勤健之氣，彷彿其為人，公之歿，朝野人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駭愕相告，咸曰，此一代之完人也，臺之民，有自動臨吊泣下者，召伯甘棠，庶幾復見，公生於民前十五年丁酉十二月十二日，歿於民國四十九年庚子六月一日，享年六十有四歲，配梁夫人就光，有子而有德，與公伉儷相偕，四十年如一日，女三，長筱鈞，適繆君啓威，次筱梅，適李君福泰，三筱蓮，適李君其昌，弟鴻潤，妹三，侄一，將以其年七月三十日葬公臺北陽明山之陽，爰述公生平並為之銘曰。

功在一時，而不自矜，位高百辟，若無所容心，智足以周萬類，而聞然自晦，明足以辨物情，渾然和光而同塵，既鉅細之畢包，亦併蓄而兼容，剛健內涵，和悅外充，知白守黑，持盈不盈，嗚呼，謙謙君子，惟其德之崇，其執與比踪。

悼念俞鴻鈞先生

徐柏園

俞鴻鈞先生於本年六月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消息立刻傳遍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巷，亦即中國一周社所在地擠滿了車和人，大家以緊張懷疑的神情趨往俞府，似乎對這一突然而來的噩耗，將信將疑，離開俞府的人，却個個愁容滿面，也有淚痕未乾的。都在悼惜一位賢哲的逝去。

俞先生體質甚好，他的外表，不像六十四歲的人，尤其他的腸胃強健，此可於他的牙齒從來不曾鑲補過證明之，一般具此天賦者，常享高齡，唯一拖累他的是喘疾，二十多年來，常常使他困頓，治療喘疾的藥劑，必然有害於心臟，日積月累，終於由不斷的消蝕而衰弱，而癱瘓，而停止工作，他帶去了俞先生，百身莫贖。

俞先生得人望，尤其得人緣，噩耗初傳，友好奔走相告，都希望消息之不確，甚或會有什麼奇蹟出現。在喪禮中，徘徊往返於遺容之前的，多不忍即離。大家似乎還覺得他沒有死去，大家與他的人緣，並沒隨他的肉體而消逝。

俞先生的功業，衆所共仰，國家史乘，會有詳細記載，無待贅述。他自從民國十六年起，為國家服務三十餘年，勤勞卓越，獻替良多。其中尤以二十六年抗戰初期，在上海市長任內，適值強敵逼境，發動禍端，俞先生沉着肆應，義正詞嚴，處弱國的地位，樹制敵之先聲，此乃俞先生忠貞幹練，才華煥發的自然流露，為中外所共仰者。隨後主持國家財政金融，肅相轉輸，歷經艱辛，更於大陸勦匪後期，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銀元，秘密運儲寶島基地，為鞏固新台幣信用，穩定基地經濟，以支持復興大業，奠立基礎。俞先生從未因此稱功，對於外界責難，亦從不置辯，這是他中期勁氣內斂，忍辱負重，一意贊襄，不矜不伐的特點，或尚未為世人所瞭然者。在台十年，一主省政，一秉國鈞，赫赫師尹，際會風雲，而俞先生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崇法務實，更趨謙抑，這是他後期涵養品德，臻於至高境界，所以繫人望，得人緣，亦為識與不識所愴懷悼念，永不能忘者。

我會三度追隨俞先生做事，二十餘年來，他對我的天真坦率，更不吝時時指點，所以他也是我做人的導師。如今物在入亡，悵望雲天，誠不勝感慨交併也。

時時刻刻與主同在

董顯光

對榮民總醫院住院榮民證道之五

四十九年六月九日講

上星期，好友俞鴻鈞先生，忽然去世，我們心裏，很是悲傷。回想上星期日的早晨，我們在士林禮拜堂做完禮拜後，我和內人，同他們夫婦，握手道別，彼此並說「再會」，想不到俞先生在星期三的下午一時，與世長辭，「再會」之約，在世間不能履行了。當日下午六時，我們到他家裏去弔唁，作一個單方面的再會，並且安慰他的太太。他躺在他們客廳的床上，如同普通人睡著一樣，面上充滿了安祥，似乎像保羅一樣的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摩太後書第四章第七節。

我們在俞先生蓋棺的時候，實實在在可以說：他的生活，是一個時常與主同在的生活。否則他不能在臨終的時候會如此安祥。我們在他面上可以看出來，死如歸家。無疑的，他現在是在與神同在，同享永生的生命。話雖如此，我們對於他的死，還是很悲傷的，因為俗世的感情，對於生離死別，總是難過的。不過就我們基督徒的看法，死的路程，沒有一個人會不走的。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而我們信基督的，却知道死後的歸宿。如果我們依照耶穌給我們的寶訓，常常會聽從履行，我們知道死後的結果，就是永生。在活著的時候，心裏時常存有與主同在的觀念，不違背基督叫我們做一個好人的道理，必為耶穌所眷顧。

與主同在的意義，是請基督住在我們心內，作一切的主張。使我們有好的思想行動，勉勵我們學祂的謙卑，以及溫和的態度，委婉的言辭，有利的行為，愛人如同愛己，能够原諒人家，一切遵行天父的旨意。

要達到與主同在，最好是祈禱。祈禱是一條大路，像一條通電燈般的電線，電線不受阻礙時，永遠是光明的。祈禱是唯一接近上帝的方法，我們祈禱時的認罪和悔改，將會使心裏得到平安，精神得到寧靜，感覺到天堂就在地上，就在我們心裏。（路十七：二十一）我們將會不怕逼迫、不懼傷害、無視貧富、無慮生死。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一個為國殉難的空軍，名字叫哥布林斯中校，他在米尼拉海港駕駛飛機，襲擊日本重洋戰艦，在他的聖經首頁，寫着說：「我已經預備好見我的神了。」一個人有了人生的目標，與主同在，知道人生的價值，才能臨難不苟，勇敢犧牲。神的恩典，是奇妙莫測的，只要我們時時刻刻，與主同在，我們將無分生死，永不寂寞。

假使我們不信上帝，不能與主同在，臨終時候，沒有人能和我們同去的。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人名叫「每人先生」，是一個有錢的人，生前過着荒唐生活，並且喜歡旅行。平時有許多朋友陪他玩，在他臨終的時候，亦要他們同去。其中有一個最知己的朋友名叫大杜子問他什麼時候回來，他說：「這一次去，不回來了。」大杜子說：「我不能同你去。」他又叫他的堂弟弟和他同去，他亦不願意去。這位每人先生，想到他有一個最忠實僕人，叫做財富，平時很聽他的說話，要他做什麼，就做什麼，他最後叫這個財富陪他去，財富到他面前，向他笑着說：「誰願和你同去！你還以為我是你的僕人？你錯了，愚人呀！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玩具，我要你笑你就笑，要你跳你就跳，你的一生，在我操縱之中。我是牽線的人，我是主動者，我不能跟你去，你還是單獨的去死吧。」每人先生，被朋友親戚僕人都棄絕了，他從來沒有見過主，沒有與上帝同在，他怕死，自然死得不平安。

上面我們所說的，俞鴻鈞先生，平時與主同在，在他死去時候的平安情形，充分得到證明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希望我們親愛的朋友們，大家遵行耶穌的寶訓，時時刻刻與主同在吧！

In Memoriam: O. K. Yui

O.K. Yui passed away in Taipei yesterday he was Governor of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 it was a post which he had held for many years and which he held concurrently even at the time when he served as Governor of Taiwan and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several years ago. Aside from the Governorship of the Central Bank and Taiwan Province and the Premiership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Yui had also held many other important posts on the mainland, including Mayor of Shanghai,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Trust of China,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However, it is not because of the high official positions held by Yui that we have seen fit to comment on his passing. Our chief reason for mourning his death is that he was once a newspaperman. Shortly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St. John's University Yui joined the staff of a newspaper in Shanghai. His journalistic days did not last very long, but in later years, as he rose higher and higher in his official positions after beginning his political career he always liked to talk about his journalistic life and recall the many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that a fledgling newsman had to undergo in those days. Indeed, he always appeared to have a nostalgia for his life as a journalist, and for that reason was extremely friendly and sympathetic towards reporters who went to him for news. During the years when Yui was holding one important position after another in the government, all newsmen who came into frequent contact with him found him exceedingly personable and approachable.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things about Yui which may not be known to the general public. Being a man noted for his honesty and moral integrity, Yui was fond of living a simple life. Even while serving as Governor of Taiwan and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he lived in a very simply furnished house and his dining room was only big enough for one round table. Another thing was that Yui was a widely read man and was quite hierarily inclined. Having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he could appreciate good writing when he saw it.

No man—especially one holding a high official position—can expect to escape criticism by others. So Yui was also not spared when he served as Premier. But it can at least be said that he was an honest official and that his policies were always characterized by sanity and discretion. At 63 he certainly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old. If he had been permitted to live fifteen or twenty years more, he would doubtless be able to render greater service to the country.

To Mrs. O.K. Yui and her daughters we wish to extend our heartfelt sympathy and sincerest condolences.
(英文中國郵報四十九年六月二日社論)

君子的典型

弔 俞 鴻 鈞 先 生

俞鴻鈞先生去世了，這是我們自由中國政治界的一大損失！

俞先生在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後，擔任上海市長，調度人力物力，協助守軍，苦戰三月之久，中間以租界領空問題，對租界當局的無理要求，嚴詞駁斥，維護國家的主權，獲得中外的敬重。二十餘年來，他迭膺國家重寄，作過財政部長、台灣省主席、行政院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他一生崇法務

實，所持政策，穩健而開明；主管業務，不求赫赫之功，祇是在安定中不斷進步。

然而俞先生之為世人所敬重，還不在於他的事功之偉烈，而在於他的那種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度。俞先生秉性正直，律已甚嚴；而待人接物，彬彬有禮，人們和他說話的時候，如坐春風。他辦事非常認真，且能任勞任怨。三十八年五月，共匪圍攻上海，其時他已交卸了一切的公職，總裁蔣公要他以個人的影響力，到上海督促各行局疏運所有存款和財產，他毅然成行，在共匪的包圍之中，從容地完成任務，他作了這種艱難的工作，認為義之所當然，從未向外界提過。俞先生平居自奉極儉，他的官邸面積不超過四十席。當監察院指摘他浪費公帑時，許多人為他不平，他却緘默不言。他這種修養是中國儒家精神和西方基督教義的綜合，是道德的高度表現。

俞先生與世長辭了，但他留下的典型是永垂不朽的。（中華日報六月二日社論）

悼俞鴻鈞先生

翻開今天報紙，完全出乎意外的發現了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先生逝世的消息。俞先生是一位素以「平易近人」著稱的政治家，所以他的長處常常被人忽略，今天到了蓋棺定論的時候，轉使人把那些長處追念起來，對他的遽然逝世，深感哀悼。

俞先生一生，以任職中央銀行總裁的時間為最久，四十二年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翌年升任行政院院長，四十七年卸任，仍任中央銀行總裁，以迄於今。比較起來，省府主席與行政院長的職位，當然較諸中央銀行總裁重要得多，但是他對國家的最大功績，還是在於大陸將告淪陷之時，排除種種困難與阻力，將庫存數百萬兩黃金運來臺灣這件事；靠了這數百萬兩黃金，新臺幣改制，才能成功！這十多年的經濟穩定，才有了基礎。這件事，的確值得我們大書特書。但在俞先生省府主席與行政院長任內，似乎一切都祇做到個平平過去，找不出一件事足以與黃金運臺相提並論。他的領導，甚至被指責為軟弱無能，沒有勇氣擔當大刀闊斧的改革。這應該是俞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而這些日子却顯得有點過於平淡，竟至於沒有什麼事可以讓人稱道。

但俞先生居官為人的風度，却留下了至為深刻的印象。他的風度，特別表現於他在行政院長任內受監察院彈劾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申誠處分的整個經過之中。這對俞先生當然是極不愉快之事，但他却樹立了一個優良的榜樣。俞先生之被彈劾，是起因為他拒絕出席監察院接受詢問；依俞先生的性格，他不會如此堅決的拒絕，其所以堅拒，是受到其它方面的影響，致鬧成僵持之局，才硬逼出了一個彈劾案。整個經過却出於陰錯陽差，在俞先生可說是代人受過。但申誠處分終告成立，俞先生還是依法在總統的申誠令上副署；事後，中央銀行的供給制就完全取消，在行政院長卸任後，俞先生確實祇拿二千餘元的薪水，再無任何津貼。俞先生這種謙抑的風度，使監察權與司法權獲得伸長。這是俞先生對國家無形的貢獻，其意義實較諸其有有形貢獻，尤為深遠。

我們更不能忘記，在俞先生任行政院長任內，我國的言論自由，確實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的政院，有財經內閣之稱，但政府的財經措施，却常常受到輿論的率直或甚且近於苛刻的批評，俞先生容忍批評的雅量，在四年之間，使輿論尺度，大見放寬，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們大家還能保持這一分成果。我們在俞先生身任要職之時，甚少對他的施政贊美，而常常是放言無忌，今天回想起來，才感到俞先生的那種風度之可貴與可敬。他之所以值得我們悼念，也正在於此。（大華晚報六月二日社論）

敬悼俞鴻鈞先生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銀行總裁、前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先生，不幸於前日下午一時半病故臺北寓所。噩耗驚傳，朝野人士無不聞聲嗟悼。本報創辦，已歷三十餘年，對俞氏生平為人、出處、事功，目擊身經，知道的很多，了解得很深；對於他的猝然長逝，緬懷今昔，尤不勝其痛惜之情！

一般人都曉得俞氏爲一財政金融方面的卓越人才。數年前他於卸任臺省主席後出任行政院長，綜攬國家庶政，凡所措施，更昭昭在人耳目；但在本黨的淵源與所作的貢獻，則知者甚少。俞氏早歲畢業聖約翰大學，出了校門不久，即佐陳友仁在上海辦一英文日報。民國十三年，本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發表宣言，揭櫫三民主義與革命政綱，風聲所播，全國有志青年與覺悟民衆，均奔集本黨革命旗幟之下，不旋踵而北伐成功。此一宣言號召力與影響力之大，在中國革命歷史文獻中，幾於無出其右。當時將此宣言譯爲英文，以之介紹於國際人士者，即爲俞氏；而國際人士亦由此對本黨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獲得進一步之認識。

綜觀俞氏一生，除少年時期會經商、任新聞記者并服務外交部，中年時期參與暨主持上海市政，晚年時期出任臺省主席與閣揆，及在滬期間一度爲一二八之役與日人從事折衝外，綜持中央財政金融工作，殆爲其平生主要經歷，他歷任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總裁，對國家財政金融，多所擘劃；且每受命於危難之際，張羅補苴，煞費苦心。近來中央銀行籌備復業，他雖在病發的時候，甚至在死前二、三日，猶於病榻不斷喘息中籌劃如何積極進行。他的逝世，在國家是喪失了一個卓越練達的財經政治家；在元首則如折股肱，所失更大。不過他已遺留下一個爲國家爲領袖矢忠失信，鞠躬盡瘁不朽的典型，足資後死者的敬仰和取法。

俞氏任政府重要官職垂三十年，世俗或以爲榮華富貴萃於一身；其實他的日常生活，至爲廉簡。他所居住的一幢中央銀行房屋，規模結構，均屬平常；他并未因出任行政院長而更換一堂皇富麗之官舍；他始終住在這個平常的房子裏，以迄於死。至其平時待人接物，則誠摯謙恕，循循如宿儒。他任閣揆時，遭受彈劾，容忍含默，大家從沒聽見他說過一句怨天尤人的話。他的識大體，他的雅量和他鞠躬盡瘁的精神，皆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和追思之中。

我們在俞氏蓋棺之時，論述他的生平，深覺他在表面上，雖無赫赫之功；而究其實際，則崇法務實，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很大。這樣一個人，應該多活若干年，爲國家社會多做一點事，多擔負一點艱巨的任務。不幸竟以宿疾猝發，匆匆撒手而去。風雨如晦，來日大難，國家棟樑，如斯摧折，實在太可痛惜了！（中央日報四十九年六月三日社論）

O. K. Yui

O. K. Yui, whose short, staccato name fitted him well, is dead in Taipei at 62, after a long public career. He was Shanghai's dynamic, colorful mayor—back in the days when Shanghai was really colorful, and not

Red.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Formosa, he rose to the premiership.

But we also remember O. K. Yu's assessment of one of those perennial Communist military build-ups across the strait from Formosa. That was in 1955. Asked by a Scripps-Howard reporter if it might be only a part of Peiping's war of nerves, he snapped back: "We only wish it were. If that's all it amounted to, we'd like nothing better than taking them on in a war of nerves. But the outcome won't be settled that way."

It still won't. (紐約世界電訊報一九六〇年六月四日社論)

悼俞鴻鈞先生

三度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先生，卒於努力爭取中央銀行恢復建制獲得最高當局允可後的短短數日間溘然長逝。易黃之時，仍念念不忘于中央銀行的復業問題，是誠可稱為忠于職守，鞠躬盡瘁矣。

俞鴻鈞先生曾說：「我爭取的是建立中央銀行制度，至于中央銀行建制後誰來擔任總裁，則是另一問題。」細味此語，具徵俞先生決不是為擴張個人的權力，才要求建立中央銀行制度。他數年來注力於此，用力愈大，而遭遇的阻力亦愈大，似是而非的台銀業務劃分計劃，就是最顯著的阻力。俞先生一生平易近人，與世無爭，獨對中央銀行恢復建制一事，頻受刺激，其內心的痛苦，寧能在外表察之。此次宿疾復發，以至心臟休克，長眠不起，雖云由於氣候不正，實為積鬱所致。

現在中央銀行恢復建制，已成定局，而俞先生不能及身觀其厥成，雖不無遺憾，亦可瞑目。惟中央銀行恢復建制一事，亦非咄嗟可辦，第一、建制的實質，必須完整，第二、建制需要適當的人才，纔能建得像樣，建制的工程浩大而艱鉅，距離完成的目标尚遠。我們且拭目以待，看負責建制的

人士如何着手？如何措施？如何達成？以慰俞鴻鈞先生在天之靈。（聯合報四十九年六月四日評論）

籌募俞氏獎學金之議

中央銀行俞故總裁之喪，昨日舉行大殮，典型人物，從茲永逝；各方雖覺痛惜，而無可如何。筆者以為，紀念俞氏，輓詞誄語有時而窮，不若集資成立俞氏獎學金，造福後進。既可擴大俞氏遺愛，使俞氏歷史不隨時日之消逝而褪色。而且，青年學子於獲得俞氏獎學金資助時，復可一溫俞氏敦厚謙恭，忠信篤敬典型，亦有益於修身之道。

俞氏為財經界領袖，德高望重，俞氏獎學金可設財經名額，獎掖大學青年專攻財經學理，用以培養新血，使我國財經改革能獲生力軍的推進。

俞氏從政，雖無赫赫功業，但其民主開明作風，影響甚大。論者謂今日輿論批評尺度之較寬，立法院對責任政府督促之較嚴，乃為俞氏在行政院長任內所播下種子。然則，俞氏獎學金又可設政治學名額，資助學子研究民主憲政，用廣俞氏作風，進一步及於法制之建立。

俞氏爲新聞記者出身，而終身與記者友善。昨日大殮，非特報業公會、記者公會有致祭節目；各報與通訊社及電台記者個別前往瞻仰遺容者亦至衆，可見俞氏與新聞事業關係之密切，如在俞氏獎學金內設新聞學名額，更是相得益彰。

俞氏既爲財經界領袖，籌集獎學金一事自無困難。當今財經首長設能登高一呼，必可蔚成運動。語云集腋成裘，以俞氏受人懷念之深，以財經界實力之雄厚；此一獎學金之籌募，其數目自必可觀。俞氏故舊僚屬勉之！（徵信新聞報四十九年六月五日評論）

嚴家淦悼念俞鴻鈞

徵信新聞報記者 董大江

「真是想不到的事。」財政部長嚴家淦先生對記者說：「俞鴻鈞先生的身體很好，只有氣喘病是他的老毛病。而且，俞先生今年只有六十四歲。」

一日深夜，記者在部長的寓邸訪見嚴辭波先生，他是俞鴻鈞先生的前後同學，與俞先生不但在公務上的關係很密切，而且有很好的友誼。對於俞鴻鈞先生的死，他感到意外，也感到悲傷。

記者請嚴部長談談俞鴻鈞先生的往事。

最喜騎馬壯如武士

「六十四歲雖然不算很老，可是一般人到這個年齡，頭髮也白了，牙齒也掉落了。」嚴部長說：「可是俞先生的頭髮是黑的，雖然近年來也有一根白髮，但是極少，而且最奇怪的是他的牙齒一顆也沒有壞。六十餘歲牙齒完整，真是少見的事。」

談到俞鴻鈞生前的嗜好，嚴部長說：

「他最喜歡騎馬。不但喜歡騎馬，而且騎術極爲高明。俞先生騎馬已有很久的歷史，戰前就開始騎，他的身體很強壯，騎起馬來像個武士。在南京，在上海，他是常常騎馬的，可是到台灣來，就沒有好馬騎了。」

嚴部長凝思了一會，繼續說：

「據我所知，俞先生到台灣以後，也曾騎過幾次馬，不過只有日本人留下來的馬，沒有好馬，所以後來就不騎了。然而俞先生最愛馬，不騎馬以後，他就搜集銅馬、鐵馬、磁製馬、玻璃馬和刺繡馬，家裏搜集了很多馬。」

「而且，沒有馬騎，他就走路。俞先生常常自中山北路二段二十巷居處步行至圓山動物園，然後再步行回家，或者早上，或者是晚上。」

崇法務實平易近人

嚴部長和俞鴻鈞是在上海認識的，他們是相隔七年的前後同學，嚴部長入聖約翰大學攻讀時，俞鴻鈞已經畢業，而且在上海市政府做事了（先做祕書，後做祕書長，市長。），也就是同學的關係，他們才認識的。

「不過當時並不常見，後來是工作上的關係，往返就逐漸增加。」嚴部長說。「抗戰的時候，在重慶和香港，我們常常見面。」

「俞先生在聖約翰讀文科，另外又研讀法律，對法律是很精通的。他做事總是崇法務實，這也是因為有根基的緣故。」
 「俞先生待人接物，是很誠懇的。他平易近人，最喜歡提携後進。他的人緣極好，凡是認識他的人，對他都會發生好感。」

不但任勞而且任怨

嚴部長回憶起俞鴻鈞先生的往事——「最使我難忘的是大陸撤守之前，人心浮動。那時候俞先生奉命將庫存物資撤運到台灣來。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環境之中，他能督飭中央銀行，把所有的物資，包括黃金，都安全運到台灣，這是何等忠貞，何等堅毅！台灣能渡過最困難的一段時間，他的貢獻是很大的。」

「然而他從不居功。一般人能够任勞已經很好了，他不但任勞，而且任怨。」

央行物資和黃金自大陸撤運來台的時候，嚴部長當時正擔任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這些物資運到台灣，就是他經手幫着整理的，所以這件事的一切經過，嚴部長都很清楚。

在嚴家擔任台灣省財政廳長的時候，俞鴻鈞主持國家財政，他對台灣的財政措施支持最力。

「當時大陸通貨膨脹，情形很嚴重，台省想要減少一些受大陸通貨膨脹的影響，將台幣匯率機動調整，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後來又改為發行新台幣，這種種措施，都獲得俞鴻鈞先生的有力支持，否則將會遭遇很多的困難。」

嚴部長很感傷地說：「像這樣的人，他死了，在國家，是一大損失。他是我們的太上司，是我的前輩同學，在日常關係上，他又是我的導師，因此，他死了，也使我個人非常悲痛。」
 「我相信懷念他的人一定很多。」

猝然而逝未留遺言

靜波先生又談到了俞鴻鈞的病，

「俞先生的氣喘病是很早就有的，據我所知，至少在抗戰以前就有了。當時年紀輕，還不在乎，現在年紀大些了，程度也就增加了。」

「不過也沒有別的病，就只有氣喘病。俞先生對於氣喘病是最有經驗的了。他爲了要治好這種病，對所有已經知道的氣喘藥物，都會試用過，也都曾研究過。有時別人把一種丹方告訴他，他就說，這藥已試用過了。但所有的藥物都不能根治他的氣喘病。」

「據我所知，俞先生這次的氣喘病是星期一開始的，當初還有點發燒，不過星期二就退了。今天上午，俞先生的脈搏突然加速，每分鐘至一百二十餘次，原來是想送醫院的，後來醫生說要等到安靜一點再送，想不到這一等，就與世長辭了。」

「我是上午參加總動員會報的時候才聽說俞先生有病的，俞先生這樣發病的情形，已記不清有過多少次，他的死，是完全想不到的。我本來打算下午二鐘多鐘去看他，可是永遠看不到了。」

下午二時許，嚴部長看到的是俞鴻鈞先生的遺容。

「俞鴻鈞先生並沒有想到自己會死，所以沒有準備遺言，不過在他病重的時候，還說起中央銀行復業建制的事。俞先生最近對這件事極爲操勞，端陽節也沒有休息過。」

嚴部長感傷地說「俞先生平常很風趣，也常常說笑話，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總是言之有物的。關於俞先生的事，值得懷念的太多了。」靜波先生和俞先生最後一次晤面是上月二十九日在極樂殯儀館公祭閻伯川先生的時候，他們沒有說什麼話，俞先生却死於公祭閻伯川先生以後的第三天。

慟失良師益友

嚴家淦財長悼念俞鴻鈞

自立晚報記者 于文華

財政部嚴家淦部長於昨天下午三點約記者談話，記者如約而至。到了他的辦公室，却聽說嚴部長適才接了電話，驚聞中央銀行俞鴻鈞總裁逝世的

消息，匆忙趕往俞府致弔去了。但嚴部長抵達俞府後，仍以電話通知回部，要記者等他一下。從俞府返回的嚴家淦部長，狀極悲感，這突如其來的噩耗，使他陷入一種悼念、哀思和恍惚的情緒中。因為在他談到正式問題之前，所談的，完全是「俞總裁」。嚴氏自稱O.K.俞是他的良師、益友。他們對於國家財政上的許多問題，都是本着良心，積極努力的，多少事，他都向俞先生請教，他們互相討論、研究，以期為國家，為老百姓多得一些利益，可是今後，他已痛失這位良師益友了。

四重關係良師益友

「說起來，俞先生和我有四重關係。」嚴氏深沉地說：「在職務上說，他是我的老長官，在學歷上說，他是我的老學長，在日常生活上來說，他是我的導師，可是俞先生樸實誠懇的為人態度，却又像一個最得益的朋友。他是那麼大公無私，那麼盡忠國家，那麼一位人格光輝的人，唉！這真是無可補償的損失！」

盡心盡職央行復業

「他一直害着氣喘病，可是這些年來，他對於任何工作都未稍有意忽，中央銀行的復業工作，已在他盡心盡力的策劃中，擬定方案，送呈政府，準備在年內復業。為了國家的體制和需要，俞先生主張中央銀行完整的復業，並不是把台灣銀行的業務單純的接過來便算是復業。俞先生辛辛苦苦心策劃的，就是怎樣才能真正建立中央銀行制度，擔負起銀行之銀行的任務，這在國家的金融制度上來說，真是太重要了！」

多次面商復業計劃

談到金融的問題，嚴氏指出了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和他自己的主張：「由於信用緊縮，我認為今後資金要求出路，應該將長期資金增多，長期資金應建築在儲蓄基礎上 and 計劃基礎上，短期資金應建立在交易基礎上，使短期資金與交易量互相流通，與國民生產發生關係，使支票能貼現調節市場，這種制度，就非有中央銀行復業不可！」

「過去，爲了中央銀行復業的問題，俞先生曾多次和我商量，這是他多年來的願望，這項願望即將實現，可是他却天不假年，溘然長逝。」

國家財政貢獻極多

嚴氏說到來台灣的數年間，我們在財政上並沒有遭遇到多大困難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對國家的貢獻。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却禁止搬運，俞氏乃破除一切困難，從上海的中央銀行，把一箱一箱黃金運來台灣，妥藏在台灣銀行的保險庫裏。四十三年六月一日，他出長行政院，組織「財經內閣」，以崇法務實的精神，深爲國人敬仰。由於這位財政閣揆，才使國家最陰晦的時期，在財政上未遭遇困難。

從不遲到亦不缺席

嚴氏很遺憾的繼續說：「今天上午中央黨部開會，開會的時間到了，俞先生却缺席，這是少有的現象，任何會議，他不但不缺席，而且不遲到，還經常比別人先到，我心裏有一點疑惑，是否他的氣喘病又發了？我想，好幾天沒看到他了，新內閣成立後，我正有些話要和他談，那麼，下午去看他吧！可是下午接到的電話，却是一個噩耗！」嚴氏的眼睛有點溼潤了。

「俞先生去世得太早，他才六十四歲，否則，他將有很長久的餘年爲國家作事，這真是國家的損失，也是財政界的損失！」

政策上損失難彌補

「那麼，俞總裁逝世後，對中央銀行的復業問題有無影響？記者問。

中央銀行復業的計劃，是他親自修訂的，我可以說，他是爲了籌劃中央銀行而積勞成疾！我只趕上瞻仰他的遺容，他的遺容很安詳，但他唯一的遺言就是「中央銀行復業」。我們一定要依照他的遺志，完成他的計劃，使中央銀行早日復業。不過，他的遺志縱能依照他的計劃完成，今後在新策劃上的損失，却是無可補償的了！」嚴氏悲戚的答覆說。

俞鴻鈞一生充滿奇蹟

中央社記者 卜惠民

不可補償的損失

今年六月一日，中國失去了一位著負時譽的政治家——俞鴻鈞先生。俞先生的去世，使國家蒙受了不可補償的損失，政府減少了一位卓越幹練的行政長才，財經界更失去了一位富有經驗的領導者。他的死，使許多同僚友好爲他哀愴悲痛，社會人士同申悼念。

人們悼念他的原因，是在他的一生事業中充滿了許多令人崇敬的事蹟，他公忠體國，崇法務實；處事唯謹，不爲私謀；待人誠懇，富人情味；不論識與不識，都覺得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偉大人物，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歷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輝煌成就。

文學上造詣極深

誰都知道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先生，是曾任財政部長的中國有名的財政學家；誰都知道他曾任臺灣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董事長，是一位銀行家；誰都知道他曾任上海市長、臺灣省主席、行政院長，他是一位政治家；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曾當過教員，他曾充任過新聞記者，更沒有人知道他是學文學的，以及他對中西文學藝術所具有的高深的造詣。在他一些朋友中都知道他的一生的生活、任職、治事、對人，各方面都充滿了奇蹟。首先從他的籍貫來說：他的原籍是廣東新會人，但他却從未在廣東地方擔任過職務，在他一生中，也很少去過他的家鄉，甚至於廣東省的各地，實際上他是一個生長在上海的廣東人。

曾獲法學士學位

俞鴻鈞先生一生中，最偉大的成就與最輝煌的事業是在財政金融方面，可是他不是學財政金融的，而在他擔任財政部長之前，從未研究過財政金融貨幣。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是學西洋文學的，他一生中最感興趣的是法律，曾經在學校畢業任職期中，上過美國芝加哥的法律函授學校，並獲得證書及學位，具有擔任上海英法租界法院認可的律師資格。然而他的任職却從未與法律發生過任何關連，而且他的這一個興趣及特長也不為外人及一般友人所知悉。

一直從科員幹起

俞鴻鈞先生最大的奇蹟是表現在他的任職上。他從一名科員的職位，進入上海市政府任職，主管的業務是編輯市政府出版的市政月刊。在短短的五六年期中，他從科員升為科長，從秘書升任為秘書長，從秘書長直接升任為市長。

以財政部來說，他開始是擔任財政部的常務次長，然後為政務次長，然後直接升為財政部長。他擔任了臺灣省政府主席，他就由省府主席直接升任為行政院長。他以財經專家的身份，擔任了臺灣銀行的董事長，當時他的朋友和一些新聞記者不會想到他會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當然更沒有人會想到他當了一年多主席之後就又升任了行政院長。俞鴻鈞先生職務及事業的步步高升，並沒有靠家庭的幫助或親友的關係，全憑自己的一「崇法務實」忠實服務與他自己的細心努力和才幹。

求學時成績優良

他的父親是廣東一名商人，在上海經營較小的商務桐油出口及地氈的生意，父親期望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能够承襲衣鉢幫助他經營進出口的商业，然而他在聖約翰大學畢業時，却因成績優良受校長卜芳濟的青睞被留校擔任為助教及講師，從此之後一生中就不再也沒有經營過家庭給他留下的事業，也沒有靠家庭及親友的關係。

俞鴻鈞先生獲得事業上輝煌成就的唯一原因，是由於他對人處事的忠實細心和苦幹。他常把自己的工作做完之後再為同僚及長官考慮。

他對人有一個方法那就是誠懇、不推諉、不虛偽，能辦到的盡量去辦，不能辦到的也說明辦不到的原因，他不附和，但願意得到朋友們的諒解，他時常說：「開誠布公，會得到別人諒解的，如果實在得不到諒解，我們打一架也可以。」

處事多有條不紊

他處事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論什麼事都分別輕重緩急和優先的次序。不論什麼事都是經過研究之後而加以處理的，所以很少發生錯誤。每天他要離開公事房的時候，他總是把明天的事預先安排，把今天沒有辦完的事列入明天待辦的工作之內，並把今天辦理的事重新檢討一下有無漏洞和不當，是否應該加以補救。

他在上海市政府擔任祕書長期間，把這樣一項繁複的工作處理得有條不紊，然後再把市長的重要事項預作安排，提供充實的處理意見。每天在公餘之暇，對他有關係的業務及學術都作廣泛的研討，時常在深夜還在作勞心的思考，一件事情總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設想，因此也造成他後來的長夜失眠。

愛好音樂與咖啡

他愛好音樂，時常借着音樂的旋律擬訂調度財政金融的方案，他嗜好咖啡，常借咖啡，提起他工作疲憊後的精神。

他的學問很淵博，除了政治經濟法律，財政金融貿易，有相當的研究之外，對文學音樂藝術也有相當的造詣，甚至於對天文學他也曾搜集了中外古今的書籍，以半年的時間作不斷的研究，可是他沒有一點自滿自驕的表現，總是以誠摯的虛心，願意向別人請教，尊重專家們的意見。對人更是和藹誠懇。然而對於律已却極嚴肅，不肯有過份的嗜好及放縱。就是對於他的三位女兒的管教也都極為嚴格。

令小姐自洗衣裳

當他擔任財政部長期中，他的一位小姐曾因一件衣服洗得不乾淨，責備女工，在他聽到之後，把女兒叫到跟前告訴她：「這些事應該你自己做！如果請她做要客氣。」僅僅是瞪了一眼，把女兒羞得哭了，一天沒有吃飯。以後時常都是她自己從學校回家後忙着洗自己的衣服。

他待部屬及佣人極為寬厚，尤其他能提拔後進。凡是服侍過他的工友，除極少數之外，他都鼓勵他們上進、學習，並提升為職員。

他是最肯幫忙朋友的一個人，他曾經拿出他自己的薪金，幫忙不太親近的年青朋友出國留學，並指導他治學的態度。他的英文文學修養是高超的，他時常把年青朋友用英文寫給他的信件，經過他細心修改後，再寄還給原發信人，這是在政務極為繁忙的臺灣省府主席，及行政院長任內公餘所做過的事，而且這不只是對一兩個年青的朋友。

未忘情記者生涯

他也時常向新聞記者的朋友們說：「我過去三十多年服務國家的歷程中，最使我留戀與懷念的是我初入社會的三年新聞記者的生涯。而使我獲益最多的，也是那三年的緊張熱烈的工作。」

「最初我當英文編譯時，使我的中國文學的修養受到嚴格的考驗，繼之我作英文編輯，使我英文寫作能力建立起一點根基，我當記者一段時期，更增加了我許多人生的閱歷，讓我得知怎樣從複雜的人生中去尋求真理；同時由於工作上緊迫的需要，使我廣泛的讀了些較為艱深原理性的書籍，而且更給我一些應對的機智，堅強的忍耐，審慎的判斷與負責任的鍛鍊。」

經常要訓練自己

「我爲了從事法院審訊案件的採訪，在六個月期中，我學會了英語速記，爲了避免漏掉新聞，我必須每天留心把預定的一些事項先登錄，每天把做過的事情到晚上檢討一下，把明天要做的先計劃一下，排列程序，分出緊要與優先，這些訓練使我養成習慣，保持到現在，給我後來服務國家的各項工作中許多特殊的幫助。也許是因爲那一段的生活給我的印象過份深刻，真的有時候我還會下意識的想：我仍然是一個新聞記者。」

這是俞鴻鈞先生時常說的，把他的一些成就，都歸功於他從事新聞記者生活的訓練，今天我特別寫在這裏來表達我對俞鴻鈞先生的追思與悼念。

平凡中的偉大

中央日報記者 王康

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先生，於六月一日下午一時半病逝以後，噩耗立刻傳遍臺北，識與不識的人，都深表哀悼，一致認爲國家喪失了一個開明政治家，領袖喪失了一個得力的高級幹部，社會喪失了一個標準的好人。

輔弼元首厥功殊偉

六年前的同一天，俞氏繼陳副總統之後，出任行政院長，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離職，專任中央銀行總裁，最近奉 總統之命籌備央行復業，在謝世的前兩天，還親將復業計劃草擬完竣，面呈 總統，不料央行復業工作未正式展開以前，即賈志以沒，這對於國家的財政金融大計，也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

有人說，自中央政府遷臺以來的十一年中，在國家大政上輔弼元首，整軍經武，建設臺灣，鞏固反共抗俄基地，貢獻最大的，一位是陳副總統，一位就是俞鴻鈞先生。這兩位都是由臺灣省主席而後出任行政院長的政治家，十一年來和衷共濟對國家的貢獻乃爲有目共睹之事，但他兩位在大陸淪陷之前，在總統指導下合作將中央銀行庫存黃金運來臺灣一事，一般讀者，却不大知道。

啓運央行存金來臺

三十八年初，總統引退，國家的全部黃金數百萬兩，當時都存在上海，代總統李宗仁却禁止搬運，如上海一旦不守，而這批黃金落入共匪之手，則國家的損失，將更慘重，俞氏不聲不響，與當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副總統函電密商，決定將黃金全部運臺，在某一個深夜裏，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密令軍艦一艘，停泊在上海黃浦灘央行附近的碼頭邊，央行附近的街道，臨時戒嚴，一箱一箱的黃金，悄悄運上軍艦，在天未破曉以前，該軍艦已駛出吳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駛向基隆。兩天以後，陳主席打電報給俞氏，全部黃金已妥藏在臺灣銀行的保險庫裏，坐在外灘央行總裁辦公室裏的俞氏，這時才感覺肩膀上的萬鈞重擔豁然減輕。

俞氏籌劃運送黃金之前，係從香港飛到上海，當時上海的保衛戰剛開始，機場戒嚴，他隻身在龍華機場步下客機以後，即被衛兵引至候機室，不

准他離開，雖然他很和藹地自我介紹，可是沒有任何證明文件足以證明他就是俞鴻鈞，連一張名片也沒有，衛兵不認識他還是不讓他走，他只得百般忍耐地守候在電話機旁，好容易他和湯恩伯司令的電話接通了，湯立刻派車到機場接他，當全體警衛官兵知道他並非冒牌俞鴻鈞時，都很覺慚愧地向他道歉，他不但不要備他們，反而嘉許他們的盡忠職守，臨走時還一一和他們握手道別。

未去前線深為遺憾

俞氏和陳副總統關係之深，要追溯到抗戰末期，當他出任財政部長時，陳副總統任軍政部長，他們有一天談起各自的年齡，忽然發現他們不但同年而且同日出生（農曆民國前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從此兩人的公證私交，自然更進了一步。

俞氏卸去行政院長以後，曾對友好們說，他在行政院長任內推一的憾事是沒有訪問過金馬前線，對於他那同年同月而不同日生但又同學同班的俞大維部長常常進出前線，非常羨慕，他為什麼不到前線去呢？就是由於使他不能享受退給的哮喘病。有一次記者和他談起此事，他說：「我到前線，如果走不通每一個島嶼或步上每一個山頭慰問戰士，我是不會滿足的，你知道我連多上一級樓梯都要氣喘，如何能經得起那種考驗呢？假如到前線去只聽取司令官的簡報，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總統考語「崇法務實」

總統對於俞氏的哮喘病向來極為關心，記得四十二年俞氏就任臺灣省主席後，總統獲悉他的辦公室在省府三樓，怕他每天上下樓梯過於吃力，曾經勸他搬到二樓辦公，由此可知，總統愛護俞氏，真是無微不至。總統對俞氏的考語是「崇法務實」四字。俞氏的立身處世，確係如此。

俞氏的為人看起來很平凡，但平凡中有他的偉大之處。他一生中經手用出的金錢，已不可數計，可是他一生清廉，沒有要過一文非份之錢。

俞氏出身上海聖約翰大學，與俞大維部長不但是同宗同班同學，而且同坐一條板櫓。他說，俞部長在學校時很歡喜運動，在足球場上，時常看見一位穿長衫着西裝的青年踢小皮球，那不是別人，就是今日的俞大維部長。

初出茅廬曾任記者

俞氏精通英語，而國學的造詣也極深，更寫得一手好字，離校以後，一面向美國某著名函授學校修習法律，一面在上海一家英文報任記者，他初出茅廬，人又老實，碰過不少釘子，知道記者的辛苦，他服官以後對新聞界人士甚為友好，這也是原因之一。民國二十一年，他任上海市政府祕書長，時值一二八抗日之戰發生，軍方指定他做發言人，每天下午他都要與數以百計的中外記者接觸，中外同業，對他均有好感。二十六年八二三滬戰發生時他任上海市長，他雖然政務繁忙，但如記者向他採訪，他仍來者不拒。

讓人懷德何須畏威

在私生活方面，他過的是標準基督徒的生活，一生烟酒不沾，連茶也不喝，吃白開水。對人和藹，對部下和僕人從不疾言厲色，他說：「做人之道，要別人畏威，不如讓別人懷德。」

在興趣方面，俞氏除讀書外，年輕時歡喜騎馬，到臺灣以後，無馬可騎，乃用望梅止渴的辦法，改為搜集馬的模型，最初他只有一匹銅馬，後來

嚴部長送他一匹，配成一對。其後這一嗜好被人發現了，贈馬的人於是絡繹不絕，一日俞氏逝世時，他書房裏擺滿了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馬，為數不下三百餘匹，它們如有生命，看見主人撒手人寰，必然慟哭失聲。

俞氏在家庭裏是個最好的家長，自和夫人梁就光女士結婚以後，四十年來伉儷情深，生有三個女兒，長筱鈞，次筱梅，最小的筱瑾，都已出嫁，現均僑居馬尼拉。

俞氏的忠黨愛國，從他的一切言行中都可以體察得出來。當他卸任行政院長時，有人勸他出國遊歷，他說：「國家遭遇空前的災難，我那有閒情逸致到外國去遊山玩水呢？」

俞鴻鈞雖逝猶生

新生報記者 沈 嫻 璋

近黃昏時風雨淒迷

六月一日下午，我接到一位同業的電話：「俞鴻鈞先生下午一點半鐘去世，我們要去弔唁……」下面的幾句話在激動的心緒下，我已辨不清他說些什麼了。放下電話，我心裏萬分難過，覺得這樣的好人，老天爺為什麼遽然奪去了他的生命，不讓他長壽呢？

這時，已近黃昏，風雨淒迷，當我和黃毅辛兄趕到中山北路俞公館時，已擠滿前往弔唁的人，凡是採訪過俞先生消息的同業，也都先後到了俞先生靈床前，有的低聲歎泣，有的號啕大哭，雖然當時俞先生的三位女公子尚未由馬尼拉返台奔喪，但是朋友們對他的哀感真情，和穿着黑色孝服的俞夫人，在靈床傍的低泣，這深沉的悲痛情緒，已够令人酸鼻。

同業唐一民兄說：「會有許多採訪對象死了，我覺得沒有什麼可悲哀；可是，俞先生遽然離開人間，我却非常難過。」

臨終猶不忘復業事

俞先生的遺體躺在靈床上，頭部枕在白色的枕頭上，全身蓋着白被單，安祥靜謐，臉上流露一種「懸念」什麼的深思表情；他近來一直為中央銀行的復業事在作計劃，在晝夜忙碌着，雖然生病，仍在病床上籌劃央行復業。所以當他六月一日離開人世的當天，他的感冒才退熱，就在上午八時準備去上班，同時決定下午四時召開央行復業會議，商討準備工作，誰知俞先生這一勞累，他的宿疾哮喘病復發了，又引起心臟麻痺症，在下午一時半，就去世了。直到他臨終一刹那，俞先生還囑咐左右，要繼續進行中央銀行的復業工作；俞先生彌留時仍念念不忘央行的復業，他對工作的認真盡瘁，永遠為後人所景仰。

生前最愛護年青人

俞先生對年青人很愛護；鼓勵他們上進，雖然在他很忙的時候，仍希望多和年青人接近，瞭解他們的需要，解決他們的困難。當俞先生大殮和舉行追思禮拜時，極樂殯儀館上天廳，裏裏外外，擠滿了人，蔣總統伉儷、陳副總統、中外官員、三軍將領等和他們的夫人，都

前往弔祭，很多太太都哭了；還有許多行政院、省政府的中下級職員，也都趕到弔祭，他們在靈前行過禮，還進入靈幃，瞻仰俞先生遺容，好些人都哭紅了眼睛，有人看見這情形說：「俞先生生前一定待人很好，也提拔過不少人。」這說法實在一點不過份。

對待部屬關懷備至

當俞先生任行政院長和省主席時，他的辦公廳都在三樓，每天上下班，他得在樓梯來往，還經過每層樓的辦公室，遇見他的部下，連工友下女在內，他都很慈諷地打招呼，偶而也和他們談到工作情形，生活狀況，由於俞先生的真誠，他的部下也願意和他談。

記得，俞先生主持臺灣省政府時，主席辦公廳有兩位年青的小工友，一個是小楊，另一個是小吳，他們每天中午都帶便當來上班，吃的蔬菜量很少，質也不好，有一天，俞先生遲下班，看見兩個小工友吃便當的菜蔬情形，俞先生看在心裏，以後每天叫司機夏巨麒，從自己家裏捎些菜給他們佐餐，事後，小楊、小吳告訴我，他們對俞先生待人的仁厚關切，都萬分感激，後來，俞先生升任行政院長，這一對小工友，向俞先生請求，要跟着他，於是他們都同時隨俞先生到行政院，現在又隨往中央銀行，所以這次俞先生的逝世，小楊、小吳哭得很傷心，他們都說：「俞先生待我們太好了，這一輩子不能忘記他的恩情。」

大家不忍言其已死

替俞先生開了十二年車子的司機夏巨麒，他在前年開刀住院，俞先生有一天親自帶了錢，到醫院裏去看他，使他當時非常侷促不安，曾經想坐起來接待主人，俞先生不讓他坐起，叮囑他安心靜養，老夏逢人便提這事，他說：「俞先生待我們下人太好了，現在連報答的機會都沒有了……」說一次，他就哭一次。

俞先生待人仁厚，這是他的美德，也是他成功因素之一。

過去採訪省政的同業，誰都非常悼念俞先生，對俞先生遽然逝去，都似失去一位好朋友般的悲痛。當我們知道俞先生離開人間的不幸消息，會採訪省政的同業，都紛紛趕到俞先生公館，在他靈床前，悲傷流淚，大家都不忍說出個「死」字，希望能有奇蹟出現，使好人俞先生能復甦過來，因此，大家在淚眼相對中，不約而同的說出：「俞先生好像睡覺？」

力疾從公影響健康

俞先生出巡時，往往一連五、六天，每天要講話、視察、開會和接見地方人士，工作常超過八小時以上，中午也從不休息，雖然他有哮喘病，他的精神仍很健旺。這是因俞先生的責任感很重，他負起一項責任，就盡力擔當起來，沒有絲毫懈怠，這是俞先生偉大的工作精神，同時，我想這也使他的精神仍很健旺。這是因俞先生的責任感很重，他負起一項責任，就盡力擔當起來，沒有絲毫懈怠，這是俞先生偉大的工作精神，同時，我想這也使他的精神仍很健旺。

留下若干永恆記憶

在我們和俞先生相處的時候，有許多事留給我們永恆的鮮明記憶：

中華日報社過去一位採訪省政的同業鄭誠章兄，是個沉默寡言，好學不倦的青年，當時他正在自修，準備投考大學，俞先生知道鄭誠章的計劃，

就鼓勵他用功，因為俞先生的英文造詣很深，有：Full Word Man 之稱，鄭誠章所有自修的英文作文等等，都由俞先生親自批改過，不久，鄭誠章服務的單位，調他到臺南報社服務，仍和俞先生保持聯繫，俞先生囑他採取通訊方式，每週寫幾封英文信，寄到臺北給他，經俞先生看了改過，再寄回去。經過俞先生一年來的指導，鄭君的英文進步很快，後來他考取了臺灣大學，去年赴美入米蘇里新聞學院，俞先生於臨行時還贈給鄭誠章一筆旅費，完成了鄭君求學的心願。每次，我們和俞先生談起這件事，他很謙虛的表示：幫助求學的青年，完成他求學的心願，這是做人份內的事。

富有濃厚的人情味

另一位採訪省政新聞的中央日報同業王康兄，嘴角生癩子，老是不好，有一天，俞先生看見，問起王兄，他很關心，覺得一個人身體不能有絲毫毛病，得了病得盡快醫好，當時，他告訴王兄說，他家裏有一種最好的藥，塗了會馬上見效，不過他已用了一半，還剩半瓶，要送給王康用，王兄則覺得生癩子不是什麼大病，用不着塗這樣貴重的藥，會竭力婉謝，俞先生還是派人將那半瓶特效藥送到王兄家裏，第二天，他看見王兄，俞先生就問他癩子好未？對俞先生這深厚的人情味，不但王兄很感激，我們也很感動。

協助同業們求深造

還有一位中華日報的女同業張魯琳女士，她並未採訪省政新聞，為着辦理出境證，她請我陪同去見當時的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俞先生，俞先生知道張女士要赴美深造，因為開學在即，希望能早日辦完出境手續，以便趕上美國開學時間，俞先生對她努力求學的精神很讚揚，立即答應囑咐承辦出境手續單位，迅速辦竣手續，在俞先生這個協助下，張女士才趕上美國開學的時間。

張女士的身體很瘦弱，俞先生第一次見面，就以長者身份，教她許多養生術，他說：一個人有健康的體，豐富的學問，忠厚的德性，他才是幸福而快樂的人。

俞先生對張女士的忠告，以後有相當大的影響，她後來到美國唸書，很注意自己的身體，慢慢的由瘦弱變成強健了。

以魚生粥油條饗客

俞先生在臺灣省主席任內，很喜歡和我們相聚歡談，他年青的時候當過新聞記者，所以他時常在自己家裏，由俞夫人親手煮一鍋廣東魚生粥或及第粥等，數碟鹹菜和油條，邀請記者們到他家，邊吃邊談，沒有省主席和記者之分，大家談着笑着，像老朋友般親切。

有時，他的幾位女公子，送給俞先生什麼好吃的東西，他也會邀請我們去分享他這份快樂。記得有一次，俞先生在馬尼拉的大小姐筵釣，空運來一桶冰淇淋，俞先生就邀我們去享受了這來自遠方的美味冰淇淋，我不喜甜食，當時想婉謝，但為着俞先生這份真誠的友情，我沒有這樣做，那天，我很高興的吃了一碟冰淇淋。

個性耿直有問必答

俞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他的個性很耿直，和我們記者相處時，有些未成熟的新聞，只要你問他，他都會詳細說明解釋，有一位同業不守信用發表了，他認為某人不可信用，以後凡是有人在場，他都三緘其口，充分顯示他耿直的個性，同時，俞先生却很謙虛的接受外人對他的建議。

他和我們聚談時，假如我們告訴他民間的某些建議，只要是正確的，俞先生都會真誠接受，這民主風度，令人永遠敬仰。

俞先生在家裏是位好丈夫，好父親，他也是一位忠於黨國，很够朋友的人，他的精神永遠為後世所景仰，活在人們的心中。

儉樸仁厚的俞鴻鈞

新生報記者 葉建麗

昨天下午，臺北中山北路俞鴻鈞先生的寓所門前，停滿了車子，坐在車裏的人，都是聽到俞先生因病逝世的消息後，趕去弔念他的。

對於這位著名財經專家的逝世，去弔念的人沒有一個不帶着哀戚的神容。

當記者冒着細雨，在灰暗的天色下趕到俞先生的寓所時，看到室內已經站滿了人。在俞先生不算大的寓所裏，彌漫着一股濃厚的悲戚的氣氛。這時，俞先生的遺體已從臥室搬到客廳裏，他平靜的躺在一張沙發床上，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圍在他四周的人，都在搖頭嘆息。對於這位為國家出過大力的人，六十三歲的年紀就凋謝了，誰不悲感？

所以，當一組基督唱詩班到場，高唱讚詩時，隨着那莊嚴旋律以俱來的，是每一個人眼眶裏的淚水。

當記者從人羣中出來時，看到替俞先生開了十二年車的夏臣駛司機，正淌着淚水在一旁哭泣，他哭喪着臉向記者打招呼說：「這叫我從何說起呢？」

他接着說：「俞先生是我最敬仰的人，他待人太好，常使到我們作下人的感到侷促不安。」他還提到他前年因病開刀時，俞先生就親自來看訪他，同時，送錢給他：「使我真不知要怎樣報答。」

一直為俞先生司廚的臺灣人廖清也哀感地說：「從此，我失去了為一個節儉的人服務的機會。」

廖清對於俞先生的儉樸作風，是甚為讚佩的。他說：俞先生和他的夫人每天只吃三餐一湯的粗飯。但他對於下人却不吝嗇，總是招呼大家吃飯。事實上，在俞家並沒有主僕之分，在俞先生寬待之下，大家如同家人一般。

在俞先生家裏一直伺候他的徐文寬也說：俞先生為人太好了，他沒有任何嗜好，煙酒都不進，平常吃的是白開水。但讀書的興趣很濃，當他公餘回家休息時，總是一書在手。記者在俞先生的書房裏，看到了不少中西書籍，成架在堆在一起。在俞先生經常用的書桌上，還置放着紅藍鉛筆，和一架金邊眼鏡。據徐文寬說：俞先生前一天晚上還在書房裏看書。

俞先生的待人和氣，在他家當下女的張秀蘭也耳熟能詳，她說：即使她每次替他倒開水時，他都說謝謝，客氣得很。有好幾次都使她不好意思。平常偶然間她做錯了事，他也從不責難的。

對於儉樸的習慣，夏臣駛還舉了一個例說：俞先生的臥房在樓上，又小又熱，但總沒有打算過要裝冷氣。他的書房在樓下，由于四壁皆書，更悶得透不過氣來，而且他使用的時間較多，所以，他的大女兒就替它裝了一個冷氣機。如今，已經用了七八年，幾乎都要壞了，但俞先生就沒有打算掉換過。

俞先生共有三位女公子，均已長大成人，也都結婚了，現都偕夫婿住在馬尼拉。每年，他們都要回來看看雙親，但當她們帶禮物回家時，俞先生和他的夫人都是囑咐她們切不可浪費。

夏巨獻說：俞先生很少說過重一點的話，他總是在儘力去幫助人。同時，他雅不願出席一些無謂的應酬。

俞先生患的氣喘症已有多年，他這次的病是在端午節那天開始發的，曾發高烧到三十九度。第二天退燒後，俞先生以為沒有什麼大不了，還打算去上班；但終在昨天上午病況趨劇，而于下午一時卅分逝世。

夏巨獻說：「俞先生的逝世，真是國家一個重大的損失。」

温厚的俞鴻鈞先生

聯合報記者 于 衡

六月一日下午一點半鐘，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在他中山北路的寓所中，悄然逝世。他安靜的躺在一隻鋼絲床上，圍繞在他身邊的是他的夫人梁就光女士和他的舊屬以及朋友們。大家都一聲不響的流着眼淚。

誰也不會想到，他會突然的離開人世，因為卅一日整天，他都在計劃中央銀行復業的事。當晚服了些安眠藥後，和平常一樣的就寢，一日早上九點鐘他還很正常的從樓上的寢室走下來，洗臉、刷牙，並修刮鬚鬚。但稍後他便感到不適，不久氣喘發作了，心臟的跳動，也加劇些。當家人把醫生請來時，情況已經很壞，打過強心針後，情況並沒有好轉。終於在過午後不久，溘然長逝。

二

六十四歲的俞鴻鈞，他在去世前是中央銀行總裁，但在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時間，是他做臺灣省主席那段歲月，以後他作行政院長時，雖然在最初，仍然高高興興的作去，但後一段時間，他的心情是陰暗的，因為陰錯陽差的拒絕出席監察院的座談會，以致後來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彈劾案。但是他卻沒有一聲怨言，默默的代人受過。

然而人們都知道，俞鴻鈞在他的內閣任內，創造了一種良好的政治風氣，那是他的「崇法務實」精神，和對於立法院的尊重。此外則是他把物價一直維持得非常穩定。在行政院長任內，他有一個原則：「在進步中求安定，在安定中求進步。」這兩句話，對他而言，並不是口號，而且切切實實的在做。

跟過俞鴻鈞作事的人，都有一個感覺，那是從來不傷害任何人，他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尊嚴，即使是一個工友，他也從不疾言厲色的使喚。在他作行政院院長期間，他仍抽空主持中央銀行的紀念週；有一次，到會的人員不多，他很不愉快，但是他僅僅說了句：「請轉告未出席的同仁，我平時的工作很忙，難得有機會和大家見面，他們今天不來，我非常懷念他們。」

三

俞鴻鈞除了具有民主的素養之外，他的另一長處是廉潔耿介。他現住的中山北路宿舍，是中央銀行的宿舍。雖然是兩層樓，但房子不大，而且夏

天奇熱，即使他在做行政院長時，他也沒有一位「隨身」的副官，台北的憲兵隊，會要派幾名憲兵守衛官邸，却被他婉拒了！有一次他告訴記者說：「我替國家做了這多年事，但從未以為自己是個官。」

採訪過省府新聞和行政院新聞的記者，對俞先生都有一份好感，他每天下午總是抽出一點時間和記者見面，同時也準備一兩條可以發表的新聞，使同業們不致空手而同。他常常告訴記者說：因為他過去做過記者，深知新聞記者之苦。所以只要是可以發表的，他總是樂於告訴大家。

四

但俞鴻鈞也有些事不為別人所諒解，例如他約定客人談話三十分鐘，只要時間一到，他馬上自己起立，表示送客，因而有人認為他太機械。缺少一點人情味，但他自己卻從不改正這個習慣。

他很少在家裏會客，他把公私劃分得很清楚，但是對記者打給他電話時，他總是親自接聽，即使是午夜十一時左右，他也從不拒絕接聽電話。

最近，他常去探望他的部屬何善垣，因為何氏正在臥病。一天他告訴司機老夏說：「善垣跟我這多年，從沒有對於名位提出什麼要求，不知我還有機會『報答』他沒有」。老夏聽了覺得不對，因為他認為長官似乎不應該對部下談什麼報答。

五

俞鴻鈞自辭卸行政院長後，每天都到中央銀行辦公，各種會議，也都親自主持。但他的老氣喘病一直不好，五月廿日總統就職典禮那天，在總統府大禮堂中，記者碰見了他，他說：有機會願意再和新聞界的朋友聚聚，典禮完後，他便匆匆跑到交際科去吃藥。

記得在他作行政院長時，有人勸他不必天天到立法院去浪費時間，但他却說：「我們使立法院很順氣，導致一些和祥之氣，便是替總統作了一件大事。」他在行政院長任內，特別重視糧價和金鈔價格的變動，他說：糧價比其他物價更要緊，因為食糧和鹽是一般貧苦的老百姓所必需。目前我們反共最要緊的工作，是使窮人能够生活下去，才能抵抗共匪毒苗的侵入。

六

俞鴻鈞對於國家的另一大貢獻，是在大陸撤守時，他把中央銀行所儲存的黃金，全部運到臺灣來，因而使得我們在過去那一段最陰暗的時期，在財政上並未遭遇困難。這一件事，蔣總統時常向高級幕僚提起。據說：當張岳軍先生一日下午把俞鴻鈞逝世的消息，向總統報告時，總統極為悲痛。

俞鴻鈞逝世的的消息，一日下午在政府的高層人士間傳播着，當記者走進俞先生的臥室時，正遇到兩位新聞同業，他們的眼睛裏噙着淚，我看到一架古老的鋼絲床，床上躺着的正是溫厚的俞鴻鈞先生，但是他已一聲不響的離開我們了！

俞鴻鈞先生的風範

聯合報記者 彥

遠

前行政院長俞鴻鈞先生的遺體今天在極樂殯儀館火殮，下午舉行火葬，這位以「崇法務實」而在全國國人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政治家及銀行家，自此超脫塵寰，永憩天國。

俞先生的一生事蹟，和他的個性極為相似：平易、篤實、穩健、醇樸；既不多彩多姿，亦不轟轟烈烈，但在平凡中表現了極大的定力，產生了極重的份量。

俞氏生平不好大喜功，不自我賣弄，當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英文譯稿出諸俞氏手筆，但俞氏生前從未以此一革命歷史文獻的譯事向人炫耀；七七抗戰爆發之際，俞氏適任上海市長，日本人亟謀襲取上海，俞氏固守崗位，不撓不屈，對日本人的威脅、狂妄，根本不予置理，抗戰初期的民心士氣，受到極大激勵，俞氏被譽為黃浦江上的蘆溝橋戰士，但俞氏生前對這段抗日期間的舊事也絕少向人提及。

關於俞氏在卅八年上海淪陷前夕把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籌劃啓運來台，保全了國家的巨額財產，穩定了政府遷台後的財政金融，此一段事蹟，今日已為國人普遍知曉，可是，一般人都還忽略了此中的一個重要關節：也許會有人以為俞氏當時既為中央銀行總裁，籌劃啓運央行庫存黃金至安全地點，本為其職責以內的事。其實，俞氏當時並不在中央銀行總裁任內，當時的央行總裁為財政部長劉攻芸兼任，俞氏不僅已經離職央行，而且他本人並不在上海，後因滬上情況緊急，李宗仁態度曖昧，鑒於中央銀行庫存黃金對國家命運的重大影響，俞氏乃率冒險從香港飛往上海，運用他個人與中央銀行在職人員的淵源關係及影響力，擊刺部署，將庫存黃金運來台灣。俞氏當時并未擔任財經方面的任何公職，完全是本諸個人對國家的忠誠、熱愛，而將個人危險置之度外，為國家保全了巨款財物，這是難能之處。

俞氏來台後，於四十二年出任台灣省主席，在職一年另二個月後，調升行政院院長。俞氏在省主席及行政院院長任內，也正像他一往的事蹟及平生的個性一樣，平易篤實，一般人也許很難於列舉出他在任內的任何豐功偉績，可是他的政治風度，他的民主涵養，他的廣闊胸襟，以及他的平易近人的處人處事態度，使得正在學步民主的我國，在民主政治的軌途上跨進了一大步。

他在行政首長的地位上尊重立法機關的職權，不計個人所受的困擾、難堪及委屈，提高了議會的權威，樹立了議會政治的楷模。他尊重輿論，以廣闊的胸襟接受批評；他尊重言論自由，從未以行政權力作過任何不當有的干預！

也許會有人以為俞氏在行政院長任內，立法院的質詢，監察院的彈劾，數度掀起政治波瀾，似乎有失祥和氣氛，其實，到了今天，大家試冷靜的回想回想，俞氏在任的那幾年，並沒有什麼令人感到扼腕或遺憾的事。當時，受到困擾最大的應當是俞氏自己，監察院的彈劾，俞氏代人受過，下台而追無怨尤，宰相肚裏好撐船，俞氏的胸襟及雅量是值得懷念的。

蓋棺論定，這位以「崇法務實」而位極閣揆的政治家，所留在國人記憶中的，不是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不是使人津津樂道的豐功偉業，他留下了一種平實的政治風範，一種潛移默化感召力。歷史典籍上不會對他大書特書，但他所遺留下的影響力卻會在無形中永垂不朽！

俞鴻鈞先生二三事

機智·守時·風趣·樸實

徵信新聞記者 周

羣

△俞鴻鈞曾以一句話名揚全球，那是在一二八對日抗戰爆發的不久，我政府會派機經過上海租界的上空，去轟炸停泊在黃浦灘畔的日艦，日本軍

開損失慘重，就煽動英法政府向我抗議，認我不應該損害他們的租界權，當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公出，俞氏即以祕書長身份發表談話，聲明我國租借與英法政府的祇是上海土地的一部份，並不包括上空在內，我派機轟炸日艦，祇是使用我國的領空權，不容他人干涉。此言一出，使英法政府無言以對，他的機智，更爲朝野傾倒，他今後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俞氏以標準守時聞名於世，他痛恨國人的「一般不守時的通病，深願以身作則，糾正時弊，他有兩個小掌故，至今還爲人樂道，一次是去祝賀一個朋友的生日，當他準時到達設筵的場所時，不但一個客人都沒有，連主人都不在場，他有事不能久等，祇得簽了名，自己叫了一碗壽麵吃了以後飄然而去。另一次是他約了一位外籍人士去看他，那位外籍人士深知他的守時習慣，特地提前了半個小時到達，但俞氏因有要公待理，仍然要這位外籍人士枯候半小時，到了預定的時刻，才予延見洽談。此外，在他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列席立法院以及擔任臺省主席期間列席省議會的時候，也都是準時到達會場，即使議員和立委們姍姍來遲，他照樣每次恭候開會，決不遲到。

△俞氏生平別無其他嗜好，祇是喜愛搜集各式駿馬的雕刻物，在他的寓邸，即陳列有各種姿態的「馬」，其中有很多匹是嚴家淦部長送的。

談話的機會，儘他所知的毫無保留答復記者的詢問，即使需要保密的或時間不成熟的，也照樣說明，祇是提示一下，請予保留。

△俞氏平日生活至爲簡單，有一次他邀請新聞界的朋友到他的寓邸裏去午飯，一般人想來，總該是盛筵大張，想不到他請的祇是一小碗清湯，一隻乳鴿，和一盆炒飯。

△有一次臺灣全省財稅主管舉行一年一度的工作會報時，俞氏以省主席的身份蒞會發表談話，他說出了一句名言，而「財稅主管拿手放在人民的脈膊上，以知道人民的需要和疾苦，」這句話在財稅界傳誦至今，仍爲一個最好的座右銘。

△在臺省府主席任內，有一位馬偕醫院的院長，因被盜竊受到傷害，俞氏聞訊以後於出事的次晨，就輕車簡從，獨個兒的跑去淡水那個院長家裏去面致慰問（兩人原來相識），到了淡水之後，他獲悉當地治安情形不佳，就到鎮公所去找鎮長垂詢詳情，不料淡水鎮長竟不相信站在面前的人，就是當時臺省的最高行政首長，最後，俞氏沒法，祇得掏出身份證來，以證明他就是俞鴻鈞，才得明瞭當地的治安，實在壞得不可設想，回來後，他就此事責詢負責臺省治安的警政首長，後因得不到結果，那位警政首長也就此宣告下臺。

△俞鴻鈞的記憶力特強，對友儕的姓名和別號，牢記不忘，但儘管如此，他仍不喜歡一個人有了名字以外，再來一個別號，所以他在介紹給自己的時候，總說：「我是名號劃一。」

△俞氏經常鼓勵相識的人從事儲蓄，他說他得到的儲蓄好處，可實在太大了，原來他早年曾經參加過中央儲蓄會的有獎儲蓄，中了一次獎金至爲龐大的頭獎，他的得以完成大學教育，就是受此儲蓄之惠。

△俞氏平日常說他是一個未曾出過洋錢過金的土包子，不過，他還是有着一個美國大學的學位，原來這是參加一家函授學校所得來的。

悼念俞鴻鈞先生

新生社記者 黃麗飛

筆者較鴻鈞先生晚生二十三年，對先生一生事功，雖高山仰止，然所知不多，僅於先生主臺政時，以職務關係，常躬聆訓誨；及先生出長行政

院，亦以奮厲，屢受先生德微之激勵啓發。茲承鈕司雜誌主編先生之囑，謹就先生行誼爲余記憶所及者，雜綴成篇，以應雅命，並申愴懷悼念之情！惟事關史實，倘有舛誤謬之處，仍祈各方賢達有以教正。

幼讀清代名家趙甌北詩有句云：「每夕見明月，我已與熟識，問月可識我？月謂不記憶，茫茫此世界，大衆奚諦視？有如君等輩，未見露奇特。」又有句云：「神龍行空中，螻蟻對之揖，禮數難則多，未必遂見及。」此固諷刺當時趨炎附勢輩之鄙薄面貌，另一方面，亦可見達官顯宦之驕矜態度。民國脫胎於清代，然換肉未換骨，宦海中以位顯驕人者，仍比比皆是。憶余供職臺省府新聞發佈部門數年，省主席宴客，例多參與，某次宴會，余亦敬陪末座，開席之前，來賓先參觀排名席次，其時與妻之某一省級首長發現余之名字，訝然不知何許人，而轉詢交際科長。實則余與某首長固常見面，特以某首長驕奢之故，其眼光看不上不看看下，小人物不足爲其注意也！鴻鈞先生雖真至省主席以至行政院長，其性格與「眼光向上」之輩極不相類。雖爲無名小卒者，如與俞氏見過三兩次面，渠即能提名道姓，親熱招呼。

俞先生主臺任內出巡，對隨行新聞記者非常關切，某次巡視臺北縣林口，歸途發現記者專車損壞，即命停下車座搭載記者。當妮娜颯風過境，災情慘重，先生於督飭屬員辦理救災，忙碌不堪之際，猶能憶及災民中之大華晚報記者劉日昇兄，特以私人財物並親筆作書，囑余代表持往慰問。

當全國出版界與政府及立法院之間爲出版法修改案爭議之際，先生正任行政院長，自爲衆矢之的，其時余在新生通訊社發佈獨家消息一則，確切報道某月某日下午，俞院長會自檔案室調閱關於出版法修正案之全部卷宗，發現所有文件俱未呈經其親自核閱，如非引起軒然大波，俞院長實不知情云云。此項消息發出後，公論報首先刊布，隨後自立晚報亦爲登載，且在別一專欄文字中加以引用，遂引起極大反應。余方深自悔責，事後數日，與俞院長在機場相遇，院長召余謂：「你所刊布之消息，使我之處境倍感窘困，非常難爲情！」余一時竟不知對答，惟覺十分羞愧！又隔半月，於另一次集會中晤見，院長又重述前話，令余愈感慚汗無地！轉念是項文字影響如此之大，當政者設非俞先生，則余此一貌不足道之新聞界小兵，勢將難免意外之禍患也！於此愈知俞先生宅心仁厚，絕不濫用威權之盛德。

先生實事求是，深惡空洞浮滑之表面文章，某次與人論及標語口號，曾批評「擁護領袖」二語乃屬多餘，俞先生謂：「蔣總統乃國父之繼承人，吾人擁護蔣總統，理所當然，譬如人均知敬事其父，未聞天天喊擁護父親之口號者。」

先生論飲食，亦別具風趣，嘗謂「娶妻必委善於烹任者。」又謂：「我家中從來不以魚翅饗客，此物價既昂，其味若粉絲，不若代以粉絲爲妙。」近年有幾位黨國顯要相繼謝世，據余所見所聞，不論政府或民間，以對俞鴻鈞先生之悼念獨深，報章文字刊載，亦以對俞先生者爲獨多，觀先生之行誼，當知此種現象由來有自非偶然也！

記者出身的政治家

中華日報記者 甘立德

俞先生是一位出身新聞記者的政治家，由於他厚道淳樸的性格，加之他在換記者生涯時，曾與廣大社會多面接觸的經驗，所以當他身居高位之時，總是平易近人，毫無「官」氣。當他在省府主席及行政院長任內，任何人有事求見，他總是給予見面和談話的機會，從不拒人於門外。每當新聞記者前往採訪時，他也總是誠懇坦率，有問必答，即令有時「無可奉告」，亦必使記者們很滿意地出門。他雖然以善理財政而見稱於國內外，但他却深懂「民主政治也就是輿論政治」的真諦，所以他非常尊重輿論，也很樂意接受別人的批評。他確有一「宰相肚裏可撐船」的恢闊雅量和民主風度，因

此，許多人都認為他是一位最平民化和最民主化的政治家。

享年六十四歲的俞先生，公忠謀國，操守廉潔，平常生活樸實清淡，公餘嗜好閱讀書籍及報紙，他最器重人才，對獎掖後進，不遺餘力。財政部長嚴家淦曾於接受記者訪問時很悲愴地說：「俞先生的死，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嚴部長說，最近俞先生曾遵照國策，致力於中央銀行復業建制的規劃，親自策擬方案，並數度修訂，三天前的端午也未會休息，臨終之時，猶殷殷詢問此事。嚴部長說：「俞先生這種為國盡瘁的精神，真使我們衷心感動。我們只有照他的遺志，完成他的計劃，才能對得起他。」俞先生一生中值得我們懷念的事太多，記者不勝枚舉。我們相信他將永遠活在我們國人的心中，永遠值得我們國人回憶和悼念！

青年導師俞鴻鈞先生

前任中華日報記者 周 萍

俞鴻鈞先生已與世長辭，但他生前對待新聞記者的誠懇和靄態度，將給人永恆的思念。他的逝世，就國家來說，從此失去一位「崇法務實」的公務員，無疑是一大損失，但就多年來常蒙他殷切關注的年青的新聞界朋友來說，更不啻是失去一位忠厚的良師。俞先生自己在年青時代當過記者，因此了解記者，同情記者工作的甘苦情形。他常跟這些後輩記者們追述他過去那段至可寶貴的新聞記者的生活經驗。他在行政院長任內，有一次會偶然對筆者說：「如果可能，你還是教你的下一代做新聞記者較為有意義。」他這話，是當他獲知筆者已有一位「下一代」時說的。他說這話的含意，據我個人的理解是表示他仍然時刻在思慕作為一個新聞記者自由自在的生活，從而將他個人一生的閱歷，親身的體驗，認為最有價值的嘗試貢獻他人作為參考。俞先生是一位最親民的公僕，他對記者如此，對普通民衆也完全一樣。他所住的中山北路寓所，常有他平生從不相識的朋友去找他幫忙，但他從不拒人於千里之外。

俞先生生前做了好事，從不張揚，他為了鼓勵年青人上進，常不惜利用僅有的一點空閒時間，替青年朋友們改英文作文。據我所知，好多現仍在美國的年青朋友從前所以能够考取留美深造機會，泰半是受俞先生鼓勵所致。俞先生對凡是肯努力求進步的青年朋友，不管是誰，都是一視同仁地盡其一切所能來鼓勵他，幫助他。例如同業中的鄭誠章君，他跟俞先生認識時間很短，祇是當俞先生出任省主席時，鄭君以中華日報記者身份在省府探訪了一段極短時間，但鄭君却可利用這點短暫的關係，向俞先生請教英文寫作，以後他便寫好英文作文，送請俞先生修改，改好後立即由郵遞寄回鄭君。甚至後來俞先生升任行政院長，日理萬機，却仍能不斷為鄭君批改作文，更為難能可貴。當時，記者朋友中常有人當俞先生的面，說他是「未立案的函授學校」，他聽後不禁哈哈大笑，並說年青人有幽默感，可愛。這可能也是他生前樂於親近年青朋友的主要原因。

有關俞先生的往事，回憶起來，真是一言難盡。誰也沒料到，他竟這樣快就跟我們永別了。然而他雖然從此長眠地下，但筆者相信，他那愛護青年，親近青年的熱忱，是永遠不會被人忘記的。

俞先生給我的最後印象

公論報記者 黃毅辛

愛馬的人性格最善良

我跟俞鴻鈞先生認識，完全是基於擔任報社採訪工作的關係。因此，自去年十月間我奉調內勤以後，加上他也早從採訪的熱門對象——行政院長——轉為專任中央銀行總裁的關係；先先後後，我們幾已近年沒有見過面了。五月十三日下午，我竟在欣賞一部美國影片以後，忽然特別想念起這位溫厚的長者。那是因為影片中一句臺詞：「愛馬的人的性格是最善良的。」熟悉俞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屬於最愛馬者之一。他家裏有幾百匹銅製、瓷造、石膠塑成的世界上各種各類的名馬模型。更奏巧的是我看電影的當天晚上，就在一個私人宴會上遇見俞先生的祕書劉章富兄，我向他問起俞先生近況，並告以想念俞先生的意思。翌日下午，我就接到章富兄專人送來的信，說俞先生歡迎我在十五日上午九時半去談談。

無意中提起蓋棺論定

這豈非神奇的安排？五月十五日我同俞先生暢談四十分鐘，他說了很多青年人做人處事的道理。特別是當我勸他趁暇寫點「回憶錄」一類的文字時，他竟提起「蓋棺論定」四個字。他說：我們這個國家是注重活人的社會，任何人一息尚存就不能不顧及各方面的情面；「回憶錄」一類的文字，要寫得真實，就難免牽涉很多活着的人。因此，歐美各國風行回憶錄或傳記，而我們却講究「蓋棺論定」；斷了最後一口氣，任憑人家去說好說歹，而自己呢？不是「充耳不聞」，而是「無耳可聞」了。想不到俞先生這無意的一席話，竟在短短的半個月後成為不祥的讖語，而我這突然起意的一次拜訪，也竟成為永訣了。

電話傍獲悉謝世消息

六月一日下午，俞先生遽然長逝的消息傳到我耳際，也是十分神奇，約莫三點鐘的時候，我在辦公室裏，一位不相識的人來借用電話，通話的對象是前中央日報社長阮毅成先生，好像是催促阮先生下午三點鐘前要踐約到什麼地方去。不料對方答話竟必須延遲幾十分鐘，因為獲悉俞鴻鈞先生逝世，要立刻趕去弔唁的關係。我真是等不及這位借電話的人放下話筒就搶着問他：「俞鴻鈞？你不是會聽錯這三個字吧？……」。四時左右，大雨滂沱中，我趕到中山北路俞先生寓所，這不願置信的消息，竟在眼底下成為最殘酷的事實了。俞先生待人誠摯和善，他的談吐沉緩而詭擊，真正屬於古人所說的「威而不猛，溫而不陷」，加上他那代表曠達、開朗與真誠的笑容，對青年人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勸服力量。無疑的，這也是他終能贏得許多年青的朋友們由衷敬佩的最直接資本。

嘗以先人遺訓勉青年

五月十五日那天，我原不為什麼特別的事去拜訪他，因此談話的內容漫無範圍。起初他向我探問很多位新聞界朋友的近況。雖然他擺脫閑探的職務已近兩年，但一、二十位以往因採訪關係跟他認識的同事，他仍能一一指名道姓，甚至連各人所屬的報社單位也不致絲毫紊亂。我想，這雖是俞先生異於一般官僚政客的一點，但很可能就是他一生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接着，我們從普通的時事一直談到當前在臺灣從事任何行業的艱難。俞先生曾告訴我很多關於他父親一生奮鬥成功的故事。他說他的父親十五歲時單鎗四馬從廣東到上海，因環境的關係祇讀了九個月的書，但後來在經商中抽空自修苦學，中、英文的根基都打得很不壞。俞先生在十歲左右時，就開始跟他父親學英文了。俞先生又說：給他印象最深，影響他一生事業最大的

是他父親彌留前的一段話：「外行的生意不要做，內行的生意沒有實權也不要做。每一個錢敞開來看都是有血的。」俞先生說，他父親雖以一名生意人說些自己親身的經驗，但仔細推敲起來，對於從事任何行業來說，這看似簡單的幾句話，都是不易的真理。俞先生特別解釋前面三句話的最後一句，是因為他父親一生辛苦奮鬥，雖然賺了很多錢，但卻能深切體會物力維艱得來不易。尤其是臨終時留給俞先生一筆可觀的財產，因而希望不要浪費他血汗換來的代價。我們幾位同時認識俞先生的同業，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祇要有機會去跟俞先生談一次話，必能令你在人生閱歷上或多或少增添了一點什麼。這正是一般人所形容的「如沐春風」的實際感受。

俞先生遽然長逝，對國家對社會都是無比的損失，他一生的功業志行，記述的人已經很多；並且由於他的完整人格與道德精神的光芒，更必將長留在識者的心坎。我因為僅僅在採訪工作上獲得與俞先生短促的接觸機會，因此所得印象，也是零落片斷而不完整的。這裏謹就我記憶所及，記述有關俞先生在民主法治觀念上值得人們推崇的兩件事：

慨嘆民主觀念猶不足

四十三年臺灣實施地方自治舉辦第二屆縣市長選舉，當時俞先生正在省主席任內，臺北市長的就選戰十分激烈，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王民寧大憲失荊州，市長寶座終被高玉樹爭奪去了。可是當選舉揭曉的那天深夜，全省其他各縣市長早就將投票結果傳達到各報社、通訊社，唯獨臺北市市長選政當局，直到凌晨四時還以統計未獲結果為藉口，拒絕向報界透露。原來是那些幼稚的協助選政的黨棍們，竟以選舉失敗比如下了什麼滔天大禍，嚇得手足無措。後來由於為報界人士所逼，不得已祇好硬著頭皮打電話向當時的省主席俞先生請示，說是統計結果竟由高玉樹當選，建議可否延壓發表的時間，藉以「徐圖補救」。俞先生由酣睡中被電話給叫醒，聽了對方的一席話大表震驚，奇怪這些人竟連承認選舉失敗的勇氣都沒有，於是他以辭懇摯的俞先生徵感不愉了，他說「總裁祇囑咐大家努力去作公平的競爭，並沒有任何必須保證當選的指示。一切由我負責。」第二天清早，俞先生先從中山北路寓所驅車往士林官邸有所報告後再到省府辦公，而且就在遇見我們幾位請他發表選舉觀感的記者時，很感慨地道出了這段當時祇供我們參考的故事。我清晰地記得，俞先生的結語是：「學步中的民主，還有待於觀念上培養起……」

不願政府彰功於人民

臺灣的「耕者有其田」政策，雖然先後以五個年頭的時間逐步去推行，但在進度表上，恰好是完成在俞先生主持臺灣省政的時候。當時，一部份黨方的人士倡議要組織一個研究小組，研究「耕者有其田」政策既已推行完成，政府所給予一般佃農或自耕農的好處是如此的優厚，這許多受惠的農民將以怎樣的方式來效忠國家，報答政府的德意。這件正在擬議中的事，當為俞先生所獲悉，他大不以為然。但中國近數十年來，任何政治上的歧見，往往可以由一方面藉已獲最高階層同意為託詞，輕易地造成事實，糾正已來不及了。俞先生為此，特地親向最高當局陳述他個人的見解，他說：「『耕者有其田』政策，祇是政府在施政上一項法令而已，而且是作為一個有能的政府應該做，必須做的政務之一，並不是對農民的一種特別恩賜；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在憲法上已有明文規定，諸如『當兵』、『納稅』皆是，我們豈能專為實施一項政策之後，又額外要求人民承擔一些什麼義務呢？」當最高當局對俞先生的見解完全表示同意後，這個倡議中的研究小組遂告作罷。

俞先生現已不幸遽作古人了。誠如前文所述，他在世的時候，囿於中國傳統的習慣，不便以回憶錄或傳記的方式記述他自己許許多多寶貴的從政

經驗與心得，因此，我特選上面兩則當年由俞先生親自口述的小故事，用以悼念這位崇實的政治家，生前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優異貢獻！

解衣推食悼〇K俞

大華晚報記者 劉日昇

我有兩套依然完好的「〇K裝」，而〇K却已蒙主召，睹物思人，倍增無限悽惻與悼念。

我因為是廣東同鄉而識〇K俞，當俞先生奉命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報社因我是廣東人而調派我採訪省政府新聞，由此得結識俞鴻鈞先生。

民國四十二年七月十七日，強烈的颱風妮娜襲擊本省東北部地區，我當時住在南機場邊，當晚暴風雨中遭水淹及腰，扶妻抱兒，隨衆逃難到建國中學樓梯口上過夜，好不悽慘！

當晚徹夜無眠，在梯級上拾得一本舊日記賬用的空白手摺，於是就俯伏在梯級上，就自身是災民的親身經歷，以及親眼所見及親耳聽聞的風雨災難實況，寫成一篇報導，次晨送到報社，刊在當日的晚報上。

我寫這篇報導，完全是站在一個新聞記者的立場，盡我的職責。因為即使我自己不遭水淹，也得去訪問被淹的災民而寫報導。這一來，我省了找對象訪問，就親身所歷及所見所聞，信手寫來，即是最真實的報導，當然我要寫而且應該寫。

孰料俞先生看見了這篇報導後，竟於次日上午，命當時省新聞處的黃麗飛兄，抱了一包男女衣料來救濟我，並且還親筆寫了一封慰問信，說他在颱風當晚曾巡視各處臨時災民收容所，恰巧就沒有到建國中學，感到非常不安。

實際上感到不安的是我，因為省主席那有許多時間巡視到每一收容所或慰問到每一位災民呢？而他贈我的兩套西裝料，才真使我受之有愧，却之又不恭，為難了好些日子，後來，還花了我當時整個月的薪水，七百元手工，做了兩套西裝，每次穿起來到了省府大樓，當時的省府交際科長鍾榮凱就半開玩笑的說：「這就是〇K裝」。〇K裝名稱原由於此。

我和俞先生之交，真是「淡如水」，雖然，他多次在他的家人親屬會聚時，例如他的女兒和孫兒來了，或他的內弟內姨來了，便邀我到他家裏一齊吃飯飲茶湊熱鬧，此外，我却從未自動去拜候過他，連過年和他的生日，我都不會去作揖或簽個名或留張名片。這次他仙逝，我不但沒趕到俞府上一弔，連殯儀館我都不會去一下，雖然說起來事出有因，但深夜靜思，不禁汗顏愧赧，怔忡不安，徹夜難以自釋，因而草草寫成此文，表示我對於〇K俞的一點悼念之意，以期稍釋內疚之心也。

我對俞先生的追思

自立晚報記者 羅祖光

何以如此受人崇敬

俞鴻鈞先生雖然作古了，但他的音容仍然縈迴在我們腦際，這種難以磨滅的印象，可說是由俞先生在世之時的坦誠直率所促成。今天鈕司週刊社

社長黃毅辛兄在電話裏告訴我，希望我們這羣採訪過俞主席、俞院長、俞總裁的新聞同業，能寫一點紀念俞先生的稿子，當時我雖一口承諾了，可是當我提筆的時候却感萬分悵惘，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去寫，才能描繪出我對俞先生的懷念，但我確信其他同業所能寫出來的文章，一定也包含着個人的懷念在內。因此，我祇想說一說俞先生爲什麼會受到像我這樣的一個新聞記者來崇敬。

大家都知道俞先生初入社會之時，也曾從事過記者的生涯，儘管時間不太長，但他却是有經驗的前輩。雖然當今黨國要員裏的新聞界前輩甚多，但能如俞先生那樣善待後進的却是很少。

拉攏政府人民關係

以俞先生那樣地位的人，大都是對新聞記者們遠離，可是俞先生不但沒有這樣想過，相反地却願意多與記者接觸，他多與記者接觸的理由，並不是要宣揚自己，而是他認爲民主政治中，必須借新聞紙來做好政府與民間的橋樑。也由於這個緣故，他希望從記者的口裏多知道一點民間的事情，同時他也願意把政府一些施政的背景向記者詳加分析，因此，在他任省主席而至行政院長的六年裏，新聞界所表現的，的確已使政府與人民間的距離縮短了，可是當時却很少被人發現這個內在的原因，而且有時竟有人指認俞先生主政時期很平凡，其實這正是俞先生主政時期的不平凡之處。到了蓋棺論定時，俞先生的這種不平凡身手，才更爲人們所追念。

力加維護言論自由

俞先生主政時，是以「崇法務實」爲號召，他本着虔誠基督信徒的精神，力求實踐，這一點可從總統府祕書長張岳軍先生在追念俞先生時所作的評語窺見，張岳軍先生說：「俞先生是基督徒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基督徒。」這幾句評語說得非常貼切，以記者們與俞先生相處時所瞭解的情形亦復如此；俞先生對任何問題不先開「空頭支票」，凡能承諾的事，他一定盡力而爲，以我們新聞界所關心的「出版法」修正案而言，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由於俞先生酷愛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對息息相關的言論自由總是力加維護。

未免也有內心隱痛

當國民黨中央決定要加強出版品的管理，而欲修正出版法時，俞先生適任行政院院長，他代表執政黨在政府裏執行這項政策時，他內心的痛苦是可以看出來的。他在沒有辦法之中，他祇有告訴我們新聞同業說：我是不同意這一個修正案的，但是我執政黨的黨員，我不能不執行黨的決策，可是我一定把我個人的看法，以及新聞界的要求，再向黨內力陳。事後我們所知道的，俞先生確曾盡過這種努力，儘管我們新聞界的要求未蒙採納，但我們也同樣的知道，行政院以密件將修正案咨送立法院審議的案子，連俞先生本人也未被過目。

不用手段鞏固地位

俞先生就是那樣的平實，他沒有隱諱，也不玩弄權術，他常常想把事情做好，假如力不從心的話，他也沒有想過運用其他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權位，在他行政院院長的後兩年任期中，他經常求去，直到監察院對他提出彈劾案時，才算有了求去的機會，但這個機會對他個人多少有點委曲；然而俞先生却真正的逆來順受。記得記者爲彈劾案而去看他時候，俞先生的那種平靜態度實在令人驚異。他說：「對彈劾案所指的內容，我自當有所辯

我們皆願和他接近

白，但在維護政府的體制上，除了依法答辯外，將不對外再作任何解釋。」他終於在這政治漩渦中蒙受了委曲，但他却符合了「崇法務實」的精神。

由於俞先生的言行一致，不虛偽、不做作，因此我們同業願意與他接近，而且從他的坦率言詞中，使我們增加了崇敬。現在俞先生却天不假年，與世長辭了，在我的職業上來說，我失去了一位值得崇敬的前輩；在個人來說，我是失去了一位良師益友，就整個國家而言，失去了一位崇法務實的模範官員。像這樣的一位完人，怎不令人追思呢！

崇尚民主自由的俞鴻鈞

自立晚報記者

前行政院長俞鴻鈞，以宿疾突發而於六月一日與世長辭，噩耗傳出，識與不識的人，都深表哀悼，一致認為像俞先生這樣的一位益友、良師、好長官之不在人間，不單是朋友的損失，而是國家的損失。

今天是俞先生大殮之期，我們以哀痛的心情來追念他，因此，我們要把俞先生在世之時的是幾件小事提出來，作為我們懷念這樣一位偉人的長眠。

自民國四十三年，俞鴻鈞先生自省府入主中央以後，他即本着 總統所指示的「給予人民更多的民主自由」原則，使他任閣換時期的行政院，的確成爲一個民主象徵的政府，他切實地想向立法院負責。因此，立法委員在這一段時期，對政府的措施幾乎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俞先生也從不以逆己之意而有所不憚，他雖是以執政黨黨員身份任閣揆，但他却不願意以執政黨的上級力量來約束議會裏的黨員同志盲目維護他，甚至有人以冷言熱語來譏諷他時，他都處之泰然，而事實上答復他們，就以新聞界最反對的所謂「出版法」而論，雖然在他行政院院長任內所修頒的，但在新聞界都很清楚，這個責任不應該由俞鴻鈞來負。因為他對全案的途徑開立院審議，事前并不知悉，事後調卷時發現自己也沒有在這一案件中判行，他在接見新聞界同仁談到這個案子時，他很惋惜的說：「我的地位很爲難，以做過新聞記者的我而言，我也不同意出版法所加予新聞界的限制，但我執政黨的黨員，又不能不執行黨的決策，可是我一定把你們新聞界的意見在黨內的會議中提出，我願意盡力去做。」事後我們都知道俞先生確曾盡過最大的努力。

俞鴻鈞先生一生，可說是一帆風順，但他從沒有私圖。因此，當他由地方而入主中央之後，才深深感覺到政治搞不好的原因所在，因此他個人是吃虧了，但在制度上他却犧牲自己立下楷模，假如換個別的人；爲了維持個人的尊嚴與面子，相信也不會有監察院的「彈劾案」出現，而俞鴻鈞接到監察院的「彈劾案」之後，一切都依照法律的程序來約束自己，最明顯的例子，是彈劾案中所謂病的中央銀行總裁的供給制，他毫無考慮的同意停止，而開始過着與其他一般公務人員的生活，記得有一次記者們在他辭卸行政院院長任肩之後，聯合歡宴他，那正是央行總裁供給制取消之後，他說：「我不能以你們這樣豐盛的筵席來邀宴你們，但有機會歡迎你們到我家來便飯。」這一點并不是俞先生矯揉做作，而是他確確實實的遵守「崇法務實」的這個原則。

俞先生的崇尚民主自由，并不是高調，而是以實踐的方式來追求，其間有一件事是我們自立晚報同仁最能體味到的，那就是四十二年雙十節國慶

大的一條花絮所受到的停刊三月處分，當執政黨決定此一處置後，即以速件經行政院下達省府執行，當時俞先生適任台灣省主席，他接到這件指示後，立即約晤現在本報董事長李玉階先生，他首先說明他必須執行此一決定的苦衷，但他同意這種處置並不是太有法律依據的說法，希望本報對這一處分能有諒解，假若本報有所請求的話，他亦願意層轉力爭。當時李董事長對俞先生的坦誠反而感到不願與他為難，而接受了三個月的停刊處分，這都足以說明俞先生待人以誠的態度。

天不假年，俞先生享年僅六十四歲，凡與俞先生交往的人，都在異口同聲地認為：這是國家的損失。

我所認識的俞鴻鈞

工商日報
駐臺記者 戴

緯

在五月的下旬，臺灣——特別是臺北市的氣候，因為來自太平洋的一個低氣壓與另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高氣壓相抗爭，不但冷暖無常，而且陰晴不定，雖然已過了端午節，季節上進入了夏天，但是人們還常常必須穿著部份冬季的毛冷衣或毛冷背心。許多小孩子傷風感冒，咳嗽發燒，那些患有呼吸器官疾病的人更會感到不適。

就是在這種氣候下，前任行政院長、現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病倒了。俞氏多年來患着氣喘病，每逢氣候有劇烈變化時，他都會略感不適。所以，當他在五月二十九日又感到不適時，他的家人、親友、僚屬甚至醫生，都認為並沒有甚麼嚴重；而且，事實上，也確實顯得並不嚴重，因為他每天遵照例要起床，走到樓下處理一部份公事；但是，在六月一日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

強心針失去效用

他在早晨八時起床後，為了怕驚醒酣睡中的太太，所以自己像往常一樣又走到樓下來激洗，大約半小時後，他突然感到不大舒服，臉色的蒼白使家人也有些慌急了，把他安頓睡在床上休息以後，趕快去請醫生，醫生診斷後，派人去買針藥，他的心臟不大好，必須用強心針，但是強心針的效用也漸漸失靈了，醫生們會商的结果，認為應該先使用氧氣，幫助他解除呼吸的困難，然後準備送他入醫院治療。

到十一時許，醫生們發現他的脈膊跳動到了每分鐘一百三十次以上，在這種情形下，自然不宜移動了，雖然醫生們覺得前任閣揆的情形不妙，却仍盡力救治，終於，到下午一時半，這位六十四歲的銀行家與政治家的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醫生宣佈的致死原因是心臟麻痺。

敲敲門可以見他

很快的，「俞氏病逝了」的消息在他的友好之間傳播開來，許多人最初甚至都不肯相信，但這是事實，人們開始利用各種交通工具，走向俞氏住了已經十年的那幢坐落在中山北路的小樓房，看到他像睡覺一樣安祥的躺在客廳的床上，熱淚禁不住奪眶而出，從眼角流經面頰，滴在地板上。

在衆多的弔祭者中，夾雜着許多年青的新聞記者，他們多半是坐了三輪車或巴士，冒雨走進他家的小庭院，再進入客廳，瞻視一下這位大朋友的遺容。

年青記者們有理由喜歡這位曾經與他們同業的大政治家，在俞氏擔任臺灣省主席和行政院長的五年期間，任何一個採訪省主席或行政院長新聞的

記者，如有必要的话，都可以敲敲門進入他的辦公室，除非他正在會客或召集會議，沒有人會阻止記者的，因為他既無保鏢也無副官，除了兩個有禮貌的年青人替客人倒茶送公文以外，實際上並沒有別人在他身邊。當時，記者要見首揆，遠較他們拜訪普通機關的科祕主管更為方便、簡易。

他知道尊重別人

因為他尊重別人，所以別人更格外敬重他，他做過記者，知道記者的需要。因之，記者們要採訪新聞，他可以先告訴你：現在還未到發表時機，祇能供你參考，然後把這新聞的來龍去脈詳細講給你聽。最初，這種作法，無疑是相當冒險的，因為萬一有人把「背景」說明發表了，豈不糟糕？但是因為他尊重記者，記者也就特別自尊自重，這樣演變下去，記者們都可以明瞭一個新聞發表到什麼程度最適當，因此，在開採與記者中間，造成了互信互敬的交往基礎，雙方的情感也就日益接近，日益親密。

報社的老闆們，最初或不免以為俞氏有什麼特別手法來撒絡記者，但是，他們終於也自己明瞭了，俞氏的確是一位具有完整人格與良心的人，而一般做官的人，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官作得越大，就人情味越小，有些作官的人自認是「神」是「超人」，別人却看他卑鄙無聊的動物。

有真正民主風度

兩年前，就在新聞界努力抗爭出版法修正案的時候，有一次，各民營報的老闆們最後想到了可以向老同業俞氏作最後的呼籲，在會見中，報社負責人們明瞭，在執政黨中央的決策堅持之下，他雖然反對修正出版法，却毫無用處，大家在那種同病相憐無可奈何的相互了解之下，祇有懷然揮別，但俞氏坦誠懇摯態度與善近人的民主風度，使報社老闆們也不得不開始喜歡他了。

偶爾，他在家準備幾樣小菜，煮一鍋魚生粥，炒一整飯，便邀集幾個新聞界的小朋友聊天，上下古今無所不談，親切到像是家長，那博淵像是教授，那平易可親又完全是一個朋友。因此，當監察院與有關當局鬥法弄得不可開交時，俞氏作了替罪的羔羊，被監察院提出彈劾案，並且移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處，而所謂的罪狀又全然與政務、政策無關，所以若干年青的記者們，甚至憤憤的自動替俞氏向熟識的「御史」們抗議爭辯。

說話帶濃重鄉音

這位說國語時仍帶着濃重鄉音的廣東大佬，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出身，做過英文報記者，後來為吳鐵城賞識提拔，從祕書、祕書長作到上海市長，那正是八一三抗戰初期，他在上海孤島與日敵對抗，在對外交涉爭取友邦同情支持方面，頗著功績，所以，當局調他到抗戰大後方，原來準備發表他為外交部次長的，不知為什麼後來却任命他為財政部次長，從此，俞氏經多年奮鬥，將自己造成中國有數的理財能手。在大陸變色以前，是他把國庫的大部黃金美鈔運來臺灣，其間的周折風波，真是難以想像，後來，政府就是憑藉這大筆金鈔，在驚濤險浪中撐過了沒有美援的艱困歲月。

對於中國的民主憲政，俞氏四年開採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他尊重立、憲兩院，他容忍反對意見，他接受批評，他虛心的與立憲院合作。尤其重要的，是他容許新聞自由，因之也幫助了憲政的發展。雖然有人尖刻的批評說他太老好，沒有用，可是，在他擔任開採的四年中，物價最為穩定，民主政治最有表現，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良好例證，都是在他任內創下的。單憑這一點，俞氏在中國憲政史上，就將是一位不朽的功臣——儘管他自己却付出了太重的代價。

做人方面最成功

大官們弔祭俞鴻鈞時一派肅穆是當然的，僚屬們的難過也是真心的，尤其他的司機、工友、女僕，談到他患病經過時，都會像訴說自己父兄臨終時景象那樣熱情流露的含淚欲滴。撇開他在政治上的成就談，在做人方面，俞氏應是最成功的了。他的夫人梁女士比他小兩歲，是一位最虔誠的基督徒，三位女公子都已結婚，子女成行，俞氏在這世界上應已無憾，所以他遺容才能像熟睡那樣的安祥。

認識俞鴻鈞先生八年

香港時報
前駐臺記者 譚日平

——所見、所聞、所感

這是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十一日的事。

臺灣在這個季節裏常常是晴雨不定的，四月十二日這一天，整天大雨滂沱；氣壓很低，因為我是香港時報記者，午后五時許，我正從外面跑新聞回到時報臺北特派員辦事處，報社同事告訴我：新發表尚未就任的臺灣省主席俞鴻鈞，在他的寓邸招待新聞記者，於是我便驅車冒雨到中山北路二段二十巷五號俞氏寓邸。

滬戰時聲譽雀起

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和二十六年「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戰役，俞鴻鈞先生已因為他能從容肆應折服強項的日本軍閥而名聞海外，可是其後他卻一直在財政金融界服務，以迄他奉命出主臺灣省政前，他身兼中央、交通、農民三國家銀行及臺灣銀行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理事，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因此在一般人士的腦海裏，俞氏已經是一個財政家、金融銀行家了。尤其是在我這個晚生二十多年而「出道」不久的新聞記者看來，對他這時奉命出主省政確實有點陌生，而不敢置信他能成功之感。

這時正值原任臺省主席吳國楨措置失當；使糧食倉儲發生問題，庫存空虛，糧價飛漲，造成人心惶惶局面，因此乃不免使我和一般人一樣產生此種心理。當時報社特派員馮志翔却獨特異議的說：「一條條道路通羅馬！」他認為俞鴻鈞在政壇上是以平實見稱，說不定會獲得意外的成功。坐在三輪車上奔馳的時候，我腦子裏一直在盤算這些問題。

為人向來不矯飾

等我到達俞氏寓邸，那時跑省政府新聞的各報同業都已到齊，大家圍坐在那顯得擁擠不堪的十席大小的客廳裏，我到得較遲，座位已排在靠近門口走道上了；我以新聞記得的習慣環顧週遭的環境，雖然稱得上明窗靜几，但掩不住破舊的痕跡及狹小的不合時宜的空間，直教我不敢相信這位鈔票上都印有他的簽名，在財政、金融界歷任要職上十多年的俞氏，竟住在這樣房子裏。事後我知道他從三十八年來臺後便住在那裏，而且做了省主席乃

至行政院長，不知多少人敦請他調換一棟較像樣的「官邸」，都被此一位「自奉菲薄」毫無矯飾的俞先生所謝絕！及至逝世為止，他一直在這個簡陋的寓邸裏消遣了十多年的歲月。當新聞記者的我們，看的及感到的都比較多，和那些喜歡廣營華廈講究享受者相比擬，又何曾天壤？！

新聞人物的俞先生，這時是座北向南的坐在我的對面，同業們都擠近他的身邊，聽取他的答覆，我趁機把他仔細端詳一番，但見他那修整光潔的面龐上廣額、豐庭、隆準、五官顯出一副為大家所稱頌的平易、篤實、穩健、淳樸、仁慈的典型風範，而他答覆一個問題時，是那樣的坦率真摯，沒有絲毫裝腔作勢；在當時我們新聞記者羣中，聽多了那些油腔滑調，如今聽來相形之下都份外的感到親切，至此始知「OK俞」果然是名不虛傳。

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是我第一次會見俞先生的情景。就在這一刻的觀感中，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不但使我內心悠然泛起一股微妙的暖流，而且這一切使在座的新聞記者朋友都永銘心版。

俞鴻鈞先生在這天記者招待會上，答覆我提出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他對未來省政措施是什麼？

他坦率而又毫不諱言的說：這個問題我要「交白卷」。

當天晚上，我為着保持純真，俞氏的答覆我一字不改的發電報到香港，第二天報上頭條新聞就是這個消息，俞氏後來看報毫不以為忤。事實上，我後來才知道他是匆匆的受命出任臺省主席，因為當時吳國楨住在日月潭表示堅決辭職，省政固不能虛懸，何況糧價飛漲人心惶惶？故此最高當局在高雄召見俞氏立即授予此一任命。這時距離記者招待會時間不過二十小時而已，在時間上來說，他對未來「治臺抱負」自是無法深刻考慮，不過俞氏所以與一般官僚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坦率態度。

廓清不合理現象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簡化機構問題。

他說：老弟，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內行」！

他批評當時財金機構實在過於龐雜，「機構則架床疊屋，政策則令出多門」，他表示他就任以後必從事簡化財經機構工作。果然，他在四月十六日就職，七月一日便草擬實行財經改革方案；建議中央於行政院下設立經濟安定委員會自兼主任委員，這個機構代替了原已設立了的二十多個財經機構，廓清了若干年來行政上不合理現象，在積極方面為中國財經打開一條自力更生的道路，主動的安排自己的經濟生活；俞氏這樣做，確為後來若干年的「繁榮與安定」奠下了基礎。

在四月十六日就職後，第一次記者招待會我又毫無保留的提出當前糧價問題，請問省主席有何妥善的辦法予以解決！

說到就立刻做到

俞氏除了當場表示就任後第一件事便是解決這個問題外，事後也知道他立刻採取行動：一方面循外交途徑向日本採購食米數千噸運臺以資挹注；一方面着令糧食局建立糧食預算制度。以財政上預算制度用之於糧食之生產、運銷納入一個有效的預算制內，這不過是俞氏就任後一個月左右的事。

其後他數度出巡地方行政，足跡所至，每一地區的糧食事務所，均被其興利除弊，一時風氣丕變，全省翕服，其後幾年間糧價糧潮問題「水永無波」，人民安居樂業，享受光復以來罕有的安靜生活，這一段時光都是每一位親身感受的省民所深感珍貴而永誌弗忘的。

擬訂林政改革方案，原是俞氏在省府主席一年任內的後六個月主要施政計劃，可惜他在這方面祇將常為世人所詬病的林班特賣廢止，整個改革方案尚未訂定，遂即轉任行政院長。

創下一個新風格

在俞氏主持省政兩個月以後，我曾以「一條條道路通羅馬」為題在時報發表一篇通訊。我說：俞氏治臺之道是以誠相見的；麥基維里的「翻術論」認為做君主或者統治者的人，「要有獅子樣的力量，又要有狐狸般的狡猾」，這種論點在西洋政治思想史，會獨霸了好幾個世紀；事實上古今中外許多政客們喜歡玩弄權術者，腦袋裏都裝滿這種思想；而俞鴻鈞的為政之道却不是獅子和狐狸的作法，獅子是靠暴力征服來建立自己的權威，狐狸是靠狡詐來騙取別人的支持，他主張而且身體力行的「推誠相與」，因此他在政治上創下了一個新風格。

而且他從來不像某些政客們，自以為自己智慧、能力是超人的，以為「人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在就任省主席第一天表示「我別無所長僅虛心而已」；其後事實證明，這些都是真實的！他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而付諸實行。他的言行使人心誠悅服，以民意為依歸，以大眾利益為前提，這是民主政治的真諦，「一條條道路通羅馬」，俞氏的作法無疑是通達羅馬的捷徑。

俞氏是四十三年六月一日出長行政院：在這前後有些事可以大書特書的。

這是四十二年五月間的事，我於五月十一日在時報發表一篇「誰是下屆行政院長」的預測特稿；因為那時正是第二屆總統副總統當選以後，預見當時內閣必將改組；政治圈內一時對未來閣揆人選見仁見智衆說紛紛。唯我則根據一項預測認為決定行政院長人選是繫於政府未來施政重點所在；這個施政重點是「財經問題為解決當前各種問題的基礎」，我的結論是使財經安定而使財經配合反攻，就是今後責任內閣的行政院長最重要的任務，所以說將來的內閣是經濟戰鬥內閣。

省主席晉任閣揆

歸納上項的條件，再根據政策需要，從列出名單中便可體會出最高當局物色組閣人選將屬於那一位，特稿所列名單中俞氏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在特稿中最後一段還提出「責任之重僅亞於行政院長的臺灣省主席」將跟着內閣改組而來的一個重要的人選；我說：假如上面對於行政院長人選的推測成立，臺省主席將由財經人員出長可能性極大，當時有人說我說得太過大膽了一點。但事實證明這些預測並沒有失誤：行政院長由蔣總統提名俞鴻鈞先生出任；省主席則由俞氏力薦嚴靜波氏擔任。

這期間俞鴻鈞先生在新聞上確曾供給給我一些「貼土」；不過他的目的並不是利用我這個新聞記者來製造輿論，而是：正如他說因為在省主席一年任內，正好摸着了「門徑」；如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推行，糧政改革，財經改革，以及林政改革等，正已逐步粗具規模，他希望繼續有兩年到三年時間，則不難奠下一個更好基礎。而且他表示有自知之明；在省主席的崗位上政治環境單純得多，行政院長的崗位則政治環境異常複雜，必須消耗更多的智力、時間、去作政治上的週旋，他認為他的個性在當時環境是不大適宜的。可知他的興趣是在省政府；希望省政府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也可知道他的權利慾望是何等淡泊！

一種深厚的友誼

萍水相逢，俞先生和我們新聞同業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甚至有時會忘記彼此間的職業隔閡，他推心置腹的希望會給他作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像這樣重大的事情他希望我們會提供一點參考意見。

後來他接納了我提出的建議；我說：雖然我們的國父遺教是要人們「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但在某一種情勢下，能够有一個較重要的崗位，未始不可以作為自己對國家作較大的貢獻機會。這時俞氏又考慮到省主席繼任人選問題；當局一度會有意必要時由行政院長兼任省主席，以收指臂之效。俞氏則認為，國家責任不妨由大家分開來負擔，最後他推薦當時財政部長嚴家淦出主省府以期取得配合政策推行需要。

至於他組閣的名單都是以才具及政治需要為條件，其中以祕書長陳慶瑜，臺銀董事長張茲閣（在就任省主席時決定）以及後來尹仲容出長經濟部等，亦為俞氏當時以「才具」作為薦用之條件。

無私人亦無私心

由這樣說，可以看出俞氏毫無任何私人和私心；有人說這是俞鴻鈞先生從政失敗的地方，然而我們應該為他這些無私偉大的地方高聲歌頌。

他在交卸行政院以後非常慨嘆的對我說：本來要做一個完人必須具有三個條件：一是做人；二是做事；三是做官，他自問做人和做事的條件都有，而且是成功的，但是做官的條件却不够充份所以失敗了！

其實，他不但做人、做事都成功，「做官」他也沒有失敗；正如上述，他已為民主制度下「做官」的人雕塑成一個大公無私，公忠體國的典範，他是一個完人；他的成功不是短暫的，是永垂不朽的。

俞鴻鈞先生在做人方面：對功名利祿是與世無爭，他沒有個人的恩怨，也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和毀譽；但對國家大事則「寸土必爭」，這些不是讚詞而是事實。正如上述他服務公職幾十年，而且全係財政金融界的要職，如掌理鈔票發行，掌理國庫，但由於他不善營私，到頭來落得兩袖清風，晚近兩年的生活，竟是由他幾位小姐及女婿予以補助；恐怕說來都無人會相信的，然而畢竟這是真正的事實。

絕對不自我宣傳

至於不計名位毀譽事實，往者不說，在行政院長任內他曾被人批評是一個「Yes man」，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官僚鄉愿，對他所標榜的「從安定中求進步，從進步中求安定。」認為是落伍的政治思想，因此造成一個印象；俞鴻鈞是一切「保守」、「落伍」，守成有餘進取不足，無為而治等形容詞的代表；然而實際上他有他獨特的個性，也就是說外圓內方，有如一座不爆發的火山一樣，他不但有偉大的政治抱負，狂熱的愛國心，以及忠於他的長官，忠於他的職守的意志，他的見解是獨到的，他的貢獻是偉大無倫的，可是他卻從來不自我宣傳，正如三十八年搶運危城上海的庫存黃金一事，要不是四十七年由 蔣總統宣示出來，社會上許多人都不曉得有這一回事。

四十三年九月三日海峽砲戰，是一幕轟動國內外的重大事件，但當天凌晨我空軍神鷹部隊，曾採取迅雷不及掩耳行動將金門對岸匪共砲兵陣地以雷霆萬鈞之勢予以毀滅性轟炸；此項轟炸無疑是給予匪共致命打擊，據說：其後幾平間共匪對海砲兵一直不敢再度挑釁，實乃該次轟擊之效果；由於當時國際環境惡劣我們處境困難，採取此項行動可能引起外交上困擾及後果無法估計，故在「九三」凌晨高層會議中主張慎重者大有人在，唯獨當時以行

政院長暨兼國防部長之俞鴻鈞則獨排眾議，果敢決定採取行動，結果竟得到意外收穫。

使用否決權經緯

四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聯合國向全球廣播稱：中華民國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宣佈：對於外蒙古申請加入聯合國問題於必要時，中華民國將使用否決權。結果否決了俄帝的提案抵制外蒙入會。這一場外交戰的勝利，曾使世界各國對中國刮目相看，誰都知道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長蔣廷黻博士因此一舉成名天下知，獲得英雄武士式的歌頌；而事實上當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在臺北由俞鴻鈞主持下之行政院院會已舉行一連串高層會議，最後由俞氏作了最明智的決定電告蔣氏執行。我在四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在時報發表一篇特稿：「反對外蒙混入聯合國蔣廷黻宣佈必要時使用否決權經緯」，對這中間曲折及無名英雄的貢獻均有所報導。

四十七年四、五月間，中日貿易談判正在臺北舉行，而這時東京方面正醞釀一樁外交風暴，日本當局有意允許匪共貿易代表團到日訪問，而且有懸允掛匪偽「五星旗」之說；輿論譁然，雖迭經外交途徑交涉，日本當局竟充耳不聞，最後經當時行政院長俞鴻鈞不顧各方反對採取斷然措施，一方面停止當時在臺北舉行之中日貿易談判，一方面宣佈暫停向日本發出任何結匯簽證，這一措施起初有關方面頗不以為然；但結果日本當局自知理虧，卒至接受中國政府的照會，中日邦交才恢復正常。

權威人士竟是他

記得時報在四十三年刊出我拍發的一個新聞電報說：「此間某權威人士指出目前自由世界政治領袖有一個非常危險的觀念就是『反帝不反共』。往往中了共產國際和平共存之毒而不自知。」這一說法當時外交部長葉公超在行政院會中指出此一權威人士卓見非常可佩，有意找尋此一人士當面請教。其實直到現在為止，葉氏還不知道此一權威人士就是俞鴻鈞。當時俞氏還是省主席，此一見解他告訴我以及一再教我不必洩露他的名字，而此說在現在仍屬「真知灼見」。

以上這些記述，是我很有幸的跟在他的旁邊了解體會得到，也不過是在不勝枚舉的事實中舉數大端而已，我目的是從這些事例中說明俞鴻鈞先生的政治抱負，他不但有進取的決心，而且有旺盛的戰鬥意志；不過因為他具有謙讓容忍精神，能讓人之所不能讓，容人之所以不能容。如有失敗或責難則獨自取當，如有功勞則歸諸他的同僚和長官，把他自己的光彩藏在國家民族利益之後；這種人格又是何等的偉大！

容忍謙讓的美德

正如上述由於鴻鈞先生的超人容忍、謙讓，他的作風常常給社會上一般人所誤解，我認識俞先生八年，許多時候我也對他的作風表示異議；我記得有一次俞先生和我討論到我戰國時闢相如和廉頗的故事；闢相如有兩句名言說：「兩爭然後相爭，兩讓而後相讓；」我說：在政治上一個人的讓、忍，在消極方面無疑可以消弭闢相如所說的第一句話的「爭」字，因為一爭一不爭自然不會相爭，但是在積極方面却無法達到第二句話的讓字的目的，因為「讓」須要雙方行為，假如一面有勝於闢相如容忍胸襟，奈何世人無廉頗之負荆請罪之氣度，因此反而助長那些無厭鑽求者的貪念而已。

強調大家要團結

俞先生對我的說法頗不以為然，他說蘭相如最初也不想到廉頗會負荆請罪的結局；蘭相如看到廉頗甚至轉路躲避；他的出發點不外一是爲着趨國的前途，一是由於他本身的修養，所以他問後果的忍讓到底，最後由於他的摯誠忍讓，感化了廉頗。他說，依同理：因爲我認爲國家到了這般田地，首要注重團結，人的個性不同有如其面；能忍者忍之，則剛柔相濟，則國家前途才有希望。而且他進一步的說，我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善良的，祇要國家有利，我吃虧一點又有甚末關係呢？耶穌救世主還不是要釘十字架嗎？

後來我慢慢體會他的說法是對的；有人說俞氏有「婦人之仁」，他的仁對好人固然有效，但對壞人來說適足以姑息養奸，但是我現在可以固執的認定，這不是俞鴻鈞的不對，也不是俞氏的失敗，而實在是人心太壞了！

俞氏的作風，俞氏的爲人，在四十七年他行將交卸行政院長時，蔣總統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於七月二日在臺北中山堂光復廳舉行茶會，招待黨籍立法委員時；對俞氏有極其公正的評論。蔣總統認爲俞氏在行政院長任內，在政治、外交各方面都有很多的進步和改革，尤其在財政支援軍事方面貢獻最大。總統說：「在俞氏任內，政通人和，並完成反攻復國的戰備。」可見俞氏的貢獻在國家最高掌舵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清楚的。

政治家與基督徒

與俞氏締交三十多年，知之最深的老朋友張岳軍先生評定俞鴻鈞先生是「基督徒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基督徒。」是最適切不過！如今俞鴻鈞先生已溘然長逝，這是國家的無可補償損失，可是他的做人、做事、做官，已留下一個典範；永留人間，作成一個後世的好榜樣！

後記

我是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認識俞鴻鈞先生，我很冒昧的說一句話，他對我可以說是交淺言深（其實他的天性淳厚對許多朋友大多如此）；所以常常跟我談起他一生的經歷，真是多彩多姿；幾十年間他由一個「小開」而新聞記者，而上海市府祕書，次第升爲參事、局長、祕書長、市長、財部次長、部長、央行總裁、省主席而位高至行政院長，很多時候，每在他一念之間，甚至一點微末細節，都可以創造出一個歷史事件，或者扭轉一個歷史局面，他的經歷是珍貴無匹的。

他拒絕我的建議；將他的一生奮鬥經歷過的事情由他自己寫出來；這樣做我知道與他的天性——不喜歡自我宣傳——相違背。但是他却不反對我以傍觀者身份以他的事跡經歷爲中心寫我的「所見、所聞、所感」，八年來，我用日記體我已寫成了厚厚的幾冊東西，我私下想在適當的時候把它整理出來，傳諸後世一定滿有意義；不料我正準備爲着他主持下中央銀行復業，另寫一新頁的時候，俞先生竟撒手長逝，以他的經歷爲中心我的「見聞及所感」，從此竟成爲絕響；至此不禁使我悲嘆無已。前面所述僅是我「所見、所聞、所感」的片言，亦已可見這個平凡中的偉大人物，其偉大的一斑。（四九、六、二十五）

俞先生生平言行補述

何善垣

俞先生逝世之次日，中國一週史紫忱先生，以予從先生久，其生平言行，或有爲其他紀念文字所未及者，囑爲補述一二，其時予因心情至感煩亂，

加以當晚尚須寫一傳略，以備次晨付印，時間過於匆遽，實亦無暇及此，祇能婉謝史先生來意，但此心至感惶歉與不安，關於先生生前，舉凡聲華大者，紐司專刊所載已有詳盡紀述，朝野各方，對先生之逝世，亦無不同聲悼惜，備致推崇，身後是非，蓋棺論定，先生九泉有知，當亦可欣然自慰矣，予前寫之傳略，因成於急就，於先生生平言之可紀者，頗亦多有未及，茲再就個人所知，拉雜追憶一二，以補傳略之不足。

先生大學畢業後，即在其母校任助教，時先生之尊人廷柱先生經營恆順泰號，其容易遠及海外各地，資用饒裕，業日以宏，廷柱先生逝世後，即由其叔星耀先生繼續經營，星耀先生有子早卒，極思先生能世其業，行中事無鉅細，悉令參與，先生雖不樂為此，然以長者之命不敢辭，則亦惟有於課業之餘，偶自詠紀其事，以爲笑樂，然終以此道不足以展其抱負，久之即決心他圖，星耀先生知其志，亦不之阻也。

先生於中英文造詣均深，時陳友仁氏主持上海英文大陸報，與先生初不相識，因見先生所投之稿，大爲欣賞，遂羅致入該報任事，陳遂於西學，而性素褻急，對人不假詞色，館中同事，每以稿件送閱，稍不滿意，即擲之於地，惟於先生則否，有未合者，輒爲一一改正，如此數月，所改漸少，或竟一字不易，最後即囑不必再行送閱，逕行付印，先生嘗謂彼之英文，得益於陳氏者，亦爲不少，迨北伐軍興，武漢底定，陳氏出任外交部長，遂邀先生任秘書，其私人名單，亦交先生掌管，先生初入仕途，才氣鬱舉，凡所經辦之事，莫不銳意進行，或代陳先爲核定其事，陳亦不以爲擅專也，其見信任如此，嗣因共黨潛謀叛亂，先生鑒於情勢，知不可以久留，遂悄然不告返滬，未幾寧漢分裂事起，先生早已抽身遠引，人咸服其先見。

十六年七月，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黃鵬白先生任第一任市長，未三月即辭，繼之者爲張定璠先生，先生因周雍能先生之介，任市府秘書，未幾即以才識受知於張公，旋調第五科科長，專主宣傳及編譯工作，當時市政週刊社論，多爲先生所撰擬，因其文筆曉暢，見解新穎，深爲讀者所讚佩，先生爲文，喜用疊筆，自謂得益於呂東萊，而縱橫論辯，曲盡事理，則又與其鄉前輩梁任公爲近似，後雖因治事日繁，不常執筆，然每於公餘之暇，輒以讀書爲樂，於古人立身行事，尤所究心，實踐躬行，自成警逸，涵濡浸潤，德量日宏，叔度汪洋，庶幾近之。

先生一生勤於爲學，有暇即手不釋卷，人皆知其英文造詣極深，實則德文亦有甚深之研究，但因需用時少，故人亦罕有知者，來台以後，以台地日語最爲通行，遂復學習日文，任省府秘書施紹長君，每週至其寓邸，講授三小時，任行政院長後，仍繼續不輟，即在其辦公室中，亦經常見其持書研讀，偶或遇有發言不能準確時，小字就詢在院長室服務之吳繼柱君，以相質正，其好學不倦與不恥下問如此，是眞能學無常師矣，先生嘗言，彼年十七始學英文，爲求精進計，置一小時字典於衣袋中，無論何時何地，稍有餘暇或遇有未能瞭解者，即取出研閱如此辛勤力學，乃能有所成就，今年雖老大，能多學一種文字亦爲一樂，惟日語發音太難，其近年記憶力又復減退，故學時倍感覺力耳，然終亦不因此而中止也。

先生幼入家塾，四書五經，均已讀畢，晚年猶能背誦，故中文根底甚深，每見近人爲文，間有引用錯悞者，輒舉以相示，於古人詩詞，亦極愛好，雖未見其有所作，但近年對此類書集，選購頗多，置之座隅，時復翻閱，一編在手，興趣盎然，有時亦嘗泛論各家優劣，且能舉其佳句，是於此道，亦深有所得，其所以不爲者，殆亦視此爲雕蟲耳。

每於暇時，喜研習書法，能爲擘窠大字，巖巖正氣，勁健無倫，深得公權神髓，嘗鐫「寧靜致遠」小印，蓋有取於澹泊明志之意，與人作書時輒喜鈐之，亦即以此自況也，近年偶亦臨摹聖教序，但終不脫其本來筆意，各方求書者至衆，先生則有應不應，後因氣喘手顫，益少爲人動筆，歿之前，因孫君義宜赴美，曾爲書一聯，殆即爲最後之遺墨矣，夫人梁就光女士，亦嫻中西文學，尤善章草，秀勁高雅，先生每自歎不如，知白頭賓客之餘，更增文字唱隨之樂矣。

先生爲人誠懇坦率，與人交接不設城府，以故人均樂近之，其任職滬市時，時市府設滬西楓林橋，即原滬海道尹公署舊址，其地與法租界徐家匯

路，僅一橋之隔，但頗僻遠，先生每日上值，均以自置之汽車代步，親自駕駛，途中遇市府同人步行者，輒停車以俟，載與俱行，治事有暇，則常至各辦公室中與同人閒話，莊諧雜作，笑言無忌，以故同人對先生無不親切若家人，而先生對每一同人工作性能，亦均瞭如指掌。

民十七年間，市府增設參議四人，首膺斯職者，為胡世澤，陳紹先（已附匪），曹振飛，其一則先生也，參議在當時，位頗尊崇，略與秘書長等，任斯職者，大抵為開望素著之士，先生於羣僚之中，獨能巽然首出，而年又最少，設非其才識有大過人之處，曷克臻此，是年冬即繼王和為財政局局長，先生於理財非素習，此項任命，亦殊出人意外，先生蒞事以後，即首以提倡科學管理與羣僚相勸勉，並利用每日中午時間，在局中與同人共進午餐，商談公務，無分職位，不拘形迹，務使人盡其言，以故事無不舉，舉無不善，行之期年，績效大著，時外人在江灣地區，鬪場賽馬，向不繳納任何捐稅，以前市政當局，雖曾屢經交涉，終無成功，先生繼長財局後，以該地並非租界，主權所屬，自應接受我國法令，即據理與之力爭，卒使外人就範，年征賽馬稅達銀元百餘萬元，蔚為當時市庫收入之大宗，有裨於市政設施者至鉅。

先生嘗謂對辦外交，最感興趣，而且具有信念，一若可操必勝之機者，其後如收回上海越界築路，以及一二八，八一三。兩次對日交涉，均錚錚有聲，名動中外，用是遂亦為中樞所知，而殿殿響用矣，忽終先生之世，卒未一任正式之外交官，三十年中樞已擬定任先生為外交部政務次長，電召赴渝就職，先生方自幸從茲可以一展夙抱矣，乃抵渝後，乃抵渝後，忽發表為財政部政務次長，實出意外，予時走謁先生於嘉陵賓館，首即舉以相告，然亦不意此一突然轉變，竟為先生未來總攬財政金融大政之開始，又豈當時所及料耶。

廿六年滬市撤退之初，先生屏居滬西某地，待命進止，嗣得密報，敵方有陰謀劫持先生，以遂其某項要挾者，遂夤夜喬裝平民，乘淞滬間往來渡輪至吳淞口，轉換外輪赴港，當時情況，緊張萬狀，然卒能安然脫險，亦云幸矣，先生赴港後，市府在法租界密設一辦事處，留同人數人負責保管聯繫之責，而以王紹齋兄主其事，是年冬，先生電召予赴港，初未言何事，抵港督謁，先生適抱微恙，臥床接見，首即問予曰：「你怕死否？」予為之愕然，當時亦未加思索，即率應曰「無所謂」，先生乃續言曰，上海目前已無事可為，武漢方面，現有某項工作，需人辦理，但該地刻正處於緊急備戰狀態中，每日均有空襲，情勢頗危，如願往當為轉介云云，予以先生意甚殷，亦不願計及個人安全，即應諾，留港三日，即啓程赴漢，過廣州時，周雍能先生正代理粵民廳長，李大超先生任電政管理局長，均在滬時之舊長官，李先生謂予曰，去漢與留粵工作等耳，此間熟人多，曷即留此，予當時亦確有戀戀之意，然以既允先生於前，決無中止之理，遂仍北行，其後數年之間，雖歷盡艱險，甚至舉家饑殍不繼，然仍勉力以赴，未嘗稍廢其志，蓋即所以報先生之知我也，予與先生，初非相知，雖共事一處而不同一科，其後先生職位日崇，晉接亦少，宜若無可契合者，況以當時市府之濟濟多賢，人才競進，樸質不訥如予者，衆中俯仰，僑復相知，然先生獨能殷殷提挈至此，人生遇合，豈偶然耶，抑有前定也。

先生生平用人，不拘一格，亦無絲毫畛域之分，嘗謂人才到處都有，祇在用之如何耳，用其所長，則人人皆為人才，用違其長，則事事無所表現，誠篤論也，若干年來，自單位主管以至秉國鈞衡，四方賢俊之相從者，莫不因才器使，未嘗私於一人，每有荐舉，初不問其關係如何，甚或並不相識，如以為可，即以列名荐剡，其任台省主席時，民防會副組長李敦宗君，因於一次會議中，為先生所器識，會後立予召見，當晚即發表其為該會主任秘書，不次超擢，人咸目為異數，實則初固無一面之識也。

先生於人，無智愚賢不肖，悉皆推誠相與，或心不善其人，亦不為崖岸固拒，但默識之而已，每於宴坐清談，偶亦作汝南之月旦，則如燃犀燭照，洞澈隱微，或人言行，有遠於人情者，雖復深致感歎，然必曰，此亦人情之常也，其能恕人若此，凡所任使，無不恪昇至專，遇事但持大體，不為苛細，蓋深得於執簡馭繁之道，以故人均樂為其用，任首揆數載，各部會用人行政，除扼要作原則上之指示，并予全力支持外，凡所施為，責成而已，觀於前教育部張部長曉峯先生，在台灣光復節談免試升學問題一文內，曾有一段如下：「有一次法國訪問團團員問我，你們中國教育部長與財政部

長，是否常吵架，我答道，我們都是執政黨的從政同志，當然大家會共體時艱，合力以赴，可是中國有一位路易喬治，就是歐鴻鈞先生，因為他也是由財政部長而做國務總理，他沉默寡言，當我就任教育部長時，他祇乾脆的說了兩句話，「教育你去辦，我支持你，」事實證明，每當行政院舉行院務會議，對教育案有爭議時，主席都是支持教育部，中國教育上能出現初中免試升學這一件事，固然由於總統英明領導，亡友俞院長對於閣員分層負責的授權，也是一個主要原因，「由此可知先生對人對事之精神，而於教育事業之重視，亦可見一斑矣。」

生平無疾言厲色，雖至僕役，亦復如是，遇有拂逆，難以理喻者，亦均淡然處之，不斤斤於辯正，不汲汲於求合，以待是非之論定，張公岳軍，曾言先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蓋知之深矣。

先生家本富饒，一八二八以後，其在滬閩北一帶房產，悉燬於敵軍炮火，損失至鉅，而星耀先生所經營之商業，又復一蹶不振，以視從前，蓋稍陵替矣，然先生甚少為人言及，一若無足繫心者，平易近人甚極，生活簡樸，其在渝時，與財部常次顧翔羣及央行秘書處長張納川兩先生，在王園合居一宅，顧居樓上，樓下則先生與張各居其半，屋僅三間一為會客室，一為書室，一臥室，每於下值後，即一人獨坐室中，或閱書，或沉思，蕭寂閑靜，門無雜賓，見者幾不知其為握全國財政金融之大權，而簡樸素宥有如此也，時正為對日抗戰緊張階段，全國上下，厲行節約，政府人員，蕭布製之中山服，先生亦如式縫製數襲，屏西服而不御，以示一律，來台以後，曾以一身同時兼中央銀行總裁及交通農民台灣三行董事長，財政、經濟、美援、三會主任委員，諸多要職，集於一身，物質之奉，宜若可以予取予求，而先生則清澹無所沾染，近年以來，雖日用所需，亦幾自為取給，蓋其中懷恬淡，公爾忘私，但知盡其力之所能為，不復計其名位之如何也，是殆真能視富貴若浮雲，用捨行藏，儼然自得者矣。

先生凡三綜國政，其第一次為三十四年對日抗戰時期，第二次為三十七年行憲開始時期，第三次則為來台後，三十九年反共抗俄時期，三十七年共匪叛亂，舉國騷然，先生鑒於情勢迫切，密將庫存黃金運台，其時予兼機要科主任，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後之一小室中辦理，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啓運之夕，由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啓運後第三日，申報中始刊登一簡短消息，謂某夜中國銀行會運出物資若干箱云云，語焉不詳，其所以言中國銀行者，因中央銀行黃金庫存，與中國銀行比鄰，同一門巷出入，以故人不能辨其誰屬也，未幾先生卸任，由劉攻芸先生繼之，時尚有部份黃金未運，迨和談破裂，共匪渡江，淞滬告警，先生復偕夫人乘船由港飛滬，籌商啓運，到之日，即夕召集有關人員舉行秘密會議，會中某君發言，謂先生以前曾為上海市市長，到此時期，自應為上海市市民着想，如將全部庫存運空，則市面將何以維持，應請考慮云云，先生鑒於當時情勢，結果乃決定留存部份以備緩急，餘則悉數運台，前見某君所作記述，謂運金事，係於先生卸任後為之蓋未知有前後經過也，黃金運台後即由何祝封兄負責保管，以迄於今。

先生篤於基督教義，宅心仁厚，尤喜急人之急，友朋中得其資助者不知凡幾，臨歿之前數月，一日忽召劉秘書章富至其辦公室中告之曰，予昨夕夢神指示。命救助一人，晨起閱報，見有某君正患重病，無錢醫治，囑即往探詢並代付所需費用，嗣後復屢以款助之其人病遂日有起色，後再訪之，已出院他去，殆已痊癒矣，先生事前堅囑不可告以姓名，以故其人亦不知施惠者為何如人也。

先生讀書治事而外，於前人之嘉言懿行，每喜舉以語人，以資砥礪，一日於書肆中見有宋根譚一書，曰是予幼時所曾閱讀者，其中既多經驗有得之談，復多律己修身之道，信為人人必讀之書，因購多本，攜歸分贈親友，嗣讀梁實秋先生所譯 Marcus Aurelius 所著沉思錄，閱之至再，認為其中語多獨到，且與吾國之孔孟哲學有甚多相同之處，足資取則，因亦購若干本分贈同人，是先生生於進德修業，雖至老猶孜孜不倦若此，且不止欲獨善其身而已。

先生嘗言生平憾事，爲未能有所著述，雖由於取材不易，實亦不願人云亦云，惟其在滬兩次對日交涉，其中經過，頗多有爲外間所未盡悉者，故深願他日有暇，寫成專書，以存實錄，當市府準備撤退之時，命予將該項有關文件，特予保存，以備將來查考，先生赴港後，爲慎重計，此項文件並其他重要文件帳冊等運港保存，迨先生赴渝，又復將其運至海防，轉運重慶，至抗戰勝利，錢大鈞先生出任上海市長，時先生尙爲未卸任之前任市長，例須辦理交接，錢先生派張雨人君爲接辦員，先生則命予負責辦理移交，予當時請示先生，該項文件，應否仍予保留，先生曰：予目前尙無暇及此，可全部移交，將來如需要時，再借閱可也，大陸淪陷，該項文件，度已早罹劫矣，今先生又歸道山，廣陵散從茲絕矣。

先生早年好騎馬，據鞍顧盼，意氣自雄，曾一度墮馬傷踝創甚，醫月餘始愈，但愈後又復馳騁如故，後其愛馬死，先生惜之不置，取其蹄鐵，留置行篋，出入必攜，時時出而撫摩之，來台後，則將其懸之書室壁間，千金餘骨，念念不忘若此，後友朋中知先生有此癖好，以各種塑型馬相貽贈，達數百匹，先生悉以之羅列室中，大小羣分，低昂盡態，每顧而樂之，晚年不復騎馬，而體重日增，知其根鬚前塵，當不勝髀肉復生之感矣。

先生爲人，富於風趣，尤其幽默感，雖在任何環境，均能不改常態，猶憶二八時，一夕敵軍以巨炮向我方轟射，次日招待記者會中，有詢以昨晚炮彈擊中何處者，先生笑答曰：恕我非炮彈，無法奉告，其風趣多類此，先生有時運用成語，尤雋永有味，來台之初，陳慶瑜、陳公亮兩先生，觴先生於日本餐室，歡談之頃，先生以「一時瑜亮」爲譽，任台省主席時，嘗至台中縣巡視，時林鶴年君任縣長，與其夫人均以音樂擅場，林君請題字，先生即書「鳴琴而治」四字爲贈，信手拈來，均有渾成典切之妙，陳公亮兄擅相人術，當時即曾預言先生將來必組閣，因憶三十八年在廣州時，一瞽者黃某，擅摸骨相法，謂先生尙有九年大運，嗣爲予及柔君儀先生相，亦復相同，以時計之，自三十八年起至四十七年先生卸任行政院時止，恰爲九年，是星相之說，亦若信而有徵矣。

先生有女公子三，均淑美多才藝，現均隨婿居非，年時每率子女更番來台省侍，故雖在客中，而家庭之樂融融如也，弟鴻潤爲一忠厚長者，其淡泊之性與先生同，而修謹則又過之，先生夙患喘疾，歷久不愈，經常以特效藥治之，人有以其醫爲言者，先生輒搖首答曰：予於此病，較一般醫者所知爲多，徒勞無益也，來台以後，病似稍減，發時亦不甚劇，雖年逾六十，而精神體力，不減曩時，髮黑齒堅，望之猶若四十許人，歿之前，亦無特殊現象，不意臥病甫及兩日，竟以不起，豈真修短有數耶，抑人事有未盡耶，際此國步方艱，中原未復，危舟風雨，正賴老成，而先生竟於此時溘然長逝，不獲卒睹邦國中興之盛，此誠足爲天下痛也，以先生之年正有可爲，再爲黨國，爲元首分憂勞十年，宜非過望，然而天道有常，人事靡常，先生可以不死而竟死，人亡之痛，寧止哭其私耶，先生有功在黨國，有學及民生，助業著於當時，聲名垂於竹帛，若是，則先生雖死可以無憾，其又奚悲。

先生歿以六月一日，前兩日爲舊歷端午節，先生晨往吊唁錫山先生之喪，予遇之於門，先生笑曰：予將往與閻先生拜節耳，予當時即覺微其語之不祥，又前此某日，先生言，彼昨夕夢墜一黑暗深谷中，呼號甚苦，仰視其上，有多人往來行走，但無人理會云云，當時未以爲意，迨先生安葬時，前往墓地之親友，排成長列，沿山坡行，因忽憶前事，倘即先生夢中之光景，而預爲之朕兆歟，是可異矣，今山川依舊，人事已非，三十餘年長官師友，無復相從，傷知己之云亡，痛哲人之長往，蒼茫誰與，往事愴懷，瑣屑記之，都無詮次，且亦未足以盡先生於萬一也。

俞先生！大家在呼喚您

——寫在鴻鈞先生身旁

譚玉佐

俞先生！我們廝守在您的身邊，這是第三天了！像這樣的酣睡！在您這一生受盡哮喘折騰夜不安枕的歲月裏，實在是很難得的！不過！到今天爲止三天了您也該睡醒了！

大家在等着您醒來

俞先生！大家在呼喚您！大家在等待您醒來！

帷幔緊緊的拉着，小茶几上的桌燈，散射出經常一樣柔和的燈光，那些由您的小姐們轉贈給您的，雖然有點古舊，但却很舒服，您經常坐在那裏和我們縱談天下事或者獨坐在那裏沉思打發若干個黃昏時光的沙發椅，那隻經常播出您愛聽古典音樂的電唱機，那隻大理石雕塑成的怒馬，每一樣您喜愛的東西仍舊擺在那熟悉不變的位置，加上圍繞在四週雪白也似的康乃馨，發出陣陣的幽香，這周圍的一切是那末寂靜，您躺在這個生活了十年的房間裏，本來我們該讓您好好的休息。

不是嗎？俞先生！我瞧着您那慈祥的臉上。依然閃耀着智慧、仁勇的光輝，您的眼睛雖然矇朧着，但從象徵仁慈的寬厚的嘴唇及代表至大至剛端正的臉頰豐潤的下顎一樣充滿着謙慈聖潔的基督光輝的神態，您不是在酣睡嗎？記得有一次您的老毛病發作也躺在如今的床上，我驀地裏跑來看您；我們也就這樣聊起天來了！情景依稀；誰知道一次相對無言，您竟是一眠不起呢！

猶記得最後的一面

俞先生！自從上個星期五（二十七日）我見過您以後，便一直忙着替您和君儀先生整理中央銀行的復業計劃，和依照那天的指示來擬訂籌備復業工作分配及進度表等事情，您的負責認真的性急脾氣我是知道的，我想儘快的完成這些工作讓您安心。呈報 總統副總統的復業計劃您慎重的一改再改總算在星期六初步定稿，在星期天（五月二十九日）早上，君儀先生喜孜孜的到我家裏揚一揚手裏拿着的計劃書告訴我「俞先生判行了」，我搶着看看您那熟悉簽署的「鴻」字，我們不約而同的相顧舒了一口气，我們盼望了十年的中央銀行復業計劃也就在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正式產生。

俞先生，誰料到這是您在政府公職上也是您人生的旅途上最後判行的一件公文，誰又料到這是您對中央銀行對國家對領袖對歷史最後的貢獻！您未眼見這個計劃的實行，但我現在看着您安祥的躺在這裏！也許您已知道 總統已保證完成您的遺志——中央銀行恢復全部業務。所以從您的表情上看出您心安理得，沒有絲毫的遺憾的模樣。

在您心中憂喜交加

俞先生！我知道您這一次不舒服是在星期六（二十八日）的下午，君儀先生見過您獲得您指示復業計劃初步定稿後，到草富兄家裏來告訴我，他說：「俞先生有點不舒服。」當時我內心觸起一陣莫名的惆悵，君儀先生和我對談之下都體會出；您是在上星期三（二十五日）接奉 總統面諭央行着即復業指示以後，心情便轉趨沉重，您在二十七日——也是您生前和我最後一次談話時說：「我奉到老先生這個命令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您指出喜的當然是停業十年的中央銀行復業，破碎的金體體制重建，憂的是在此時此地央行復業後使命艱巨如何完成？您告訴我：「當前國家財金問題比甚末問題都重要，都嚴重，而央行復業後，也正負起解決這重大問題的責任，我接受命令以後，我便不能令它失敗。總統失望。」所以當時我聽到您話我便深知道後面這些才是啣嚙您心靈的問題，一直至二十八日君儀先生告訴我您不舒服消息益發證明這個想法沒有錯，很不幸到今天更證明您是爲了這些問題而焦慮而失眠更甚而服多量安眠劑而併發各症，兩個小時內竟停止脈搏與世長辭！執筆至此能不令人悲痛無已！

必遵照遺志去努力

俞先生！您教我永遠這樣稱呼您，您說官位官銜對您沒有甚末了不起而且隨時可以棄之如遺，這顯得您對名利看得何等淡薄呢！在我完成您規劃的計劃和那些復業籌備工作進度也大致撰具時，我正打算送來給您看，因爲您認爲，祇要下面的條件具備，中央銀行復業在 總統副總統的支持之下一定會達成任務的：

第一、國際局勢不發美援增加；從赫魯雪夫已瘋狂的毀滅世界和平，美國總統艾森豪決定訪華等跡象，可以看出國際局勢已進入另一局面，美國軍經援的增加，也是必然的結果，是則我們在財經金融上將獲得決定性的鎮定作用，那麼金融政策的執行便有成功的保障。

第二、各方面的配合：金融問題是整個財經問題以及整個廣義的政治問題的一環，陳辭修先生繼續主持內閣以後可以預見的，他將發揮他那肯幹、硬幹的精神從事刷新政風，發展經濟，開源節流減少收支逆差的工作，而且會有（必然性）成效，那末金融政策的推行自可獲得有效配合。

有超人智慧的見解

第三、海峽局勢穩定或向大陸推進；海峽局勢如於適當期內有相當的穩定，而天災意外又託福沒有發生，則一時間無財政上緊急支應，增加發行之威脅；但相反的，如果軍事行動大規模的展開，短期內並向大陸推進，則央行復業適當其時，正符軍事推進需要。

第四、當局和俞先生的信心：最高當局飭令央行復業便表示對央行復業及其成功有了堅不可移的信心，俞先生您也一再責成樞峯、君儀諸先生立即分頭加緊籌備；而您更抱着「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信心，着我們分陳利害、釐定計劃進度等細則，以便逐步推進；這幾天的進行正是表示出「好的開始成功了一半」的名言了。

俞先生！誰又料到二十七日一次深談竟成永訣！這些話您那時還沒有暢所欲言，而從此再也無緣聽到您那超人智慧的見解和您明智深入的高論！

想不到竟一語成讖

在復業計劃最後定稿，而且如期送出以後，君儀先生把所有資料交我予以整理保管，他曾叫我燬掉一部份您刪改過的原稿，奇怪的是當時我祇說是一「沒有關係！我全部保留起來以爲紀念。」那時目的是作爲央行復業歷史資料。誰知，這竟是一語成讖，即使是片紙隻字如今果真是歷史文件，您那珍貴的筆跡，使我們永留哀思了！

記得在您準備刀割治疝氣以前，您曾說：「我身體沒有甚麼毛病，氣喘已經被我精神征服了；如果再把疝氣割治，便可以成爲一個完美的人了！」事實上在「既刀」以後，您的精神確是振奮了許多，誰都知道您的老毛病在折磨您，完全是靠您那旺盛的生命力，來跟它搏鬥，幾十年間每一次都是您贏得勝利，二十六日您在中央銀行同仁動員月會上，報告「本行必將復業」的信心；您的神態聲調之雄亮，精力儀容的煥發，事後同仁之間私下都感到後生二十多年的我們這羣小伙子，對您那六十四歲的老年來說大有自嘆弗如欽羨不置的感覺。

三天來未放棄希望

所以我們對您的健康和對您做人處事一樣具有同樣的信念。五月三十一日您沒有到行辦公，雖然從大家的感覺裏知道這一次的老毛病過去的情形較爲嚴重，但是三十一日下午知道您的體溫已由三十八度四回降至三十七度，看來已經是到了正常的現象，所以六月一日我與匆匆的跑到行裏希望能夠見到您，但是從章富兄那裏却聽到您早晨起來感到頭暈無法到公的消息，何善垣先生十一時半由您的寓邸到行裏告訴我們說，經醫生驗血已無大礙等語並無任何惡兆，所以當我安心回家午睡，及至午後二時一刻獲得您已於一時三十分鐘停止最後一口呼吸以後，我和我的家人簡直不相信我們的耳朵。

俞先生，真是晴天霹靂，每一個人不管識與不識您的人都被這個惡耗震懾住了！是的！我是不相信您會被病魔戰敗的，我趕到您的床前，看見招呼您的徐文寬不停的按摩着您的額頭、心窩，這時您體溫還沒完全消失，拿起您的手還像常人一樣軟軟的，有人主張再設法作身後搶救，雖然科學最後證明不可能，但是我們都抱着出現奇跡的希望，我們廝守在您的床前，在等待您，在呼喚您！三天來我們一直沒有放棄這點希望！（六、三夜）

哭俞總裁

楊選堂

「俞院長去世啦！」從電話中聽到舊日行政院同事的通知，對我是晴天霹靂。抖着手放下電話，等我由家中趕到中山北路俞公館內客廳邊的臥房時，已有多人守在床前。我衝前往床上一望，俞先生已離開了我們，一時悲從中來，禁不住扶住床沿放聲痛哭。我在叫喊：「這是不可能的事，這是不應有的事。」這樣的好人；這樣忠於國家領袖；這樣愛護青年，和易謙恕的人，他的生命如此輕易地爲死神奪去，蒼天不仁，有能更好的解釋嗎？

俞先生多年困於氣喘，每逢天氣轉變，總不免發作，這次生病起於感冒，星期一早上感到有熱度，我到中央銀行辦公，聽到消息後去望他，他對我說：「我本來想到行裏辦公，但下午中央黨部開常會，要通過行政院局改組的人事，不能不去，所以索性上午休息一下。」他還鄭重的說：「總統就職後，海內外期望政府有新政，我們今後每一個人的擔子都更重啦。」那天他氣色雖較差，精神仍佳，但下午終於身體支持不住的而向中常會請假。

第二天，星期二，氣喘嚴重起來，他覺得頗爲痛苦，坐在床上說：忍受這種痛苦，誠不如解脫。聽他話的人都爲之黯然。但大家總以爲這是多年老毛病的普通發作，也就沒有特別認真他對病魔的埋怨。

第三天，就是今天，我一清早跑去望他，當時有陳忠緯醫師，央行桑錫普顧問，俞鴻鈞先生及陳震亞兄在座，我問陳醫師，他說：「總裁熱度已

遲，現在正在修臉。」我們在客廳裏等候許久，我原想見到他看情形後再離開，但一直等到九點半還不見他出來吃早點。不久，陳醫師說：「昨晚總裁因吃了幾次安眠藥，早上仍有點頭昏，躺在床上休息了。」我想不便吵擾他，便告辭出來往央行辦公。十時多我因感身上衣單寒冷，提早下班，午飯後微感不適，請假在家，本擬明天一早再去望俞先生，想不到樓上電話鈴響，傳來的竟是萬萬料想不到的噩訊；竟未能見到對我兼有長官、恩師及慈友般感情的俞先生臨終前最後一面，未能聽到他對我說最後的一句話，執筆至此，令我涕泗交流，肝腸寸斷！

我哭俞先生，不止是因為他對我有提拔栽培之恩，除了私情以外，實在是，像俞先生那麼大公無私；那麼忠盡國家領袖；那麼一位人格光輝的人，他的死，對於國家，以及凡是認識他的人，都是無可補償的損失。

俞先生與我過去毫無關係，四十二年他就任省府主席，我是省府秘書處編譯室主任，由於為他撰述文稿，他幾次囑當時的何主任秘書要召見我。及見面，他對我說：「我希望你能多擔負一些責任，我對你的一切都不清楚，但是我却從你在文章中所表現對國家領袖的真誠意識認識你。我從來沒有所謂幹部，凡是愛國家愛領袖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你以後隨時可來看我，隨便說你認為秉着良心說的話。」在省府的一年及以後行政院與中央銀行的六年，我秉着他的意志做事，他也以這樣的意見待我。我與他幾乎無日不見面，無日不縱談國內外大事，他從不以長官對僚屬的身份待我，也不要求我盡僚屬對長官的尊卑形式。我發現，這根本是他對人的和易態度，甚至對於工友亦是如此。他從沒有架子，他雖位尊至行政院長，但與工友握手，對工友日常的服務一再說「謝謝」的為人態度，從未有所改變。這不是他的矯情，這便是真正的俞先生，他會為一位工友的死于車禍而流淚。他愛護部屬，在我追隨他做事的七年中，我發現他經常的探問部屬的生活、家庭。過年過節，他對部屬送禮，而且親自上門。他常說：「替我做事的人，生活清苦，我總希望有一天告老不復官，還我少年時的經營生意生涯，大家同事可以和生活改善點。」

俞先生的公忠體國，我個人對此最有體認。他對我說過無數次這樣的話：「我們為國家做事，要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要為分總統的憂勞為做事的原則，在國家如此艱難的時候，個人不值考慮，隨時得準備犧牲小我。」這話不是高調，他在行政院長任內，便確曾犧牲個人的名望、地位與歷史來符合國家的利害，來為領袖分憂勞。這是大家所知的事，不必詳說。許多外人不知道的實例，我無法詳說。

四十三年當他就任行政院長的前夕召見我，劈面一句話說：「我本想把你介紹給嚴主席，但是你跟我到行政院去，或更能替國家做點事，所以我要存私心帶你到中央去。」四十七年他卸去行政院長職時，又對我說：「我現在不負國家政治責任了，你用不到跟我，我想介紹你給陳院長，因為你是國家的幹部，不是俞某人的幹部。」我說：「陳院長也是我的長官，我以你的意志為意志。」後來，他到我家家，又說：「你家庭負擔重，中央銀行待遇總算好一點，休息一個短時期，我再為你給陳院長說去，也算我幫你的忙啦。」今天想起他這句話，我真是欲哭無淚。

俞先生在行政院任內，碰到「彈劾事件」，我因為薪津收入不敷生活，替幾家報館撰稿賣文，乃秉着良心為報社寫社論評及彈劾事件。」他讀到後叫我去說：「作為一個朋友，我感謝你。但是，作為一個行政院長，我只接受你在社論中批評我的話，而要命令你停止寫足足以影響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公平裁斷的話。」我抗議，我說我是作為一個主筆在寫社論，我寫社論時不再是他的部下。我上簽呈辭職，他拿起筆要批而最後長嘆一聲作罷。

當時我以為俞先生有所辯護，是因為他的確是那麼清廉無私。他一生服官，在財政金融界多年，但是他自奉之薄，凡到過中山北路俞公館的人都知道。客廳裏的橡皮地毯是舊而破，所有的傢俱是那麼粗糙，家裏的一座電氣冰箱及一套較好的沙發，還是女婿送的。夏天為了減輕氣喘痛苦所用的一架冷氣機，破得幾乎不能開動，吵雜之聲達於戶外。在行政院長任內，有人對他說，位至行政院長之尊，代表國家體面，應搬往大一點的房子住，內部陳設應當高貴些。他說：「招待國家貴賓我有台北賓館可用，招待熟友，人們將不致以屋小傢俱舊而嫌我，我何必搬。」這話是從他心裏說出來的，我深深知道。從行政院回到中央銀行後，俞先生每月只拿二千多元別無津貼，他對我說：「這時我真想訴苦啦，但是，對於行裏的同仁，

對於廣大的軍公教人員，我這苦是該吃的。」

在最近的一二個月裏，俞先生頗為中央銀行的復業煩心，他曾聽到許多的傳說與閒話，我不免擔心，他擺着臉孔教訓我：「選堂，你叫我失望啦，爲什麼說這些話？多年來我教你的忠恕道理，爲什麼一遇事就忘了？」有一天他叫我去，說：「爲本行同仁，爲國家體制與需要，我絕對主張完整的復業，但是，我絕不作權利之爭，也絕不以爲把台灣銀行的業務接過來便算是復業。我在苦心焦慮的想，怎樣才能真正建立中央銀行制度，擔負起銀行之銀行之任務。這個問題較任何其他有關問題爲重要。如果能真正有利於國家，我要堅持我的原則，否則便無爭辯的價值。我看還是讓賢好。」說後他拿二份有關復業的計劃給我說：「你素來不以說好聽的話來哄我，你去研究研究。」想不到政府當局決定中央銀行復業後，他竟先撒手而去。臨終時的最後一句話還是：「復業的事怎麼啦。」央行同仁聽了這話莫不同聲痛哭。俞先生的大公無私，由此亦可見一斑。

俞先生對我，作爲長官，督我甚嚴，對我的工作科以最高的標準；但他對我治學爲人的教誨，又有如恩師，慈父。他常對我說：「年青人，你要不斷的充實自己，求進步，求完善，要保重身體，準備擔當更大的責任，不要以我爲限界。」公餘有暇，他還教我練習以英文撰述社論，一字一句，批說說明詳細。上一二個星期，我在他辦公室擬稿，他笑着說：「選堂，你與我同事近十年了，沒有一點好處給你，說要幫你赴美深造，又未成功，我只送你手中的一枝金筆，說好聽點，就算賀劍贈與英雄了。」說吧，我們相視大笑，那能想到我今晚竟用他賜我的金筆寫他，而且只能凌亂的說述他生平的一萬一。窗外苦雨潺潺，面對着檯上的俞先生遺像，蒼天，教我怎生忘情！

憶丈人

繆啓威

丈人俞翁鴻鈞息勞，到執筆時爲止，轉瞬已逾一月。每當夜靜，無言獨坐，追憶他生前的言行，和那慈祥的面貌，親切的談話以及低沉的音調，便會不斷地重新浮現在眼前。

他的突然辭世，對我而言，豈止是損失一位長者而已乎！記得當他安靜地躺在那滿繡着鮮花的牀上，旁邊的人，不論是親是友，儘都在淌著眼淚，對他們，又豈止是一位親友去逝而已哉！

丈人一生待人，親切仁厚，雖最小的地方也絕不疏忽。記得二十餘年前，他剛卸下上海市長的職位，在香港暫住，那時他在九龍十三咪海灘的旁邊，租賃了一間小木棚，以便游泳時更換衣服之用，並且在附近請了一位老人去看管，當時我們認識才不久，有一天，我和幾位朋友準備在週末往那兒游泳，恐怕泳棚臨時不易租得，便徵求他的同意，借用木棚，他一口便應允了。不料到了週末，天氣忽然發生變化，風雨驟作，游泳自然去不成，我們便去告訴原因游泳停止了。他聽了也沒有說甚麼，事後，我們才知道他會爲這事特地前往十三咪去告訴那守棚的老人，招待我們，到我們取消計劃時，他又冒著狂風暴雨通知老人不必等候，從這小小的事情，證明他的爲人，處處替人著想，懇切周詳。

丈人平生對國家極忠，對領袖最敬。好像在民國三十八年左右，大局突變，他在上海恰巧喘病復發，十餘日不能起牀，有一天，病正發得最劇時，他剛巧在洗臉，氣忽然接不上了，兩眼睜得圓圓的，額上的頭筋更膨脹得像一條繩子繞在頭上，話已說不出，祇不斷地指著檯上一包藥粉，我在旁邊趕緊把藥粉拿過來，以一手扶著他的身體，一手把藥送到他的嘴裏，才能把他的氣透過來，從這一次以後，他的健康受到嚴重影響更衰弱不堪，每天全賴氧氣幫助呼吸，恰在這個時候，總統有電報來，說即派飛機接他上南京有事。普通的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必說坐機往南京，就是下牀激

洗也非常容易，但他平素就有這個脾氣，斷不以自己的健康延誤領袖的事，接到電報以後，立刻抖擻精神，吩咐準備車子，同時自己穿好衣服，竟毫無考慮地起身啓程了，那時在上海祇有我一個人在陪伴他，也不知道應該阻止他還是讓他去的好，結果他是去了，路上怎樣忍受，怎樣捱過的，相信祇有他自己知道，在我而言，這是一奇蹟至今無法明白的，如果強要解釋，恐怕就在他臨別的一句話：「我已經以身許國，領袖需要我的時候，我那能顧到一些小毛病呢？」

他對外交上的應付，天生有其捷才，他曾對我講述一次應付某英國大使的事，那時上海還是英人仗著租界，耀武揚威的時候。一天，英國大使因為好像是越界築路的事，到市政府去找他，一進門便已怒氣沖沖，話也不說，便把桌子一拍，他一看情形不對，笑着問英大使：「你是甚麼人？」當時英大使和他在私交上是相當熟稔的朋友，經這一問，竟愕然不懂起來說：「你難道不認識我是英大使嗎？」於是他才慢慢地說：「我以前認識的英大使是一位溫文有禮的君子，你一進門便大拍桌子，所以我不相信你就是他！」英大使聽了這話，滿臉通紅，不得不馬上改容，從新客氣地說話了。這件事，他每次講起，總覺得很有趣，而且笑得最高興，這種愉快的笑聲，好像就在目前，誰相信我所敬愛的人竟已作古了呢！

丈人平常最喜歡青年人，尤愛幫忙無力求學的學子，在抗戰勝利之後，從他的開支中，不知替他經手救濟了多少人，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民三十六、七年左右，那時我國金融很動蕩，他收到廣州幾位年青的朋友來信，需要些錢交付學費和維持生活，他馬上叫我匯寄給那幾位陷於困難而急需幫助的青年，從這不自私慷慨的贈與，而又是如此爽快的答允，這真給我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對他本不相識，祇偶然在香港輪渡上談話而獲認識的機緣，此後二十餘年，他一直在獎掖我，鼓勵我，教導我，他常以「人到無求品自高」一句話勉勵我自修。前年往台，每晚我與內子坐在他牀邊和他聊天，至深夜不肯停止，他又教我在一個「容」字上用工夫。

當憲法事件鬧得最兇時，他精神很痛苦，但仍繼續地寫信給我，勸我遇事要忍辱負重，我以一个魯鈍的人，竟蒙他不棄，不斷地訓導我，鼓勵我，此恩此德，何日始能圖報於萬一呢！思念及此，不禁悲愴欲絕，熱淚盈眶，丈人之逝，於我真豈止損失一位長者而已哉！

治喪委員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治喪委員會謹以香花之儀致告於

翁故中央常務委員鴻鈞先生之前曰：

維茲吉辰 風和日清 恭奉遺體 爰即殯宮 牛眠待卜 殮禮先成 周詳審決 以安以寧 靈其鑒只 敢掬微忱 尙鑒

中國國民黨 總裁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奉中央委員會全體同志謹以香花酒酒之奠致祭於

翁故常務委員鴻鈞先生之靈曰：

峨峨五嶺 吐納光景 誕毓先生 召華茂類 秀濯淞濱 探驪得珍 淵淵學海 溯其文津 長途驪展 英聲鶴起 小試新錫 收功驛砥 寇來自東 峴嶻五嶺 折其凶銳 有氣如虹 盤錯所經 鋒銛斯驗 浴總司農 初膺鸞薦 漢廷論績 鄴侯居先 綱繆克敵 理有固然 洪水橫流 中原塗炭 鯤島奮揚 更參廟算 台疆開府 洽洽輿情 艱難弘濟 遂踐台衡 性秉冲夷 政崇安定 和以接物 堅以立信 宿疾在躬 謂同荷瘁 豈意須臾 溘然長往 國喪助賢 天傾柱石 興復方艱 誰爲籌策 天下之痛 吾黨之悲 軍民隕涕 非哭其私 天佑中興 再生申甫 靈爽匪遙 鑿茲樽俎 嗚呼哀哉 尙鑒

陳副總統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陳誠謹以香花酒禮之儀致祭於

鴻鈞先生之靈前曰：

公以偉質 早播英聲 宏才碩學 宦達名成 始作英傑 旋專其位 布政淞濱 宣猷弼治 遭時多難 外侮方加 雍容定變 折遏機牙 美譽方隆 登於國府 取精用宏 位期公輔 屬當危難 計定謀深 鯨航穩護 同心斷金 旣越羗員 丹誠無改 生聚維勤 公爲元宰 謙光雅量 百度維新 憂勞興國 力疾忘身 豈冀良材 不竟其用 棟折榱崩 銜哀茹痛 兩京未復 齋志重泉 陳詞侑酒 肅奠靈筵 尙鑒

祭文

行政院祭文

五四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行政院兼院長陳誠謹派副院長王雲五率同全體政務委員暨本院同仁敬以香花清酌之儀致祭於
中央銀行俞故總裁鴻鈞先生之靈曰：

嶺表挺秀 河嶽降靈 名世間出 篤生哲人 敷政淞濱 騰聲歇浦 任重庚支 猷宜園府 出膺疆寄 入總樞機 百揆時敘 庶績咸熙 翊贊中興
網繆大計 殫慮竭忠 積勞盡瘁 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 彼蒼不弔 何弗慈遺 精爽在茲 人天永隔 敬薦馨香 靈兮來格 尙鑒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全體同人謹以香花奠醴之儀致祭於
俞委員鴻鈞先生之靈前曰：

嶺表雄辭 篤生哲人 志存匡濟 業懋經綸 外領疆圉 入掌鈞衡 崇法務實 勤政愛民 訐謔獻替 肝膽輪函 勳華炳耀 名德維馨 老成遠逝
愴悼同深 掬哀致奠 鑒此精誠 尙鑒

第一屆候補立法委員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有九年六月四日第一屆候補立法委員倪炯聲等一百二十人謹以香楮清酌肴饌之儀致祭於
故前行政院長 中央銀行總裁 俞公鴻鈞老先生的靈席前曰：

嗟嗟我公 天生哲人 聲宏實大 出類超羣 學精中外 滿腹經綸 莘莘為義 惇惇其仁 汪洋大度 和藹可欽 忠貞為國 勤政愛民 崇法務實 秉國之鈞 發揮民治 行憲精神 政治猛進 財經平衡 教育普及 社會安寧 尤其軍事 匪敵震驚 至於外交 與國同盟 內安外睦 舉世咸欽 實真元輔 更有何人 胡天不弔 喪我元勳 元勳一喪 舉國傷心 嗚呼哀哉 尙鑒

財政部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財政部部長嚴家淦率全體同仁謹以香花酒醴之儀致祭於

中央銀行總裁俞公鴻鈞之靈曰：

嗚呼我公 今世之英 胡天不弔 遽赴九京 學優而仕 中西匯通 主滬威敵 聲譽日隆 精研財經 羣仰巨擘 八年運籌 萬世建策 政府遷台 主持中樞 贊襄復國 嘉猷嘉謨 從政終始 崇法務實 勤政愛民 口碑無匹 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 百身可贖 九死無避 蒙也追隨 廿載於茲 靡耗突傳 淚墮如糜 敬奠醴酒 侑奏哀辭 來歎來格 神其聞知 嗚呼尚鑒

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徐柏園率同全體同仁敬獻香花致祭於

俞故主任委員鴻鈞先生之靈曰：

己丑之年 九州變色 炎風海臺 播遷而國 阨阻中樞 奠基初植 百廢待興 實艱財力 公於是時 起荷其職 庚寅秋吉 改轍更張 勵精圖治 大舉綱常 蕪蕪密畫 黨財是將 公出餘積 厥猷允臧 以筐以箱 乃積乃倉 需用孔急 充有餘藏 微仗許謨 曷蘇此困 微公雅望 曷盈鉅萬 微公容德 曷成此願 惟公秉柄 矧勉有勸 持躬仁厚 休休以誠 履險如夷 不爲物驚 保泰持盈 不撓營營 恭儉謙抑 秉質堅貞 十年歎歷 德位愈閑 出入獻替 國之棟莖 天胡斬算 不慙遺一 青澤在民 親疏銜恤 公生有自 申甫之匹 歸領天班 玉闕品秩 嗚呼尚鑒

國防部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參謀總長彭孟緝謹率所屬以鮮花酒果致奠於

俞前院長鴻鈞先生之靈前曰：

粵江浩蕩 庾嶺嶺峯 毓秀鍾靈 篤生明哲 維公安通 沉潛剛克 崇法務實 有典有則 春申江畔 實爲名邑 錦履牙樞 萬商雲集 公長市政

祭文

初試牛刀 敷政優優 以淳易澆 蝦夷猾夏 禍延八區 民生凋敝 國庫空虛 公總九府 流節源開 一曲薰風 解愠阜財 赤流泛濫 九有重淪
 播遷海疆 共策復興 出牧三臺 風靡斯樹 入宅百揆 百揆時敘 夙夜在公 莫敢或佚 耿耿此心 可質天日 嗚呼 風塵瀕洞 海水羣飛
 不有脊哲 孰濟艱危 天不慈遺 遽歿以去 悵望雲天 有淚如注 何以餞之 爰有舊醕 太虛寥廓 魂兮歸來 尙鑒

陸軍總部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陸軍總司令羅列率陸軍官兵代表謹以香花之儀致祭於

俞公鴻鈞先生之靈曰：

南紀奧區 扶輿磅礴 篤生哲人 樹立嶽嶽 敷政滄瀆 助譽昭倬 金融巨擘 百羽一鶚 更司度支 運丁百六 長才見理 干將鑿錯 海甸中興
 匡時抒略 用寄疆圻 民禔國福 黃扉正位 躬任吐握 澤覃化成 功伴伊霍 哲人其萎 民之無祿 敬荐椒漿 我悲何若 尙鑒

空軍總部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空軍總司令陳嘉尚謹率全體官兵敬以香花菓醴之儀致祭於

俞公鴻鈞先生之靈曰：

繫維先生 珠海毓英 學優則仕 器度恢宏 滬濱折敵 中外蜚聲 入贊樞府 財阜權衡 布政炎徵 淬厲膽新 崇法務實 松勁風清 鞠躬盡瘁
 長留典型 精靈不爽 明德維馨 尙鑒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黃杰謹以香花之儀致奠於

俞故總裁鴻鈞先生之靈曰：

惟公命世 發政施仁 江涵山峙 一代儀型 尙鑒

台灣省政府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率同全體委員暨廳處首長敬以香茗鮮花之儀致祭於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先生之靈柩前曰：
理財治政 夙秉忠誠 存金籌運 國庫是充 輔弼元首 經建惟勤 天乎不測 中道而終 敬薦香茗 永企英靈 尙鑒

台灣省議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台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謝東閣暨全體議員謹以香花清酌致祭於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先生之靈曰：
嗚呼先生 當世之英 主政滬市 日寇侵凌 與敵周旋 不屈不撓 深洽民心 歷縮財政 穩定金融 大陸變色 追隨政府 渡海蓬瀛 出膺省政 入主機樞 崇法務實 蔚爲風尚 卸任國鈞 仍掌央行 擘劃蓋籌 竭慮殫精 昊天不佑 喪斯哲人 中興在望 復國可期 靈其有知 尙祈默護 嗚呼哀哉 伏維尙鑒

交通銀行等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交通銀行董事長趙志達監察人會主席何成濬總經理趙復全暨全體董事監察人各部處同人及台北紡織公司中本紡織公司全體同人等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俞前董事長鴻鈞先生之靈曰：
嗚呼 國家多故 哲人遽摧 大任未竟 羽駕俄催 百身難贖 顧天莫回 猗惟先生 嶺嶠之英 生爲申甫 逝爲日星 寬厚恭敬 明允篤誠 庫藏南屆 功莫能京 生聚教訓 賴此充盈 歎歷內外 倚若長城 公之爲政 崇法務實 不事浮誇 不尙權術 謬謬審審 舍文重質 公於金融 兩持國府 籌策憂勤 績彰利溥 公於交行 振衰起廢 大廈支持 風雨如晦 燭見先幾 補苴破碎 泊主臺員 及瓜而代 圭臬猶存 規模永在 復業

祭文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重興 訓言難再 公有夙疴 時櫻啜歎 亦自知醫 勤公不廢 豈料微疴 俄遭大變 嗚呼哀哉 夏日陰沈 凄風慘澹 悲痛何深 人生何暫 聊薦
蘭觴 靈其垂鑒 嗚呼哀哉 尙鑒

中國農民銀行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竺芝珊率全體同人謹以清酌庶饋之儀致祭於

故常務董事俞公鴻鈞先生之靈前而言曰：

嗚呼俞公 生而為英 學通中外 才擅縱橫 接人和易 持身廉貞 出領疆圻 入掌鈞衡 務實崇法 竭智殫精 功在邦國 澤及民生 卓然不朽 永有令名 大慈稽顙 國難未平 水深火熱 民不安寧 方冀我公 再盡忠誠 以復失土 以斬長鯨 胡天不弔 殞落蓬瀛 朝野士庶 靡不震驚 躬在本行 播遷自京 閱時數載 賴總其成 久同患難 詎敢忘情 望風殞涕 死別吞聲 尙鑒

台灣省警務處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台灣省警務處處長郭永率全體官警代表等謹以香花酒醴之儀致祭於

俞故總裁鴻鈞先生之靈前而言曰：

嗚呼俞公 一代菁英 頂天立地 緯武經文 崇法務實 勤政愛民 竭忠盡智 輔佐中興 領導省政 德被羣倫 財經內閣 蜚聲四鄰 內求安定 外結同盟 穩定幣制 功在民生 鞠躬盡瘁 宵旰勞形 央行復業 正期實行 胡天不弔 遽喪老成 甘棠在念 多士涕零 瞻仰遺範 悲痛莫名 香花寸楮 聊表虔誠 靈兮天降 尙祈來歆 尙鑒

台北市政府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台灣省台北市長黃啓瑞謹以香花清酒致祭於
俞故中央銀行總裁鴻鈞先生之靈曰：

天降賢哲 惟嘆遽萎 七十不老 六秩何衰 正當丕展 龍蛇厄福 共匪未滅 俄寇待夷 國家興復 端賴相持 胡虜夙疾 束手無醫 歸真天國
 竟與世辭 憶公往昔 申滬名馳 迨攬總揆 崇涉務滋 愛民勤政 功載口碑 愛國忠黨 典型永道 精神不死 勳名長垂 掌珠羽翮 更擅英奇
 幽明雖隔 目瞑奚疑 茲當追思 敬陳誄詞 獻花滿握 薦酒盈厄 虔申徵忱 靈其鑒之 尙鑒

台北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台北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陳勉修暨全體理監事謹以香花清醴致祭於
 中央銀行俞故總裁鴻鈞先生之靈前曰：

嗚呼先生 山川毓鍾 謙謙君子 休休有容 東山謝傳 莘野阿衡 學優筮仕 歷著政聲 出膺疆寄 入秉國鈞 蒼生霖雨 庶政維新 黃閣著績 園府宣猷 經營學劃 翼贊中興 公忠體國 不辭艱辛 積勞瘁疾 遽爾歸真 赤禍未戢 神州沉淪 胡天不弔 竟萎哲人 香花清醴 致奠痛深 惟公有靈 來格來歆 嗚呼哀哉 尙鑒

台灣銀行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歲次庚子夏六月四日台灣銀行董事長張茲閣總經理王鍾率全體同人謹以香花束帛之儀清酌庶饘之奠致祭於
 俞故總裁鴻公之靈前而祝之以文曰：

我公稟賦聰穎兮乃水鏡而山鍾 早歲獻身黨國兮已崇法而殫忠 始長全滬市政兮縱橫捭闔雍容 及掌全國度支兮領導財政金融 主持台省大政兮措安
 定而繁榮 迨任艱鉅元輔兮益謀國而謙沖 挽狂瀾之既倒兮卓著懋績豐功 扶危邦如磐石兮躋康濟於大同 爲一代之人雄兮若哺握之周公 忽山頹而
 木壞兮胡天遽奪哲躬 失士猶未重光兮悲通地之哀鴻 痛公齋恨以歿兮瀝血淚於長空 圖報效而繼志兮期聊慰於遺衷 焚三菊以訣別兮長仰望乎高風
 哀哉尙鑒

台灣產物保險公司祭文

維

祭文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臺灣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周友端總經理黃秉心暨全體同仁謹以香花酒菓祭於
俞故總裁鴻鈞先生之靈曰：

巍巍俞公 國之元輔 位隆鼎鉉 用叶霖雨 頤頤蕭賈 比踪房杜 力障狂流 屹然砥柱 圍府制用 政勤孔彰 度支不匱 理財有方 才高劉晏
功邁弘羊 鞠躬盡瘁 二豎膏肓 中原未復 楨榦先殞 萬衆雨泣 繪音悲愍 楚些同招 靈輿共引 千秋百世 精爽不泯 嗚呼哀哉 尙鑒

廣東同鄉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理事長馬超俊暨全體同仁謹以香花清醴致祭於

中央銀行俞故總裁鴻鈞先生之靈曰：

嗚呼先生 一代偉人 剛內柔外 和藹可親 夙懷遠略 銳意革新 崇法務實 勤政愛民 抗倭海上 令譽彰聞 度支入掌 擘劃艱辛 謨猷陳獻
匡濟宣勳 出瀋灑海 物阜民殷 朝乾夕惕 樞府策勳 中興待稅 遽痛辭塵 國失賢哲 痛切榆粉 鞠誠致奠 神其來歆 尙鑒

中央大學校友會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國立中央大學校校友會謹以清酒香花之奠致祭於

俞故中央銀行總裁鴻鈞先生之靈前而言曰：

維公國之楨榦 民之導師 宜勤滬市 懋績庚支 神州淪陷 開府台員 勤政愛民 莫與比肩 入主大政 益著勤勞 崇法務實 潛運沈謀 母校復
校 衆疑莫決 公力主持 輿情大悅 胡天不弔 奪此哲人 皆爲國慟 豈獨交親 香花清酒 聊表虔忱 魂兮有靈 來格來歆

台北市社會局局長李蘊權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職李蘊權謹以香花清酌之儀致祭於

俞公鴻鈞之靈曰：

嗚呼 典型凋謝 楫模淪亡 痛失棟樑 萬民行淚 茂績長存 保釐無望 矧忝依於仁宇 感心傷而涕零 維我公世之所仰 民具爾瞻 秉性忠直 律已特嚴 待人接物 虛懷若谷 迭膺重寄 崇法務實 懷冰雪以盟心 千秋風峻 煥經綸於指掌 四海波恬 普濡惠澤 登樂業於春台 遐甞休聲 聽謠歌於朝野 自奉儉約 無我無私 淡泊名利 任勞任怨 職叨承蔭庇 辱在研縷 親領教誨 十有餘載 詎料膏雨猶滋 仁風安仰 從此素琴常寂 曠談禮樂三千 寶帳空懸 孰與河山百二 靈桐感遇 何時報大德於生前 結草銜恩 此日哭高風於地下 華表繞寒雲之色 盼丁鶴之歸來 長江逝遠水之波 悵李鯨之仙去 寄悲懷而曷已 實難罄乎哀忱 尙鑒

中央銀行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中央銀行副總裁翁飛鵬謹率本行全體同仁虔備香花黍醴之儀致祭於本行

翁故總裁鴻鈞先生之靈曰：

嶺海毓靈 篤生哲人 含章挺曜 抱璞懷珍 敷政淞濱 騰聲歎浦 壇坫周旋 折衝禦侮 度支鞅掌 財政宣勤 上籌國計 下裕民生 調劑金融 兼領園政 家給戶饒 塗歌衢詠 出膺疆寄 入總樞機 九功惟敘 庶績咸熙 靖獻邦家 決策廊廟 望重臯鑾 勳侔周召 迭掌園府 久歷星霜 運籌經畫 懋績孔彰 凡我同仁 夙欽盛德 自執旃纛 深叨渥澤 網羅大計 翊贊中興 憂勤備至 疾病紛乘 精力未衰 訐謔未盡 輔世經邦 正需忠藎 鉅人長德 邦家之基 何期彈指 倏爾騎箕 元首含悲 朝野震悼 況我同仁 躬承領導 舟流莫屆 行邁靡臻 誰爲津逮 誰樹儀型 仙駭難迴 幽明永隔 緬想音徽 人天咫尺 攄詞有限 愴念無窮 聊陳薄奠 尙鑒丹衷 尙鑒

中央印製廠 祭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四日中央印製廠總經理時壽彰中央造幣廠廠長甘豫昌率全體同人謹以香花清醴之儀致祭於

鴻公總裁之靈前而言曰：

嗚呼鴻公 國之耆英 磊落爽朗 早歲知名 新聞喉舌 立論公正 主政滬上 適值寇侵 寸土必守 爲國干城 巴山入部 運籌風清 田賦整理 富國厚生 復員還都 重整財經 貨通有無 福國利民 朱毛倡亂 大陸沉淪 蓋謀碩畫 鞏固國本 層峯器重 主理省政 崇法務實 吏治清明 秉衡中樞 利無不興 金馬推敵 匪膽震驚 吾儕部屬 沐恩厚深 方期天假以年 永享多福 孰知喘病纏綿 一夕不祿 嗚呼 夜台渺渺兮嗚吟暗

祭文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蒼海溟溟兮水空流 撒手永別兮胡所依 嗚呼哀哉 尙饗

六一

啓櫬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三十日治喪委員會全體同人謹以香花之儀致告於

俞故中央常務委員鴻鈞先生之靈曰：

流光電逝，倏忽經時，音沉響寂，愴然興悲，茲者祇承令典，恭移靈櫬，安葬陽明山麓，程途夙戒，以虔以誠，敢告啓櫬，靈兮永寧，尙饗。

告窆文

維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七月三十日治喪委員會恭奉

俞故中央常務委員鴻鈞先生之靈櫬安葬於台北陽明山之陽而祭告於靈前曰：

嗚呼 日月易邁 景光如昨 靈未即安 牛眠待卜 爰擇吉壤 陽明之麓 松楸葱蘢 佳城鬱鬱 寧公於此 魂兮亦樂 北定中原 再告興復 尙饗

誄辭

張羣

立身之正 治學之專 信道之篤 持志之堅 虛衷容物 束身事天 山川靈秀 毓此名賢 早共事功 公私無間 竭智殫精 守經達變 夷險同嘗
 肝膽互見 三十二年 流光如箭 出守外台 入主大政 崇法務實 沉謀潛運 身弱心強 外和內勁 積勞損躬 繁霜入鬢 不圖貞疾 奪我哲人
 志齋定亂 業待收京 哀深疹瘁 寧為交親 千秋百世 式此儀型

馬超俊

猗歟先生 嶺海奇英 內懷剛毅 接物和平 處理繁劇 惟允惟明 歷膺重寄 不伐不矜 倭氛昔熾 城下要盟 折衝歌浦 薄海傾心 司農七載
 克展經綸 中原板蕩 策治蓬瀛 乾惕在莒 益勵艱辛 紆籌復國 懋贊中興 詎以盡瘁 侯爾捐塵 天奪何速 茹歎同聲

李宗黃

清風亮節 萬古常新
 清明在躬 百僚是式 公忠體國 庶績咸熙

錢公來

時局正堪悲 哲人何樂歸 賢材頓凋謝 大衆盡哀歎 德行長遺範 功助昭日微 忠貞為黨國 青史永光輝

胡振輝

品也德也 民其思兮 仰止行止 心嚮往之

誄辭

六三

楊子隆 祥祐

輓聯

以收到先後爲序

經濟自名家百辟論功瞻碩望
猷爲務崇實萬方多難痛耆賢

治喪委員會全體委員

生年同日許國同心晚節共艱難
還仗丹忱迴末運律已以誠服人以德中興多績
效定從青史紀殊勳

陳誠

平生以崇法務實爲心弘濟艱難臨大節而不可奪
此日眞鞠躬盡瘁以死明時表忠靈徵斯人其誰與歸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忠靈翊中樞九府長留經世業
艱難謀國是同舟忽失濟川才

于右任

是篤實光輝一流翊贊歷艱虞豈僅高名重國府
當淬志展圖之際交親又寥落忍搔鬢鬢看雲根

張道藩

宣猷滬市敷政台疆中樞展絲綸偉績豐功垂史乘
才擅財經動隆黨國一朝悲訣別凄風苦雨助辛酸

謝冠生

畢生黨國宣勞黃閣訐謔夙彰忠盡
一瞑人天遽速素車哀誄悼失英賢

何應欽

崇法務實順變守經平生是官不自求財政金融昭偉績
貞疾強心和顏勁氣病重尙策無遺算泰山梁木殞斯人

賈景德

平實處益見公忠台閣雍容垂世範

輓聯

彌留時不忘經濟老成凋謝繼人難

唐縱

饑溺見仁懷良相餘恩天下被
涵容有雅度大臣遺範世間崇

王雲五

神化丹青台閣雍容稱相業
志行堅白史乘揚厲繪凌煙

黃國書

南粵清芬彰勁節
中樞翊贊著殊勳

李嗣琨

黨國宣勞梓桑峻望
財經巨擘史冊流徽

傅秉常

重義存誠雅度永懷齊晏子
利民福國勳名不讓管夷吾

程天放

其德量足以服人平生一片丹誠晚歲憂勤忘病久
當危疑不可奪志他日大書青史中興勳業屬公多

黃少谷

一生惟謹慎崇法務實留有勳名垂後世
大局正艱虞返璞歸真頓教匡濟失老成

谷正綱

是金融家是政治家貽勉平生多偉績
爲民國計爲央行計彌留一語念中興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張目寒

裕國富民靈續堪媿唐劉晏

濟危弼政事功步武漢蕭何

景佐綱

臨事不懼好謀而成執言立折倭酋氣

勸政愛民崇法務實薄海長懷宰相才

許靜芝

平準著勛猷聲譽久崇鹽鐵論

風規垂令範中興未竟老成心

關吉玉

國摧楨幹情切萬難多難萬方添此痛

勳著嘉謨名垂竹帛那堪重海賦招魂

陳立夫

雅步廟堂務實知為崇法本

愴懷硯席論交無過少年遊

俞大維

廊廟昔相依時值艱虞受知不次承推轂

朝野同太息永懷忠藎定論奚須待蓋棺

龐松舟

主政則崇法務實理財在富國裕民當代論勛名匡時成許唐劉晏

抱病猶治事從公所願贊中興大業鑿時驚解脫入昂長懷漢鄧侯

張知本率子民生

崇法務實夙見主張一代論才足矜式

靈犀從公遽聞溘逝九原可作惜斯人

顧祝同

樞廷邀列圍府追依先進仰同岸青瑣幾經聆惠導

眼勉餘功殷勤至囑流哀滿天下素帷兼為哭其私

嚴家淦

佈政渝都早垂渠範

宣勤海嶠永表精忠

財政部全體同人

仰我公真容德休休曩時接掌艱難餘緒經綸蓋策中樞財不匱

膽勳業方耆年衰袞詎料驚心噩報遺型典則同悲碩果樹云亡

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全體同人

大木忽摧殂愴懷承卸仔肩荷擔中財宗碩畫

菲材猶補之那忍周旋靈次揮彈雙淚哭吾公

徐柏園

保鑑於艱阻受命於危難崇法務實贏得中興良輔譽

謀國仰忠誠知人仰明察愛民勳政長留棠頌峴山碑

蕭毅肅

依倚逾十年接席論思不棄涓埃真偉度

明良昭一德崇法務實用光綸紉見貞忱

張茲閔

儒行式千秋豈獨冠裳崇位望

奇勳昭一代已同海嶽著聲名

梅貽琦

崇法務實允稱循吏

重德輕威堪作世師

革命實踐研究院

梓鄉留重望崇法務實欽耆宿

道山痛歸隱接席詢政憶前塵

立法院粵籍立法委員

歲月感推遷騎箕正是持衡日

追陪憶疇昔平章總見協調心

袁守謙

於崇法務實共矢精誠緊念到彌留眞實踐鞠躬盡瘁以死

記就任捐塵恰符月日事緣何巧合永安息應召在天之靈

陳慶瑜

風雨昔同舟共濟艱危勞頃刻
中興方在望遽捐館含有深哀

王德溥

德範仰元良裕國利民稱幹濟
勳華垂奕稷崇法務實緬風徽

谷鳳翔

望重三台饋餉功高藉相國
名垂百世聲永繼歆虛江

張其昀

崇法務實為政之要率官方獎治績建設宏規立基本
經邦濟世理財是尙充國用裕民生復興大業仰籌謀

史尙寬

受任于艱虞播越之時力疾為神州八表風雲哀疹瘁
立身以謙抑忠誠為主許讓在廊廟千秋德業耀旂常

尹仲容

社稷紀殊勳諸葛一生惟謹慎
民人懷大德羊公接物以寬仁

鄭彥棻

自園府以迄廟堂並有勳猷為世重
嚴操持而矜名節猶留風度與人看

陳雪屏

直道至今猶在
清名終古常留

楊繼曾

謀國之忠任事之誠長留千秋典範
持身以正宅心以平堪稱一代完人

劉廉克

舉大經立大本兩載登龍聞公面命
涉中壽謀中興一朝駕鶴使我心悲

輓 聯

沈 鈞

謀國著忠誠十載海疆昭懋勳
積勞抑壽考一朝箕采闕靈光

連震東

對黨國以忠一代勳名昭汗簡
處公私唯法千秋渠範式人寰

周昆田

抱希文志節人掌揆要出理疆圉有守有為永念哲人風範
本基督精神律己以嚴待人以恕不矜不伐長留君子典型

曹聖芬

在萬方多難之中溪千共處渝上借行帷幄同欽肅相國
值衆議喧騰之際法度傾微典型凋謝盜旄徒老灌將軍

陶希聖

崇法務實功在黨國
虛衷含默德昭日星

曾虛白

匡濟展經綸千載勳名光史冊
虛懷懸日月長留古道照人心

劉牧羣

黃閣裕經綸猶使海疆思善政
青編記讓烈豈惟泉府重遺徵

黃伯虔

歷疆圉而總百揆憶宣教海邦曾受提携勞顧復
志聖賢以希千載記許身黨國每從患難見匡扶

鄧傳楷

財經肩鉅任遺大投艱揆席早推聲望重
黨政展許讓盡忠竭智簡編長紀績助高

歐濟時

謀國見深心大節平生關史局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宏規留治法英風隔日弔湘閩

曾寶霖

志喻枯樗國叟也知潛溉苦

器同瑚璉邦人咸動愍遺悲

梁寒操

黃閣早蜚聲經緯萬端國計民生皆利賴

彭孟緝

赤氛猶未靖別離一瞬星沉雲黯倍傷懷

從平實以建事功雅量世同稱一點丹心作元輔

周書楷

當危疑益昭志節中興期早定千秋青史紀殊勳

謀國以誠一生謹慎弭危難

朱懷冰

胡天不慙八方風雨喪元良

周至柔

偉業豐功應記清廉昭史蹟

愛民勤政長留德業在人間

馬紀壯

於廟堂瞻侍光儀謨明弱諧一代傑才稱中外

為國家耗完心血風寒雨晦千秋聲祀極哀榮

查良鑑

翠稱調和鼎鼐之功台閣任迴翔翊贊元戎光大業

遽見托遊箕尾而去江山餘涕淚中原板蕩海天雲

楚崧秋

於危疑震撼之交肆應每從容才見其長心見其細

當繁劇艱難之任辛勤求展布勞而不伐和而不同

陳啓天

謀國抒忠經濟長才昭一代

崇法務實高風偉績足千秋

憂國憂民易贊不忘興復事
立功立德愴懷遽失老成人

郭 賦

平生憂樂關懷揆席經邦貞百度
宿疾沈痼不起海疆遺愛足千秋

郭寄嶠

崇法務實賢哉管晏
鞠躬盡瘁允矣蕭曹

白崇禧

待人誠信論事盡忠籌策豈輸蕭相國
勵節清勤立身光霽行藏不讓陸宣公

顧翊羣

公自有功深能以財經傳令譽
我元施政拙愧無建樹報相知

田炳錦

房杜有賢才黃閣絲綸書異代
蕭曹留偉略鯨鯢洋風雨失斯人

向樽父

劉晏風高幾經世變蒼黃能使國家財不匱
蕭何助在要令政成熙緝記曾湯濟鼎能調

薛 岳

圖府著賢聲五銖正賴紆籌筭
樞垣留懋績金鑑長垂忠蓋思

周光棠

虛懷若谷深慮若淵翊運矢精誠一代羽儀垂典範
遺愛在民大勳在國鞠躬成盡瘁千秋竹帛播芬芳

雷法章

嶺南間氣鍾申甫
海上驚心瑣棟梁

蔡屏藩

貞幹仰樞機那堪梁木其頹不遺一老
金融定園府萎絕榴花正放遙奠千秋

杭立武

出任封疆入爲宰輔藉勳名垂黨國
心存匡濟懷抱經綸恢功業在民生

俞濱東

世事感滄桑二十年恩禮有加常懷知遇
蒼生望霖雨一剎那癡興遽變痛失瞻依

樓復

托庇旃幃效愚忠盡言責推心置腹知遇恩深何堪一夕成永訣
國喪元良乘閣政攬財經祇存助業遐邇深悲瘦門無淚哭先生

家駁

趙靖黎率子

家驛

黨國矢忠貞當代勳名垂百世
天人無愧忤平生清介足千秋

李基鴻

廊廟贊勳猷赫赫鄭侯昭竹簡
申台宏治績循循召伯蔭甘棠

胡軌

死生如幻夢
富貴若浮雲

魯蕩平

殊助一代稱名相
令節千秋式後人

張維貞

四海哀傷懷柱國
一生鞠粹在央行

輓 聯

朱宗良

崇法務實輔政公忠偉績長存照海宇
裕國理財鞠躬盡瘁道山遽返惜晨星

張建中

卅載幕席追隨甘苦共嘗私誼無殊手足
一旦宿疾復發朝夕小別悲傷竟隔人天

王紹齋

裕國經綸猶未盡
平生志業已堪傳

錢用和

勤政愛民一生謹慎酬知己
崇法務實百世勳名著汗青

王冠吾

許謨卓著財經不朽勳名尤推釀醴調羹手
至計端資輔弼千秋典範想見揮斤游刃功

黎玉璽

幹時以杜預爲楷模平準貨財同稱武庫
作相如曲江有風度敬恭桑梓哀此哲人

余漢謀

崇法務實助業碩畫傳史籍
親民愛物清操揀量仰典型

閻志敏

閻志敏

容我追隨昔時獻效慚無狀
負公期許舊日郎曹愧不才

趙樹人

朱靜一

盧學禮

懷德畏威風格平生原卓立

六九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崇法務寬典型千古足追思

陳方波

高蔭棠

杜為

食足貨通國實民富成良政

風清弊絕大法小廉示後昆

楊鴻斌

李保謙

鄧振

危急用大謀竭智盡忠真俊傑

中興資安定阜財解愾見經綸

吳湛露

張敬原

洪懋中

滬濱憶追隨卅載光陰成一瞬

海圻悲返駕畢生助業足千秋

陳頌平

三珠萬里奔喪猶及慶門視含殮

四海同聲哀悼豈徒鄰閭罷歌吞

張山鐘

忠藎樹宏護長策善籌夙仰豐功榮國史

著賢全壽考高風亮節永留令範勵瀛寰

張炎元

為國不辭勞卅年竭智盡忠贏得勳猷昭史冊

收京猶有待此日歸真返璞頓教朝野動哀思

上官業佑

知遇數平生幹濟式助勤奮歷歷留盛業

憂時傷大老助勤奮興復青史恢恢著令光

劉啓光

追隨近二十年痛失平生一知己
忠勤原分內事未聞片語涉矜功

楊綿仲

經世有千秋功在人間神歸天上

登堂同一弔羊城風冷鯤島雲埋

胡宗南

負經濟宏才許世以身斯人卓著千秋業

綜生平政績大書其事豐功留傳萬古名

陳能才

志業在生民開府秉鈞抒大計

言行思體國鞠躬盡瘁鞠躬中興

陳嘉尚

星黯蓬萊盛德最感人盡策苦心留病榻

風摧樑棟遺讓堪堪裕國薄海悲歌悼峴碑

譚國鐸

獻替奠中興一代助功昭史冊

公忠挽大劫萬方涕淚弔元良

任先志

江漢昔追隨頻年籌策躬承彌感深恩託知己

邦家曠珍瘞此日棟樑遽折還祈默佑贊中興

趙志堯

百世仰聲光忠誠應有千秋鑑

清名垂史冊紆籌思復五銖錢

陳惠夫

李猷

論政以崇法為先澹泊襟期進退雍容真足式

處事惟務實為本堅貞卓立感懷知遇泣遺規

趙葆全

才輔復國志切匡時卅載仰勤勞浩汗地天垂正氣

誼洽苔岑交融水乳重洋驚噩耗滄沱涕泗灑臨風

李叔明

卅年翊贊中樞並有許謨垂不朽
四載忝參幕府愧無長策答相知

郁鳳岐

國步正艱虞一刹頓嗟梁木壞
平生崇寬厚千秋遺愛峴山青

姚志崇

宰衡功業方牧經綸共仰赤烏雍容多士翔鸞頌吉甫
瀛海棲遲山河遜逸祇愧白頭如故杜陵駐馬哭房公

汪大燾

愷悌虛衷平生行止惟忠恕
國家傾軋多難何堪折棟梁

呂咸

爲治務識大體勤政愛民台閣允稱賢輔弼
持躬屏絕芬華篤信好學襟懷猶是老書生

張彝鼎

崇法務實措大事如磐石謐安萬相生平唯謹慎
鞠躬盡瘁迴百川值狂瀾倒泛宣公勛業佐中興

杜如明

秉國懲勳猷節用愛人四海同欽清德
憂時成疾鞠躬盡瘁千秋永仰精忠

劉愷鍾

揆政佈仁風復國財經資碩勳
憂時傷國器彌天風雨助哀思

鄭炳庚

嶺表超人豪開濟數卅年勛業
海疆傷世難遺助聽百姓謳歌

何志浩

報國忘家曠代勛名舉世同聲一哭
崇法務實九霄嘉語於公獨有千秋

祝秀俠

勛業佐中興邊徼未安絕筆不忘籌國度
箴規垂下吏併懷久戴過門長此泣春風

吳迺愨

往歲忝追隨愛眾親仁名垂簡冊
哲人驚萎謝崇法務實功在國家

吳石仙

待我肫誠其容如在生其言如在耳
哭公永逝有聲當澈天有淚當徹泉

張齡

談笑見經綸共仰許謨匡黨國
江山餘涕淚定知靈爽贊中興

任覺五

忠勇謀國平易近人二十載樞府宜勞鼎誦調和同敬仰
赤誠未消河山待復一霎時棟樑摧折風雲慘變總傷神

林競

平倭權武襄聲威曲水春申同不朽
反共抒經濟大略凌煙賢祀兩留名

王超凡

財經泰斗黨國勳名典範猶存堪不朽
勤政愛民崇法務實哲人遽逝痛何如

王煥

謀國維忠遭時多難政事著財經未睹中興驚隕落
廬山憶舊蓬島重逢行言崇篤實愴盡瘁失瞻依

吳仕漢

入掌樞密出膺疆寄三十年數歷外中抗戰截亂懲倭績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未覩復興竟賡遺恨億兆衆猶坐塗炭反攻鋤奸慰重泉

楊森

有垣赫事功際艱屯運會未遑收京慟先殂

以椒蘭展奠在海滋招魂空留芳躅與後看

王聯奎

李寰

三度掌握圓樞旋乾坤何堪此日形格勢禁易簣猶留復業語

萬里追趨令德光風霽月忍看今朝山頽梁壞餘生永負深知恩

林崇墉

上蒼籠召九天外

遐邇追思百世中

虞克裕

助績著中樞治國理財崇法務實

精神歸上界鄧侯入昴傳相騎箕

李學燈

庚支九貢表率百僚勳績昭垂千古重

傳相騎箕鄧侯入昴精神歸宿九霄高

徐世賢

一柱緬承乾勤政愛民五嶺以南稱曩日

靈時訝捐館神留形往八埏之內動哀聲

蔣鼎文

是長官亦良師卅載駢轡回首春申會立雪

出疆圻入閣揆千秋勛業傷心蓬島賦招魂

丁念先

政事經濟才有兼長素履持躬品彌重

廊廟封疆歷當大任蒼生絕望國同悲

韓文源

黨國懇助猷久瞻山斗

歸真全福壽帳望人琴

吳雲鵬

久著忠勤昭懋績

爲歌薤露失耆賢

郭紫峻

助籌昭奕世

黨國失元良

馬濟霖

世亂時艱哲人其萎

山高水長先生之風

侯庭督

有德於人有功於國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劉全忠

會著助猷昭黨國

長留典範式來人

穆超

吏愛民懷崇法務實

星沉人邈生榮死哀

王夢雲

識拔記當年愧我虛期青眼在

助華昭永世哭公端奈百哀何

李葆初

蓬島峴治滬濱推襟久敬賢勞謀國事

駒陳不留嶺雲愁望看多銘誄動哀思

陸京士

人無間言功在黨國

哀傳碧海圖應丹青

陳開泗
勤政愛民志業助猷昭奕世

崇法務實瞻艱當代是完人

羅霞天

勛業潮前型謀國公忠昭懋績
大星今殞落哀深珍疼痛招魂

余拯

病裏常憐憂國事
嶺頭猶是未歸人

李翼中

擊斃方殷胡速沉疴少靈藥
隱憂猶在那堪危厄失耆賢

謝建華

德溥生民功在黨國
哀彌海島像圖凌煙

伍振華

已有勳庸留琬琰
從茲形像付丹青

李繼淵

樞府展談猷百世有光垂青史
元良重黨國九原遺憾策中興

劉平

憶當年歌浦揚名智略無雙早卜調羹稱聖手
際此日央行復業蕤歌忽起共看勳表倍愴懷

何佐治

前天祭闕公握手殷勤成永別
今日吊閣下鞠躬盡瘁竭忠誠

段劍岷

從政至公接物至誠國步正艱難濟世賢勞推宰輔
律已極嚴待人極寬鶴鶴驚頃刻滿堂朝野弔元勳

管歐

輓 聯

長庚支主省政任首揆以務實見知懋績殊勳垂宇宙
明大禮厲廉隅崇法治更謙和孚望高風亮節在人間

鄭湘暉

經濟仰宏謨銀鉅歷膺昭懋績
忠勤成盡瘁河山未復耿丹心

葉秀峯

端的是樽俎折衝之才臺閣迴翔英爽未償使節願
不及親邦國中興而逝神明澹定丹心猶繫屬續時

楊愷齡

當代數人才龍戰黃每臨墳玷支危局
卅年論交誼鷄鳴風雨忍對琴書憶舊遊

鄒聲棣

阮毅成

泉壘事業韓范經綸卓犖平生昭史冊
一瞑歸神萬方多難淒涼風雨悼耆賢

梁序昭

崇法務實奠民主之常軌
鼎新革故樹政治之良規

王平

耿晉

經濟擅長才國計民生資碩畫
台鉉膺重任崇法務實樹良規

李彌

治國理財照庶績
愴懷舉世失耆勳

王東原

志援溺饑會隸研懷恩更厚
國喪柱石為傾涕淚恻非私

劉建德

七三

敬鴻鈞先生紀念集

由滬戰見大勇由臺政見大仁一老不慙道天胡此醉
爲國事不私親爲黨務不私友九原如可作人百其身

林有壬

劉學長才歷戶部而入相臺會爲艱難瘁肺腑
古岡碩彥主泉庫以計軍國不期風雨失英賢

高信

爲國爲家事業永垂汗簡
以忠以孝典型長式鄉人

高勤

總角同校白首論心宿疾久關懷靈藥難求方士致
報國以忠臨事有斷庸勳自昭赫憤懷何止淚痕深

唐季珊

建緯地經天之業謀遠智深矜式豈惟昭一代
以利民富國爲心人人邦瘼摧傷不儘屬私交

竺芝珊

崇法務實德望早爲天下重
守經達變言行卓有古人風

黃通

卅載交情曾憐范叔之寒祿俸及於小兒女
一代勳業堪媿夷吾之治財經先展大謀猷

張震西率 女苞 子莊

通市參贊台海追隨託苔苔經卅載
功在中興政成生聚名留竹帛足千秋

李大超

王孝英

立身難忘立德立功立言遺訓
循聲遍誦循職循法循道而亡

張導民

蔡孝義

崇法務實樹民主儀型豈止園府更新青史千秋有定論
冬令夏行乃陰陽失調遽悼元良溢逝薤歌此日不勝哀

李一飛

胡天不慙遺頌令雲黯旣曠風寒秦斗
知公有餘憾未及贊襄樞府光復河山

陳公亮

法治輝煌復興基地會蔭支柱
英靈顯赫鋤奸建國許庇豐功

何彤

謀國見公忠遺憾長留未親王師光禹甸
理財推元宿徽音安仰驚傳江左失夷吾

台北市銀行公會理事長陳勉修暨全體理監事

崇法務實四字匡時會秉鈞衡彰政績
盡瘁鞠躬一生報國忍看廊廟喪耆賢

胡家鳳

山河矗立此砥柱
天地黯然失良師

蘇志彬

臨危不亂
守節無瑕

馮正忠

赫赫著宏謨同仰勳名垂史冊
汪汪懷大度更多遺愛感邦人

黃範一

謀國惟忠處事惟勤輝輝丹青留偉績
持己以誠愛人以德悠悠叔世仰高風

董世芳

李樸生

陳元

黃閣著績園府宣猷方冀弱佐中興箕尾登仙驚惡耗
橫海樓船龍城飛將竹看爭先北指太牢告廟慰精魂

胡宗鐸

忠勤謀國謹厚待人交誼滿生平萬頃汪洋懷叔度
赤禍未除時艱正亟邦家何殄瘁八方風雨哭謝安

王激瑩

崇法務實謹慎一生秉政經大端功在黨國
霖雨飄風蒼茫四顧痛著勛凋落淚灑天涯

蕭鈺

籌策贊中興朝野欽遲懷懋績
神州待規復憂勞心力殫元良

葉明勳

黃雪邨
處變亂能力任艱苦居羈雜而身置清閒風度最雍容事就功成終不伐
掌度支以清廉自持主政事則崇法是尙長才忽凋謝人亡邦瘁劇堪悲

蕭同茲

崇法獨稱賢相業至今推懋德
憂時常在抱邦艱未已痛遺言

黃天爵

李樸生
匡濟在危時元揆舊勳昭近史
禋祠宜有日銷官廟貌是藍圖

陳清文

是長官是良師勉有加方期請益問難奉爲表率
忠國家忠元首鞠躬盡瘁正待反攻驅虜遽失完人

馬潤庠

崇法務實著賢聲留得典型垂後世
嘉謨卓識建偉績每憶風節愧師承

輓 聯

錢昌祚

事業已歸前輩錄
典型留與後人看

儀益三

待僚屬若家人子弟之親累歲託餅饅耳提面命無虛語
聞惡音爲天下蒼生而慟連朝苦風雨注海傾河有百哀

劉大柏

大庾記雍容德業文章當推桓桓
中原猶撥蕩艱難風雨又哭元賢

張寶樹

爲政不在多言崇法務實躬忠元首
收京尙須有日沉謀潛運天奪者賢

張泰祥

吳兆棠
志潔行芳盛德垂後世
崇法務實勳業著人間

毛松年

爲黨爲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以誠以忠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林秀乘

創業難守成不易幾度守成見經濟
崇法制平易務實要從平易佐中興

祝成錦

崇法務實中興所依
負艱任鉅繼起誰歸

寶夢兆

匡復贊鴻圖長有勛名傳信史
薦馨悼碩彥空教後輩仰遺型

七五

發鴻鈞先生紀念集

張重羽

崇法務實典型猶在
經世濟國遺範永留

洪其琛

遭時多艱最欽相業
胡天不弔遽奪長才

何成濬

湖海極淵閣簡書已著千秋業
斗山崇位望閣揆長留萬古名

李熙謀

秉經濟宏才功在黨國立千秋偉業
綜生平政績勳垂史冊留萬古英名

行政院編譯室

崇法尚賢閣揆聲名天下著
懷謙居簡儒門楷範國中欽

浦祥鳳

秉鈞衡掌度支宏濟艱難垂不朽
邀眷顧慰民望鞠躬盡瘁永留思

王澤民

碩望素重鄉邦百粵驚聞凋耆老
長才曾理國政羣黎猶自頌甘棠

陳翰華

一德夙相孚納善陳謨命名素著
九原不可作崇法務實典型永昭

周宏濤

清望世無多師表百僚度支九貢
哲人日已遠鄧侯人昂傳說騎箕

謝歌民

表勳以置圻台閣為高不獨事功著園府

應物取介特和光兼濟永昭名德重嚴廊

金克和

甄拔荷恩知在公為國為民原以培植人材為己在
忠誠奉職守愧我矢勤矢慎尚乏涓埃績效副殷期

陳琮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徐卿

數十年黨國宣勞執政理財赫赫事功垂後世
三兩日病魔突襲山頽木壞蕭蕭風雨哭先生

杜梅和

亦澹靜亦樸忠徽省佩許謨慟甚西州峴首
主崇法主務實人間尊節概名高謝傳羊公

方治

為政理財功自著
矢勤克儉史其傳

金維繫

報國建殊助庫藏頻移心力瘁
匡時恢大略央行重振事功垂

金越光

千古風規應範世
一身忠亮在謀邦

劉巨全

平生忠亮傳邦國
不死精神寄海山

張岫嵐

崇法務實一代宏謨匡大業
愛民憂國平生風範足千秋

葉時修

未返神州驚永逝
長存碩績壯中興

田欲樸

項潤崑

爲國碩畫宏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從政崇法務實足食安定於今稱之

吳道南

計叢展經猷致富致強一代中興欣肇始
管鮑篤友誼相依相輔卅年故舊憫凋殘

周雅能

披擢荷深知憶院會提名半職差堪資鶴俸
財經數傑出逢央行復業百端無得仰鴻裁

丘斌存

翼贊裕綸猶記變理餘聞仰接虛衷承問政
逍遙跨箕尾正值中興在邇行看多士共收京

趙琛

厥實循名有張居正遺意
利民裕國法管夷吾良規

謝嘉淵

耀掩台星長有助勞昭史乘
艱悲天步不堪鷄酒弔英靈

洪軌

具經濟政治之全才禹甸策中興盡瘁鞠躬忘歲月
贊革命復國之大業海疆驚枉折黃蕉丹荔春秋

羅奇

爲金融巨擘仰度支經綸民殷國富
寄蹤斯夷任成吐握偉業天挺人豪

胡璉

兢兢在富強樞府宣猷努力總關天下計

輓 聯

中興股蓋割魯靈遽圮收京未竟老成心

唐守治

助猷夙著善行爭稱待我每多恩教範親承長繫念
寇患方張九州未復哭公空有淚海天西望更傷神

章勳義

議論難忘高軒過我
循聲徧誦遺愛在人

楊一峯

苦心孤詣當年支撐松滬危卽已蜚聲於中外
明斷卓識往歲裨益金融重整洵屬遺惠在民生

余凌雲

德比前賢望學中外百世傳勳業
志切收京功在黨國千秋仰儀型

周象賢

盛德作長城政舉民和數隸研懷親渠範
靈忠銷劫運星沉棟折每瞻山斗哭元勳

施紹長

治天下以教育爲先頗具深心復校至今傳不朽
緬結人忽辭塵歸去不禁涕淚吾儕畢竟感難忘

國立中央大學校友會

樹業仰規模追溯先河籌措黨財從借鏡
令公今柱石遺留碩畫顧瞻雲海建中邦

張式綸

十載沐溫薰春風如在
一朝聞噩耗涕淚何從

胡希汾

一時代勳業昭垂復國有期朝野官民齊仰鏡
五丈原星芒遽隕反攻前夕山川草木盡含悲

陳超

戴鴻鈞先生紀念集

孫鈞

生平以狷介自持負經濟宏才實力攸資舉世正殷屬望
從政則公忠體國留史乘功勳大業未竟上天何不怒遣

陳尙文

安社稷於播遷際頻年國事關心宵旰宣勳昭青史
建功業在從容間當代元勳佐命甘棠遺愛利兆民

劉茂恩

崇法務實勤政愛民管子才高經天緯地
外柔內剛鞠躬盡瘁甘棠德厚百代千秋

郭壽華

江陵秉政劉晏理財風雨黯神州正賴賢良扶世運
傳說騎箕令感化鶴功勳留史冊緬懷耆碩倍心傾

賴名湯

宏揚法治翊贊中興赤餞正彌天引領東山思太傅
穩定金融調和鼎鼐蒼生方屬望傷心江左失夷吾

余伯泉

我昔列旂幟每佩功高心愈下
公今游閔苑益嗟人去事堪思

閔劍梅

名濟天壤望重國中雅容雅度思元輔
病起臨間恨留千古愴懷舊政識深猷

朱成春

遺愛難忘黍雨棠陰皆德政
昊天不愍江雲海水盡愁思

鄧述魯

王叔增

王飛

輔國抱憂勤眼目尙開遺疏賴
立身存節概捫心端不愧彈章

方子丹

出膺疆寄入總鈞衡勳望久欽遲盡瘁卅年前績懋
決策廟堂宜勞園府訐謗資費震驚一霎大星沉

瞿韶華

仁以施政義以理財功存一代絲綸手
黨之元良國之柱石哀動萬方風雨時

梅麟高

風雨費網繆明義利察權衡當代理財推巨擘
河山餘涕淚仰舊勳思良輔百年寶志愴中途

王正誼

廊廟著勳猷綜一生篤實光輝持躬夙擅勞謙譽
帷籌關至計歷幾許艱難盤錯裕國長懷經濟才

唐振楚

令績富民侯更燮理總揆耕戰大經端國本
遺書鹽鐵論已鞠躬盡瘁河山未復繫公心

黃鎮球

萬里江山千秋俎豆
書生面目慈母心腸

任覺五

忠誠謀國鞠躬盡瘁勳名垂宇宙
虔敬事天懷德感恩遺愛在人間

葉達光

宏謀協運握髮吐哺權衡國計邦交靈聲中外
勤政愛民崇法務實式仰槃才大度垂範將來

羅機

柱石輔中興不僅生聚紆籌才長經濟
典型昭百世此日馨香展奠禮備哀榮

洪懋祥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

是真澹泊身歿志益明

毛景彪

具經濟長才富國強兵聚訓豐功同范蠡
當艱難時會輸金納貨度支偉績蓋蕭何

龔澄生

負經濟宏才斯人卓著千秋業
綜生平政績此後留傳萬古名

宋達

吐握仰流風延接羣賢謀復國
鞠躬哀疹瘳彌留一念在收京

徐晴嵐

崇法務實沉謀國政賢名垂百世
守經達變推行民治風範昭千秋

李漢儀

勤政愛民正國步艱難遽沉列曜
崇法務實仰平生風義永式儀型

戴仲玉

功高稷契臬臺書勳名已標麟閣
哀動江湖廊廟懷德人皆哭老成

卓高煊

畢生為黨國宜勞開濟名垂青史
一疾竟膏肓不起艱難痛失老成

周靈鈞

忠誠奉公穩健治事為政四年多建樹
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噩音一夕失楷模

鄒志奮

是理財巨擘憂風濟政萬眾輟誠瞻馬首
乃經邦妙手到治甘棠四年會為試牛刀

何蓋民

劉崇齡

出主疆圻入膺國政肅素見襟懷志節未忘歸澹泊
星殞滄溟助傳史冊時艱思忠藎哲人何故嘆飄零

余富岸

由封疆以登庸外柔內剛威加天下無如德
唯崇法而務實小心大度遠注金門憾未前

尹俊

康濟天下上海早移金權術大計歌難得
夢牽嶺南一生唯愛馬際會中興失老成

吳志勛

輝生

遺愛難忘黍雨棠蔭皆德政
循聲遍誦江雲海水盡愁思

謝玉裁

功業彰史冊貽謀百世
英靈護山河流芳萬年

陳繼烈

論道經邦履理陰陽稱國手
鞠躬盡瘁瞻懷象魏泣蒼生

鄭子政

平生以崇法務實自期絕艱仰其高風雲早遂康時略
慧業為藥爐茶鼎所苦哲人云已逝天地能知許國心

台灣警備總司令黃杰率全體官兵

撫民遺愛謀國垂勳依倚計多年豈僅口碑說載道
在莒未歸騎箕以去艱難當此日竟令朝野泣同悲

李立柏

卅載勵忠貞猶惜濟時心未了
平生敦志節共欽謀國績長昭

晏玉璣

輓 聯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輔弼中興垂千秋之亮節
豁達大度仰一代之雄才

包烈

匡時輔國著宏猷十載感深知愧我無才肩重任
木壞山頽驚噩耗八荒齊下淚問公何以慰蒼生

陳萬

滬上同禦侮正倭氛方張迢遞關山尋舊夢
瀛島少過往悲老成謝世淒涼風雨痛招魂

李士珍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
是真澹泊身歿志益明

王撫洲

謀國矢堅貞卓樹典型垂不朽
匡時資幹略遜摧梁木感尤深

陳漢平

志懷不屈管樂後
勛業當在臬臺間

鄭豐

葉屏侯

膺疆寄綜機樞黨國宣勞欽偉績
擅財經長政治松筠勁節仰高風

馬壽華

樞院忝追隨厚澤殊勛留國史
樞星驚殞落凄風苦雨滿瀛洲

張少癡

任之

大智總樞衡國用民生資碩勳
長天隕箕宿江雲海水盡愁思

馬國琳

朝野震哀音從知感逝懷賢隨淚立碑思惠澤
樞圻隆建樹最是理財裕國補天鍊石見經綸

沈鴻烈

崇法務實口碑載道
愛民勤政蔬露永哀

齊絮悟

輔弼元首竭智盡忠留得勳名垂黨國
歷宰樞衡運籌決策尙餘典範在人寰

台北市海南同鄉會

輔世仰槃才早著聲華馳海宇
沈疴少靈藥空餘孽劃奠財經

白建民

珠喻渾圓抱輔世長才崇法臨民會綜財經謀建國
絲防易染憶論交深語傷時悼世空餘籌策望中興

陳素

總御百揆且時序
一擲耆賢與世違

關大成

崇法務實勤政愛民會爲蒼生作霖雨
盡瘁積勞歸真返璞還從甘棠望雲天

根震權

濟世利羣生長留遺澤傳四海
離塵歸天國猶念哀鴻遍八荒

陳友欽

盡瘁積辛勞德業未完雄才大略遺弘範
彌留猶在念央行待復國計民生失典型

郭永

碩望重元樞卅年政務宣勞樞柱艱難資輔弼
中興籌國策一夕膏肓痼疾痠涼哀詠弔英靈

袁棟

業贊中興鼎鼐調和羣辟相隨瞻馬首
校約翰風雲思奮發此時黯沒失龍頭

聖約翰大學在台同學會

通家仰李門當日音容成想像

圍府推劉晏千秋事業作鹽梅

張叔良

張李異珉

立身樹崇法務實宏規風骨清微昭百代
為國建經濟制度大計甘棠遺愛足千秋

陳大慶

國事著勳勞畢生齋瘁如一日

臺垣昭政績盛德在民足千秋

吳三連

是經濟家是政治家戮力宣勞資輔弼
國士未復國恥未雪憤懷實志赴泉臺

陸匡文
幼剛

務實足箴時會秉鈞衡學衆望
投艱期復國猶從經濟濟餘年

楊家瑜

黃閣夙宣猷猶展經綸能裕國
青年俄戢影已留淳樸足箴時

黃輝

遺烈重廟堂未復舊京身遽瘁
弘謨垂錫燧曾依仁宇意難忘

張子奇

齊崧

衰職濟危時舉世尙稱安定策

輓

聯

炎方傳噩耗一朝遽喪老成人

丁治驛

平章國事政通人和一代著勳名孔亟時艱思令尹
綜理金融民康物阜百年垂典範中興大業火元良

徐鴻賓

於危急中會秉國鈞安內禦外備受憂勞論事功尤稱良輔
在艱難日綜持財政節流開源不虞匱乏談經濟亦係專家

張楚

江山萬里憶杖履追隨略會蒙采一得
風雨八方哀棟樑摧折勳名永仰垂千秋

李應兆

包德明

世變方殷許謨肇創多倚重
中興在望香燭落動哀思

楊覺天

陶寄天

愛屬員如家人子弟併懷多年耳提面命無虛語
痛國家喪賢哲耆勳風雨此日人慟潮咽復何言

謝冠羣

德業並山河噩耗驚傳悲四海
勳名昭日月芳烈共仰瞻千秋

趙自齊

幾度隸軒轅鞅掌趨公風誼雲天愆未報
卅年忠黨國鞠躬盡瘁勳名日月共長昭

劉支藩

鎮國撫民餉胥不置是謂之賢相
潔身率物正直無私乃歿而為神

劉先雲

財經久領重中樞力疾紆籌復與屬望尊元輔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篤敬持躬垂世範緬懷亮節遠逝驚傳惜老成

鄒清之

公眞良相我愧良醫海外每承顏共懷故土思匡復
國喪賢才鄉失賢士堂前徒痛悼只爲中興惜股肱

賴少魂

滬上樹聲名自抗戰以還彪炳勛華垂信史
嶺南論碩彥溯曲江而後端凝風度更何人

許開淵

崇法務實記勛贊中興輔展濟艱危風雨漫天小別頓成華屋感
內勤外和數平生盛德發開姻姻蒼茫潸淚臨歧忍說首邱終

鍾孟謀

碧如玉

是儒家本來面目有崇法務實工夫黨國樹嘉謨開濟數卅年大業
與耶穌同付心腸懷博愛利人襟抱膏肓終莫起英靈歸一主無疑

石覺

本中山先生革命精神黨國建殊勳留有嘉謨傳後世
懷范文正公爲政抱負治平抒頓劃那堪風雨弔斯人

趙桂森

勤政愛民一生盡瘁

崇法務實千秋永播芳名

劉 垞 中

甘珠爾瓦呼圖克圖

唐 從 周

崇法務實開風氣
相國愛民有德勛

蕭季璋

封疆組閣勤政愛民爲黨國中堅份子
理亂治繁崇法務實是財經首出人才

梁世德

盛業塔欽黍雨棠蔭銘澤遠

高勳可仰天雲海水泛哀思

包文同

霖雨慰蒼生謝公繫天下望
大星沉碧落傳說騎箕尾遊

鄭進福

南華士安崇法務實播遷顯忠貞
江方夷吾高勳重望遺愛留千古

趙 濟

張 蕙

負經濟宏才許世以身有功於國有功于民斯人卓著千秋業
綜生平政績大書其事或布在方或布在策此後留傳萬古名

張廷樞

領導金融財政支持反共抗俄崇法務實功在黨國
大陸尙未重光建台猶待致力棟樑摧折萬古同悲

曹樹鈞

庫藏久綜嗟力瘁
國鈞曾秉欵才難

張維翰

爐火純清風調欲超孤雁上
襟胸坦蕩音容猶若五雲中

閻孟華

輔國紓鴻猷一代勳名昭後世
憂時驚鶴化千秋偉業著先型

姬夔川

莊惠有容數載經邦舉世重
勳猷方振一朝撤手萬人悲

劉錫五

負重忍辱當大任

崇法務實遺後思

李毓秀

匡時有崇法務實之褒豈獨溫恭乎衆望
謀國踐躬躬盡瘁之誓足留遺範式千秋

李文齋

隆望在人庸勛在國
名之百世薦之馨香

徐中濟

力抱病軀謀國事
僊遊麗島悼時賢

張清源

鴻公毅魄回天上
鈞長馳名在世間

李建興

黨國懋豐功助略蓋籌欽往績
赤氣猶未滅艱難宏濟失長才

方冀達

膺開府樞臣之寄著崇法務實之賢風範已千秋豈僅殊勳垂竹帛
沐陽春雨之私見末世清明之節音容渺終古不徒零涕爲蒼生

前上海市保安總團旅台舊屬

朝野哭斯人從知憂國關心開濟不辭天下任
股肱膺重寄想見艱難瞑目車書未睹九州同

吉章簡

舉世共欽崇赫赫大勳垂竹帛
多年承迪誨巍巍盛德鐵衷腸

楊鋒

鼎誦著殊勳勤政愛民稱不朽
蠅蟻尙多難哭公爲國縮遺徽

輓 聯

史延程

體國矢忠貞秉軸助名高北斗
復仇勵薪膽同舟風雨失南針

楊管北

申江布澤圓府宣猷更管處黃扉直遺萬家霖雨遍
警歎頻親鐵型死在念夙承青睞彌傷一夕大星沉

趙聚鈺

庶政著謀猷況有文章光史冊
厚生資籌畫不堪風雨黯靈旗

陳維綸

病喘又極公忙挽救惜無從隔海遙憐舍弟泣
米貴更嫌薪少財經搜對策綸圖難狀義民饑

狄膺

謀國公忠千秋勳業
宅心仁愛萬口碑銘

吳越潮

盛德心銘碧海青天渾入夢
高風懷仰素車白馬恨招魂

周文蔚

功名事業已昭彰試看萬輩蒼生頌德銘恩歎歐偏里巷
經濟文章常綢繡留得千秋青史紀勳績炳耀在人寰

施運元 率子復昌

懋績堪稱反共抗俄保有黃金數百萬
風懷可仰存誠不妄真無愧忤足千秋

鄧激濤

千秋後知有公助業長存人間尙覺甘棠在
數日前才過我風神猶昔壁上曾携拙墨歸

香翰屏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黨國著賢勞竭智殫精卅載勳猷光史冊
知行能合一務實崇法千秋遺範仰儀型

陸宗祺

陳奮澄

力疾宣勤先生真健者

孤忠謀國多士慎元良

王六任

江漢華嵩我生憾晚

日星河嶽公歿猶存

丘琪忠

入主大政出寄封疆功業照人寰
豈止幃幃感厚澤民望昭蘇國正匡復艱難愴此日
那堪中道哭元勛

李慕韓

廉潔特躬畢生爲國家宣勞功彪史冊
謙恭處世一意替人羣造福澤被蒼黎

石鳳翔

基督精神忠恕待人

輔國器度恭謙容物

雷震遠

蕭鄴侯功濟軍儲謀國見深衷
漢室勳名誰與並諸葛公治孚衆望
異時論相業曲江風度信能濟

趙恆忍

廿載荷滋培爲慈父爲良師
詎料大限難違失北斗一朝成
懸檝是真耶是夢耶方恨同生無術
恨人琴

劉慶堯

望重明時蓋劃蓋盤廊廟算

仙遊麗島野風颯颯海潮哀

唐國楨

天不留耆舊

人皆惜老成

劉秋芳

足智多謀遇事機先同管仲

崇法務實中興功應比蕭何

陳葵仙

黃新礪

開濟補時艱清望早曾輝百粵

度支宏國用遺哀未見定中原

劉詠堯

我悲知己那失元良卅年風義兼師友

澤被蒼生名垂青史萬古雲霄一羽毛

周德偉

具經濟學有佐命才黨國憂勤人易老

壽未百年別懷千載海雲擁護鶴歸來

王風雄

爲國著功勳堪羨崇法愛民留有棠陰調德政

頻年親警歎除茲騎鯨跨鶴怕開薤露動哀思

鄧克昌

經財內閣撐危運

忠亮平生永令名

鍾伯毅

十餘年綜攬財樞杖履追陪早叨榷蔭

一剎那神歸太素干戈擾攘痛失元勳

王聞韶

滬濱識荆香島再逢卅載風雲變幻落落儒生辜厚賞

幕府抒略鸞臺著績一朝膏肓莫起恢恢青史有餘光

樊紹賢

直道至今猶在

清名終古常留

黎少達

復國樹鴻基底定八荒拯我炎黃指顧澄清成大業
濟川懷顧附追隨廿載仰茲桑卜傷心知遇更何人

沈祖同

碩範夙追隨開濟忠誠垂後世
名山安窅夢龍蛇蟠鬱蔚佳城

侯銘恩

掌天下不盡之財毫不及身堪稱富今廉者
蒙世間非罪之謗甘絀其口何慚千古完人

方子丹

杖履追隨園府廿年仰盛德
棟梁崩折廟堂九域動哀忱

中央銀行全體同仁

數十載領導同人問燠噓寒愛護多方恩萬種
一霎時驚傳噩耗撫今追昔悲傷畢集淚千行

中央銀行在台留資同人

海宇仰許謨光國垂勳自有大名長炳耀
泉園敦雅誼關懷復業猶抒至計到彌留

俞飛鵬

豁達仰襟期忠黨愛國自有豐功昭史乘
翁和敷部屬推愛及人那堪灑淚向銀淚

陳自康

中央印製廠時壽彭率全體同仁

鄭元翔

崇法以治務實是嚴舉國仰元良中興方仗許謨略
園府銘勛經邦裕用鞠躬真盡瘁大計猶鑿屬續時

中央造幣廠全體員工

公忍棄我儕而去乎憶播遷來台風雨同舟幸蒙領導得續絕統
天胡新時日不予耶開復制決策原則穩定遽返道山未觀厥成

輓 聯

中央銀行業務局同人

蓬島感蒼涼流水夕陽千古恨
蓉城歸縹緲凄風苦雨百年愁

中央銀行會計處全體同人

忠於謀國勤於治事從政數十年時事蠅蟻心早瘁
廉以持己恕以待人辛勞如一日昨懷頓失淚頻揮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室全體同人

知遇感平生三十載仰託昨懷每以心腹相推訓誨帆嘗期我最
憂勤傷大老一霎間忽騎箕尾從此音容永逝淚淚獨為哭公多

何驥

巴渝眷顧海嶠隨隨數念年碎壁山河心血從教帷幄盡
風義千秋恩期畢世飛五月落梅霧雨淚痕揮向瘦門多

刁培然

開濟仰許謨病榻繫心猶關至計
平生感風誼仁昨回首莫贖百生

王鍾

隸昨懷言德常承鄉關吾久尊耆宿
罹疾疾參苓罔效黨國人驚折棟梁

劉天可

巴蜀追隨隨溯頻年安危與共疾病相扶回首已成千古痛
金融預籌策綫幾日規劃方呈艱難待濟蓋棺能慰九原心

桑錫晉

溫儉謙恭功高心愈下
崇法務實身歿志益明

趙觀白

公乃國中英卅年方伯阿衡遺大投艱霖雨富生靈謝傳
上為天下慟三度賓從幕府感深如遇斷雲楚水哭房公

范鶴言

翊贊著謀猷崇法厚生時望切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追陪慚識拔星沉人逸寫哀深

史世珍

請命每趨庭一代元良思召伯

箴言猶在耳廿年知遇痛春申

時壽彭

園府久綜持每感盛德涵濡卅載追隨親範範

神京方待復詎料大星隕落羣倫痛悼失瞻依

甘豫昌

威儀倭奴厲士氣振人心全仗勤猷國因啓新運

勘平匪亂調盈虛裕庫用猶期引領天何不假年

沈慕潛

崇法務實變理陰陽大計承留自有鐘鏗銘不朽

略分言情如同子弟深恩未報每懷訓誨淚長揮

馬君助

蒞政以崇法務實爲先舉舉宏規關國計

立身循居儉持謙之本軍軍遺澤繫人思

饒振常

秉國鈞於危難之中旋乾轉坤卓著助勞昭史乘

杳飛鴻於霄漢以上歸真返璞永留德澤在人間

黎勉亭

挽既倒之狂瀾默運潛籌秉國似良醫鞠躬盡瘁

措偏安於磐石崇法務實治民如賢相永式遺型

武鏞

從渝由滬而台廿載追隨左右恩義如親最痛涓滴未酬默歎傷心公遽逝

爲民愛國忠黨一生盡瘁中樞德功並著正賴河山待復茫茫塵世我何依

丁可夫

忠慎爲國實志而去

淡泊處世遺範長新

金湯

歌薰風以阜財北斗積金高挹彼注茲瀛海片帆抒國難

汪家鈺

若冬日之可愛中懷秉玉潤悅近來遠汪洋大度得人和

受元首殊知膺股肱重任共仰勞而不伐和而不同調燮允孚當代望

曹志鵬

總度支全權掌金融大計弗使外有贏財內有餘帛操持默契昔賢心

具光風霽月之懷每幸園府追隨久隸旃幟承德澤

陳震亞

膺元首股肱之寄忽報巨星隕落頓教朝野動哀思

楊選堂

數載旃幟幟幟頻加風誼雲天增感慨

劉章富

卅年勤黨國聲猷並懋勳名日月共昭垂

譚玉佐

廟堂贊畫園府綜持四十年爲國宣勞勳業久孚霖雨望

劉光祿

心地光明胸懷磊落一霎間辭塵遠逝精誠長並日星懸

李家禾

宦轍許相隨待我誠如子弟

鍾榮凱

道山驚遽返知公原屬星辰

陳廣麟

兄真不拔潛龍憶兒時問字課經前塵在目一自田園零落繩旆西東難荒事業已

成空又遯風催背鳥去我似退飛倦鷓依母喪成哀扶輿夙疾銘心如今骨肉流離人天下上任恤山恩猶

負重何堪星黯白雲埋

表妹

陳錢淑貞率男 永堯 洪鋼

愧半子定省多疏管恨身繫非邦遙向泰嶽瞻依同祝康疆臻上壽
忽萬里噩音遠報驚恚魂歸天國從此孀鄉失庇長教嗚咽泣東床

婿 李福泰

繆啓威率子女

李其昌

輓

聯

幃軸禮箋

以收到先後為序

國	國	老	哲	大	蓬	懋	召	青	國	義	懋	典				
失元	徐源泉	陶百川	成澗	會約農	會寶霖	蕭孝徽	羅家倫	史留芳	張默君	秀永	李煜瀛	重金	莫德惠	續同欽	陳其業	型尙在

功	功	哲	功	功	典	翊	功	哲	哲	哲	鞠	
黃煥如	沈家杰	王任遠	潘衍興	劉振東	葉翔之	端木愷	董顯光	何聯奎	李品仙	王懋功	朱紹良	沈慧蓮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青	功	仁	哲	功	功	痛	哲	哲	助	哲	德	老	
史留芳	詹純鑑	武誓彭	嚴廷驥	于汝洲	任培道	陳海澄	孫芹池	臧元駿	潘朝英	滿擊雲	倪文亞	望常	陳介生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黨

蕭贊育

功 昭 黨 國

張翰書

哲 人 其 萎

冉寅谷

功 在 黨 國

李雅先

哲 人 其 萎

朱慎微

功 在 國 家

熊斌

國 失 元 良

陳達元

勳 績 永 昭

雷震

勳 業 昭 垂

黃啓瑞

哲 人 其 萎

台灣省物資局長張仁滔暨全體同人

哲 人 其 萎

黃珍吾

黨 失 賢 良

張瑞貴

哲 人 其 萎

劉正民

哲 人 其 萎

黃比瀛 錢劍秋

哲 人 其 萎

華僑協會總會理事長馬超俊暨全體理監事

經 濟 宏 才

朱家驊 張紅薇

一 代 完 人

汪元

德 望 常 昭

陳寶麟

勳 業 長 昭

韓德純

哲 人 其 萎

毛向新

績 留 樞 機

朱正宗

哲 人 其 萎

翁鈞

哲 人 其 萎

李子欣 李崇年 張翰蕃

一 代 完 人

徐公荷

功 在 黨 國

姚大海

功 在 黨 國

梁式恆

典 型 猶 在

吳興校

勳 業 昭 垂

梁華盛

典 型 猶 存

劉東巖

德 望 常 昭

劉兼善

永 懷 公 忠

陳運生

碩 範 永 昭

李蘊權

哲 人 其 萎

黃百器

哲 人 其 萎

南華紡織公司倪克宣

功 在 黨 國

王培基

勳 業 永 昭

朱致一

哲 人 其 萎

達化文

哲 人 其 萎

孫震

哲 人 其 萎

富聖廉

德 範 常 昭

王立哉

遺 範 長 存

陳士誠

國 喪 棟 樑

張錦富

典 型 猶 在

邱梁

勳 業 昭 垂

儀	德	南	遽	功	榮	哲	哲	哲	典	召	哲	蓬	痛	哲	典							
徐月珍	業千秋	馬紹邦 李葆真	極星 陳逸松	返道 山	歸天 黨	歸天 黨	梁安慶 廖蔚	傅亞夫 周惠珠	人其萎	王祝康 伍華麟	鈕因林 鈕湯中方	返天 國	周彭年	人其萎	韓克溫	島歸 真	應式文	失賢 良	區萬勝 鄧晴隆	人其萎	楊柳樵	型永 式
							黃燕平 丑輝瑛												劉星汜			

樟軸禮鏡

奠	功	哲	典	德	勳	哲	榮	功	哲	典	國	哲	邦													
馬紹裘	李祖眠 李祖晴 李祖冰 李祖淳	范誦堯	人其萎	水祥雲	型長 昭	徐毓莊 徐毓存	鮑長 存	郵政儲金匯業局	業長 昭	徐逸	人其萎	何縱炎	歸天 國	王啓元 王啓華 王啓光 王啓明	在黨 國	許超	人其萎	施復昌	型猶 在	許榮蔭 徐毓華	失耆 賢	文朝籍	人其萎	高魁元	家珍 瘁	卓補林

失老成	裴鳴宇	德清芬	王選長 羅鐵青	身端正	卓定謀	人其萎	李龍荔紅	人其萎	徐自行	人其萎	吳望伋	失鄉賢	仁	人其萎	業彪炳	吳俊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理事長馬超俊暨全體同

台灣各紡廠原棉聯購處

唁函唁電

- | | | | | | | | | | | | | |
|----------------|-------------------|-----------------------|-------------------------------|-------|-----------------|------|-----------------|--------------------|-----|-----|---------|---------------|
| 孔祥熙 | 葉公超 | 蔣廷黻 | 李迪俊 | 杭立武 | 段茂瀾 | 沈怡 | 陳質平 | 顧維鈞 | 徐亨 | 陳立夫 | 厲昭 | 袁子健 |
| 陳之邁 | 何世禮 | 菲律賓駐華大使 Narciso Ramos | 西班牙駐華大使 Julio de Larra occhia | 王蓬 | 譚伯羽 | 顧翊羣 | 李翰 | 孫義宣 | 張悅聯 | 梁慶椿 | 蔣賜福 | 蔣慶椿 |
| 謝東閣 | 許榮蔭 | 游健文 | 徐柏園夫人 | 陳健庵夫人 | 陳秀芬 | 陳秀珍 | 中國國民黨駐美東支部暨紐約分部 | Dr. Greg W. Sudaar | 貝祖詒 | 陳光甫 | 張嘉敬 | 榮爾仁 |
| 郭泉 | 郭順 | 十河信一 | 柯叔寶 | 盛昇頤 | 吳俊升 | 薛人仰 | 劉真 | 李叔明 | 郭琳褒 | 薛芬士 | 菲律賓廣東會館 | 姚守中 |
| 羅友倫 | 張李德和 | 賴森林 | 陳清文 | 賴順生 | 黃宗焜 | 林鶴年 | 林伶蕙 | 張山鐘 | 王金海 | 林金生 | 劉文光 | 李鄧秀卿 |
| 洪榮華 | 吳尚卿 | 吳鴻麟 | 呂世明 | 楊仲鯨 | 尤聯甫 | 彭瑞鷺 | 錢汝侃 | 盛毓驥 | 林金生 | 席鑑庭 | 蔡鴻文 | 黃通 |
| 張富 | 林齊青 | 鄭行靜 | 簡欣哲 | 彭早午 | 孔大衛 | 蔡啓恆 | 戴銘允 | 丘東旭 | 王啓光 | 鍾啓迪 | 呂民魂 | 李玉林 |
| Daisy Auerbury | Charles P. Gilson | 陳體立夫人 | 韓朝宗 | 吳子祥 | 香港華僑中學校長古譚暨全體員生 | 吳馬鳳岐 | 崔聘西 | 戴華蘭 | 程任宇 | 馮秉芬 | 鄭錫壽 | 李冀曜 |
| 碧如瑰 | 曾善華 | 鄭功欣 | 陳孝威 | 李揚敬 | 林翼中 | 黃麟書 | 鄭觀昌 | 鄭劉秀峯 | 蕭兆綱 | 大象行 | 戴活連 | 朱錦 |
| 李卓亞 | 謝慶堃 | 鄭桂生 | 鄭桂泉 | 王寶琦 | 陳其標 | 鄭觀昌 | 鄭劉秀峯 | 蕭兆綱 | 大象行 | 戴活連 | 朱錦 | Frank Snoklin |
| 梅傑生 | 陳德新 | 陳炎水 | The Chase Manhattan Bank | 梁敬諄 | 李卓之 | 簡東浦 | 戴活連 | 朱錦 | 黃紹慈 | 盧衍明 | | |

各方函電因係分由治喪委員會中央銀行及家屬方面收受上列台銜或不免有所遺漏特此註明敬希鑒察

致送賻金臺銜

以收到先後為序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全體委員

陳光甫 沈維經 黃鎮球 甘楓英

陳訓奮 吳嘉榮 趙鐵章 黃仁霖

江一平 蘇志彬 劉啓光 高湯盤

張默君 張慶恩 張廷榮 呂紹民

台灣產物保險公司全體同人

張心洽 霍寶樹 林柏壽 楊聚嘉

洪軌 李頌陶 周象賢 潘錫甲

陳大慶 吳三連 唐傳宗 沈百先

碧如玉 徐有岸 劉蓄靜 王先青

丁鏡人 陳樹人 吳楊慧珍 黃朝輝

凌忠揚 沈秋雁 陳伯莊 呂靜宜

葉濤堅 翁嘉貽 李翼曜 榮卓亞

李蕙蘭 魏重慶 羅敦偉 陳逢源

陳松光 賀其綦 李炳燮 馮季新

王慎名 錢其琛 台灣各紗廠原棉聯購處

陳啓清 胡弘成率男載熙 江元仁

宋述樵 蘇媛 澳門四邑同鄉會

蘇銳淞 許丙 陳葵仙 黃新礪

高逸鴻 龔聖治 蔡六乘 吳湘珍

風純德 丘東旭 虞福填 邱清淵

李鳴蘇 莊村美率女昭妹 李福杖 李福權

以上共收賻金美金五十元(照台銀匯率新台幣二千元)

港幣三百九十元(照台銀匯率新台幣二十七百三十元)

致送賻金台銜

戕翼翹

梁寒操

羅萬俾

黃朝琴

張梅卿

謝惠元

王孝英

卓定謀

劉文光

陳澤寬

錢珽

劉澤恩

屠顯德

中西女子中學同學會

李建興

許金德

高崧

洪興蔭

董徹

裴光新

郭午嶠

汪竹一

李福培

首藤正巳

尹仲容

王金海

周菩提

范愛德

張運卿

中國產物保險公司全體同人

李大超

高崑峯

陳祖厚

吳海峯

鄭元翔

屠顯德

田寶岱

盧祺沃

沙德堅

樊紹賢

莫衡

關頌聲

曹璧如

徐賢樂

符琴

李福和

王正廷

李壽雅

蔡功南

吳鴻森

張運卿

王大松

台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同人

李占春

錢劍秋

陳祖光

沈宗瀚

侯銘恩

吳德昭

郭可侗

張一真

錢嫵

張志輝

袁世斌

高廷梓

潘仰山

何墨林

陳積中

聖約翰大學同學會

吳道良

吳道良

朱數春

富綱侯

汪漢滔

楊克天

魏景蒙

張壽賢

華僑銀行

姚志崇

嚴慶齡

台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同人

王民寧

伍守恭

謝罔却

沈祖穆

黃婦普

楊祖安

王朱學勤

張藹真

陳樹寬

袁世斌

張志輝

袁世斌

高廷梓

潘仰山

何墨林

陳積中

聖約翰大學同學會

吳道良

吳道良

朱數春

富綱侯

汪漢滔

楊克天

嚴家淦

謝耿民

周宏濤

方亦儒

嚴慶齡

台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同人

交通銀行全體同人

吳蘭

方度

董炎

蕭勃

沈慈輝

張藹真

陳樹寬

袁世斌

張志輝

袁世斌

高廷梓

潘仰山

何墨林

陳積中

聖約翰大學同學會

吳道良

吳道良

朱數春

富綱侯

汪漢滔

楊克天

黃季陸

周宏濤

陳長桐

吳舜文

嚴慶齡

台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同人

交通銀行全體同人

吳蘭

方度

董炎

蕭勃

沈慈輝

張藹真

陳樹寬

袁世斌

張志輝

袁世斌

高廷梓

潘仰山

何墨林

陳積中

聖約翰大學同學會

吳道良

吳道良

朱數春

富綱侯

汪漢滔

楊克天

貝祖詒

李世激

陳長桐

吳舜文

嚴慶齡

台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同人

交通銀行全體同人

吳蘭

方度

董炎

蕭勃

沈慈輝

張藹真

陳樹寬

袁世斌

張志輝

袁世斌

高廷梓

潘仰山

何墨林

陳積中

聖約翰大學同學會

吳道良

吳道良

朱數春

富綱侯

汪漢滔

楊克天

飲鴻鈞先生紀念集

新台幣七萬八千一百七十元

共計新台幣八萬二千九百元

四十九年十二月廿八日經治療委員會議決上款分別捐贈台灣大學附設醫院及省立台北醫院各新台幣肆萬壹千肆百伍拾元充作貧民醫藥救濟費用並於同年十二月卅一日辦訖

致送花園、花十字架臺銜

以收到先後為序

- | | | | | | | | | |
|-----------------|----------|---------------------|------------------------------|------------------|-------------------------------|----------------|----------------------------|-----------|
| 陳誠 | 張道藩 | 許世英 | 許沈依仁 | 王世杰 | 黃國書 | 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 | 郭澄 | 美國大使館莊萊德 |
| 莊富蘭芝 | 韓國大使館韓有東 | 越南公使阮功助 | Mr. & Mrs. Clarence F. Field | 杭立武 | 立法院粵籍全體立法委員 | 陳慶瑜 | 徐柏園 | |
| 周友端 | 王叔銘 | 連震東 | 季源溥 | 蔣渭川 | Georgiang and Magnus Geggoson | William & Hunt | Mr. & Mrs. William P. Hunt | 懷德工程公司 |
| 張嘉璈 | 貝祖詒 | 陳光甫 | 沈維經 | 劉我美 | 郭元嬌 | 施季言 | 李玉楷 | 葉明勳 |
| 胡健中 | 劉安祺 | 李立柏 | 沈昌煥 | 郭元嬌 | 施季言 | 李連春 | 李玉楷 | 葉明勳 |
| 吳三連 | 朱聯馥 | 沈昌煥 | 錢龍綽 | 應昌期 | 奚炎 | 徐潤勳 | 吳黃梅芳 | 屈用中 |
| 中本紡織公司 | 應昌期 | 奚炎 | 徐潤勳 | 吳黃梅芳 | 屈用中 | 龔強 | 余鄂賓 | 陳長桐 |
| 台灣銀行總務室 | 趙悠梅 | 簡澤民 | 陸翰芹 | 吳德昭 | 陶玉田 | 彰化紗廠 | 汪弼 | 吳順明 |
| 王蓬 | 錢嫻 | 中國市政學會 | 王興邦 | 黃友幹 | 何綺華 | 沈鶴年 | 貝國華 | 錢壽恆 |
| 胡可時 | 朱玖瑩 | 台北市報業公會 | 何綺華 | 沈鶴年 | 貝國華 | 錢壽恆 | 許會潤 | 李崇實 |
| 賴森林 | 王星舟 | 李宇清 | 保君健 | 審計部駐國庫審計何憶昔暨全體同人 | 秦汾 | 蔣迪先 | 陳仙舟 | 陳漢清 |
| 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 | 孫景華 | 張靜愚 | 朱其傳 | 盛毓驥 | 鄭允征 | 台北市銀行公會 | 何墨林 | 賀聯華 |
| 李柏齡 | 顏春輝 | 葉錫祺 | 許中紡織公司 | 林挺生 | 梁式恆 | 李國鼎 | 王美接 | 運用委員會全體同仁 |
| 楊濟華 | 黃朝琴 | 趙品聰 | 許中紡織公司 | 林挺生 | 梁式恆 | 李國鼎 | 王美接 | 運用委員會全體同仁 |
| 王民 | 謝然之 | 趙君豪 | 黃占魁 | 劉瑞恆 | 張元鈞 | 梁恩慈 | 胡崇賢 | 李連春 |
| 菲律賓華商總會聯合會 | 潘冰如 | 台灣省鐵路局長莫衡暨全體同志 | 美南浸信會 | 蔣友勤 | 俞國華 | 趙不成 | 黃孝如 | 林伯中 |
| 梁官涓 | 徐恩會 | 江國棟 | 陳嘉尚 | 涂少梅 | 台灣省議會全體議員 | 王子瑜 | 李駿耀 | 譚嶽泉 |
| 周財源 | 方青儒 | 俞慈民 | 何墨帆 | 林振成 | 孫鄧文英 | 張頌禹 | 張金友蘭 | 趙金生 |
| George Hong Jr. | 黃河 | 孫沂方 | 孫鄧文英 | 張頌禹 | 張金友蘭 | 趙金生 | 李壽雅 | 陳廣鸞 |
| 台灣銀行全體員工 | 吳鼎芬 | 龍禮因 | 哈駿文 | 張頌禹 | 張金友蘭 | 趙金生 | 李壽雅 | 陳廣鸞 |
| 高湯盤 | 李占春 | Honorable Jose Yulo | 林則彬 | 王新衡 | 郭永 | 李壽雅 | 陳廣鸞 | 莊水德 |
| 張蘭熙 | 許金德 | 趙志堯 | 趙葆全 | 林則彬 | 王新衡 | 郭永 | 李壽雅 | 陳廣鸞 |

致送花園、花十字架台銜

俞鴻鈞先生紀念集

九八

鍾榮凱 應懿凝 王德祥 中國農業供銷公司
中央銀行全體留資同人 俞飛鵬 王 鍾
汪家鈺 張秀蘭 沈秀子 夏臣祺 徐文寬
高阿燕 高金標 梁就真 王士優 俞美運
李昭進 徐夢慈 楊寶田 梁思成
陳啓川 施性水 馬君助 吳淑瑾
中央印製廠全體員工 吳繼柱 邱更生
陳忠蔭 王佐才 時壽彰 鄭元翔
俞麗芬 王佐才 時壽彰 鄭元翔
吳淑瑾 鄭元翔 易榮發 蔣友光
中央銀行全體同人 陳自康 林璧貞
許永明 徐寄遠 陳震亞
陳 敏 鄭阿寶

治喪營葬紀要

(一) 逝世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銀行總裁、前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先生，因患流行性感胃引發氣喘宿疾，致心臟麻痺，於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二十巷五號寓邸逝世，享壽六十有四。中央通訊社及外國各通訊社駐台灣分社，均於當日將噩訊播發海外。先生臨終時俞夫人梁就光女士及弟鴻潤、內弟梁思成及僚屬多人隨侍在側。

先生患支氣管炎近三十年，時發時愈，雖未能根治，但發作時向無特別激烈情況，先生勤政憂時，每力疾從公，逝世前不久奉命籌劃中央銀行復業，先生因事關國家金融建制，爰親自策理方案並一再修訂充實，未遑休息，其時流行性感胃猖獗，先生可能因過份疲勞，至影響抵抗力，迫感胃與哮喘同發，心臟乃不堪負荷矣。先生逝世之日，感冒曾一度退熱，清晨八時起身後下樓盥洗，仍準備至央行辦公，唯旋即感覺不支，家人察覺當即電請台大醫院內科主任蔡錫琴醫師及台北中心診所陳約翰醫師會診急救，中午十二時許，蔣經國先生聞訊至俞府探望，先生對經國先生說：「我感到很辛苦」，當時本擬轉送台北榮民總醫院診治，唯病況急遽惡化，不待榮民醫院所派車輛到達，心臟已停止跳動。中央銀行新任總裁徐柏園先生於其所撰「悼俞鴻鈞先生」一文中說：「俞鴻鈞先生於本年六月一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消息立刻傳遍台北市……大家以緊張懷疑的神情趕往俞府，似乎對這突然而來的噩耗，將信將疑……都希望消息之不確，甚或會有甚麼奇蹟出現。」此一描述實可代表當時所有初聞消息者之心情。蓋先生體素強健，除困於哮喘外，鮮有他疾，却未料舊症突發，由病至危，未及兩日，變化竟若是之速而不可測也。是先生之友好僚屬於先生心臟停止跳動後，仍極力抑制感情，圍繞先生臥榻之旁有所等待，迄終覺先生溘然長逝，返魂無術時，又莫不痛苦失聲。

先生逝世後，蔣夫人、陳副總統、總統府祕書長張羣先生及友好僚屬等紛紛至俞府弔唁，因先生為虔誠的基督教徒，乃循禮由周聯華牧師作禱告，並將遺體移至內客廳。總統於下午接獲先生逝世消息之報告後，至感震悼，於當日即召見先生僚屬多人，垂詢經過，翌晨親臨俞府慰問俞夫人，並在先生靈前低首默念良久，離俞府時臉容哀戚，眼含淚水，總統內心之沉痛，亦可見矣。

(二) 治喪

先生逝世後，除由家屬急電通知旅非之女公子俞筱鈞、俞筱梅、俞筱璉暨女婿繆啓威、李福泰、李其昌外，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先生畢生盡瘁黨國，功在不朽，即於是日下午六時，在中央黨部組織俞鴻鈞先生治喪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及列席者：張羣、何應欽、李石曾、賈景德、馬超俊、張道藩、谷正綱、顧祝同、丘念台、余井塘、傅秉常、謝冠生、張其昀、陶希聖、程天放、羅家倫、王世杰、袁守謙、蔡培火、黃少谷、胡宗南、蔣經國、徐柏園、陳雪屏、鄭彥棻、彭孟緝、王叔銘、黃國書、皮以書、馬紀壯、鄧傳楷、黃杰、周宏濤、郭驥、李壽雍、陳嘉尙、嚴家淦、楊繼曾、梅貽琦、趙志奎、錢劍秋、連震東、谷鳳翔、田炯錦、胡健中、曹聖芬、會虛白、張茲園、倪文亞、俞國華、趙葆全、堯樂博士、陳勉修、陳建中、錢用和、張寶樹、黃通、蕭錚、高信、王星舟、陳慶瑜、李永新、李嗣聰、竺芝珊、王秉鈞、俞飛鵬、劉詠堯、張壽賢、王鍾、王宗

山、刁培然、桑錫菁等人。開會時公推張岳軍先生爲主席，全體與會人員並起立默念。旋即由主席及陳忠緯醫師分別報告先生患病治療經過，主席報告時略謂：「中央銀行最近準備復業，其計劃由俞先生親自核定，力疾從公，昨日方送至總統府，先生此次患病，變化至速，臨終時，並無遺囑，唯在病情轉劇時，仍不忘對身旁照顧之僚屬桑錫菁先生叮囑有關央行復業事，其忠勤爲國之精神，無可比喻。」聞者莫不淚下。主席報告後，會議並議決五點：

- 一、推張道藩先生爲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馬超俊、嚴家淦、徐柏園三先生爲副主任委員。
- 二、推陳慶瑜先生爲治喪委員會總幹事，張壽賢、桑錫菁兩先生爲副總幹事。
- 三、俞鴻鈞先生爲一虔誠之基督徒，其喪禮中應有一宗教儀式之追思禮拜，至追思禮拜及大殮公祭日期俟與俞夫人商定後再行登報，先於六月二日刊登計開一天。
- 四、呈請政府明令褒揚。

五、俞先生遺體大殮時，覆蓋黨旗，並推何應欽、張羣、李石曾、謝冠生諸先生擔任覆旗事宜。

(三) 大殮

先生於六月一日逝世，因等候其女公子及女婿由非來台奔喪，遺體停放於俞公館內客廳，臨時裝設冷氣維護，並於內客廳通往前門庭院之涼台裝設靈堂，靈堂以榕葉搭架，素花爲飾，中鑲先生遺照，台前則置大型白花十字架，自二日起至四日移靈止，前往俞公館弔唁者絡繹不絕。

先生喪禮原定火葬，六月三日下午七時半俞女公子三人偕婿等由非來台奔喪，由於外孫廖家申之提議，喪禮改爲土葬。六月四日上午舉行移靈，八時正極樂殯儀館派花車至俞公館接靈，由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道藩先生、副主任委員徐柏園、嚴家淦先生及蔣經國先生等步行護送靈車，靈車經中山北路、南京東路時，路人均肅立讓道，對先生之喪，莫不顯現哀悼之情。靈車抵殯儀館時，由國防部示範樂隊列隊在門道奏哀樂迎靈。先生靈堂佈置極爲嚴肅壯觀，由殯儀館大門至靈堂止，走道兩旁搭設高聳竹棚，兩旁遍懸各方輓聯，靈堂前則搭有靈簾拱門，上置白十字架，靈堂內四壁亦懸滿輓聯、輓聯等，靈案前有十字架一座，案上置鮮花兩瓶及花環兩簇，中供先生遺像，環以花邊，兩旁並有大型素花綴成之十字架，靈案上正壁恭懸總統頒題「膺懷慎幹」匾額。

移靈典禮完畢，九時正，在靈堂舉行追思禮拜，蔣夫人、陳副總統及總統府祕書長張岳軍先生等一百多人參加禮拜，張岳軍先生於典禮中報告先生生平，指出：「俞鴻鈞先生是基督徒中的政治家，也是政治家中的基督徒。」報告完畢，由周聯華牧師證道，迄九時半禮拜結束，九時三刻總統復親臨靈堂行祭禮後並至靈幃默視先生遺容，慰唁先生家屬，歷數十分鐘方始離去。先生遺體着黑色西式禮服，上蓋白緞黑十字被狀，致祭親友僚屬，均依依至靈幃內瞻仰遺容。十時正舉行大殮，先由副總統及治喪委員會致祭，先生家屬俯伏舉哀盡禮。殮後由何應欽、張羣、李石曾、及謝冠生四先生將靈柩一面覆於棺上，旋即開始公祭。團體公祭者有治喪委員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司法院、台灣省政府、台北市政府、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國民大會、財政部、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中國銀行、行政院、監察院、考試院、司法院、藏委員會、聯勤總司令部、憲兵司令部、駐台各國使節、中央印製廠、中央造幣廠、交通銀行暨台北紡織廠及中本公司、農民銀行、台灣銀行、紅十字會、台北市銀行公會、報業公會、記者公會、上海市政府在台人員、前上海市保安總團、陸軍總司令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郵政總局、中華基督教、台灣產物保險公司、民社黨中央黨部、革命實踐研究院、台灣省菸酒公賣局、中央銀行資遣同仁聯誼會、新疆省政府、空軍總司令部、台灣省警

務處、廣東省同鄉會、國防部、聖約翰同學會、海南同鄉會、市政府社會局、中央銀行等五十餘單位。個人先後至靈堂致祭者達二千四百九十七人。公祭至下午一時方告結束。

公祭畢，由周聯華牧師率同先生家屬護靈至極樂殯儀館臨時殯舍暫厝，擇吉安葬。

(四) 安葬

先生靈柩暫厝極樂殯儀館後，由張岳軍先生及治喪委員會同先生家屬及陽明山管理局局長周象賢先生在陽明公墓內勘擇墓地，並委由大陸工程公司主辦設計及建築事宜。先生墓地後枕大屯山脈，面臨陽明山盆地，左右山巒環抱，遙望淡水蜿蜒，景物如畫。墓地總面積為二十四坪，其建築採古羅馬宮殿式，平頂砌石，墓壁以四大方形石柱承頂，並用大理石雕刻。總統親題「愴懷楨幹」四字，鐫於壁上。墓穴為鋼筋混凝土所築，亦作方形內分兩穴，墓頂及四周外鑲黑色大理石，穴壁另有大理石墓表一方。墓旁兩側列植松柏，並以磨石低欄圍拱，墓之正面為墓碑，上題：「俞鴻鈞先生之墓」，佳城鬱鬱，氣象萬千，全部建築堅實壯觀，莊嚴樸素，誠足以反映先生生前治事為人作風。

墓地建築初成，治喪委員會即決定於七月三十日舉行移靈安葬。是日七時，在國防部示範樂隊前導下，先生靈柩移入禮堂，八時起由周聯華牧師主持安葬禮拜，蔣夫人及陳副總統等多人參加典禮，禮拜結束後，由治喪委員會致祭，誦讀祭文，其後先生友好僚屬亦紛紛自動在靈前行禮。九時正發引出殯，由吉普一輛開道，其後為銘旌車，上懸「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中央銀行總裁鴻鈞先生之銘旌」長形花圈。車後為樂隊車，次為總統轎區車，再次為總統褒揚令車、遺像車、牧師車，然後為靈車。除樂隊車及牧師車外，各車均用白色鮮花及蒼綠榕葉飾蓋，車前亦遵宗教禮綴以十字架。靈車裝飾，前為一用鮮花組成之「靈」字，車頂鮮花拱架作宮殿式，車身四週亦有飾蓋，遠望如屋形，靈車兩旁為素花大形十字架，極為莊嚴肅穆。靈車之後為家屬及送葬親友車共九十七輛，白馬素車，備極哀榮。靈車發引路線經南京東路、中山北路、士林而至陽明山公墓，沿途路人圍觀如堵，嗟惜之聲，此起彼落。

十時半靈車抵達墓地，先由治喪委員會致祭讀告祭文，送葬來賓五百七十餘人均共同參加祭禮。祭後安靈，並在墓前舉行告別禮拜，由周聯華牧師主持，蔣夫人領率先生家屬及友好僚屬等均參加此一告別禮拜，為先生在天之靈禱告。十二時，總統親臨墓地察看，在墓前低頭默念良久，行鞠躬禮後復慰唁先生家屬，總統離開後，安葬禮旋告完成。一代黨國偉人，宛旣既安，于焉永息，惟先生精神不死，先生名垂於長遠，先生典型則永為千萬萬同胞所懷念。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霍寶樹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文集

張公權等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霍寶樹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文集



宋文州

目次

序	霍邱真藹
悼念霍君亞民	張公權
憶霍亞民先生	林柏壽
霍寶樹先生追思紀念詞	徐柏園
我永不能忘懷的霍亞民兄	沈怡
我與霍亞民兄	譚伯羽
記亡友霍君亞民	姚崧齡
再記亡友霍君亞民	姚崧齡
霍寶樹先生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葉良才
追思霍亞民先生	陸翰芹
霍亞民先生的追憶	蔣碩傑
懷念亞公	劉大中
可敬可愛的亞民兄	崔存璘
憶霍亞民先生	張心洽
追念亞民先生	潘誌甲

亞民逝世五周年，承朋友好意，集文紀念，至爲可感。我在此向惠文諸公鄭重道謝。

亞民一生熱愛朋友，在他死後五年，我讀到這些朋友對亞民懷念和讚許的文字，真是字字真情，令人感動。由此可以想見亞民生前生活在這些朋輩真摯友誼之中，是何等快樂，何等享受！我與亞民結婚三十多年，真可說是「伉儷情深，舉室融融」。他的刻苦自勵日新又新的精神，使我心折。我親眼看見他：在家庭中，如何努力做成一個好兒子，一個好弟兄，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在公務上，如何努力做成一個好同事，一個好屬員，一個好長官。在社會上，如何努力做成一個好朋友，一個好公民。

「多想別人，少想自己；多想社會，少想家庭」。是他的座右銘。他就在努力求好忙碌快樂中，度過了他的七十人生；留下了一份勤奮的業績，珍貴的友情，讓大家欣賞，讓大家懷念。我很虔誠的將這本紀念文集介紹給國內青年讀者。亞民一生熱愛青年，因爲青年是改進社會的動力。他盼望青年面對現實，立志做人，廣種善因，改良社會。日常生活，要以歡笑代歎息，以工作代牢騷，以希望代憂慮，以振作代頹唐。先求健全自己，社會自然進步，國家自然富強。他願青年接受他行之終身的「忙碌而快樂」的人生哲學，日益推廣，做些於社會有益的工作，交些肝胆相照的朋友，爲個人創造一個快樂而有意義的人生，再留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給後代！

最後我感謝林柏壽先生將此紀念文集刊印行世。張心治、潘鈺甲、傅安明三先生集稿編校督印之勞亦所深感，併此致謝。

霍邱真藹

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亞民逝世五周年紀念日於美京

悼念霍君亞民

張公權

亞民去世已逾五載其夫人卹真蕩女士將狀述亞民一生行誼刊印紀念冊因畧述所懷以誌追思

亞民一生在中國銀行服務最久對於行務貢獻最多政府屢昇以財經工作無不善用其在行之經驗將近代企業之管理方法與道德規範介紹於任職機構亞民與中國銀行關係之深多其能無一言以述哉可懷乎亞民之加入中國銀行並非偶然中行於

民國十七年隨中央銀行成立之改組為
國際匯兌銀行願經營國際匯兌業務
其對象或為世界各國之金融機關或為世
界各國之貿易商行若非本身之人事與
組織合乎世界標準無以得國外之信任
而達成可賦予之任務多深幸中央地方之
財政收支有中央銀行者之調劑亦讓本
人脫離以往十七年忙於政府借款軍閥
勒索之苦而集中心力於為社會金融服務

務因於十八年赴歐美各國考察銀行業務
同時訪求人才一面向英之密特蘭特銀行借
用會計專家白德之達姆斯德特銀行借用
外匯專家幫助革新會計制度與外匯業
務並任用英國銀行學會總書記擔任釐
訂行交任用升降退休以及訓練等項制度
與籌設經濟研究機構一面羅致英美各
大學畢業之優秀人士會同外國專家研
究如何使外國方法與中國習慣融會貫

通而新制可以推行無阻外匯方面有陳君
長桐會計方面有劉君改岳沈君熙瑞人
事方面有戴君志騫信托方面有夏君屏方
國內業務方面有徐君維明陳君隽人蔡
君承新總務革新方面有林君旭如經濟
研究方面有張女士肖梅行屋建築方面
有陸君謹受至精神教育之中行生
活刊物編輯方面有薛君克前皆一時俊
彥因志同道合而來相助在當時以為

人事部署粗：齊備而循序前進不意民國
十九年日人侵粵東北中國喪失其資源
最豐富之地區其出口貿易幾占全國出口十
分之四又為國內輕工業產品之重要市場東
北一失中國之國際收支逆差將益擴大國
民經濟將益困窮在此情勢之下中國銀
幣不能自安於國外匯兌之局部工作乃決
定之民事於四天目標協助政府修建鐵
路以開發內地資源曰輔助國貨工業以替

代進口洋貨(三)提倡農村產銷合作放款以
增加農業生產(四)吸收華僑匯款以裕外
匯來源其最終目標在謀國際收支之平
衡國民所得之增加除吸收僑匯工作責
成閩粵港各分行外其他三項工作因超出
本行普通銀行業務之外不特各行經理向非
所習且以此類放款易於呆擱不便使各
行獨負其責勢須由總行推動乃而款
寬一適當人才主持其事四處訪求通

亞氏襄助張靜江先生在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及浙江建設廳工作因建築杭以欽路來行接洽借款屢次晤談之後覺其人有才氣而不驕矜知應變而不阿附三身廉潔而不狃介富於理想而不空虛且對於經濟建設具有深切興趣因探其意志願否加入中行亞氏答以未得靜江先生同意未便改慮我乃高、李石曾先生請其向靜江先生疏通稍經時日之後石曾先

告我如中行能承諾在金融上幫助靜
江先生發起之各項建設事業彼當初
靜江先生允許亞民加入中行我毫不遲
疑與以承諾隨於民國二十一年正月聘任
亞民為總行業務管理第一室分區稽核
靜江先生之廓然大公不私天下之才石曾
先生之親仁愛物視人事如己事使我倍
增景仰與以中行領道寸杭江鐵路建築
借款銀團及杭州電廠擴充資金銀團

以完成靜江先生之志願我之在石曾先生
所辦之各種文化金融事業均破例列名
為董事皆由民之間接關係為之也中行之
得由民由於特殊之機緣而中行將以經濟
建設之大任付諸由民非彼始料所及古語
云其才之獲得其用命也信哉斯言
由民任職必有姚君崑齡張君心一先後
加入中行為由民之助姚君長於放本會
計負責工廠之財務審核張君專研農業

經濟負責推動農產之銷合作放款並由總
行指定接近工廠區之虹口支行經理王君振
芳負責國貨工廠放款並民對於重大建設
借款均能推衡輕重預到借款人与放款人
之双方利益不數年間成績斐然皖江鐵
路於短期間完成進而籌劃自江山起長至
南昌之建築借款至於農業合作放款先
從陝汴魯三省之棉產入手合作社數与放
款金額逐年增加對於國貨工業一面選

擇優良工廠助以低利放款一面與廠家合
組產銷合作協會及國貨公司網羅民於短
期間有此成就皆其得人和之效也蓋中行
在以往十九年間應經政治金融風潮全行
信用始終不為動搖存款增至五萬元鈔票
發行增至二萬元得此成績全賴各行經理
立身行事能示信於人中下級同事勤慎
服務能使顧客滿意故舊人之中不乏是為
新人之師表而如何使新舊人才溶為一爐

以甲之長補乙之短為當時登進新人後之最大
難題也思至再乃決定舉行一晚餐會每星
期一次邀新舊上級人員參加每次必有新舊
方面各一人發表意見然因自由討論分行中之
人員到總行述職者亦邀其參加我除此有
特別事故每會必列席但不多發言僅將
双方言論中新智識與舊經驗可以相互
貫通之處指出喚起注意希望藉此途徑
使老化小小化老新化舊舊化新老小新舊

融合為一此聚餐會終我離行為止繼續三年
未有一星期間斷始則新進人多熱心參加繼
則舊人前輩亦感興趣經過相當時期
舊人深切瞭解新人新人誠心敬事舊人
彼此無猜無忌共同致力於行之革新中行
之聲譽鶴然興起亞民以其在會中所得之
經驗推而及於處理業務應付人事不久行
中前輩對於亞民均刮目相視中下級同
事亦加以敬愛當時總稽核為汪君楊伯

在行服務多年富於經驗而喜瀏覽新
書善於品評人之品貌性格某日詢其對於
亞民之印象渠感稱其可勝重任因告以我
有意增設一副總稽核以亞民任之渠忻然
同意乃知亞民之能貫通新舊而得人和
矣嗣由亞民由副總稽核而總稽核而副總
經理如大陸不易憾則亞民之綜攬全行亦意
料及之矣

我於民國二十四年離中行後與亞民見面之

機會不多因難期間偶在四聯總處開會時
晤面以彼此公務忙碌無暇多談勝利必我在
東北工作因以返渝適亞民夫人奉一男舉行
湯餅宴我往道賀目睹亞民夫婦笑容滿面
此乃仇儂積德之所致亞民擔任開辦司職
務必曾來美西岸一次暢談竟日不覺五十
二年五月忽得噩耗驚駭悲傷數日唯念
死生有命列子云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
壽八百顏子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以亞民之

智豈不知命列子又云知命者不逆命不
逆命者何羨壽今其以子已大學畢業亞
民夫人管教子女服務社會一如往昔亞民
必含笑於地下矣

憶霍亞民先生

林柏壽

遠在我旅居大陸的時候，就已曾聽到過「霍寶樹」這個名字，一直到四十八年初霍亞民先生回國籌辦開發公司，彼此才有見面機會。

從四八年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籌備時起到五十二年亞民兄逝世時止，四年多之中我和亞民兄私人友誼可說是與日俱增，而且也使我對他留下了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象。

亞民兄的長處很多，不是我這樣的管窺蠡測所能盡述，茲篇所敘也祇是我個人對他回憶中片斷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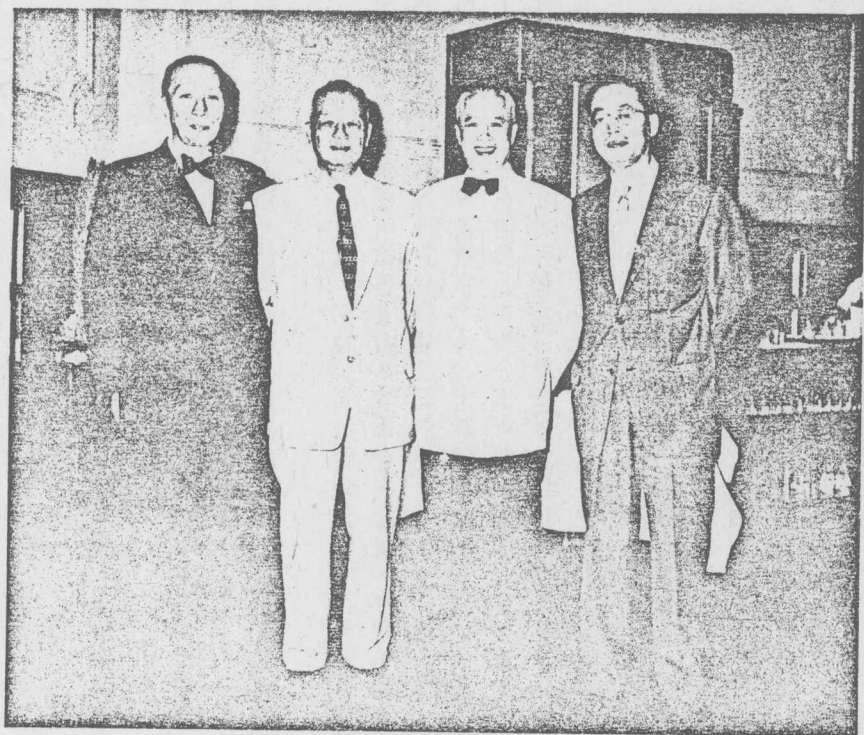
第一是他的「恢恢大度」，確有常人所不可及處，開發公司的策進籌備全出他和俞國華兄之力，當時當局決策董事長一職希望由民股擔任，徵辟及我，我因身在臺灣，推辭不掉，才承乏了這一職務。亞民兄以董事兼任總經理，實際他對於開發公司的締造可說「功高百辟」，結果爲了協調鼎鼐，顧全大局，自己却退居一個普通董事，他非但辭色自如了不爲意，而且也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對這事提過隻字。我和亞民兄在開發公司辦公室祇間一壁，亞民兄辦銀行是「內行」，按理說遇事應當由我來就教他，可是每次我到公司總是他先到我房裡，舉凡公司大計無有不先和我商量斟酌，日常事務也儘量讓我有了解，數年如一日。此外我看他處朋友待同仁，也都是以寬以恕，從來沒有一點計較的地方。

第二是他處事的條理分明，扼要簡賅，他的處事只提綱挈領抓住要點安排好了，交給屬下去辦，遇有盤根錯節的難題，自然由他來承擔解決，不過他自己從來不「巨細集於一身」，我偶爾過他房間看他寫字枱上總是空空蕩蕩，一塵不染，可是整個機構却效率緊湊，不廢一事。

第三是他的知人善任，亞民兄生平除了銀行事業而外，在行政機關也負過不少責任，據我所知經他提拔的人才很不在少數。他的用人真做到了能「識」、能「用」、能「容」，尤其一個「容」字更稱難得。他估量凡是屬下能够勝任的事，他就儘量放手交付給他們去做，古人說

：「已若有所不能
然後能容人之能。
——他做主管表面上
看似垂拱而治，實
質上他却充分利用
和發揮了屬下的力
量以爲整體的力量
。在用人方面我所
見過的主管中，亞
民兄確實可稱是個
大手筆。」

時光易逝，亞
民兄離去我們轉眼
已整整五年，追懷
往事，能無愴然，
謹以這篇短文，替
代了我對他的悼念
！



(左) 譚柏林與會酒立成司公發開華中月五年八十四
攝合聲類師築建放關賢生先兩 (右) 洽心張

霍寶樹先生追思紀念詞

徐 柏 園

中華開發公司總經理霍寶樹先生在美逝世，中外人士咸表哀悼，此間財經各界首長百餘人發起追思紀念會，於五十二年五月廿八日上午八時半假臺北市新生南路衛理堂舉行，遺像高懸，香花滿佈，到政府首長及親友等五百餘人，由陳維屏老牧師證道祝福，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報告霍氏逝世經過及生前事蹟追思悼念，情況莊嚴肅穆，至為隆重。

霍寶樹亞民先生，原籍廣東新會，民前十六年生於湖北，今年五月十二日，歿於美國華盛頓，享年六十八歲。

亞民先生於四年前奉召返國，籌組中華開發公司的時候，身體健康情形，便不够理想。他隨身攜帶兩種藥品，一種食品，兩種藥品是防治心臟病和高血壓的。食品是糖精，因為他有糖尿病。他在創辦開發公司以後的三年中，雖然時時感受病魔的威脅，但是他爲了事業、報效國家，力疾從公，積極奮鬥。在任何場合，商談公務，他總是精神奕奕，活力充沛！他的責任心和信仰力，發揮到了極致。

他於去年（五十一年）八月赴美，繼續爲開發公司奔走，也曾參加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行的年會。他原定本年一月中旬返國，不料自去年十二月起，常常感覺心臟不適，先在家休養，未見痊愈，乃於本年二月四日，住入當地醫院治療。醫生發現他心房擴大，肺部積水過多，曾先後抽水五千CC，隨抽隨積，未能根治。主持醫生曾建議動用手術，未獲結論，乃改用一種新藥，暫時頗見功效，於二月廿五日回家休養。不料僅過五天，又感不適，於三月二日再度住院治療。

三月五日施用大手術，經過平穩，但發現肺尖下脇膜間有結癌情況，而且手術之後十天，

仍未十分清醒，恢復甚爲緩慢，這都是使大家替他擔憂的。嗣於三月廿六日出院，回家調養，初期頗好，一度并可在走廊上坐一小時許。誰知道到了本月八日，病情又復急劇惡化，當晚送入附近的醫院急診，終以病入膏肓，群醫束手，延至本月十二日華盛頓時間清晨四時許，與世長辭，亦即臺北時間，同日下午四時左右也。

亞民先生遺體，已於本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安葬於馬利蘭州的公墓。安葬之前，係在當地美以美禮拜堂舉行追思禮拜，參加親友百餘人，曾由譚伯羽先生當場宣讀 總統、副總統的弔唁電文，並報告亞民先生生前事蹟。

亞民先生的功業，今天在座的朋友都清楚，不用我詳細陳述。他年青時參加革命，是位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很早就接受洗禮，也是位虔誠的基督徒。他工作最久的崗位是銀行，中國銀行是我全國公認最著聲譽的銀行，而亞民先生却是過去中國銀行裏最卓越的領導幹部。他也曾從政，國府奠都南京之初，即曾擔任過全國建設委員會秘書長，嗣復先後擔任浙江省政府建設廳長、行政院輸出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駐美技術代表團團長、駐美公使兼經濟參事等重要職務。最後兩項工作，都以接洽美援爲主要任務，亞民先生周旋肆應，卓著功勳，不亢不卑，馳譽國際。近年以其餘緒，創辦中華開發公司，仍以吸引外資，發展經濟爲基本任務；並爲此鞠躬盡瘁，以至於最後一分鐘。

亞民先生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積極前進，豪爽樂觀。做人做事，莫不如此。他氣勢磅礴，古道熱腸，以事業爲生命，以助人爲快樂。經他策劃推動，支助發展的事業，不知凡幾；經他薰陶鼓勵，培育鍛煉的人才，也不知凡幾，只是他謙光自斂，功成不居。他是位偉大的革命者，犧牲小我；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服務爲懷。我們今天在這追思集會中數述他的功業，似乎是多餘的。不過亞民先生的一生，尤其他的爲人，實在令人懷念不已。我們和他交遊，都很容易感染他的溫馨爽朗和熱情，他使你一見面便發生極好的印象，交遊愈久，則愈使你對他敬重，這真是人世間難能可貴的品德，我們的追思悼念，又豈止於今天的集會呢？

亞民先生熱愛國家，一切以國家爲至上。四十八年不顧身體多病，奉召返國籌組開發公司，等於把身體獻給國家。去年年底，他不顧病體支離，決心回國效命，曾約好朋友陪伴同行，訂定飛機票和沿途旅館準備回國，不料隨後病況惡化，才決定展緩行期，但他再三表示，希望能夠早日回國！直到本年五月八日，病況劇變，第二次住進醫院時，他還對家人說，他深信他的病會好，而且可以回國來。

亞民先生安息了，他的事業，他的品德，永遠留在人間，他的精神永在，願他回國來與我們同在。



十四年三月在臺北代表中華開發公司與美駐華大使
莊德先簽訂開發貸款基金（DLF）合約

我永不能忘懷的霍亞民兄

沈 怡

五十六年聖誕節前不多天，忽接霍亞民夫人自華盛頓寄來的一封信，大意說：「亞民逝世五周年，友朋發起出一本紀念刊，你是亞民生前好友之一，希望你能把對他的認識，對他的個性，以及他對國家的抱負，寫一篇紀念文。」

想寫一篇文來紀念亞民兄，是為我多年來蓄之已久迄未完成的一個心願，所以一直沒有動筆的原因，完全是由於每次想寫的時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總無法落筆。不僅此，當我每天來往於臺北市區，不知有多少次要經過他所手創的中華開發公司，單只消向那座暗綠色的四層樓房屋和他生前那間辦公室外面久經風吹雨打已變成既破且舊的一排遮蓬望一望，前塵往事，頓時都會一一兜上心來，黯然神愴，不能自己。時間過得不能再快，一轉眼已是五年，今承亞民夫人遠道來函敦囑，不僅義不容辭，且亦不敢再有所因循了。

回憶八年以前，我辭去了聯合國職務，由曼谷回來，其時亞民應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的邀請，早已先我由美返臺。照說就亞民當時的健康而言，他真需要好好休息，即使不為健康，也未始不可以就此在美國定居下去，但結果他却毅然決然，不聲不響地，竟獨個兒悄悄的回來了。他這種愛國家，富責任感，勇於任事的精神，在我許多朋友中，可算得是很突出的一位，很足以做許多人榜樣的一位。

四十九年七月，我回臺的最初幾天，就住在他的臺北寓所裏，因為亞民的家眷留在美國，並沒有同來，所以整個屋子除了一僕，一庖丁以外，就只有我們兩人。雖祇短短數日的相處，但我們間無所不談，無所不告，又恍如重溫過去同在一起時的滋味，至今回憶起來，真有隔世之感。

論交，我和亞民由相識，相熟，而成莫逆，為時在三十年以上，不可謂不久，然而我們既非同學，也從未同過事。我最初祇不過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在某些機關擔任工作，後來又聽

說他放棄了政治生涯投身金融界。我早先所知道的亞民就不過如此而已。他在中國銀行任事的時候，我也正在上海工作，彼此雖同在一地，但難得相遇。在足足十年以上的時間中，我祇去過他愚園路的家一次，可見在抗戰以前，我們間的交誼是尋常而又尋常的。

二十六年冬，國軍在淞滬地區苦戰數月之後，逐漸向後方退却，上海市遂全部陷於敵手。就在這時候，自動的爲「急國家之急」不約而同紛紛奔向後方的人頗爲不少。事有湊巧，由上海到香港我和亞民竟不約而遇的同在一艘法國郵輪上，但在船上我們也並未多接觸，我只知道他是隨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港，他也知道我是要到內地去。

到香港的第二天，出乎意外的，亞民突然來旅舍看我，他開門見山的說，廣州四郊需要做工事，他已把戰前我在上海所做有關軍事工程的工作告訴了宋子文先生，因此宋先生希望我能同去廣州一行，並且當晚即須啓程。我表示，我和資源委員會已有約在先，去了廣州還是要去漢口的。彼此有了這個了解，我就隨宋先生一起到廣州，同行除亞民和宋先生的秘書一行外，還有我初次遇到的何世禮將軍。

由廣州歸來，我雖去了漢口，但亞民傳達宋先生之命，一再電催，要我再去廣州，我得了資源委員會的同意，便又回到廣州。我自上海撤退後，工程方面的幹部早已星散，成了光桿一人，但經不起宋先生和亞民的督促，不得不負起責任，協助廣東軍事當局，由增城以至廣州之間，做了一道防線。當時從許多方面來看，認爲這是一條相當堅固的防線，可是在敵人登陸時，我們的軍隊竟不曾有所利用，實在太可惜了。我之所以特別提這件事的目的，只是爲記我和亞民的交往，從那個時候起才真正的開始。

抗戰初期，軍事失利，不得不一步一步的後撤，自上海南京相繼淪陷約有半年光景之後，廣州也失守了。所幸長江方面，敵人雖是開始進逼，但爲勢不猛，而香港這一彈丸之地，由於太平洋戰事尚未爆發，猶能瓦全一時。其時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大部份的人都留在香港，但後方也需要有人駐守，更需要有一位高級人員主持其間，這份工作就落到亞民身上。他對於這種方

面，向來是「赴義恐後」，從不推辭的。

二十七年三月間，我已在資源委員會正式工作，亞民也來到了漢口，這樣彼此見面的機會就更多了。他豪於飲，而我也同好，但我們喝的多數是啤酒，有時也喝一點白蘭地，完全學西洋人喝法，以把盞品酒爲樂，因此從不酩酊大醉。有一天晚上，月色很好，我們兩人沿着江邊走，先在一家酒店，不知不覺已喝到打烊時分，而興猶未盡，於是又換一家再飲，可是像這樣的回數並不多。亞民後來遇到內子懿凝時總喜歡開玩笑的說：「如果當時你知道君怡有這樣一個朋友，相聚就是喝酒，必以爲此人是一個不可救藥的酒徒無疑了」，說罷便一聲哈哈大笑。亞民善談笑，談話時尤喜出聲大笑，他的笑聲宏亮而自然。我書至此，這笑聲彷彿又縈繞耳際，爲之黯然。

我們雖常在一起喝酒，但大半是借酒談心，上下古今，無所不及。當時雖抗戰才開始，但我們竟已是十分起勁的在討論戰後問題，這樣愈談愈感覺它的重要性。先則以邀約相熟的朋友舉行座談會方式交換意見，每次的座談會中亞民從不缺席，並且貢獻意見甚多，浸而至於共同發起了中國經濟建設協會，時爲二十八年四月。我現在從該會創立緣起中摘錄如下一段文字：

「國家之經濟建設，必須根據政府國策，權衡輕重，製爲整個方案，列舉各部份應行致力之工作及其程序，乃能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方案既定，全國上下再一致認清共同目標，各就其範圍與所負之使命，分工合作，悉力推動，如是始可發生偉大效率，是即所謂計劃經濟原則。違反此一原則，必致各部份間，或步調不齊，或輕重倒置，結果未有不支離破碎，同歸失敗。試觀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我國沿江沿海一帶僅有之經濟建設事業，頓呈紛崩離析狀態，對於抗戰方面未能作有力之貢獻。前車既覆，可爲殷鑒。今者戰事方殷，所謂經濟建設工作，一時固無從說起，但一旦戰事結束，凡有關國民衣食住行等各種經濟建設之復興工作，必須立即推行，方可減少民生疾苦，臻國家於富強之域。然則我人應如何確定最合理之共同目標？如何根據目標決定各種經濟建設應辦之事業及其程序？如何使各部份間相互諧和步調一致？換言之

，如何規定一種適合計劃經濟原則之具體方案？要當未雨綢繆，作充分準備。」

還有一段關於中國經濟建設協會工作方針的文字，也值得介紹，摘錄如下：

「經濟建設進展之遲速，基於一國之科學基礎。我國以往建設事業，往往名不副實。最大病根，即在一方面科學基礎太薄，一方面看事太易，求效太急。今後務宜以全力提倡科學，培養人才。於擬具計劃時，則必須注重切事，不求速成，務使內容完備，適合實用，凡所提供之方案，無不確有把握，均能見諸施行。萬一格於或種原因，計劃內容不能完備，則不妨先將其大綱擬定，以待日後之補充，若併此不能，則寧缺毋濫。」

「我國人才經濟兩皆貧弱，大戰之後，必將更見其不敷應用。本會主張，不但經營不宜有分文之虛糜，即工作亦不宜有絲毫之重複。本會同人甚願以在野之資格，奔走聯絡，不標榜，不掠美，務使各方面於無形之中，互相聯繫，互相呼應，以實現分工合作之目的。一旦國家從事大規模之經濟建設，有此基礎，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本此宗旨，本會竊願以全力與各機關、團體、以及個人，取得密切聯絡，不求功自我成，但願為國家經濟建設樹立一小小基礎。」

以上文字雖不是出於亞民之手，亦非一人之言，但若論亞民對國家建設的抱負，亦由此可覘一二。中國經濟建設協會當時的會員份子，有經濟學者、工程師、農學家、及其他各種專門人才，他們經常分組討論。二十九年十月將各組討論的結果，編成一冊「中國經濟建設綱領初稿」，以喚起朝野各方的注意。這件事雖由我總其成，但自發動以至於脫稿，亞民實為贊助最力之一人，也可以說，他是中國經濟建設協會少數核心人物中之一。他對戰後經濟建設的重視和熱心，我是最清楚的。

這樣我們長時期的共同談心談志，交誼便愈來愈深，久而久之，彼此更是無所不談。有一件事我再也沒有想到的，原來在國民革命以前，亞民竟曾參加過軍隊，在西南一帶打過仗。他講到他個人那種傳奇性的軍中生活，怎樣打仗，又怎樣打了敗仗，怎樣一溜煙的散夥，總是說得有声有色。又講起後來赴美留學，半工半讀，當過侍者，洗過碗盤，也是敘述得頭頭是道。

及至由國外學成歸來，他和當時一般的留學生一樣，進了機關做事。首先在建設委員會，主持人是張靜江先生，那是國民政府初期富有朝氣的一個機構。靜江先生見解超人，頗想有所作為，網羅了許多有志氣有抱負的青年，因此建設委員會為時雖不長，着實有不少表現。不久，靜江先生轉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建設廳長是程振鈞先生，亞民是他的主任秘書。亞民以何種淵源做他的主任秘書，我不得而知，但據當時一般人的說法，廳長職務由他代行的時間居多。欣賞他的人說他肯負責，但批評他的人說他做事霸道。大概在中國官場中，這一類的批評是想做事，肯負責的人最容易受到的。在我看來，這與其說是詆毀，毋寧說是對亞民的讚美。

對亞民說來，他既已投身行政機關，何以忽然又從頭來起，一轉而進入銀行界？這實是一件極不尋常的事！我和他接觸既多，才知道他這一改行絕非偶然，而是出於有計劃的行動。亞民曾和我談起當他在行政機關做事時，不免與金融界有所接觸，常常為推動事業得不到金融界的同情與贊助而深有感觸。在他心目中，任何事業的培養滋長，金融界的扶持絕不可少，於是決心放棄在行政機關已有的經歷和已得到的地位，試向金融界去自動投効。事有湊巧，當時中國銀行的張公權先生，正在不遺餘力的網羅人才，凡所引進，均為一時之選，亞民就在這時候進了中國銀行。他後來做到副總稽核、總稽核，但並不是一進去就是這樣高的位置，其間經過，以前在中國銀行的朋友知道得遠比我清楚，毋須我在此贅述。總而言之，他是有計劃，有所為而加入金融界的。至於亞民進了中國銀行以後，由於他能力的過人，見解的不凡，立即受到許多人的器重，張公權先生以外，汪楞伯先生就是最賞識他的一個人。楞伯先生是當時中國銀行的總稽核，他從清末的大清銀行以至於後來的中國銀行，一生盡瘁行事，是一個奇人，是一個博學多聞極可敬佩的人。我在重慶時，很和他談得來，知其為人公正，能識人，好讀書；至於善談，喜談諧，尤其餘事。楞伯先生一日和我閒談之餘，忽然月旦到他的許多同事，他獨讚美亞民有政治頭腦，能見其大，許為中行最最傑出人才。這是楞伯先生親口和我說的。我今借用其言以作對亞民的評語，我想比什麼都來得適當。

記得亞民自己不止一次的說，銀行賺錢，做點「散錢」的事理所應當，尤其國家銀行與一般銀行任務不同，若都是一孔之見，專打小算盤，與錢莊何異？他抱定這樣的宗旨進入中國銀行，因此他常常自比為替銀行散錢的人。

亞民進中國銀行以後，對銀行本身和對國家社會的種種貢獻，我所知者遠不及許多以前在中行和他共過事的人。我與其隔靴搔癢，不如選擇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略作敘述，以見亞民見解不同凡俗，做事大刀濶斧之一斑。

我要說的是亞民一手推動的甘肅水利林牧公司。

那時正值抗戰中期，甘肅省政府改組，中央以谷紀常先生為省主席。谷先生約了張心一去當建設廳長，張心一甘肅籍，習農，一向在中國銀行辦農貸。亞民不知怎麼想到開發西北農田水利的重要，於是他便想到了我，又恐我不肯去西北。抗戰時期，一般人心理，在香港的人怕到內地，以為內地生活太苦，在重慶和昆明的人，又怕到西北，以為西北生活更苦。所以亞民先不來說動我，只說我們一道去西北看看何如？我對旅行素感興趣，華北和西南都已見識過，還沒有到過西北，便欣然答應。遂於三十年四月初，由重慶啓程，同上征途，彼此都是第一次去西北，因此格外興致勃勃。

我們由重慶出發，過內江，而成都，而廣元，這時的「蜀道」已都是平坦的公路。一路名勝古蹟，處處與三國故事有關。不管是真是假，我們登上了據說就是當年諸葛孔明演空城計的城樓，這地方如今確只剩了一座空城，此外也視察了馬謖擅作主張紮營的山頭。亞民對平劇一向興緻極濃，他的嗓音宏亮，氣由丹田，唱來也很有韻味。因此每到一處，即使聽眾就祇我一人，他必定即景生情地要來一下響遏行雲的獨唱。

我們一路行去，越秦嶺，經天水，到了蘭州，見過谷紀常先生以後，甘肅省政府很快就和中國銀行決定了甘肅水利林牧公司的組織，我也就無法推辭的接受了這一份開發西北的工作。在今天事後想來，當時我們對美國的 TVA 並無任何印象，甚至連 TVA 的名字國內尚很少

有人知道，但這個抗戰時在西北創立的甘肅水利林牧公司却具體而微的有點 T.V.A. 的性質，因為它也是一個區域性的多目標開發計劃。這個構想可說完全出之於亞民，而當時的中國銀行竟肯幫助地方投資於這一類無利可圖的事業，非有遠大眼光若亞民者在幕後全力策動，是無法實現的，只此一端，已足夠把亞民的偉大刻劃出一個輪廓來了。

我和亞民三十年的交往，彼此言志之餘，他還關切到我的生活。他知道我做了幾十年的公務員，無擔石之儲，直到大陸淪陷後任職聯合國十餘年，才稍稍有了點積蓄。但他還是一直替我擔心，因為他很清楚我的經濟狀況，和我從聯合國未屆退休所能獲得的那筆極有限的退職金，而更知道我是一個最不會打算，最不懂理財的人，於是他不憚其煩的替我多所策劃。像這樣關心體貼的朋友，在我一生中所遇到的，除亞民外，還沒有過第二人。

書至此，我必須說出我內心對他負疚的一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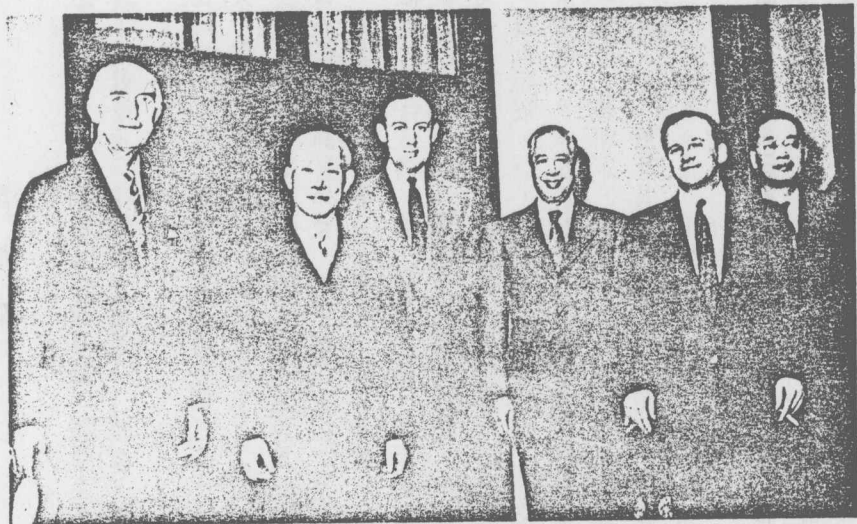
當時我在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所辦的各種事業，均有賴大量投資，而水利更是替政府背上了一个包袱，無利可圖。公司非機關可比，必須自給自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再加應付人事，也難免有令人很不愉快的時候。某次我由蘭州來到重慶，就把亞民作為發洩牢騷的對象，借酒遮臉，大發其脾氣。他非但不怪我，並且耐性子的聽我，最後才帶笑的問我：「罵完了沒有？罵够了沒有？」如今事後想來，我如此缺少涵養，實在對不起這位老友！

亞民對我回臺以後，在我那塊早於數年前買好的地上造一所住宅的計劃，自始至終是反對的，他再三勸我不聽。及至房子造成，他還是建議我，不如把它賣掉，他說一定可以把本錢收回而有餘，我又不聽。他只是搖頭，因為他知道我在這件事上，至少要耗去大部份的積蓄，他認為這種不事生產的做法，實在太無算計了。他曾苦笑對着我說：「這個不聽話的孩子，真拿你沒辦法」。後來他把我的餘款，替我作了一個精密的計劃，我這幾年的生活，得以無慮，我不能不感激亞民給我的安排。

五十一年九月，在亞民返美前一日，我和懿凝赴其寓所，作長時間的促膝深談。他帶上了

老花眼鏡，拿出了一些參考資料，又不厭其詳的給我們二人上了一課「經濟學」，但覺仍不能使這兩塊頑石點頭，便歎息地說：「我已盡我所知的說了，以後應該你們自己來用點心了！」臨行珍重道別，原望他早去早回，那知他返美不久，宿疾復發，終至不治。天不假年，哀哉！

距亞民去世的第二年，適以事去華京，某日下午我負着沉重的心情，捧了一束鮮花，專誠去到他的墓地。那地方是廣大無垠一片芳草如茵的空野，周圍環繞着漠漠平林，隔絕了外邊的塵世。經過一處處疏疏落落平臥在草茵中的墓碑，仔細尋覓了好久，才發現有一處隱隱露出尺餘見方的一塊銅碑，近前一看，見上面鐫着亞民兄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撫摩着，久久不忍離去，嗚呼！這就是胸懷壯志，一生肝膽待人，我的好友長眠之所，痛矣！



陳副總統接見世界銀行技術團 四十八年三月隨

我與霍亞民兄

譚 伯 羽

亞民兄既逝之第五年，其夫人徵文於其友好，思有以紀念之。亞民兄爲國宣勤，建樹至多，卒後蒙 總統明令褒揚，平生功績，自將傳諸史冊，茲就彼此交往情親，追述一二瑣事，以報亞民夫人之命。

余與亞民兄訂交雖晚，相知則深，彼此初識在民國十九年春，時德國實業考察團抵華，余以任同濟大學秘書長之關係，得參加招待，比到南京，復承當時浙江民政廳長朱騷先兄之招，偕內子到杭州，參與游宴，時張靜江先生主浙，亞民兄代長建設廳，在其報告浙省建設施政時，係在一廣場中，亞民兄披黑呢斗蓬，長身玉立，口講指畫，神采煥發，內子顧謂余曰：是真美男子也。此後相晤，屢爲亞民兄言之，一笑而已，此爲余二人之第一次相見，數日酬酢，寒暄而已。彼一口鄂音，初亦未知其爲粵人，嗣後以職務不同，人各一方，遂相隔絕，迄至民國三十一年春，珍珠港被襲及香港淪陷之後，余時任職駐德使館，以中德絕交，撤館抵美，奉命暫留服務於宋子文先生主持之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不久亞民兄亦由重慶奉調而來，彼此始重晤於華盛頓。余初次到美，不嫻英文，工作單純，頗多閒暇，亞民兄到後，相處日密，締交蓋始於此。是時同僚除王孝華、楊汝金、梁定閩、朱世明、尹仲容諸友已先後逝世外，有宋子良、劉景山，胡世澤、譚紹華、朱光沐、江星初、李邑均、韓朝宗、崔存麟、蕭信如、莊莘儒、顧憲祥等，均一時才雋之士，正如亞民兄常笑謂「有了這一般寶貝，怎會不熱鬧呢？」的確當時公餘之暇極盡交游之樂，亞民兄以其和藹之性情，瀟灑之風度，有彼在場，倍形融洽，余記憶所及有兩事值得一述：

一爲當時日街之中興樓爲余輩中午聚餐之中心點，英文名Wings Restaurant店主爲王「其彌」，彼時而老闆，時而茶房，全視其於番攤開皮席上之盈虧結果何如耳。亞民兄初到之後在 此午飯席中曾爲我輩詳述香港淪陷時之情形，如陳策之獨腿渡江，黃伯樵夫婦隱居誦佛，及吳

蘊初之得電而獲幸免等等，說來有聲有色，可歌可泣，是時余與尹仲容、沈壽宇諸友正以心金韻聯句，得聞其故事，悉入題材，余挽仲容詩中有「華京曾下榻，金韻尚連篇」之句，即指此也。二則是時我國駐美軍事代表團由熊式輝團長率領，亦抵華府，徐培根、金岱峰爲團員，可惜王受慶廣病死於途中；熊天翼到後，下棋之風大熾，於時過從頗仍，茶餘酒後，時間爭車奪子之聲，亞民兄有時旁觀，輒以指敲桌面，哼其「我本是臥龍岡……」也。是年十月，宋公飛渝，主持外交，亞民兄隨行，余次年春亦奉命返國，服務經濟部，兩人雖復同處一城，然戰時內地生活較苦，工作亦繁，中國銀行疏散於郊外之玉靈洞，時一相聚，無復華京杯酒流連之樂，而抗敵方殷，亦無當時興致矣。

勝利之後，余奉命赴漢口北平工作，亞民兄亦奔走東北，旋復去粵，及至大陸淪陷，余以病軀展轉經歐抵美，任國際貨幣基金中國代表。亞民兄亦到華府，任駐美技術團團長，辦理美援事宜，旋改爲駐美大使館公使銜經濟參事，復得舊地重逢，然兩人俱過中年，家國流離，神州待復，惟嘆舊遊之難再，無新勇之可鼓。四十八年亞民兄又以陳辭修兄之敦勸，返臺組織中華開發信託公司，此亦即亞民兄一生最後對國家之大供獻。於是兩人又復分開，但亞民兄同時兼任國際貨幣基金中國之副理事，每年一次之理事年會，得來出席參加，作短時之相聚，最近數年，相見之餘，多談病情藥理，互勸止酒戒煙矣。迨至民國五十一年，亞民兄以中華開發公司業務，再度來美，健康大不如前，雖未龍鐘，已呈蒼老，是年冬後，便已病發，不料未及數月，竟致不起，在此就醫期間，雖醫囑靜養，而彼急欲返臺，拒絕割治，出入病院者屢，終致施手術後已無可救，余是時除返臺述職月餘外，時去探視及勸慰，或被邀談，或電話詢問病狀，是以對亞民兄彌留前之病情，頗爲詳盡。茲以遵亞民嫂之囑，寫此回憶，乃翻閱是年日記，茲將其中與亞民兄有關者數段，節錄於下，以存其真：

五十二年一月五日……霍太早來電話，謂亞民兄近來心弱氣促，醫囑靜養一禮拜，十六日飛臺北，似不可能，恐須退機票云。到會得靜波電，「仲容以肝炎入院檢查，醫囑靜養，

假須長久休息，則基金三月中之商討會議，須商量改期云云，聞之不怡，今日一天同時聞兩友病也。……

二月七日……崔存璘來談，亞民病，乃知每日抽肺脇下積水千餘cc，病狀不可樂觀，而彼尚欲返臺，望得辭修來一慰電，囑其安心靜養，即允之，電託靜波代呈……

二月八日……得辭修慰問亞民電，即請榮蔭送醫院……午後榮蔭由病院返會，帶來亞民交柏園致其信，謂心洽已謝卻臺灣銀行總經理之職，仍留開發公司云云，是不以祿位背友，於公於私，俱至善也。霍大高興，吾亦爲之一慰，因去心洽書，恭維之……

二月十五日……午三時到醫院看亞民，彼已起坐，精神較好，自言醫疑肺中有瘤，主張開視割去；又言彼急欲返臺，了當開發公司之事，又云只望能再活兩年，見其兒子入大學，如願即足，故不願施手術云。余從各方面唯否立場爲言，主張多找醫生，再加考慮，勿遽作決定，談五十分鐘出……

二月十八日……得辭修十一日發書，述及亞民之忠誠，再囑勸其靜養也。夜呼霍太問病情，云恐無多希望，只有從其意志，盡忠報國，死於國土矣云云，則彼不肯開刀，仍欲飛臺也……

三月三日……今日禮拜，午飯後到「博士」醫院看亞民，邀我去談也，以其致林柏壽、徐柏園、俞國華諸友信示我，意在因病不能即歸，請辭去現職，擬請將心洽真除，吾謂因病請辭，在彼自出之正當，然國內未必照准，總以靜養爲宜，不必堅持也。復告又有積水，但不甚多，醫生主張施一小手術，探視脇骨下情形云云，安慰久之達一小時乃出，是已同意施手術矣……

三月五日……霍太呼，醫生已決定今午爲亞民施手術，啓視患處如可割即割云，……午後三時半，霍太呼告亞民脇間之瘤，因不在肺中，已取出，經過良好，須十餘日休息云，託代電告臺北……

三月十六日……霍太告，亞民尚有積水，人極倦，非好消息，爲之不寧。夜霍太電話，方由醫院還，亞民今日好多，似去水之故，人尚清楚云，爲之稍慰，吾明日離此飛臺北也。四月廿八日……昨日回華府，午去看亞民，瘦弱益甚，坐談臺北情形，彼望心洽能於今年會前一來也，看其談話，至爲費力，十分鐘即辭出，與其夫人立談，云看能拖幾個月耳，可傷。……

五月九日……早霍太呼，亞民昨晚已送入附近之「茜不勒」醫院，約十一時半去看之，寫君怡信，告霍病危矣。如時到院，亞民正醒，入談，告我入院招呼較便當，餘不甚清楚，以鼻中塞養氣管，醫來量血壓，乃握手而別。與霍太立談門外，言醫生佩其毅力，尋常人至此，早已不支云，醫生只假以七八天之生命也！……

五月十二日……九時霍太呼，則亞民兄已於今早四時去世矣，爲之愴然，固知其不能久。又未料如是之速也。電話榮蔭，發臺北電報，午後訪霍太於家，美參議員鄭友良在坐，與霍太有感誼也。霍太告，昨晚八時起，亞民即呼吸困難，至今早四時便長逝矣。……

五月十三日……明日霍葬，我被邀「捧靈」，余以病足病背，未能舉重，只能隨行執紼也。崔存磷電話，霍太請我說話，并宣讀 總統及副總統唁電，及代家屬答謝云，吾自應之。

五月十四日……九時換黑服，與內子乃麗到Bethesda Methodist禮拜堂，參加亞民兄喪禮，宋先生及貝淞孫輩由紐約趕來，與余俱爲名譽扶靈人，蔣廷黻與使館同人及外賓來者甚多，如鄭友良與 Hornbeck 老大使輩亦到，十時許，牧師引我同上臺，宗教儀式畢，我以中文致詞，首宣讀 總統副總統唁電，及代表家屬致謝，繼略述其病榻所談，斤斤以開發公司事務爲念，尤以未能回臺及不及見其子成立爲憾；彼一生謀國之忠，待人之厚，處事之誠，無以復加，至足風範。最後勉其子寔，發憤勤學，以慰在天之靈，言未畢，傷感已甚，至泣不成聲。……

今日重讀，不禁泫然，不忍再寫，於是擱筆。

記亡友霍君亞民

姚崧齡

霍君逝世後四年，其夫人邱真藹女士將狀述君之行誼，刊冊紀念。諗余與君交遊共事有年，囑爲文以記經過。余不文，然義不容辭。

余與君相識，早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九月。余時肄業美東費城之彭雪佛尼亞大學研究院。君適至自美中，就學於約翰孫教授 Professor Emory Johnson。約翰孫教授，當時運輸學之權威也。一日余與君相值於大學附近之「客興樓」餐室 Kessinger Cafe，互道姓名，自我介紹。兩人均操川鄂方言，交談至愜。君身長鶴立，儀表雋雅，態度和易，令人一見如故。君自費留學，須恃餘暇勤工助讀。平時彼此不數見。見則必長談。恆相與縱論國內外局勢。各人所學，及將來出處。廢寢忘倦，每至深夜不稍休。君早隸國民黨籍，亦時談三民主義，顧未嘗以入黨爲勸。

民國十六年秋，余由美經歐，返抵廣州，任教中山大學，賃居永漢南路八和坊。時回國同學如何孟吾、朱公亮、陳欽仁、廖芸泉諸君、嘗主余寓。君不久亦來羊城，任建設廳秘書主任。舊雨欣逢，嘉會頗多。無何粵局轉變，共黨暴動，諸友星散。余既轉桂，君亦赴寧，應張靜江、曾養甫兩先生之招，參加建設委員會。余因與君相違者二年。

民國十九年元月，余新婚南遊。君適任浙江省建設廳秘書主任，兼攝廳務，因邀留杭相助。期以六個月，爲釐訂建設廳及所轄機關之會計制度。於君在浙施設，得以粗知梗概。其績效之昭著者，莫若籌築杭江鐵路，興建杭州電廠。至省境各公路之接通，內河航運之整理，亦咸能實收疏通貨運，方便行旅之利。是年秋，余離杭北返，君亦移長新成立之農礦處。雖任期不長，顧於浙境鑛藏之探測，茶絲產銷之改進，塘工之飭修，長興煤鑛之整理，莫不實事求是，同時并舉，亦均各具端緒。次年初，浙江省政府改組，君回建設委員會任業務處處長。

君之重返建設委員會也，對於舊管事業，如威士堰電廠、首都電廠，因其本身已有收入，

遂憑以向銀行商借款項，購置器材，進行擴充，增加發電，推廣供應。同時策劃京蕪鐵路之展築，淮南煤礦之增產，使路礦合作，提高營業收益。逮君任職中國銀行後，仍繼續導致行方資力，對於上述事業，畀以協助，使其基礎，日臻鞏固。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君加入中國銀行，任總管理處業務管理第一室分區稽核。時中行業務，範圍擴充，總經理張公權先生正羅致人材，參加國內建設。而君亦認爲政府所轄生產事業，如與金融機關合作經營，完全企業化，不受政潮影響，當能於安定之中，獲得進步。遂因金君潤泉之介，結識張先生，而加入中行。金君中行杭州經理，君在浙時相識者也。

君服務中行，歷時十有七年。卸職後，擔任中行董事者，又四五年。由分區稽核，副總稽核，總稽核，而代理副總經理。名位梯進，權責亦隨之加重。而君所以效力於行務者，亦踴躍其忠誠智慧。所遇首長，不下六七人，均與君素乏淵源。共事之後，知君廉幹，而成深倚賴。君既以事業爲前提，每有論列，立場堅定，從不依阿取容，退有後言。對於同列，和衷共濟，對於後進，鼓勵提携，人皆樂與接近。其所策劃助成之事業，如浙贛鐵路，江南鐵路，杭州電廠、首都電廠，漢口既濟水電公司、中國物產公司、中國汽車公司、淮南煤礦公司、雲南錫業公司、昆明裕滇紗廠等，均關係國計民生，抗戰建設。所收效果，自有公論。至其功成不居，爲而不有，無絲毫自利企圖之風格，尤足範世。君代表行方擔任各種事業之董監事職務，爲數不下十餘。所得公費，悉收行帳。事雖瑣細，亦以見君取與之分明。

民國二十三年秋，閩變發生，爲策福建境內行產安全計，行方檄君入閩，督導應付。君駐福州數月，對外折衝，對內指示，無虧使命。抗戰軍興，政府成立四國家銀行聯合辦事總處，統籌戰時金融。四行首長，例須按時出席會議。會議在渝舉行，正值敵機不斷狂炸，人多趨避。君銜命代表出席，毫無游移。太平洋戰事爆發，宋子文先生特電召君赴美，協理中國國防公司，及美援諸事宜。君奉命即行，事竣而返，曾不吝情去留。抗戰結束，行方籌劃復員，當時有資格任經理之人，咸爭赴滬、寧、津、青，從事接收。君獨願以總稽核名義，率領行員，前

任東北，規復行務。時蘇聯業已進兵，中共正準備篡奪，危機四伏，形勢緊張。君毅然北上，直抵瀋陽，成立分行。復在長春、哈爾濱、大連等地，籌設機構，預備開業。轉瞬局勢驟變，前功盡棄，終於撤回關內。君嘗言畏難避害，人之常情。然徒自圖其極安，而予人以至危，則天下事，將一無可爲。余之所以追記斯言者，示君之行不違言而已。

君奉命接替蔣廷黻任行政院救濟總署署長，時爲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余適出國，不知詳細經過。惟當時各方對於救濟物資之分配，爭奪至烈，尤以共黨爲最。終君之任，不聞對於分配問題，引起外間非難，亦難能己。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政府發行金元券，任宋子文爲廣州區經濟督導員。宋氏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特約君駐穗，協助督導工作。君以廣州密邇香港，管制過嚴，不啻爲淵驅魚，且將影響僑滙，啓僑胞反感。主張採取溫和手段，寓懲於勸。結果廣州市面，比較安定，民間仇視當道心理，亦不若京滬一帶之深。

民國三十八年底，君辭卸中行代理副總經理職務，時大陸已全部淪陷。惟中行董事長宋漢章先生仍囑君以董事資格，赴倫敦一行，視查當地中行業務。抵英後，知英將承認中共，遂即離英轉美。旋奉政府命令駐華盛頓，擔任中國技術團主任，接洽美援。嗣復兼任國際貨幣基金中國候補理事。四十八年籌備中華開發公司，尋任公司總經理。余時退職，寓居紐約。惟君因公往來臺北華盛頓，道經紐約時，輒邀往旅館，共進早餐。余既退休，於君工作，殊少聞問。彼此晤面，話舊而已。君宿有胃病，後兼患心臟衰弱。

民國四十五年初，曾因心臟病，臥床經月。故晤談時，常以戒煙、止酒、節勞爲勸。君於五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來余寓晚飯，自謂煙已戒絕，酒亦涓滴不入口，惟勞最爲難節。終席談笑甚歡。因小兒柱侍坐，特詳詢其在溪港研究所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工作情形，并問如願遊臺，當任居停云云。精神興趣，一如往昔。不意此一聚會，竟成永訣。

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君原擬飛臺北，處理開發公司事務，尋感不適。經醫生診斷後，認爲病情複雜，不宜遠行。繼又發現肺癌，多方割治，迄無起色。時其女公子雲，常由電話，報告

病況，余已深慮其不治。四月二十二日，余與內子特赴華盛頓探視。見君神智雖極清楚，但飲食困難，體重大減，病勢極爲沉重。余坐床前，君堅握余手，眼淚盈眶，似已自知不起。因謂四十年來，服務國家，未嘗一日爲身家謀，自問無愧無作。又謂開發公司，付託得人，深以爲慰。余不願其談話費神，除空言安慰外，即興辭而出。當承邱夫人告以最近醫藥經過。均感病勢如此，康復不易，相視流淚而已。次日余將各情，函告張君心治。張君原屬中行同事，時任開發公司副總經理。由其商得公司董事會同意，對於君醫藥各費，滙款接濟。五月十二日晨，接華盛頓電話，驚喜君竟於是日清晨二時，在華盛頓醫師醫院，與世長辭。蓋後以病勢加劇，復由家中移住醫院也。十四日晨，余由紐約飛往華盛頓，參加執紼。當日經過，曾函告張君。茲節錄如後：

「……亞老復入醫院，延至本月十二日清晨二時，遽捐館舍。噩耗傳出，當早達尊聽。從此朋輩中，少一眞摯良友，世界缺一正人，國家弱一忠蓋幹員。此固不僅區區友誼之痛悼。十四日晨，弟由紐約飛往華府，參加執紼，謹向故人，致最後之敬禮。上午十時，在白城美以美會教堂 Bethesda Methodist Church 舉行追思儀式。禮畢由譚君伯羽代表家屬致謝辭，并宣讀蔣陳二公唁電。末述亞老遺憾兩點：①未能目及大陸光復，壽終國門，歸葬首邱。②未能親見獨子升入大學。十一時出殯，十一時半抵達墓園。下壙時，天色轉暗，大雨滂沱，眞有天人同悲之慨。前往會葬者，不下二百餘人。本國蔣大使廷獻，美國國會華裔鄭參議員友良、宋前院長子文、貝前總裁淞孫，均在執紼之列。」

君諱寶樹，亞民其字也。原籍廣東新會。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出生於上海。民國五十二年癸卯（一九六三），卒於美京華盛頓。享年六十有八歲。幼時母教特嚴。偶與隣童賭博，輒痛遭夏楚。終君之身，對於賭博投機，不感興趣。晚年與朋輩作橋牌消遣，然絕不博金錢。辛亥光復，曾從軍重慶，參加革命。嗣入安慶某教會中學肄業，旋轉學上海聖約翰書院。赴美前，服務於漢口粵漢鐵路局，深得主管器重，於其出國留學，多所協助。君弟寶椿

，亦嘗供職路局，對君留學費用，亦多接濟。此皆君平時學以相告者也。從知君少時，苦學奮鬪，不爲環境所困，卓然自立，實非偶然。接世後，絕無門蔭可恃，復乏親故奧援，所憑以與當世賢豪相週旋者，個人人格與能力而已。余入中行，後君兩年，實由君介。相與比案削牘者，先後幾十年。抗戰期間，同寓重慶牛角沱及玉靈洞中行宿舍，共晨夕者，亦四五年。君長余五歲，常以老弟呼余。君在中行地位，恆超余一級。商討行務，彼此不拘形跡。有時意見不同，難免齟齬，事過輒忘。君廣交，而余孤介。君豁達，而余褊急。君喜熱鬧，而余樂冷靜。個性不同，并不碍友誼，不妨公事。相處逾久，氣誼彌深。君早歲奔走四方，後則努力事業，鮮暇讀書。人恆以此短君。至譏其少書卷氣，缺乏文化素養。然君管理事業，固極尊重專家意見，對於敦品勵行之通人學者，靡不衷心敬佩。不伎不求，既無自卑感，亦從不妄自尊大。惟絕恥附庸風雅，標榜名流。家中既無古玩名畫之陳設，亦未見列挂時賢墨寶，或要人玉照。此則凡與交往者所共鑒。君於交友用人之際，存心忠恕，常明於知君子，而暗於辨別小人。有時不免爲人利用，或遭反噬。後雖知之，亦不計較。

君於民國二十年夏，與邱真蕩女士結縭於上海。嗣邱夫人以康健關係，易地療養，居住牯嶺。君獨留上海，每月必抽暇一往探視。伉儷感情，久而益篤。勝利後，邱夫人在重慶舉一男名霆，時君已年逾五十。朋輩齊爲君夫婦慶，而君亦極感欣慰。至於飭內行，篤倫常，此則有教養之人，固當如是，不足爲君多也。

再記亡友霍君亞民

姚崧齡

關於亞民行誼：我在「記亡友霍君亞民」一文中，業已分別敘述。惟覺言有未盡，茲特補記數事如下：

亞民在幼年時，因受嚴格母教，不許賭博，故終其身，對於投機取巧，絲毫不感興趣。民國二十一年以後，七七抗戰開始之前，上海的證券交易，十分活躍。一般在金融界稍有地位的人，難免不利用職業上的方便，多少做幾票買賣，藉以調濟個人的開支。有些人，因廣置姬妾，生活奢侈，更不能不大做特做，多賺點錢，以供揮霍。但亞民在中行服務的十多年中，我確知他從來不曾做過這類投機的買賣。他當時雖無權力禁止同事私下投機，但對於投機的人，總是十分鄙視，而盡量的避免接近。他一家的生活費用，全仗每月不到國幣五百元的薪津收入。有一時期——將近三年——他的夫人住在牯嶺療養，醫藥等費，開支很大。同時還須不斷寄錢奉養他的太夫人。在此情況之下，他祇得盡量節約，計入爲出，勉渡難關。在那幾年中，他不曾添製過一套新衣。經常穿的一襲西裝，雖然熨得筆挺，但是袖口早已牽絲挂線。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他並不憂貧，也從來不曾謀劃過他個人生財的捷徑。

他常對人說：「以服務國家社會爲職志的人，只要努力自愛，決不致有凍餒之虞。薪金收入，總可勉強維持一家溫飽。當然生活不免清苦一些。」他是一個無發財慾望的人。他最大的志願是將銀行聚積的錢財，用在生產企業上，因而增加社會一般的福利。他認爲運用銀行的錢財，而收到造福社會的效果，對於他個人心理上的滿足，實與使用他個人的錢財所得到的滿足，并無分別。這些話的意義，當然卑之無甚高論。但他卻是向着這個目標去做。確也做到不少。所以我說他是一個「行不違言」的人。他的想法，很像美國羅斯福總統任內的商業部長霍布銜 Harry Hopkins。個人并不會賺過大錢，但是能替有錢的人，將他們的錢，用到極有意義的去處。

有人常說他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這在謙退的他，并不否認。不否認自己沒有學問，總較瞎吹自己是學人，是專家，是名流，不獨誠實，而且漂亮。美國許多大企業的主持人，經常有人問他們有無博士學位，他們的回答是：「十分慚愧，個人并無博士頭銜，但是手下確有不少有博士頭銜的學者專家，幫助我工作。」亞民在所推動和助成的許多事業中，推薦專家，遴選幹材，便具有這樣的風度。他推薦杜鎮遠、侯家源籌築杭江鐵路，推薦潘銘新、洪傳綱、尹仲容先後創辦杭州電廠，整理首都電廠，既濟水電公司，推薦洪書行、周賢頌、吳競清、程韋度主持江南鐵路和淮南煤礦，就是很顯明的例子。抗戰期間，對於中國汽車公司的陳篳霖、吳新炳、蘇樂真，對於雲南錫業公司的繆芸臺、秦慧珈、陳大受，莫不推誠接納，聲應氣求，使所有事業，表現良好成績。上述諸君，既皆係各業專家，而他能與之從容周旋，推重倚賴，合作無間，這便是他的學問，也是他的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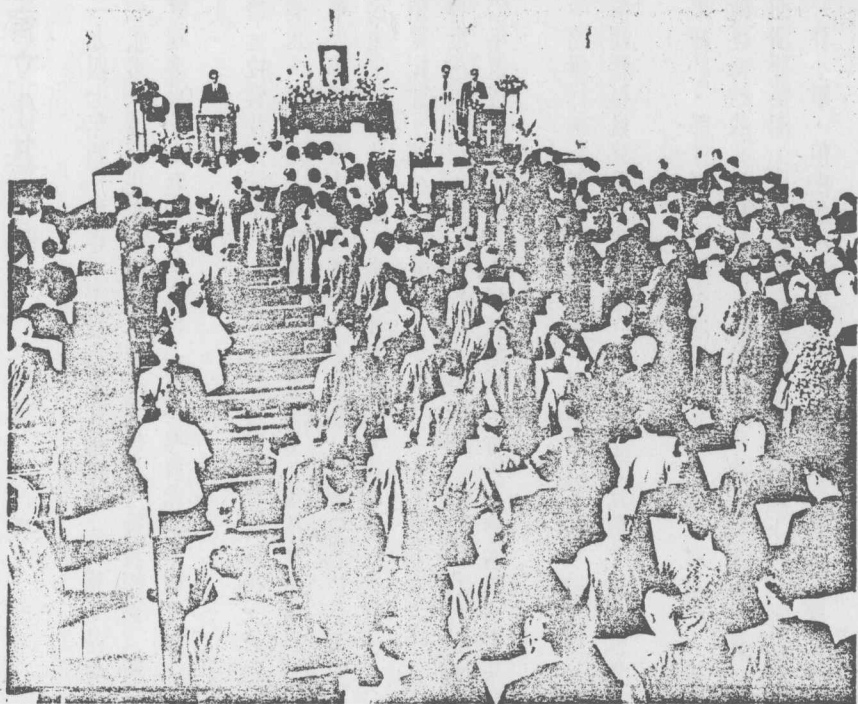
中國銀行向例供給行員住所。民國二十三年時，中行信託部經管地產的一位副經理，以投資地產爲名，特在滬西林肯路建造華貴的住宅十餘幢，作爲高級行員的住所。亞民照章應占住一幢。但他始終不曾遷住。寧願在憶定盤路租住簡樸的房屋。他曾向我說出不遷住的理由：第一不贊成銀行投資地產；第二反對建造華貴行員住宅；第三不贊成同仁家眷聚居一區。他是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議。迨至八一三戰火瀰漫滬西，居住林肯路的各家，狼狽遷避，頗遭損失。他總算有先見之明。三十年後，那位主管地產的副經理，因投機地產失敗，及其他原故，跳樓自殺，真可謂土木爲災！

亞民是一個不耐寂寥的人。所謂不耐寂寥，并非說他熱中，說他干祿，或說他想要做官。而是說他公餘之暇，喜歡熱鬧，坐不住，靜不下來。住在重慶郊外玉靈洞中行宿舍時，除非因爲趕辦緊急的公事外，難得看見他關了房門，一個人獨自在房內看書或是靜坐。在他的家眷未到內地之前，每於公事完畢之後，他總是自己拿出錢來，叫工友買些花生和滄酒，邀請幾個能飲的同事，聚在一屋，邊喝邊談，興高采烈，其樂陶陶。他的酒量和酒品都好，無論在公私

應酬的場合，我未曾見過他飲醉或失態。有時興到，還請同事，配上胡琴，唱上幾句「落馬湖」或「三娘教子」的京調。再不然，便與同事下一局象棋，或者鬧幾個「樂褒」的橋牌。有人說他不許人在宿舍又麻雀，而自己却打橋牌，豈不自相矛盾？他的回答是：「又麻雀總不免賭現錢，打橋牌不過空記分數，以瞻成績而已。」這些公餘的消遣，他向不分階級，盡量與人同樂。從來他不做出道貌岸然，儼然人望而畏之的假模假樣。更絕不置身百尺層樓，高不可攀。這是他可愛之處，也是他最受人尊敬之處。他在中行人緣很好，就是由於他處處率真。

以上所述，多屬細節。但君子觀人於微。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用這樣的程序去衡量亞民的言行，對於他的人格、操守、和志趣，不難得其全貌。

一九六八年二月三日脫稿於基隆原



二十五日八月二日在北臺理堂舉行追思禮拜

霍寶樹先生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葉良才

四八

我認識霍寶樹（亞民）先生是從一九四七年始。那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基會）董事施肇基（植之）先生退休，中基會董事公推亞民先生繼任。翌年亞民先生接替李銘（菽蓀）先生爲中基會會計。一九五〇年兼財務委員會主席。上述各職，都是無薪給的義務工作，亞民先生一直担任到一九六三年逝世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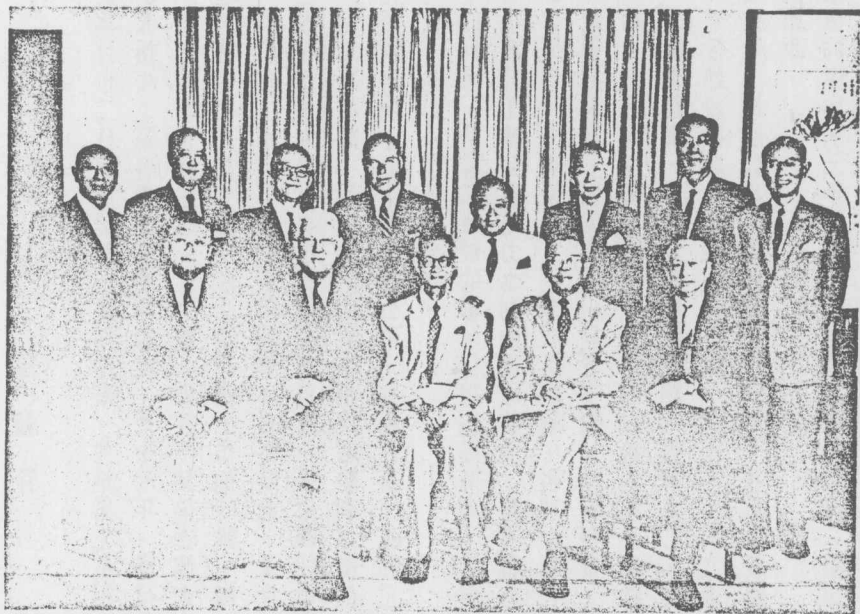
中基會的財務委員會是負責處理基金投資及保管事宜，一九五〇年中基會全部美元資產（連清華基金在內）市值爲五百九十萬美元。到一九六二亞民先生逝世那年，該基金市值爲一千二百二十萬美元。（歷年利息用作清華大學經費及中基會補助文教事業，不算在內），總共增加了六百二十萬美元。這可以說是亞民先生任內的成績，也是他對我國文教事業的貢獻。

亞民先生在中基會尚有兩事特別值得紀述。第一，一九四八下半年，中基會將存在上海花旗銀行的全部證券，陸續提出移存到香港花旗銀行。那時亞民先生在廣州，我們幸得他的幫助，於一九四九年初完全辦妥。一九五〇年這些證券再由香港移到紐約。所以大陸淪陷，中基會的證券都沒有遺失。

第二，一九五九年中基會向臺北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登記所持中國銀行股票並領股息，也得亞民先生的幫助。並由他與中國銀行前總稽核姚崧齡先生担保。迄今中基會所收到的中國銀行新臺幣股息等於美金三萬二千元。

亞民先生家居華盛頓時，他通常來紐約，都住在六十四街西部一家中下等的旅館裡，房錢大約五元至八元一天。爲節省時間，他經常約我共進早餐，商談各事，一次有朋友勸他換一家比較大的旅館。他笑說：「這旅館廉而清靜整潔。距中基會辦事處又近。由地下車到紐約中國銀行分行也方便。何必多費。」這是一件小事，但由此可見亞民先生的爲人，是重實際而不在乎外表。

亞民先生對中基會重要事務，莫不細心研究，常有獨到的見解；但他隨時都樂意考慮並接受別人的意見。他對朋友真誠，對後進竭力提攜。我很榮幸得與他有十七年共事的機會，並得到他的指導及友誼。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二日於美國中國大使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三十三屆年會

追思霍亞民先生

陸 翰 芹

中華開發公司總經理霍亞民先生，於本月十二日病逝美都，噩耗傳來，凡是與先生相識的人，都非常痛悼。楨榦云亡，真是國家的大損失！筆者與先生交往過從，凡十七年，兩度共事，相知甚深，不料握別數月，音容頓渺，值茲親友聚會追思先生之際，尤其不禁傷感悼念！

追思先生的一生，自民國十六年起，筆者初見先生擔任浙江建設廳工作的時候，真是才氣橫溢，丰采爽朗，象徵着當年開國，興高采烈，積極有爲的青年朝氣。從那時起，先生一直擔任財經建設工作，爲國効力，始則輔佐張靜江先生於中央經濟建設委員會，後來轉任中國銀行職務，歷十餘年。筆者一直心儀其人，而無緣相識。我們的兩度共事是抗戰勝利以後的事；一在先生接任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一是先生創辦現在的中華開發公司。這兩件事，也許正是先生一生中對國家最大的貢獻，最爲難能可貴，也最不能使人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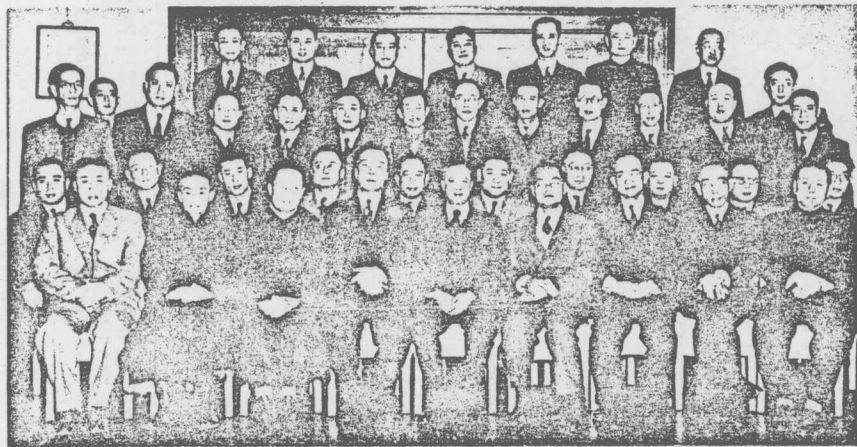
抗戰勝利後的國際善後救濟，爲當年的行總，是著名難辦的事，行總組織龐大，人事複雜，而工作的廣泛，從貧病衣食的救濟到各項農漁工礦交通電力水利的復原建設，應有盡有。當時各部門和各地分署的主管，雖然多是專家學者，一時俊彥，但多缺乏經驗，再加上聯合國救濟總署的事事牽制，共匪的處處搗亂，以致管制脫節，組織渙散，經費支絀，物資壅塞，到先生接任的時候，行總的困難紊亂，達於極點。但是先生毫不遲疑，勇敢的以跳火坑的精神，接受使命。他以簡要迅捷，處理困難紊亂，以綱舉目張，安排計劃解決問題，鼓舞人心，共赴事功。不到兩年，行總得以順利結束，各項善後建設計劃，皆能通盤打算，分別開始獨立進行，今天臺灣許多經濟事業，如農復會，漁業公司，民航公司，鐵路電力以及若干重要的工廠，多曾經過先生的擘劃支助，與先生有深遠的淵源。

中華開發公司的創立，可說是先生最後的傑作。三年以前，政府因爲臺灣經濟，亟需積極開發，尤須吸引國際投資，乃有設立公司積極推進之議。開創這一新的局面，是國家的重要決

策。當時先生甫卸駐美公使兼經濟參事，接洽美援的任務，當局即以這個新的任務，徵詢先生，他毫不躊躇，力疾歸國，願以衰病餘年，負起創業的責任，籌備策劃組成中華開發公司，承擔任公司總經理職務。在他勞瘁經營擊劃之下，不到三年，中華開發公司規模日大，信譽日隆，匯集民間資金，推行國策，很迅速的成爲吸引國際投資開發臺灣產業的中心樞紐。

先生這兩件事，多與臺灣的經濟長成與開發有密切的關係，於推行國策更有重大的貢獻。

總之，先生一生，爽朗豁達，誠摯助人，爲國盡瘁的品格，使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在財經建設方面的卓越成就，朋友交往上的溫厚融洽，多是基於他這種優美的品格，先生逝矣，我們唯有深深策勵，以效法先生來紀念先生！



聚歡人同總行與日四十月三年七十三國民

霍亞民先生的追憶

蔣 頤 傑

時光過的真快，亞民先生逝世，忽忽已經五年了。但是他的神采容貌，隨時都可以浮現在我眼前；他的談笑的聲調，彷彿還縈繞在我耳際，他真是一位叫人難以遺忘的長者，和忘年之好友！

我初次遇見亞民先生，是遠在二十二年前的事。地點則在東北長春，那時抗戰剛結束，各處失地還未接收完竣。尤其是東北全境，還統統在蘇聯紅軍盤據之下。雖然我國政府已派了張公權先生（時任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擔任與蘇聯談判之全權代表），率領各部接收人員前往長春，與蘇方接洽接收移交事宜；但是蘇聯早已包藏禍心，一再拖延不肯撤兵，亦不放我國國軍進駐東北。那時蘇聯遠東紅軍的總司令，就是現任蘇聯政府的國防部部长馬林諾夫斯基 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他一面向我國政府方面要索種種利權，一面又偷偷的讓中共部隊潛入東北，最後於二十五年四月，他先下令將東北的工業設備拆卸一空，然後將一切剩餘，包括關東軍之武器裝備，移交中共部隊之後，纔撤兵而去。他這一着毒棋，使我國在戰後對抗共產勢力的鬭爭，急轉直下，馴致大陸淪陷。至今思之，猶有餘恨。

我在二十四年年底剛從英國劍橋大學應公權先生之邀，抱着滿腔熱望，前往東北，滿以為可以所學幫他發展這片資源最豐富的國土了。那知到了長春，不但領略了塞外隆冬冰雪的嚴威，並且瞭解了當時局勢的險惡，及勝利的空虛。那時數百名中央接收人員全部偏處在所謂「滿炭大樓」之內（這是偽滿時期，日人統制全境煤礦的總公司辦公大樓），不但不能分頭接收其所轄機構，甚至出門在市內行走都要萬分小心，因為紅軍的紀律是有名的。路上行人身穿的大衣及身邊的手錶鋼筆之類，如果中了他們之意，就有當場被「共產」的危險。在這種苦悶緊張的空氣之中，忽然聽說中國銀行的總稽核竟要親率一批行員，前來東北接收與總行隔絕了十多年的分支行，並規劃復業，這件事在那時的「滿炭大樓」之中，自然是一項打破沉悶的消息。

公權先生本是中國銀行的總經理，該行重要職員多是他栽培的後進，亞民先生也是他當日羅致的人才。所以亞民先生的來臨，他自然要盛大招待的。我也幸得忝列末座，因此得初次瞻仰亞民先生的風采。

他那時五十初度，精神奕奕，身軀脩長，相貌清秀。尤其是鼻樑隆正，直上額際，最為觸目，皮膚白晳而透紅潤，頭髮梳得一絲不亂，無論是坐是站，背脊總是筆挺而且微向後傾，顯得十分莊嚴，但又毫無驕矜自得之色。因為他對人的態度，總是那樣謙和而真摯的，因此即是初次見面的人，也會對他起極好的印象。他說的一口湖北官話，就好像是京戲中的「道白」似的，不論南方人或是北方人都很容易聽得懂。公權先生頗有意挽留他在東北做一有力的臂助，但是很顯然的，那時中國銀行的主腦對他也是依畀極重，他是擺脫不開的。他籌劃了幾處重要的分支行（如瀋陽、長春、錦州等行）復業後，即匆匆南歸。我那次雖然只得驚鴻一瞥，但是對他的儀表，已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後却一隔四五年沒有機會再和他見面。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已經淪陷，我已避難來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服務時，纔得再度相逢。這次在美國相交往達十年之久，承他不棄將我看做忘年之交，因此得真正認識他的為人及他處事的作風，使我益加敬佩其人格。

他在東北之行後，不久即奉命接替蔣廷黻先生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三十五年十月）。那時救濟物資，是各方所爭奪的對象，這樁差使是極容易招謗的。可是他一直做到救濟物資處理完竣，該署工作結束而解散為止，未聞輿論有攻擊其個人操守之事；監察院、立法院亦無糾彈指摘之舉，真是難能可貴。這和日後我十餘年來所觀察的他家庭生活之儉樸情形相印證，可以斷定他是一個絕對廉潔的好官。在那時那種大混亂的局面下，如此廉吏真是不易得的。

民國二十九年韓戰突然發生，美國一改其束手不問中國政治，即所謂「靜待塵土澄清」的政策，又恢復對華援助了。中樞以極明智的判斷，任命亞民先生做駐美技術團主任，常川駐在華盛頓，與美方接洽美援事宜，那時美國政府雖然改變了它的對華政策，但其國內民主及共和

兩黨的黨爭，仍時以中國大陸之失陷爲互相攻擊之工具。報章上及國會發言中，不時出現對我國政府在大陸上施政的批評。「貪污無能，以美援金錢物資中飽私囊」之類的文字，時常觸人眼目。美國朝野，不少人公開懷疑，對我們這樣的政府是否還值得再予援助。幸而那時主持接洽美援的是亞民先生，他在大陸上處理美援物資的廉介公允的情形，是中美雙方所有目共睹的。「貪污無能，以美援中飽私囊」這類的話，對他絕對不能適用。因此在那種不斷翻舊賬的惡性批評之下，猶能贏得美方信任，順利達成其任務，真是令人額手稱慶的事。

他和他的秘書長後兼副主任李芑均先生（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真可算是一對相得而益彰的好搭擋。亞民先生的作風是大刀濶斧的，做了粗枝大葉的決策後，就勇於承擔一切責任。芑均先生是頭腦極細密，極富於分析和計劃能力的人，兩人和衷共濟，相輔相成，有似房杜。那幾年最緊要關頭的美援的接洽，他們兩人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亞民先生是最能虛心交納青年朋友的長者。像我這樣年齡和他相差二十多歲的人，他都能視作忘年之交，時常徵詢我們的意見，他對青年人真是獎掖提携，愛護備至。我可以舉一二切身之例來證明他的作風。民國四十三年我國政府因外匯及金融政策亟待改絃更張，曾商請美政府遣派一經濟顧問團來臺研究臺灣經濟問題，並提供改革方案。美方已慨然同意，並且正在組織該團之際，當時的經濟部部長尹仲容先生突然給國際貨幣基金的中國理事譚伯羽先生發了一封電報，問他有無可能向基金當局洽商調借劉大中和我兩人，回臺協助美國經濟顧問團，研究我國經濟問題。我和大中兄事先對此事都未有所聞。我和仲容先生那時並非素識，不過在兩年前的回國休假期間，曾因芑均先生的函介，和他討論過臺灣的經濟問題，並送了他一本自己隨身帶着看的 J. E. Meade 所著「計劃與價格機構」Planning and the Price Mechanism 一書，如此一面之交而已。這事後爲亞民先生所聞，他極力主張大中兄和我回國去一趟，並說他自己不日將回國述職，願就便促成此事。過後不久，果然財政部長徐柏園先生又有電致譚伯羽先生，請他正式向基金洽借我們兩人回國一行，並且當時的行政院院長俞鴻鈞先生又發給我們一

人一張聘書，作爲行政院所聘的臨時顧問。亞民先生自己又特地展延他由臺灣返美的日期，直等到我們到達臺灣之後，替我們介紹了各有關方面，務使我們工作能够順利進行，然後纔離臺返美。他這種待人真摯週到的地方，真是令人感懷不已的。

後來大中兄和我所提出的關於外匯及利率政策的改革，及中日雙邊貿易信用利用方法的建議，究竟是功是過，且留待日後史家去判斷。不過我們事後聽到朋友轉告：俞故院長在讀了美國經濟顧問團的報告及我們兩人另寫的建議之後，曾在行政院的一次紀念週中，對着全體職員說過，「劉、蔣兩人的建議比美國顧問團的報告更爲切實可行」云云。（大意如此，字句不確。）我希望我們兩人總算沒有辜負了亞民先生推挽的一番苦心吧。

民國四十七年亞民先生奉命籌備中華開發公司，並內定出任其首任總經理。他向我表示一定要重視經濟研究，所以打算在該公司內設一經濟研究室，叫我推薦幾位青年有爲的經濟學家。我就將我所知道的幾位開列給他，他去臺灣後，都一一邀談，凡願意到他公司服務的他都聘用了。他曾向我說過，開發公司的目的之一，在構成臺灣工業與美國資本市場之間的一座橋樑。他認爲除了汲取國外官方的資金來源（如美國的進出口銀行及世界銀行）之外，也應該探討利用龐大無倫的美國商營資本市場的途徑。這樣才能使國內工業資金供給的源流廣濶長遠。所以他利用多年在中國銀行服務時所建立的關係，一再親自去紐約，和那裡的大銀行接洽，商討有無貸款的可能。他發現那時臺灣工業的信用在國外還未樹立，就是以新成立的開發公司的名義，也只能在紐約借到短期的貸款。但他對我表示，他願意負擔風險向紐約各大銀行商借一筆短期貸款，到期後一再轉期，而用這筆資金擴充對臺灣工業的中長期放款。這種勇於負擔風險的舉動，決不是只求自己官運亨通的人，所願做的。

民國四十八年夏，我又爲着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和尹仲容先生之邀來臺灣。那時開發公司已經成立。他正預備南下考察幾家工廠，以決定是否值得貸款助其擴展。承他盛意邀我同去，我因爲南部的工業區還未參觀過，所以欣然從命。他帶着公司的副總經理潘誌甲先生、技術處

長沈琰先生、經研室的副主任錢純先生等一同南下。事先對每家工廠都做了一份業務及會計分析，每到一處又仔細考察其技術操作、品質管制、並細詢其經營推銷狀況。雖在仲夏盛暑之下，仍舊認真得一絲不苟，真令人欽佩。

亞民先生可算是個人緣最好的政府要人。人人對他的誠摯、公允、廉介都衷心欽佩。但是他決不是鄉愿或巧宦之流的人物。他自己約束極嚴，處事唯公，而待人則以恕道，不與人爭名利，所以纔博得大家的敬重。他和他的夫人邱真藹女士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家庭生活和睦而有規律。亞民先生對一切賭博都不感興趣，只偶作橋牌之戲，但亦不以金錢為賭注，牌藝似亦不甚高明。霍夫人則橋牌、麻將以及其他博奕，一概不為，視官場之宴會酬酢為苦事。唯對音樂非常愛好，她本是美國波士頓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的畢業生。抗戰以前，亞民先生在上海服務的時候，她一直在滬上有名的中西女校教授鋼琴。亞民先生在華盛頓任技術團主任的時候，她仍在自己家裡教授鋼琴，以補助家用。因為國難期間，政府駐外人員的薪給，大都不很豐裕的。亞民先生去世後，她更以此自給。她對於有關中國的慈善事業，無不熱心擔任組織推動的工作，至今如此。

亞民先生病重和逝世的時候，我已離開了華盛頓，來到羅哲斯德大學教書了。收到噩耗的時候，真是悲悼不已。想起當年大陸初陷，政府播遷臺灣，國脈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際，幸虧有一批有能力的正人君子，被擢拔起用。他們的能力足以挽回頹勢，支撐危局；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人格足以重新贏得老百姓及盟國的信任；這纔能在極度混亂動盪之中，在蔣總統領導之下，勵行各種改革，造成今日臺灣欣欣向榮的局面。如今這般人之中，已經有好幾位盡瘁而逝了。怎麼叫人不飲水思源，感懷悼念他們！

人生最大的樂事，是能够交到一位品德才能遠勝於自己的朋友，尤其是一位熱情充沛的長者。在最近三十年中，霍亞民先生實是我們朋輩中共同敬愛的忘年交。亞公教導我們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如何增加我們對國家社會的貢獻，甚至於如何增進我們自己在生活上的樂趣。如今亞公已經逝世五年了，我回憶這一段珍貴的友情以及其逝世後對於朋輩無可補償之損失，真是無限傷感，無限懷念！

回憶第一次遇見亞公，是在（抗戰時期）民國卅二年。那時我在駐美大使館商務參事處供職。當時的商務參事是李芑均（翰）先生。亞公與芑公是很熟的朋友，常到商務參事處來談天。亞公大我十多歲，那時候早已是一位名重位高的前輩。而對我們後輩朋友的誠摯爽朗，毫不矜持，令人欽服。與他交往，如沐春風。見面幾次之後，就覺得無事不可向亞公請教。而且不必有任何顧忌保留。他這種樂於交結少年的誠心，與求才若渴的風度，不存絲毫敷衍矯作的成份，完全出於他對青年愛護的真誠。

依我的揣測，亞公交朋友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一切以朋友的興趣和快樂為主，把他自己已完全忘掉。普通在事業上稍有成就的人，往往有「自我中心」（Self-Centered）的傾向。亞公雖在事業上有很大的建樹，但是絲毫沒有這個缺點。關於這點，我可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在民國卅三年前後，我對西洋古典音樂十分愛好，每天必須聽一二小時的交響樂唱片，否則即飲食無味，坐立不安。亞公的夫人，雖是一位有造詣的西洋音樂家，但據我所知，亞公對於西洋音樂的興趣，並不很高。有一天晚上，我請亞公和其他兩位前輩朋友到家便飯。飯後我就開放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頭尾不停，全神貫注。我雖大過其癮，而其他兩位前輩朋友，則索然無味，匆匆告辭而去。留下亞公，依然微笑點頭，繼續欣賞。聽完以後，還與我談了很久，才欣然告別。我現在回想這段往事，真有「少不更事」之感。從而更體會到亞公的「舍

己爲人」的精神。那天晚上他看到我跟着音樂節奏手舞足蹈自得其樂的神情，就不忍打斷我的興頭，他見到我的興高采烈，因而自己也覺得十分快樂。

抗戰勝利後，亞公回國，在京滬主持中國銀行及善後救濟等重要任務。我則回北平，在清華大學教書。彼此不相見者數年。及至大陸淪陷，我們又重來華府。亞公主持美援的交涉。我在國際貨幣基金供職。從那時起，到民國四十七年我遷居康乃爾大學教書爲止，有將近十年的光陰。在此期中我與亞公同住一城，往來頻繁，也是我從亞公得益最多的一個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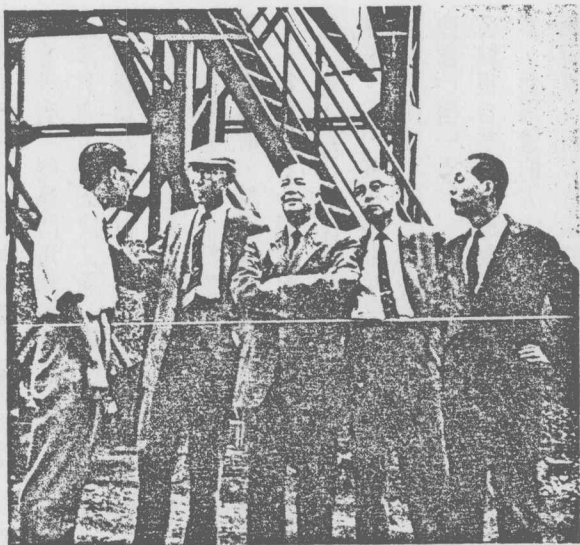
這幾年中，我國的處境相當困難。臺灣還未進入穩定繁榮的境界。住在華盛頓的朋友不免意氣消沉。亞公便又成了鼓舞我們努力向上的最大的動力。民國四十三年，蔣碩傑兄和我奉召赴臺，協助政府修改外匯政策，更得到亞公的贊助和支持。行前，他對我們說：「此次任務十分重要。凡是你們確實經過詳細周密分析後的看法，無論與政府當時所採取的政策有多大出入，都得就事論事，坦率直陳。不必遷就事實，有所保留。」詳情已見碩傑兄所寫追念文中，不再贅述。他勸我們所採取的態度，其實也就是亞公一生做事的原則。他做事宗旨明確，魄力雄偉，是一般朋友都欽佩的。

華府諸友，一有閒暇，就找亞公談天。記得在一個早春之夜，與傅安明兄同訪亞公，正值他後院薔薇盛開。我們圍坐園中，三杯清茶，一碟花生，娓娓清談，深夜不倦。他所談的，或爲經驗，或爲哲理，皆關爲人處世之道。他好像說書道白，時而嚴肅，時而談諧，層層譬解，津津有味。他全用旁敲側擊，導人爲善的說法，一點沒有道貌岸然教訓後生的口氣。那晚談話的要點雖已事隔十餘年，我還記憶猶新。他說：「第一，不論自己的見解如何的自以爲是，不論人家的說法如何的自以爲非，討論的態度，必須平和，說理的聲調切忌高揚，一定要慢條斯理的從容發揮；否則自己的意見，即便是對的，也難得使人接受。第二，求學做事，切忌急進，尤忌取巧沽名。中國讀書人，對利頗看得開，於名則未必能澹泊。須知水到渠成，實至名歸。自己的一技之長，如果未被人家欣賞，不必感到急躁不平。如果僥倖被人欣賞，也不必自鳴

得意。第三，現代的知識，漸趨專門，一個稍有聰明的人，在某一種學問上多下一些工夫，自然會得到一些專門知識。但切忌因此自覺對某一問題已有通盤認識。須知，每一個實際問題所牽涉到的方面既廣又深，錯綜複雜。任何一個偏狹的看法，縱能深入，亦非盡善。」。安明兄是同輩朋友中最和平最謙虛的一位；而我則熱誠有餘，涵養不足，此是亞公所深知的。他那晚的談話，絕非無的放矢，實是對我一片關懷的開導。但他的說法，是如此的輕鬆委婉，引人入勝，使我聽了，油然悅服。亞公之所以能使人信服，一則由於其辭婉而意誠，二則由於他一向能以身作則，說到辦到。所以他的現身說法能使「貪廉懦立」，頑石點頭。

亞公還有一個最大的長處，那就是他誠心誠意與人通力合作的精神。同時他也希望別人能效法他的榜樣，彼此合作無間。關於此點，我也可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亞公與我有一個共同嗜好。我們都很喜歡唱平劇。亞公雖原籍廣東，但他的湖北口音很重，因此他雖沒用多少時間去真正研究平劇，但他所唱的字音的確一字不「倒」（在平劇中，如「平上去入」四聲唱錯，即為「倒」字）。在紐約和華盛頓，有許多後輩同好，常常在顧季高先生府上聚集清唱，而亞公就很自然的成爲我們的「領隊」。我們客居美國，很少消遣，於是平劇同志的人數，自然增多，而消遣的方式，也由清唱而漸漸變爲彩排公演。愛好平劇的同志們，有不少是天才卓越的藝術家；而有造詣的藝術家，也往往「孤高自賞」，合作無緣。開始彩排公演不久，我們的平劇團體，就各立門戶一分爲二了。並且彼此成見，與日俱深。這兩個團體，雖不合作，但對我們霍大哥則是一致擁護。亞公見此情形，不免掃興，乃自告奮勇，致力於「復合」運動，他決心要促成兩個平劇團體通力合作的局面。爲了這件事，亞公舌敝唇焦的兩邊遊說，再三譬解，勸誡我們「唱戲事小，合作事大」。可惜這些小弟小妹，偏偏十分矯情，無論亞公如何開導，總歸無動於衷，至今仍然未能復合。事後想來，這是我們一群平劇同好最對不起亞公的一件事。很可能的，這也是亞公這一生中唯一的一個失敗。但是我們這幫戲迷，對霍大哥的敬愛，反而因此而更加深厚，滿懷慚愧，遺憾終身。

亞公對於國家最後的貢獻，就是在臺灣開辦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後來因病，來美就醫。不料竟一病不起，溘然長逝。他最後數年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致力於臺灣的經濟建設。我深深知道，他在病中一直希望以臺灣爲他最後的歸宿，逝世海外，何等遺憾！在他華府病重之時，我自康乃爾馳往探病。見其面貌很清癯，而目光依然有神，他那一種清和洒脱的風度，一如往昔。我們握手相視，有說不盡的言語，別時有無限的離情。亞公一再申述，「我病稍好，即回臺灣」。不料此別竟成永訣了。我一後輩，何幸能與亞公締有二十五年忘年之交，此一良緣，終身永寶！



廠焦煉司公工化業啓港南觀參



影合甫光事董陳與時會大東股司公發開華中月三年十五

可敬可愛的亞民兄

崔存璣

五月十二日在一個天氣陰沈細雨綿綿的下午，我和普霖及華茲夫人陪同真藹到亞民墓前獻花致敬。光陰過得真快，亞民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五年了。他那爽朗的笑聲還是時常縈繞於我們的耳際，和煦的笑貌，也隨時出現在我們的眼面。在朋友的心目中亞民的友情是永遠不能忘懷的。

我初識亞民是在民國三十一年，他任職於物資供應委員會。彼此往還不過祇是應酬場合，橋牌桌上數度見面，尚未識得廬山真面目。那時華府，不論是何場合，只要有亞民在座，總是氣氛輕鬆笑聲滿座。

民國二十八年下半年，中國銀行緊縮，亞民由倫敦到華盛頓，與我們同住在華府近郊的一座公寓。那個時候大陸淪陷，政府遷臺。亞民個人甫自中行退休。可以說是精神上他最困苦的一段時期。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有一點懊喪的表情，也沒有聽見他有半句牢騷的言語，只是默默奔走於紐約華盛頓之間，做些有益於國家利益的工作。那時傳說美政府已內定於次年四月承認匪偽政權。亞民乃幫同顧少川大使就各人所接近的美國朋友分途遊說，盼望能扭轉乾坤。所幸得到國會中共和黨朋友的努力，延緩承認。及至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承認之議遂作罷論。這一事件，亦可以表現亞民達觀應變和公忠體國的精神。

亞民交遊滿天下，對於亞民在社會國家的貢獻，已有許多朋友撰寫紀念文字，詳記其事。我現在只就記憶所及的幾件軼事和遺言，畧一記述，以見亞民生平對長官對同僚對朋友對家人愛護的真摯。

亞民病重的時候，宋子文先生託友來詢，可否來美京探望。由我轉達。亞民答道：「我生平對任何長官莫不忠貞盡職。公事以外，皆以誠懇友誼相待。TV知交不多，余與交談，總以真言相告。我們多年共事，在友誼上亦有深切諒解。現在極願再有機會與其暢談」。亞民故後，宋先生親來送葬，並為執紼。宋霍締交數十年，歷久彌篤，亦屬佳話。

陳毅夫兄曾在亞民主持的技術團擔任信差職務，現在紐約經營餐業，甚為發達。一日來京我邀彼午餐。陳君云「凡事都有天命。霍先生做人真真好。如果霍先生當年不辭職回臺，我恐怕不會離開他，現在還在送信呢」。亞民之得人心也如此。

亞民在美京供職的時候，應酬極多，常在 Dupont Plaza 旅館舉行酒會，招待外賓。其時陸傳銘兄等新創北京樓，生意不振。適值嚴副總統（時任財政部長）來美公幹。亞民別開生面，在北京樓開酒會歡迎。亞民說「中國同胞在海外的事業，大家應該盡力幫忙使其成功。」北京樓經過這次酒會的宣揚，營業逐漸興隆。該樓同仁，對於亞民的俠義精神，至今感慕。

亞民病重時，對於中華開發公司及其家庭的將來，常常與我談及。亞民說「開發公司基礎已定。上有林董事長之領導。下有心洽鈺甲及其他同事的協力合作，前途無量。總經理一職，我已決定請辭，推薦心洽繼任。心洽才能超越足以勝任。我如病愈，可以顧問名義擔任計劃工作。」他對同僚的信任關切，真正做到「舍己爲人」的地步。實在令人感動。

在家庭方面，亞民生平最得真誦的內助。亞民說「真誦性情爽直寬厚，喜歡朋友，熱心公益，雖不善理財，亦不虛糜廢費，生平從不干涉公事，且有獨立精神，伊喜愛音樂，平時教琴自遣，亦有收入。我在中國銀行解散時，所得遣散費，已在銀行設立信託基金，可助家用，并供孺兒學費。清苦生活，足可維持。雲女性情良善，學業完成並得佳婿，家庭美滿可無問題。最可慮者乃孺兒。我不常在家，對孺教導全賴真誦。孺兒年事太輕，中國情形隔膜。將來升學就業尚請多多指導。我極希望能夠參加孺的畢業典禮。」孺於是年六月中學畢業，亞民已先一月去世，未能達到親往觀禮的願望，亦係憾事。時光飛逝，於今亞民已逝世五年，孺大學畢業後，且入研究院攻讀，誠篤好學，立志遠大。亞民在天之靈亦可稍慰矣。「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這句古話足以表達亞民真誦伉儷處世處人的哲學。他們無時不以誠懇的態度，友愛的精神對待朋友，亦頗得朋友之敬愛。今值亞民逝世五周年紀念之日，以此追念亞民并願與我友

共勉之。

憶霍亞民先生

張心洽

我一生之中曾經兩度追隨霍亞民先生，視若尊長，而霍先生之看我也同家人後輩一樣，關顧備至，十分親切，因而他的離去人間，在我感情上的負擔也特別沉重。

中國銀行在民國廿九年時因業務需要曾在上海昆明重慶三地分別招考了三批大學畢業生，我是在上海應考的，進行不久就被調到雲南下關服務，卅年三月又調至昆明，遇到同年在昆明考取的同事，雖不是在同一地區進行，也可稱得是同年，相處比較親密，往還亦較多，在他們口中常常提到「亞公」，並且常說「亞公」最喜歡提拔後進，當時祇知「亞公」即是霍亞民先生，是中行總處的副總稽核，但從未見過，後來在民國卅三年我奉派駐昆明裕滇紗廠任會計科長時，霍先生因公來滇曾來紗廠參觀，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霍先生。

卅五年我去美國哈佛讀書，卅七年春我從美國回來，被派任中行廣州分行僑滙股主任，九月奉派兼任美援會廣州辦事處主任，不久霍先生奉派南下擔任廣州區經濟管制督導處協助督導員，（宋子文先生兼任督導員）霍先生調我兼任督導處辦事，當時辦公室中同仁連我只有五人，其他人都是各機關臨時協助的，中途又有兩位同仁回去上海，剩下就祇有三個人，事實我就等於當了霍先生的機要秘書，以此和霍先生朝夕共處，相當親近，也很得到了霍先生的青睞和鼓勵。在這一段時期中霍先生很有意要給我在工作裡的職位加以擢升，雖曾一再向我服務行方面提及，但究竟也未便直接干預，就在這一年冬間，中行總管理處南遷，霍先生身在華南，受命就近主持駐穗總處事宜，我就被調為總處會計處第三課副課長駐廣州服務，這是我在中行實際追隨霍先生工作之開始，也是在中行追隨霍先生工作的唯一時期。

霍先生有一個特長隨到那裡，自己不一定帶人而都可以就地取才，加以驅策，督導處人很少而工作很繁，其時有關機關如金融管理局輸出入管理委員會綏靖公署以及其他金融單位首長每天中午都到督導處辦公室一同進餐，很多公事就利用這午餐時間商量解決，霍先生和這些人

以往很少淵源，但對他們都能指揮若定，駕馭自如。霍先生每逢宴請外賓，常要我一起作陪，意思是要我對外邦人士的酬酢應對多一些歷練，這點對我日後肆應國際間的周旋往還，有着很大的益處，同時也足見霍先生的提挈後進，無微不至。

二十八年秋廣州淪陷，我跟中行總處到了香港，隨奉霍先生指示總處已決定遷臺，因此我也就來了臺灣。其後霍先生奉命去了美國擔任駐美大使館公使兼駐美技術團主任，此後一時期中就祇有在霍先生返臺述職的時候才有重行聚晤的機會。

四十六年俞國華先生率領的金融代表團赴美考察，返國後曾提出報告，并建議提倡儲蓄，籌設證券交易所，改訂外人投資條例等事項，同時又建議在臺灣創設一間以長期貸款及投資為專業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四十七年秋上項設置開發金融機構的擬議漸臻成熟，當局發動積極推進，已故陳副總統辭修先生請霍先生回國承擔這項任務，霍先生當時爲了健康關係，不無猶豫，但一方面爲了陳辭公的堅邀和有關各方的敦促，一方面他本人對於這項開發性金融機構的籌創工作也認爲很有意義才決定接受。（霍先生早年在中國銀行爲了振興實業發揚國貨，曾試選擇上海虹口區若干工廠爲貸款對象，竭力扶持，結果非常成功，可見霍先生在那時候已經具有了今日開發貸款的觀念。）這樣霍先生就先在美國就近與美方朝野分頭聯繫，一面俞國華先生在臺也先邀集工商企業各界人士聚晤，就投資合作作初步的佈署。四十八年一月下旬霍先生重返臺垣，下機以後即日展開工作，這也就開始了我再一度追隨霍先生的階段。四十八年二月成立了開發公司策進委員會，霍先生任主任委員，俞國華先生任副主任委員，因爲當局督促甚急，於是快馬加鞭，分頭策進，這一前所未有的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就在很短時間內籌備完妥，於四十八年五月一日正式成立，五月十四日開始營業。在這段籌備時期中，霍先生的殫思竭慮，勞瘁緊張，是不問可知的，對於霍先生的健康不能說全無影響，霍先生自己曾說過：這次回來籌辦開發公司，應是他一生對國家最後一次的貢獻，不幸竟成了語讖。

公司成立，林柏壽先生出任董事長，霍先生任董事兼總經理，開發公司是一個事無前例新

創的單位，和中外各方的關係又錯綜複雜，因此主其事者擊劃肆應要比一般通常的機構勞神多。開發公司的性質和普通銀行不同，霍先生鑒於當時我國經濟情況應以發展工業生產，增加輸出獲取外匯收入，代替輸入減少外匯消耗為第一要義，因此就根據以上原則釐訂業務方針和範圍，以辦理中期和長期生產放款，協助各生產事業創業或擴充生產能力改善設備，及參加投資，扶助新創生產事業為主要業務。貸款扶助的對象：須要其產品能輸出國外換取外匯；或能替代進口商品節省外匯；又或生產本省過去不能自製的民生必需產品；以及產品有裨社會需要者，才加考慮。方針和範圍釐訂之後，資金來源問題也很費周章，政府和有關各方在這方面都幫了開發公司不少忙，爲了籌措外幣營運資金，四十八年秋天霍先生就去了美國，和美國開發貸款基金商借美金貸款壹千萬元，經過各方奔走折衝，方獲成議，霍先生先行返臺，借款合同於次年三月在臺簽訂，這算奠定了開發公司對外借款的基礎。其後因爲借款的運用仍不無問題，霍先生又於四十九年秋藉出席國際貨幣基金年會之便再度赴美，向有關各方聯繫磋商，到五十年一月返臺。五十一年三月印度工業信用投資公司邀約中東遠東十六個國家開發銀行在孟買舉行亞洲區開發銀行會議，中華開發公司爲被邀單位之一，由霍先生代表出席，在和各國出席代表切磋交換意見而外，此行並携帶了英文本的「臺灣土地改革」三十餘本，分送各國代表，反應之佳，出乎想像，這是利用時機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國民外交工作。

霍先生除了海外奔波以外，國內更有不少艱難困擾的工作需要籌劃應付，如唐榮鐵工廠的監督清查事宜，中華彩印工廠的接辦集資事項，證券交易所的撥合組成等等，都是相當吃力的事情，霍先生都主持得井井有條，各有成就，此外對於公司內部制度的規劃，典章的訂立，人事的安排，都處理得妥妥貼貼，使我們後繼者到今日仍能濡潤到他老人家的餘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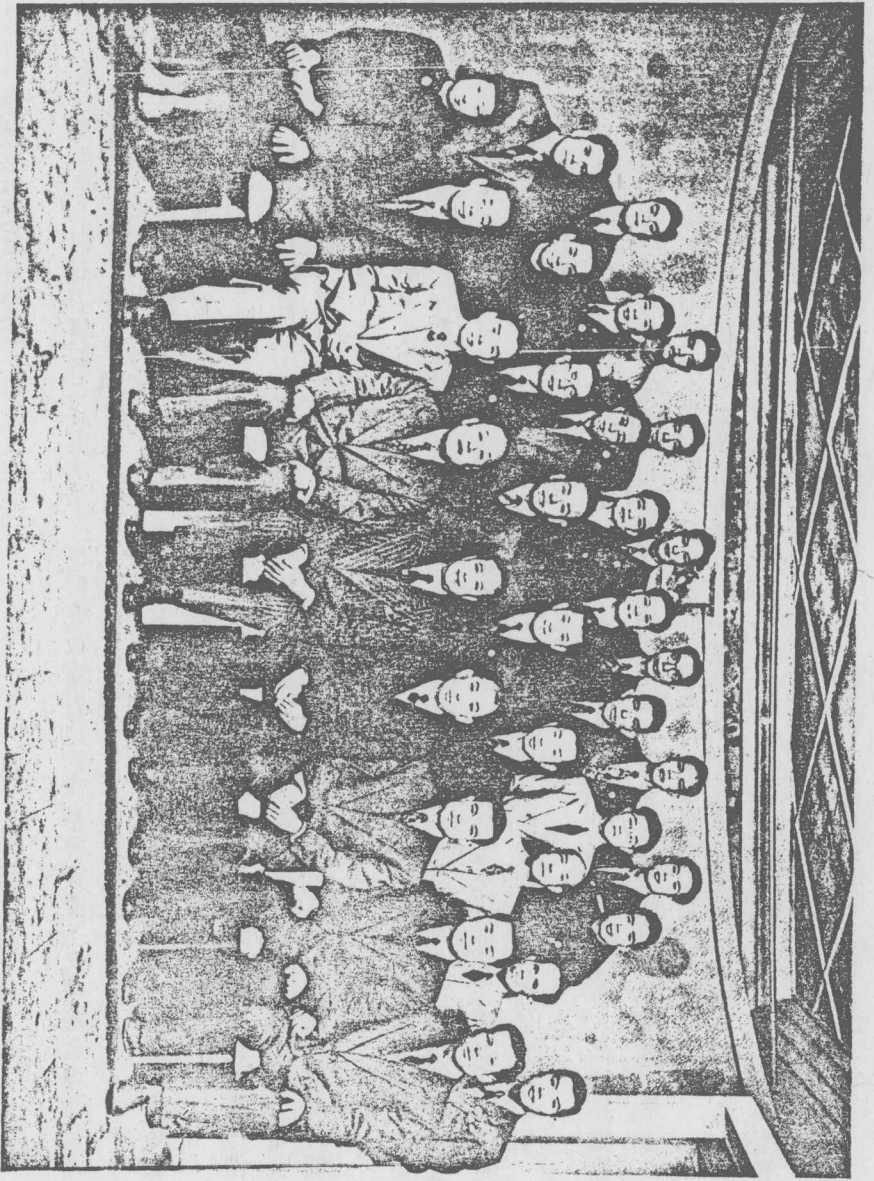
霍先生因爲是隻身留居臺北，我們同人對他老人家的飲食起居也就格外注意，每逢外出無論遠近都有人陪伴，住處也有專人照應。他老人家從外表看來，每天總是神色怡如，在後一二年中同仁雖也意會到霍先生的健康有點不如以前，可是霍先生不大喜歡人家多問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同仁也就不敢多提，但也不虞一時會有什麼嚴重後果。五十一年九月二日霍先生因公再度赴美，其時我正在陽明山受訓，平日不能常侍左右，初未料這次機場握別竟成永訣。

霍先生在美本打算次年（五十二年）一月間回來臺灣，聖誕節前後感覺心臟部份不適，醫囑需臥床休養，來臺之期不能不加延緩，二月初住入醫院檢查，當月下旬回家，三月初再度住院，遵照醫生的建議施用手術，開刀後情形尚稱良好，三月下旬出院，回家後病情略有起色，五月八日急劇惡化，送入寓所附近醫院求治，延至五月十二日與世長辭！噩耗抵臺，同人莫不悼慟，我個人的悲愴傷痛更非語言楮墨所能形容。五月十四日先在公司中舉行了一個簡單聚會，五月廿八日由霍先生在臺生前友好百人發起在臺北市的衛理堂舉行了一次追思禮拜，自動參加者約四百人，其後復蒙 總統明令褒揚，身後算得相當哀榮。

霍先生的爲人，襟懷廓落，氣度恢宏，做事勇於負責而功成不居，對人態度和易親切，和他相處一起，你會有一種如春風拂面不衣自煖的感覺，他每到一個環境，上上下下對他都會有一種不期而然的好感。從前人有「將將」「將兵」的說法，以霍先生來說，確實是一位善於「將將」的好主管，他的知人善任，真有一般人不能及的地方，凡是在他周圍的人，不論生熟，都會自動竭其忠智，樂爲効命，前面所述的廣州督導處的情形就是一個例證，同時他又非常愛惜人才，遇到有爲的青年後進，獎掖栽培都不遺餘力，至今海內外各界當年經他灌溉培育的幼苗，現在都已蔚然成林，各有建樹，這更是霍先生本身事業以外的對國家社會一項潛在的貢獻。我們在臺灣的故舊僚屬爲了紀念霍先生，曾替霍先生辦了一項獎學金，數目雖不大，每年也都可以從這裡培植出少數人才，紹承遺志，綿延久遠。

時光易逝，轉瞬間霍先生離去我們已是五年，可是他的音容談笑，恍然仍在眼前，濡毫爲記，泫然欲涕！



攝合人同體全處公辦員導督制管濟經區州慶院政行與月二十年七十三

追念亞民先生

潘 鈺 甲

亞民先生離我們而去轉瞬已經五年了，但親友故屬對他的思慕與懷念，迄未隨着無情歲月的消逝而稍減，相反的却歷久彌深。

能有機會追隨亞民先生該是我生命史中一段彌足珍貴的經歷和最幸運的事。亞民先生是我生平僅有的三位直接長官之一，三位之中我和他相處的時間最短，相共却是最樂。

他的大名我早就聽說過，可是直到民國三十一年才初次有機會和他見面，那是在重慶上清寺油礦局宿舍的一次宴會上。油礦局是抗戰時期全國最大而且性質最重要的事業機構，當時我在局裡擔任財務處長，常要設法從重慶運大量現鈔到甘肅玉門礦場，因而和中國銀行常有接觸。可是在那次宴會之前，從未見過這位中行的重要人物。

在我的想像中，亞民先生應該是位高不可攀，不容易和青年接近的人，但那次宴會，却糾正了我的想法。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天同席的還有程遠帆、陳伯莊等幾位先生。席間亞民先生談笑風生，顯得非常風趣而隨和。他跟我們談話，絲毫沒有老大哥的架子或居高卑下的意味。我們幾個年青人開始時還有點拘束，慢慢就爲他那洒脱的風度和引人入勝的談話吸引，全神灌注，渾忘面對的是一位名高位重，久已欽運的前輩。

就此一面之後，我們各自忙於自己的工作，始終沒有機會再聚首。星移斗轉，直到民國四十八年，他回臺主持中華開發信託公司，我才有機會追隨，這才算是我和他真正相處的開始。此後四年，我和他朝夕相共，受益良多，而對他的認識和了解也更加深刻。

亞民先生具有渾厚的賦性，爽直的胸懷和超人的度量，我這樣說沒有一點揄揚的意思；實在他從不記別人的仇、恨、惡，不計較別人的過錯。凡是願意和他接近的，他都推心置腹當作好朋友一樣看待。他認爲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壞的、醜的一面，也一定有好的、美的一面，我們應該儘量發掘好的、美的一面，使之發揚光大，自然可使壞的、醜的一面逐漸消退。

他更善於用人，不但選拔人才甚具慧眼，且能兼容並蓄。當初他在中國銀行，引進了大批年青的留學生，個個都出類拔萃，造成了中行最輝煌的時期。後來他在臺灣主持中華開發信託公司，亦是求賢若渴，用人惟才，因此俊彥之士多歸之。

根據他的觀點：人人都有才，如果有適當的機會磨練發揮出來，人人都可以有番作為。他用人的原則是：「任專、藏己」，賦予所用的人以全權，不牽制束縛，也不堅持己見，絕對尊重所用的人的意見和主張，讓其能放手去做，他最多站在指導的立場。他常常對我們說：用人就是一「容人」，要能容得部下差錯，更要能容得部下擅專。在我和他共事的這段時期，我從未見過他疾言厲色責備同仁，或以命令催促同仁趕辦什麼事。很多事情我相信他未必滿意，然而他總是以極大的耐心承擔下來，把同仁做的無保留作為自己的主意。他對待同仁，無論大小高低，都像對待上賓一樣。而且他所表現的寬厚容忍出於自然，沒有半點勉強或做作的成份在內，因此受之者能坦然、惕然、樂於效命，奮發有加。

他主持開發公司這幾年，在臺北的時候，就一個人孤單單地住在和平東路宿舍裡，宿舍廚師做的菜實在不高明，而且總是相同的幾樣。換了別人早就厭煩了，而他好像總是吃的津津有味，從未露過不滿神態，即使對下人他都不願讓他不高興。

但是，亞民先生的豁達大度，並不影響他的正邪之辨和是非之分。他不僅具識人、用人之能，他也非常機智。儘管他能容納不同的意見和主張，却是基於他明智的判斷，所以很少造成錯誤，他那洞燭機先的識見是少有人及的。

亞民先生一生，大部份時間任職金融事業。也許，他真正興趣之所在是辦工業。因為他深切了解，發展工業是強國的捷徑。而他又深知，中國民間財富少，除非有健全的金融事業支持，很難興辦具有規模的工業，此所以張公權先生在民國廿一年，拉他參加中國銀行時，他便欣然就道。我揣測他當時的意思，是想藉金融事業以發展工業。他的才具過人，加入後不多久，便成爲中國銀行重要角色，他由分區稽核，而副總稽核、而總稽核、而副總經理，在中行竟服

務了十八年，到民國卅八年底他辭卸副總經理職務時，中行仍委託他以董事資格赴倫敦視察業務。後來他奉命赴華盛頓擔任中國技術團主任，洽辦美援，再後主持開發公司，他的工作，仍不脫金融事業的範圍，這可能非他始料所及。

他服務於中國銀行這段時期，中行對工業貸款不論在範圍和金額上都比從前擴大了許多，政策上亦變得十分主動和積極。抗戰時期在西北、西南許多邊遠省份，都有中國銀行幫助設立的工業，對於戰時的後勤支援，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一點，亞民先生的努力是功不可沒的。

他對於工業的愛好，不僅在於新事業的創立，對於發生困難而性質重要的舊事業，尤願盡力幫助使之起死回生。最顯著的例子是：上海申新集團的紗廠和麵粉廠週轉不靈，瀕臨倒閉時，他都以無比的魄力挽狂瀾於既倒，而使申新復甦重生。來臺後，他又不畏物議，毅然把清理和整頓唐榮鐵工廠的責任承擔下來，協助唐榮繼續生產，逐漸走上康復之路。這種做法，厥因他感到類此性質的工業如果挫敗，將使國家經濟前途蒙受不良影響，所以願冒不韙幫助它們再站起來。新公司法中有「重整」辦法的規定，亞民先生大概是這個思想最先發動而且付諸實踐的人。

亞民先生這種以金融事業支持工業的想法和做法，我想與他早年在建設委員會跟隨張靜江先生，以及在浙江省政府追隨朱家驊先生，受兩位先生思想的影響有關。而他以後在實際工作中所遭遇的難題，更加深了他這種認識。不圖因他這一念，竟使許多有志工業的人蒙受其利。終亞民先生一生，雖然他自己也曾一度主持過實業，然而大部份時間是協助創辦或扶植別人辦的工業，我相信會有不少不少人在懷念他，感激他。

亞民先生對於青年的愛護、獎掖是不遺餘力的，我們可以說他是青年最好的導師，因為他總是以循循善誘的態度，引導青年去觀察自己、磨練自己，慢慢的吸取經驗和教訓。他認為青年一定要經過奮鬥掙扎的階段，才能趨向圓潤、成熟。他能够使得和他接觸的青年，受他的吸

引和影響。我常想，他如果辦學校從事教育，他的成就可能不會在蔡元培、張伯苓諸先生之下。

亞民先生一生忠於國家，忠於領袖，忠於工作，忠於家庭，忠於自己，這幾年我常憶及他那藹然可親的音容笑貌。這篇短文並不能表達我對他的悼念和敬意於萬一，我覺得我們今日來紀念他，應該效法他的風格節操，了解身處今日責任之重大，益加惕勵，以慰亞民先生在天之靈。



約合屬附款貸（IDA）會協發開際國訂簽部政財在月二年一十五

CONTENTS

Preface

P. H. Ho — Chronological Notes

Pao Hsu Ho, a Memoir

A Tribute to My Old Friend, P. H. Ho

P. H. Ho and CNRRA

P. H. Ho

P. H. Ho: Economist, Banker and Idealist

In Remembrance of My Godfather, P. H. Ho

In Remembrance of My Father

My Dad

Gertrude C. Ho

Gertrude C. Ho

Glen E. Edgerton

W. J. Green

Harry B. Price

Grace Zia Chu

S. W. Kung

Samuel C. Chu

Ying Ho Leung

Ting Ho

PREFACE

This little volume as a memorial to my husband P.H.Ho has been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many sincere and deep expressions of his friends. It has been five years since he died, but his friendships were long and lasting. I am deeply touched by the many written tributes that have been received and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each of them for his or her words of comfort and understanding.

One of P.H.'s greatest joys was to be with his friends. We had a joke between us. I would ask "Why is he your friend?" He would always answer, "Because he is honest and hard working," and he would laugh with his very infectious laugh.

P.H. and I had thirty-two happy years together. I have never known him to stop working hard for his family, his friends and his country. He was a good son, a good husband, a good father and a good citizen who loved his country deeply. He was a loyal subordinate, an inspired leader and a respected employer. He had deep perception and compassion and never ceased in his efforts to help others.

I think he was happiest working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e felt that if society is to improve, it is the young people who will do it. He wanted the young to be inspired with real purpose in life and to be able to face reality, to be motivated less by financial rewards than by the betterment of humanity. Keeping busy and working for others would make a happy and meaningful life.

P.H. had a favorite saying "When you do something for others it is not because you expect something in return. You do it because you want to." I think of this so often when I get discouraged in what I am doing. I am grateful for his inspirations and for the many happy years I had with him.

Foremost among those who have been gracious and helpful in producing this memorial are Mr. P. S. Lim who offered to have it published, Mr. Felix Chang and Mr. T. C. Pan who looked after the printing, and Mr. Anming Fu who helped me initiate and assemble the material.

May I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all those who helped in establishing scholarships as a lasting memorial to P.H. Several scholarship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Chinese Cultural College and the Fu Hsing Opera School.

Gertrude C. Ho

May 12, 1968

Bethesda, Maryland, U.S.A.



Gertrude and P. H. Washington D. C. 1958

P. H. Ho

Chronological Notes

By Gertrude C. Ho

Born in Shanghai, China, October 12, 1895 — the 9th in a family of 12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he was 3 months old, his family moved to Ichang, Hupeh. Father had an herb shop.

Attended St. Paul's Middle School, 1907-11.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 as a soldier in 1911. His father said that he had no money for the cause, but he could offer a son to fight.

Attended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920-23.

Received a partial Tsinghua scholarship in 1923 to study in U. S. A.

Attende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nd received B. A. degree in 1925.

Entered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in 1925 and received M. S. degree in 1927.

Attended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in 1927.

Returned to China in 1928 and joined the North Expedition Army as Lt. Col. in charge of troop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Became Commissioner of Reconstruction, Chek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ngchow, China, in 1929.

Became Secretary-General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om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Nanking, in 1931.

Married Gertrude Chur on April 30, 1931, Shanghai, China.

Joined Bank of China, Head Office, Shanghai, China in 1932.

Moved with Bank of China to Chungking, China in 1942.

Returned with Bank of China to Shanghai, China in 1946.

Was Administrator of 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China from 1946-48.

Elected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China Foundation in 1947.

Arrived in U. S. A. in 1949 and became Head of Chinese Technical Mission, Washington, D. C. in 1950.

Joined Chinese Embassy, Washington, D. C. as Economic Minister-Counselor in 1958.

Went to Taipei, Taiwan in 1959 to organize 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served as its President from 1959-63.

During his business trip to Washington, D. C. in 1962 became ill and died on May 12, 1963. Left wife, daughter, Ying Ho Leung and son, Ting.

PAO HSU HO

A Memoir

Mr. P. H. Ho was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CNRRA) during most of my time as Director of the China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in Shanghai, China, in 1946 and 1947. We worked in close cooperation in-as-much as the objectives and operation of CNRRA were complementary to those of UNRRA.

His work was made unusually difficult by reason of the policy applied by UNRRA in China and not generally if at all, in other countries, of requiring the distribution of UNRRA supplies without charge to the recipients. So the funds for operating CNRRA had to be obtained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tead of being derived from proceeds of the sale of the goods distributed.

My close association with Mr. Ho which began as a necessity of our work grew to be also for me a pleasure and a privilege. Mr. Ho brought to CNRRA rare talents for the control and operation of that far flung and unique enterprise. He was a man of high intelligence and other fine personal qualities which had been developed through excellent f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also brought to his work the benefits of extensive business experience, largely in the field of banking and finance. He was able to apply his knowledge and skills expertly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NRRA operations, introducing many improved management techniques extending from top to bottom. Indefatigable himself, he was able to secure the willing and enthusiastic response of his co-workers, including the many foreign nationals of our UNRRA organization. Without any show of arrogance or domineering he promptly but quietly established his leadership in CNRRA and maintained it without coercive measu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our association, and, I believe, during the entire life of CNRRA.

In addition to the enviabl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qualities that Mr. Ho brought to CNRRA, without which it could not have secured the excellent results that were achieved under his leadership, he was an exceptionally agreeable companion in all situations, cheerful, optimistic, entertaining, and able to cope with adverse developments undismayed, with ingenuity, speed and reassuring confidence. He had keen feelings for,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sibilities of others with whom he came in contact. He had a great sense of humor, but of a kindly not an offensive or distasteful nature.

After the work of UNRRA and CNRRA was terminated in China, Mr. Ho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his Governm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later as President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y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Mr. Ho were severed with my departure from China in June 1947, but our friendship never waned and I managed to see him from time to time and to keep up a general knowledge of his work until illness ended his business career.

I count it a privilege of the first order to have had a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is exceptional man in very difficult work, in which his performance was outstanding, and to have had his friendship then and for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He was a great man by any standard.

Glen E. Edgerton
Maj. Gen. U.S. Army (Ret.)



Edgerton and P. H. Ho

A Tribute to My Old Friend, P. H. Ho

On the fif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 want to add a few words of tribute to P. H. Ho, a man whom I admired as a great leader and regarded as a personal friend.

We first met in Chungking during the last year of World War II when I was there with a small UNRRA mission under the director of Benjamin H. Kizer. Later in October 1946, P. H. Ho became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resignation of Dr. T. F. Tsiang. That occurred at about the time that I, who was Chief of the Agricultural Rehabilitation Division of the China Office of UNRRA, temporarily took over the duties of Assistant Director in Charge of Supply, during the four months that Brigadier Frank Field was out of the country. General Glen E. Edgerton had been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China Office of UNRRA in late August of that year.

With his ability as an organizer and an executive, P. H., with the able assistance of Assistant Director Dr. C. M. Li, held many conferences with General Edgerton and members of his staff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program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war-torn China, and the part that CNRRA and UNRRA could play in solving them. It was at a very critical time. Many shiploads of needed supplies were arriving weekly. In altogether too many cases, facilities for handling and shipping them to the interior where they were needed were sadly inadequate. In many other cases, specialists and technicians to be supplied by UNRRA had not yet arrived.

Fortunately both CNRRA and UNRRA had new directors who were good administrators and soon both agencies were functioning more efficiently. In addition to his other qualifications, P. H. was a good public relations man. He soon established good working arrangements, not only with UNRRA but also with the various Ministries of the government. Among other things, he arranged with General Edgerton to have weekly luncheon meetings with him and a few members of each staff to discuss policies and problems. Through these and many other meetings, personal conferences, and also social affairs in his home, there developed between us a personal friendship that lasted down through the years, long after UNRRA and CNRRA had passed into history.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that he has been gone for five years, but he will always live in the memory of us who were fortunate enough to know him and

to work with him. In CNRRA, and in the many other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and trust he held for his government, he not only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s of our two countries. The world needs men like P. H. Ho in these troubled times. It is most unfortunate that he had to leave it so soon.

W. J. Green

6126 Martel Avenue
Dallas, Texas 75214

P. H. Ho and C. N. R. R. A.

By Harry B. Price

In November 1946, P.H. Ho became Director-General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CNRRA). By any ordinary standards, his managerial tasks in the Bank of China, in a period of scarcities and runaway inflation, had been arduous. But the management of China's vast postwar program of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was infinitely more complex and demanding; also more exposed to public criticism, and more challenging.

I had known Mr. Ho well, in Washington and in Chungking. When I learned that he had been selected to succeed Dr. T. F. Tsiang (Tsiang Ting-fu), I did not doubt that he would accept the post, even though he was acutely aware of its pitfalls; his patriotism would permit no other course. But I did wonder whether he would be equal to the task—not because of any lack of character or all-round ability; I had seen ample evidence of these qualities. But I had also viewed at close range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F. Tsiang had struggled. He, too, was a talented man of character, who had built up from scratch the large CNRRA organization, with its headquarters and 15 regional offices. He had overcome some massive difficulties in preparing for, and launching, the CNRRA operation. Yet, toward the end of 1946, the program was in deep trouble. Could P.H. Ho, a gentle, sensitive man, cope with the problems that remained to be solved? Did he have the toughness, the resilience, the immense fund of energy that the work would require?

Let us recall for a moment the reason for the CNRRA program, and the setting in which it was conducted.

The parts of China overrun by Japan's military forces during the war had been roughly equivalent to the parts of Europe overrun by the Axis powers there, or the combined area of Czechoslovakia, Poland, France, Belgium, The Netherlands, Denmark, Norway, Rumania, Bulgaria, Yugoslavia, Greece, and a substantial part of Russia.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so-called occupied areas of China was estimated at 260 million, considerably more than the population then of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or of the USSR.

Even before the war,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suffering from severe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an extremely low standard of living, and they almost continuously beset, in one region or another, by famines, epidemics, and civil disorder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established in 1928, had only begun

the gigantic task of encouraging modernization and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the Japanese military struck — first in Manchuria in 1931, then in north and central China in 1937.

During the war, havoc was widespread and economic deterioration took a heavy toll. Millions were forced to flee from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carrying what little they could on their own shoulders. Civillian casualties were innumerable. Huge tracts of fertile farmland were deliberately flooded to stem the enemy's adv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clined; food shortages became acute in many districts. Meager transportation systems — waterways, roads, railroads — were generally disrupted. Industrial centers were bombed, shelled, looted. Scores of cities and thousands of market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laid waste.

While the war was still being fought, the Allied nations began making plans to help deal with its tragic aftermath in Europe and in Asia. To facilitate the immense tasks of administration and coordination,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they created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 more than a year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manent UN organization.

Although far from commensurate with the nation's colossal needs, the UNRRA program for China was more extensive than any comparable effort ever previously undertaken in behalf of a single nation. Approximately \$518 million (U.S.) worth of supplies, composed of thousands of different items procured from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ere delivered to China in 1946 and 1947. Shipping and warehousing charges and certain special contributions raised the total contribution to China to about \$670 million, exclusive of administrative costs. Close collaboration between UNRRA's China mission and CNRRA was, of course, imperative.

When the program began, the immediate problems that had to be faced in China were staggering. Famine conditions existed, or were imminent, in sections of Shantung, Anhwei, Kiangsu, Fukien, Kwangtung, Kwangsi, Kweichow, and in large parts of Honan and Hunan. Organization for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relief, however, was practically non-existent and there was a tragic shortage of trained personnel to conduct both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work.

In November 1944, the establishment of CNRRA was under way, and the UNRRA China mission began its work in Chungking. In November 1945, both organizations had moved their headquarters to Shanghai, and the first shipload of UNRRA supplies arrived. By November 1946, UNRRA

deliveries to Chinese ports had passed the halfway mark. It was at this point that P.H. Ho took the reins in CNRRA.

He plunged wholeheartedly into his new task. From the beginning, not being a petty politician, he recognized the contributions of his predecessor, Tsiang Ting-fu. Instead of blaming him for weaknesses and shortcomings in CNRRA that were apparent to a perceptive newcomer, he tried to make sure that he understood all that Tsiang had built into the program: an effective presentation of China's needs to UNRRA; detailed programming of requirements; the negotiation of a basic agreement with UNRRA; a firm legislative base for CNRRA; a successful recruitment and deployment of generally superior key personnel for the CNRRA organization; detailed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s within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UNRRA; absorption of many specialists, requested from and provided by UNRRA, for periods of emergency service within CNRRA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broa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program and its aims; the creation of a number of special agencies needed; and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both headquarters and regional offices.

At the time, I had a favorable vantage point from which to observe P.H. Ho at work. As Assistant Director of UNRRA's China Office, I was responsible primarily for liaison between the two agencies. So I was invited to attend regularly CNRRA's own weekly staff meetings and was in almost daily contact, on many matters, with P.H. Ho and his principal aides. It was, for me, an engrossing and, in some ways, a highly instructive experience.

In working into his job and in approaching any new question, P.H. Ho's principal concern at the outset seemed always to be for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involved. He was fully and acutely attentive, also, to operational and technical questions in all of their essential details. But almost instinctively, it appeared, he sought first a basis of rapport within the group, or with an individual. This was evident in dealing with his own staff, and with members of the UNRRA organization. It was evident, too, in his contacts with associates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in his handling of sen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Communist representatives during the month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open civil warfare.

He did not assume that the principal officers, regional directors and other CNRRA staff members who had been recruited by T.F. Tsiang would automatically transfer their loyalties to him, or even that they had an obligation to do so. Nor did he fearfully assume that they would not be loyal to him. Suitable personnel were hard to come by, and common sense suggested

the desirability of retaining, as far as possible, all of the abler people within the agency. But he recognized with complete good humor that allegiance to him, as their leader, would have to be won; and that in many cases their larger allegiance to the jobs they were doing would have to be reinforced.

To the headquarters staff, and to a promptly summoned conference of regional directors and deputies, he made known simply, and with transparent sincerity, his reasons for accept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leadership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his view of the tremendously difficult tasks that lay ahead. Then he called for frank discussion of the outstanding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agency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This was followed by unhurried talks with individual staff members during which he learned in detail about their jobs and the difficulties they were facing. He was generous in recognizing accomplishments to date, and he probed for ways in which greater support might be provided for their effort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by no means blind to their weaknesses as he sought means of shoring up, where most needed, their personal performance or that of their organizational units.

It worked. What happened was a rarity. There was a minimum of overturn i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staffs of CNRRA. With the help of T.F. Tsiang's own urging, they did in most cases give their confidence to P.H. Ho, and to his vision of the work yet to be done. As he moved on, then, to new emphases and innovations, they were with him, contributing their own unstinting efforts. Incredible obstacles remained, and frictions within the agency were not eliminated. But there was faith in the management. Morale, instead of sagging as many had feared, first steadied, then gradually rose to a new level. In achieving this result, P.H. Ho was given invaluable help by many of his top staff members, including Li Cho-min (C.M. Li), Cheng Tao-ju, O.S. Lieu, and K.Y. Chen.

Dealings with UNRRA's China mission, a complementary organization in which 38 nationalities were represented, offered a different range of problems. Here the foremost needs were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for mutual insights, tolerance and respect; and for a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of efforts in a massive, turbulent emergency program. Understandably, stresses had developed 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s.

P.H. Ho sensed immediately that, at least for his way of working, the attainment of friendship, candor and mutual respect at the top was a necessary first step toward the improvement of cooperative endeavors all along the line. During the preceding two years, the China Office of UNRRA had had its

own problems and four changes in top command. When P.H. Ho became Director-General of CNRRA, the UNRRA organization in China was under the wise, steady, practical guidance of Major General Glen E. Edgerton and when he retired for reasons of health, his place was taken, in April 1947, by a young man of extraordinary judgment and administrative talent, Harlan Cleveland. With both of these men and several of their top assistants, P.H. Ho developed not only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but also an exceptional depth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One of the qualities that facilitated his dealings with UNRRA people was an active sense of humor. He told jokes at his own expense. His ability to see the funny side of a situation and his hearty, infectious laugh contributed many a time to a relief of tension and a restoration of good feeling. He was also magnanimous in interpreting to his own colleagues the seemingly — if not actually — tactless behavior of foreigners who were unaware of local customs. And he absorbed with inexhaustible patience many criticisms of CNRRA performance emanating from UNRRA sources — some justified, some unwarranted. This I know, since it was part of my duty to be a frequent conveyer of criticism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I never saw P.H. Ho take offense when none was intended, and he did not hesitate to take remedial measures when he believed they were needed and attainable. The same might be said in the UNRRA organization, of Glen Edgerton and Harlan Cleveland.

Relationships of a different order were involved in his dealings with other government leaders. I watched him during a number of joint conferences with his superiors,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Prime Minister T.V. Soong. Toward them, he was deferential; at the same time, he did not fail to bring out facts that might alter their opinions or judgment on specific questions. With the heads of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whose collaboration was essenti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 he was modest, unpretentious, factual and thoroughly businesslike in promoting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a problem as a basis for cooperative action.

Amid all the relationships with which he had to deal, the most touchy were those with Communist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constantly demanding, for the areas under their control, larger shares of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supplies. On this question, P.H. Ho was at the focal point of three sets of pressures. One set emanated from UNRRA, which sought a realization of its fundamental, worldwide tenet that aid should be distribut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n account of race, creed, or political belief." Another set came from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which faced an internal struggle for

its own survival and was loathe to give approval to actions that migh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trengthen the Communists politically or militarily. The third set of pressures was from the Communist representatives constantly on the lookout for occasions to accuse the government, privately and publicly, of bad faith through failure to adhere to its basic agreement with UNRRA, which contained a pledge of non-discriminatory distribution.

This problem was, of course, insoluble in the sense that no conceivable solution would have satisfied all parties. Amid such multiple pressures, many administrators might have been tempted to resort to maneuver, guile, or double-talk. But that was not P.H. Ho's way. To Nationalist leaders he repeated patiently and persistently the commitments the government had made, and urged that these commitments be met as far as practicable. With UNRRA officials he talked frankly about attitudes within his own government as the threat of civil war increased. Most remarkable, he won the respect of Communist negotiators — but not a stoppage of their criticisms — by his sincerity in doing what he could without falsifying the situation or pretending that it matched the government's earlier promises to UNRRA.

The principal Communist negotiator then succeeding Chou En-lai, was Tung Pi-wu who, most of the time, had the bearing and manners of a gentleman of the old school. I remember one occasion, however, when his anger flared, his face turned red, and he threatened to break off all talks unless a certain demand was met. P.H. Ho's face flushed, but his voice was even and courteous as he explained quietly what could be done, and what was beyond his power to accomplish. Tung Pi-wu's wrath subsided, and the discussion continued.

During a few field trips together, I detected something of the quality of P.H. Ho's concern and compassion for the many millions of his countrymen whose sufferings, after 8 years of war and 10 years of dislocation and inflation, were indescribable. He talked to those he encountered with respect, and with complete attentiveness to their individual situations. More than once, tears came to his eyes. I think it was his feeling for the people — his concern for their pain and hopes for their future — tha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gave meaning to his life and labors during the CNRRA years.

In his many-sided relationships, and amid all the tensions and anxieties of his work, P.H. Ho's wife seemed to me to be, for him,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courage and strength. Warm-hearted, alert, intelligent, unruffled, Gertrude Ho seemed always ready to share in whatever their life together might bring. P.H. Ho possessed great energy but his body was not very

robust, and she watchfully guarded his health. With him, she made their home into a center of generous hospitality, gaiety and friendship.

It is not easy to convey in a few words a fair impression of the difficul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operations that P.H. Ho directed from November 1946 until the CNRRA program tapered off in the spring of 1948. He had five main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1. to take over the CNRRA organization, strengthen its operations, and improve its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agencies,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2. to accelerate greatly the distribution and effective use of the UNRRA supplies rapidly piling up in Shanghai, Hongkong, Tientsin, Hankow and other ports;
3. to help cope with the problem of internal financing required for the effective distribu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oth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supplies;
4. to oversee the conduct of direct relief and work relief programs; and
5. to supervise, and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longer-rang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 for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flood control,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ial rehabilitation, and specialized training.

Given the magnitude of China's postwar needs, and the inescapable limitations under which th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had to be conducted — limitations of time, money, organization, personnel,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and effective political control — all that P.H. Ho could do, indeed all that any man in his place could have done, was to set priorities then take one thing at a time, deal with it as best he could, then move on quickly to the next. I can only attempt here to touch on what seemed to me to be the nature of P.H. Ho's personal contribution in each of the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mentioned above.

Organization. When P.H. Ho took charge, CNRRA had already become in less than two years one of the biggest agencies of the government. It continued to grow, under his direction, until it had more than 30,000 employees. There was a headquarters office centered in Shanghai, with a branch in the capital, Nanking. There were six main supply offices and several large subsidiaries established for special purposes. These all work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15 regional offices.

<u>Regional Office Headquarters</u>	<u>Area Served</u>	<u>Size (Sq. Km.)</u>	<u>Population</u>
Mukden	Manchuria	1,071,103	35,183,704
Peiping-Tientsin	Hopei, Chahar, Jehol	603,910	37,108,673
Taiyuan	Shansi, Suiyuan	485,817	16,782,855
Tsingtao	Shantung	146,737	36,289,177
Kaifeng	Honan	165,141	26,994,209
Chingkiang	Kiangsu (except Shanghai)	107,422	31,160,417
Shanghai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893	4,946,872
Wuhu	Anhwei	140,687	21,842,039
Hankow	Hupei	183,363	21,271,862
Hangchow	Chekiang, Fukien	220,623	30,691,488
Nanchang	Kiangsi	173,014	12,836,619
Changsha	Hunan	204,771	26,171,117
Taipei	Taiwan (Formosa)	35,961	6,336,329
Liuchow	Kwangsi	218,924	14,543,528
Canton	Kwangtung, Hainan Island	218,765	29,128,924

(Note: This table is taken from the official 3-volume history of UNRRA (volume II, page 383) written by George Woodbridge and associates, and published in 1950 by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e statistics, which for populations are approximations only, were taken from 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7, Page 1.)

Within the CNRRA organization, P.H. Ho's main concerns seemed to be to 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 with each person in a position of key executive responsibility, and to make each feel that he was being trusted and depended upon; to root out corruption; to foster and nurture throughout the entire agency a spirit of dedication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to speed up communications and operations; to raise the levels of technical performance in each office and sub-agency and, as far as practicable, in the cooperating ministries; to give each subsidiary and regional office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for decision-making and action, and also for results achieved; to cultivate improved working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articularly, with the people.

Distribution. The \$518 million worth of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supplies delivered by UNRRA mainly to Shanghai, but also to Hongkong, Tientsin, Hankow, and a dozen other coastal and river ports, consisted of different items procur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relief supplies alone included about 2,422 million pounds of assorted foodstuffs, 378 million pounds of clothing, textiles and footwear, and 92 million pounds of

medical and sanitation supplies. In addition were the rehabilitation supplies which included 886 million pounds of seeds, fertilizers, implements and heavier equipment for agricultural restoration and flood control work, plus 1,488 million pounds of tools, machines, materials and vehicles for use in rehabilitating industries and transport facili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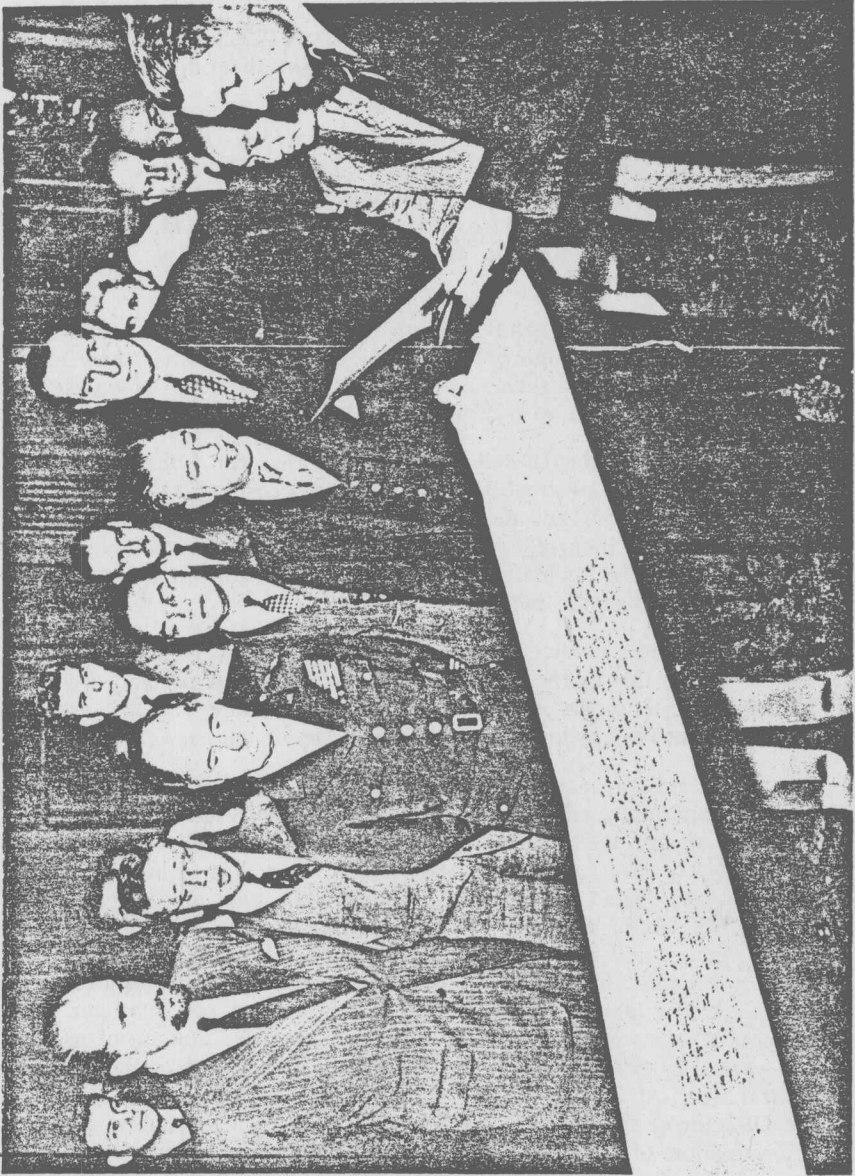
By November 1946, when P.H. Ho entered the picture, the ports were glutt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UNRRA supplies and a mounting flow of commercial goods to meet shortages that had been growing more acute over a ten-year period. The competition for space was severe in bulging warehouses, abandoned factories and schools, and in vacant lots. Only a fraction of the incoming goods had reached their ultimate destination and use; some food and equipment, exposed to the weather, was deteriorating. I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s, and from government and UNRRA sources too, came increasing charges of incompetence, theft, corruption, and black market operations.

Being a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P.H. Ho was painfully conscious of the rising barrage of criticism. But I do not recall any effort on his part to answer it publicly, or to cite the almost unbelievable difficulties that CNRRA

faced as an excuse for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warehousing and distribution operations. Instead, he focussed his energies on efforts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As a banker, he had acquired an orderly approach to problems, a grasp of practical aspects of business and trade, and a wide acquaintanceship among prominent individuals in the nation's economic life. All of these things stood him in good stead as he labored with his own staff and with UNRRA operating personnel to bring order out of chaos, and to get the supplies moving and into responsible hands.

In warehouses and other storage areas, guard systems had to be improved. Extensive re-sorting and inventorying were essential before dependable records could be set up, and before accurate shipping schedules to supply and regional offices could be worked out. Special warehousing units were set apart for automotive, industrial, medical, and other categories of equipment.

The rehabilitation of transport facilities had to be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use of those facilities for backed up public demands and for the accelerated dispersal of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goods.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transport operation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1946 through a special CNRRA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and several



Mr. Ho presenting a scroll to Major-General Glen E. Edgerton upon the latter's retirement as Director of the China Office of UNRRA, in April 1947.

sub-agencies including CNRRA Highway Transport (CHT), CNRRA Waterways Transport (CWT) and CNRRA Air Transport (CAT). What remained was to flesh out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to help them in removing the principal bottlenecks in their work.

In all of this, cooperation with UNRRA which provided extensive auxiliary operating personnel, was essential. Equally imperative was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had to be expanded with other agenc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overal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especially the Ministries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Health, and Welfare.

In these relationships, handled partly through a Cabine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but mostly through personal contacts, P.H. Ho knew how to be both considerate and persuasive, and to work deftly, with his colleagues toward getting things done with minimal needless bureaucratic wrangling.

Financing. When the UNRRA supply program for China was being planned, there was little awareness of the enormous costs that would have to be incurred in distribut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supplies, or of the fact that these costs would be incurred during a period of galloping inflation when monies alloc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month might drop 50% or more in value before the end of the month.

All of P.H. Ho's financial experience and acumen were needed in the effort to cope with this financial problem. Improved budgeting and accounting, operational economies, better supervision, and more effective appeals to the government for appropriations provided part of the answer.

But these measures alone were not enough, and the entir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operation might have ground to a halt for want of operating funds but for an ingenious plan worked out by Commander R.G.A. Jackson, the Senior Deputy Director-General of UNRRA, on a visit from Washington headquarters, and Prime Minister T.V. Soong. The plan involved the provision, by UNRRA, of some \$19 million worth of cotton yarn the value of which, in China,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keep pace with the inflation. The cotton yarn became the principal "financial" reserve for CNRRA's field operations. At the moment when money was needed to make specific payments, enough yarn would be sold to provide the required amount of money. Under a special agreement, the mechanics of this operation were handled by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subject to control and supervision by P.H. Ho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UNRRA China mission under a systematic plan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riorities. Through all of these measures there was

ultimately achieved a stabilization of financing for th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during a year, 1947, in which wholesale prices in Shanghai rose 1,370%.

Relief. The most elemental needs of China's huge population, after the war, were so great that, at best, they could be met only in small part by UNRRA aid. But every effort, it was felt, must be undertaken to make the aid go as far as possible in providing desperately needed relief. This was done through group feeding stations, throug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raw food and clothing in critical areas, an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emporary refugee camps where food, rudimentary shelter, and some medical and travel assistance could be provided. At one time, in Hunan, flour and rice kitchens were feeding about 73,000 persons daily and supplementary diet was being provided, through some 3,000 special nutrition stations, to an estimated 2 million children. During a peak month in Kwangsi, some direct relief was given to approximately 800,000 destitute people.

P.H. Ho did all he could to facilit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direct relief programs. And, as his predecessor had done, he showed keen intere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k relief programs in which laborers on urgent projects were paid, not in depreciating currency, but in food, clothing and other necessities drawn from the UNRRA supply program. Through work relief projects, thousands of miles of roads and railway beds were restored, considerable public utility and housing rehabilitation work was accomplished, some medical and welfare institutions were rebuilt and, perhaps most significant, several conservancy projects on a large scale were carried to completion.

P.H. Ho followed closely the reports of work on these project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ir essential needs were being met — including the most famous of them all: the diverting of the Yellow River to its prewar channel, and the consequent freeing for cultivation of some 4 million fertile acres that had been flooded annually during the previous 8 years.

Rehabilitation. Most of the work relief projects represented, of course, one form of rehabilitation, alongside other large programs designed to restore and exp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It is not feasible to describe in detail here the far-flung emergency-type programs that developed in the areas of agricultural, transport, and industrial rehabilitation.

I think that these represented, for P.H. Ho, the real "fun" part of the program. During social evenings, his mind would keep reverting to one or

another rehabilitation project, and he would discuss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it and ways in which further effective support might be given to it. That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accomplished as much as they did in spite of all obstacles, including the spread of civil conflict in 1947 and early 1948, was due in no small measure to the broad guidance given by P.H. Ho and the shrewd practical direction and judgment that he and his principal aides provided.

Although he held other positions of high responsibility, I suspect that none of them gave to P.H. Ho quite so large a scope for the exercise of his talents as that of being the administrator of China's postwar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nd he gave to this work the stamp of his own personality — his blend of modesty and self-respect, of idealism and realism, his capacity for dedication and loyalty, his warmth and breadth of spirit.

Responsibility and fame did not go to his head. He never tried to depict himself in terms larger than life, and it would have embarrassed him for any one else to do so. He did not pretend to be a philosopher or a linguist or a scholar. He simply did his best, and inspired his colleagues to do the same. When the program was ended, he knew well what the shortcomings had been. Yet he felt good about what the CNRRA team had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together, against seemingly hopeless odds.

"We do not deny that CNRRA made mistakes," he wrote in a foreword to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dministration's final report. "But they were mistakes such as an organization could not entirely avoid, when it is considered that it was formed in a hurry and executed with limited means a tremendous job for which no benefit could be derived from past experiences. Notwithstanding some murmurs arising out of local interests, there was fortunately a general appreciation for CNRRA endeavor to effect a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the supplies insofar as it was compatibl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lacing them where they could do the maximum amount of lasting good to the Nation as a whole. . . . In looking back through the three years of CNRRA's existence, through all the vicissitudes and all heartaches, through breath-taking moments and sleepless nights, through our hard struggles against difficulties, political,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caused by bad weather, inadequate facilities, lack of experience, poor coordination and every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 conceivable, we still have a profound sense of satisfaction inspired by the knowledge that we did all that was our share in a truly noble cause. . . ."

His conception of the basic motivation behind the worldwide UNRRA program was warm and generous. "At the end of CNRRA's operations,"

he wrote, "I recall with peculiar fondness the high ideals of the Member Nations of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which, at the conclusion of World War II, undertook to contribute one percent of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incomes toward the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of those allies in war which had suffered enemy occupation. This was unquestionably the most concrete expression of the noble ideal of world brotherhood that the world has yet seen. During the CNRRA days, China received over two million tons of UNRRA supplies, which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stwar recuperation of the Nation. But more valuable than even these material supplies is the unmistakable indication that there existed a sympathy among mankind and a fellowship among Nations. It is these moral qualities which really touched the heart and enhanced the value of the supplies."

P.H. Ho had reason enough to be irritated by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of some members of the large UNRRA organization. He had reason, too, to be resentful of ways in which some of his government associates let him down. But he did not dwell on these things. Magnanimity thrived in his make-up; vindictiveness did not. "CNRRA," he said, "was singularly happy in being able to draw from all walks of life many people, whose ability, learning, integrity and devotion could not be doubted, and with whom it was a real pleasure to work in close association. To our foreign colleagues, who came half-way across the globe to assist China in her post-war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either administratively or technically, a warm acknowledgment of credit is due. Our appreciation of their services is not any less because they often found occasions to dissent from us in their honest and good-natured opinions regarding our operations, than because they went through many hardship and difficulties in discharging their duties."

"In presenting this Report to the public," he wrote in conclusion, "it is hoped that, whatever our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might be, our experience may prove to be of some value as a reference to similar enterprises which may be undertaken in the future."

The personality of P.H. Ho,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his devotion to the cause for which he labored, deserve to be equally remembered. He was, without fanfare, a great public servant and an unforgettable friend.

P. H. Ho

My very first encounter with P. H. was exactly forty years ago, when my late husband, then my fiance, asked him to bring a crate of cararumba, a very fragile fruit,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P. H. was traveling by boat and it took him five days. Since the fruit was rotting every day, he took great care to preserve the good ones remaining. When he finally delivered the fruit to me, there were but a few left at the bottom of the huge crate. He told me that he brought the original crate to me just to show how many there were at the start, and that he had done his best to salvage the remaining few. Laughingly he asked me to use my imagination and appreciate the efforts of both men. What a responsible person! And what a sense of humor.

Soon afterwards we were both at a party. P. H. sensed that there were strain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me people at the party. He kept telling jokes, mostly with himself as butt, in order to keep the party gay and lively. Those who did not realize the situation thought that he made a fool of himself. In reality he was sacrificing his own personal feelings in order to save his friend's party.

P. H. was a self-made man. With over ten children in the family, the family could not give him the education he wanted. He did all kinds of jobs, many of them not considered proper for a son of a middle class family. He disregarded customs and "face" and managed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higher education, thus better preparing himself for his lifelong service to his country.

In Chekiang, in the years before his own marriage, P. H. lived in the same house with us. He always was considerate, generous, and thoughtful to everyone, including the servants. When Governor Chang Ching-chiang made known his intention to resign from office, he asked each of his four immediate subordinates what he wished to do. Among these four, both P. H. and my husband wanted to go to Europe to study condition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order to prepare themselves better for future service to China. Knowing how anxious my husband wanted to make the trip, and realizing that the Governor could only send one of the four, P. H. kept his own wishes to himself so that my husband could have the chance. Such was his loyalty to his friends!

He was scrupulously honest. He stuck to his principles even in the face of some discomfort or inconvenience. At the time when he was connected

to a bank, he opposed the bank buying a fleet of new cars, believing that there were other more urgent things needed. He was overruled in the matter. When the cars arrived from abroad, and even though he was fully entitled to a new car, he declined the use of it and continued to ride in his old car.

His loyalty to his country and to his party was beyond criticism. I have never heard him once criticize any of his superiors, even though we all knew what he was going through at times. He would just play solitaire and sing Chinese opera, smiling patiently all the while. During his final illness, he kept on hoping to be able to travel back to Taiwan, in order to die there and be buried in his own country.

He was filial to his mother (and to all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even though some of them were only half-brothers and sisters). During wartime his mother had to be evacuated to the countryside. Every Sunday P. H. would travel for hours to spend some time and have a meal with his mother. He said that he was often busy and tired, but it made her happy even if he went and had a nap in her house. So he made the trip without fail.

His devotion to his family was unusual. He never wanted his wife to be subjected to the many political, social or family obligations if he thought that they were too much for her. He made provisions for his children so that they could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 most unusual thing about him was his unfailing enthusiasm. He was enthusiastic about the things he liked to do. He was enthusiastic about the things he did not care to do. He had a goal, he had hopes and he had faith. He learned from both hi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To all who knew him, the memories of P. H. remain a living inspiration.

Grace Zia Chu

June 1, 1968

P. H. HO

ECONOMIST, BANKER AND IDEALIST

By S. W. Kung

It affords me great honor to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is publication something of what I knew P. H. to be. His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reached far and wide, and his own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innumerable. What I attempt to relate here are the events which we shared over some years of his life.

I remember that when I joined the Bank of China in 1935, I found the Bank constantly in search of new blood to fill the needs arising from its active expansion from time to time. Among those who are several years my senior and who have always enjoyed my respect,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P. H. Ho, K. W. Hsu, R. C. Chen and Peter W. Lin. There are, of course, many elders and others about my age and younger who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welfare of the Bank of China. Invariably P. H. was one who inspired respect and was well liked by all who knew him through the years. He was indeed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the life of the Bank — a major force for progress and responsibility.

I met P. H. in Shanghai in 1933 when he was already with the Bank of China. We were both attending a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Practical Economics (中國實用經濟學社), an association originally form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hinese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ics 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Association held annual meetings which members from all parts of China were invited to attend. Papers were read and comments and discussion followed. During one of these meetings a proposal by P. H. of a plan for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aught the attention and acclamation of the members. The need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had long been recognized. What was most apparent about P. H.'s address was the way in which he presented the problem and the means he suggested to achieve the proposed end. His presentation covered the following: 1) the need to divide industrialization into appropriate stages and the building up of necessary capital formation; 2)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3) the ways and means to increase export performance.

P. H., always a conscientious and good speaker, knew how to present his ideas persuasively and concisely. He suggested frankly that one way to achieve progress in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e and export promotion was

to utilize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He firmly believed tha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would be virtually certain. He summarized the goals of his program in one sentence: "Successful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under ordinary circumstances, include an overall program of social rejuvenation, gener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investment in transportation, power generation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There was almost unanimous agreement among the members that such a program was indeed necessary, and his insight and the practical nature of his proposal were equally commended. As a matter of fact, a major part of the program he formulated in his earlier years was carried out gradually and methodically during his career with the Bank of China between 1932 and 1949. He indeed practiced what he believed.

During the 1930's China had, at last, achieved political stability. Many reforms were under way, but a great deal remained to be done. One great hindrance insofar as industrialization was concerned was the poor system of inland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which hampere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Many industries could have been located nearer the sources of raw materials if there had been an adequat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Poor transportation also affected export trade; more than 80%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prior to World War II was handled by foreign firms located in treaty ports, especially in Shanghai. Until China could learn the need to export her own products abroad directly, a better export performance would be impossible to achieve.

China has been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for many centuries; almost 80% of her people are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ursuits. Although before World War II China led the world in the production of rice, soya beans, ground nuts, barley, silk and tea, food products still have had to be imported at times. Again, lack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was partially responsible.

Poor credit facilities and exorbitantly high interest rates plagued the small farmers, who had no alternatives but to obtain credit from relatives, friends and neighbors, as well as from money shops or local banks. Survey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independent studies by private organizations both revealed the very high interest rates, often as great as 85% or even higher. If I am not mistaken, P. H. wa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convincing the Bank of China to make credit available to the small farmers. The Bank recruited a number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sts to assist their local branches in northern China and elsewhere in carrying out this policy. In addition to offering low-cost credit, the Bank also helped these small farmers to form

cooperatives. The example set by the Bank of China led many other Government banks and even private financial and banking institutions to follow suit.

In the area of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Bank of China was instrumental in financing loans to a number of privately and publicly owned electrical power companies in Hangchow, Nanking and elsewhere, assisting them in financing their expansion programs as well as providing sufficient working capital. Railroad financing also received a helping hand.

The Bank has often tailored its len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es. There is a common saying among those in the business circle that no application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will ever be rejected by the Bank of China so long as the plan is financially sound. Often the Bank's excellent technical staff will study an applicant's set up and in many cases recommend that a company be completely reorganized to enable it to operate more efficiently and profitably. In other words, the Bank of China looks at cash flow and lends on prospects, contrary to the practice, even today, of European bankers who prefer to put emphasis on physical assets.

P. H., through the Bank of China, also participated actively in promoting several large-scale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Two in particular are the China Cotton Corp. and the China Products Corp., each of which was capitalized at \$10 million Chinese currency (equivalent to about US\$3.5 million). The China Products Corp. was promoted by the Bank to encourage direc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the corpor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for export products could be maintained and new export industries could be developed. Similarly, the China Cotton Corp.'s job was to meet the import requirement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upgrade domestic production.

Along these lines, there was a particular project under consideration by the Bank of China several years later, in which P. H. and I both were involved. At that time it was felt that it would be beneficial if a fertilizer plant c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province of Taiwan. A feasibility study was therefore made, and it was finally decided that the project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With the Bank's approval a committee of five was formed in the summer of 1948. Members were P. H. Ho, William M. Wong (manager, Tientsin Branch), Peter W. Lin (manager, Trust Department), K. W. Hsu (manager, Shanghai Branch) and myself. P. H. was named chairman while William Wong and I were 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 company was subsequently formed in the name of Yee Ming Chemical Corp., which, translated, means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 H. a good beginning was made. A technical team of five engineers was contracted to make a detailed survey under an arrangement with the Chemical Construction Corp. and the Anderson Meyer Co. The gas reserve was found to be insufficient, and the manufacture of ammonia sulfate was thereupon decided. The initial capacity of the plant was to be about 50,000 tons a year, and the location decided upon was Hsin-chu, Taiwan.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had been held with AID officials for necessary financ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spective investor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had been arranged. All this had been accomplished within a period of six months; however, the matter had to be dropped with the loss of mainland China.

When I said that I had the constant benefit of advice from P. H. my meaning was not so much in regard to personal matters as to professional advice. In one particular event I discovered his humanism and his deep concern for and commitment to the welfare of the common people.

When Japan surrendered in August 1945, I was on a Government mission to Mexico and Brazil. Upon my return to Chungking at the end of October, I was summoned by Dr. T. V. Soong, t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instructed to make a quick survey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North China and, in particular, to make a recommendation for a conversion pr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and the notes issued by the so-called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orth China.

The conversion ratio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al currency and the bogus Central Reserve Bank in Shanghai had been fixed at 200:1, nineteen days after the ending of the War. But no decision had been made concerning the national currency and the notes issued by the bogus Federal Reserve Bank. The idea of the Government was to dispatch someone to North China to make an on-the-spot survey before that conversion price would be initiated.

Having spent the past three months in Latin America, I was somewhat out of touch with the latest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hina. I tried to catch up before leaving for North China, and I found myself in desperate need of assistance. I immediately thought of P. H. and cabled him requesting his advice. In Tientsin and Peiping I conferred with Bank managers, university professors, Ministry of Finance officers, and a score of others. In essence, I tri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all the related data within the time limit, as instructed. Needless to say, it was all very hectic and when I had almost finished my work I received a cabled reply from P. H. Translated, it was as follows:

"I know you will do a good job. All I can advise is that it is most essential for you to take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 common people in whose hand these bank notes are possessed."

I was indeed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is guideline from P. H. And he was right, the majority of the notes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farmers, peddlers, small retailers and rank-and-file government officers.

Returning to Chungking on November 12th, I thereupon reported to Dr. Soong. I tried to present a picture of the economy of North China as best I could, and I recommended a conversion price of not more than 5:1. That evening a meeting was called in which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Mr. O. K. Yui, participated. Dr. Soong read part of my report and made comments, whereupon Minister Yui then said he had received a cable from his resident commissioner in Peiping recommending that the ratio be 10:1, the same ratio being upheld by military officers in North China. Angrily he stated that the Treasury should not spend the additional 200 billion of the national currency which the 5:1 ratio called for, and argued that the 10:1 ratio conformed to the conversion price already in effect in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I endeavored to explain all the factors leading to my recommendation, all of which had been based on available data and on consider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North China in particular. I, too, had considered the conversion ratio already established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and yet I considered it proper to have it set at five or below, if possible. Encouragement for this position was from P. H. Within the next three days, to my greatest satisfaction, the announcement was officially made that the conversion ratio had been fixed at 5:1.

With hindsight I must say that the ratio of 5:1 (100% less than in South and Central China) still was a bit inadequate. When I was visiting several cities in North China I found the ratio of the free market in Tientsin and Peiping about 4.4:1, and from November 10th to 12th it fluctuated between 3.6 and 7 to one. During that same time in Tsingtao and Tonsan it was 8:1, in Tsinan it was 10:1, and in the interior of Shantung it was as high as 18:1.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ough, perhaps the ratio of 5:1 was the best the Government could do.

Not too long thereafter I told P. H. what had conspired during the meeting and the angry remarks of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He chuckled and said, "if the bulk of this \$200 billion was distributed to the common people it really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loss to the Treasury."

Between March and August of 1948, I was working for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as a member of the Currency Stabilization Board. It was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P. H. was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Trade Commission, and his job had a great deal to do with promoting export and import control. Since the mission of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both under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was closely related, we managed to see each other quite frequently. I knew that P. H. worked very hard on the export promotion task and that he attached to it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However, under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s he had to confine his work to export financing and to finding ways and means by which to remove the physical barriers hindering the transportation of products to sea ports from the interior. I knew also that he was very anxious to see that the inflation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and the exchange rate stabilized somewhat, so that the normal flow of exports would not be hampered.

After I resigned from the Bank of China in the summer of 1949, I joined the Central Trust of China as its represent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a year later P. H. was mad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Technical Mission stationed in Washington, D. C. In these capacities, we both, and particularly P. H.,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regard to the flow of United States AID to Taiwan. During these years, P. H. was very much involved in, and in my opinion was at least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fine performance of the U. S. AID to China. Two events are perhaps worth being singled out for particular mention. P. H. often expressed the opinion that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make the flow of U. S. AID to Taiwan as smooth and efficient as possible, and in the meantime, to take more initiative and responsibility in fulfilling that requisite. With this intention in mind he was a great advocate of having the Chinese themselves purchase U. S. AID materials, including full-fledged factories. He could not see why we should entrust these turn-key jobs to the American or European firms while we handled matters of minor importance. "The responsibility is ours anyway," he said, adding that "in doing it ourselves we would not only properly train our own people but probably save money too." To the delight of P. H. his suggestions were heeded, as in the case of Kaohsiung Ammonia Sulfate Works and the Hualien Nitrogen Works, both of which were handled by our own engin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procurement agency and were completed in good time for operations.

During the early 1950's the purchase of grain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entrus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 a small service fee. The consumption of wheat and soya beans in Taiwa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it occurred to our authorities that this purchasing

might be handled just as well if not better by a Chinese Government agency. It was found that almost all of the wheat shipments were from the mid-continent U.S. Gulf Coast. It was logical that we should ship wheat from the West Coast, because not only is the wheat cheaper (due to supply concentration) but the freight is much less since the distance from there to Taipei is shorter. It was estimated that China could perhaps save from US\$1.5 to 2 million yearly on price and freight differentials. The matter was taken up with P. H., who immediately endorsed the idea and agreed that i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aipei for final decision. One slight difference appeared between the wheat from the Gulf and the West Coasts; protein contents were higher in the Gulf Coast wheat. A nutritionist was engaged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and effects in regards to the specific needs and requirements to be met in Taiwa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found to be insignificant.

While I had known P. H., up to that time, for almost a generation, it was in February 1961 that we were together almost every day. When he learned my wife and I were visiting Taipei, he invited us to stay at his residence there and we accepted. Not being well at that time, P. H. stayed home when not at work and it was then, during those four weeks, we were together constantly. I soon began to appreciate his not only being a pragmatic economist and banker but also his being an idealist. He discussed with me his past and the future. He spoke of his early life in China, his experiences in the Army, his study and self-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happy family life, his work, his friends, and what he thought of and hoped for the future. He planned to ask his wife Gertrude to come to Taipei and to stay with him. He believed his son Ting was old enough to care for himself, and, of course, his daughter Yin was already married. He also wanted to resign as President of the China Development Corp.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e time. He was confident that his associate Felix Chang was able and would administer well. After his resignation his hope was to do liaison wor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at would allow him to devote time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giving assistance to whatever project he might help best.

We freely exchanged opinions on a number of topics, and I found that P. H. had fresh ideas, new approaches to situations and posses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to get things done within his field. He saw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as being too fast, so that any system considered desirable today could well be obsolete tomorrow. Invariably he spoke of the need for doing extensive economic research. In his opinion, "one can stimulate and explore an economic system model in order to study proble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foreign trade policy, but it is still no substitut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He firmly believed in the need for constant economic expansion but also that social progress should paralle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essing emphatically the goal of true progress being the raising of living standards for all people and that the policy bringing this goal closer to reality should be the one pursued.

A topic he brought up time and again was education. "There is nothing more important in China, or elsewhere for that matter, than the need of education," he told me a number of times. It was his idea that any government putting money into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giving it the high priority it deserved, would surely be amply rewarded. He argued that the main asse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so much the wealth, natural resources 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as the emphasi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t was this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thus evolved that would not easily be overtaken by other countries.

His fundamental outlook on life encompassed the belief that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pursue the wisdom of "give and take", that one must be more willing to give a bit more than he takes. By the same token, if one would pursue a little more the "you" attitude, thinking of someone else's interest and cause, instead of the "I" attitude, everyone would find more peace.

After more return from the trip to Taiwan in 1961 I saw P. H. a number of times, whenever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business. It was always a joy to talk with him. I must say that, for myself, I need all the wisdom I can get, and P. H. was always willing to share with me some of his vast store of that commodity. It was sometime in January of 1963 that he became seriously ill. On May 9th I went to Washington, D.C. to visit him. He was able to say a few words, among them that he wanted most to return to Taipei as soon as he was able. With that I reluctantly left him and prayed that God might spare him.

A devoted friend, an inspiring teacher, a conscientious worker and, above all, a great patriot, passed away on 12 May 1963.

IN REMEMBRANCE OF MY GODFATHER, P. H. 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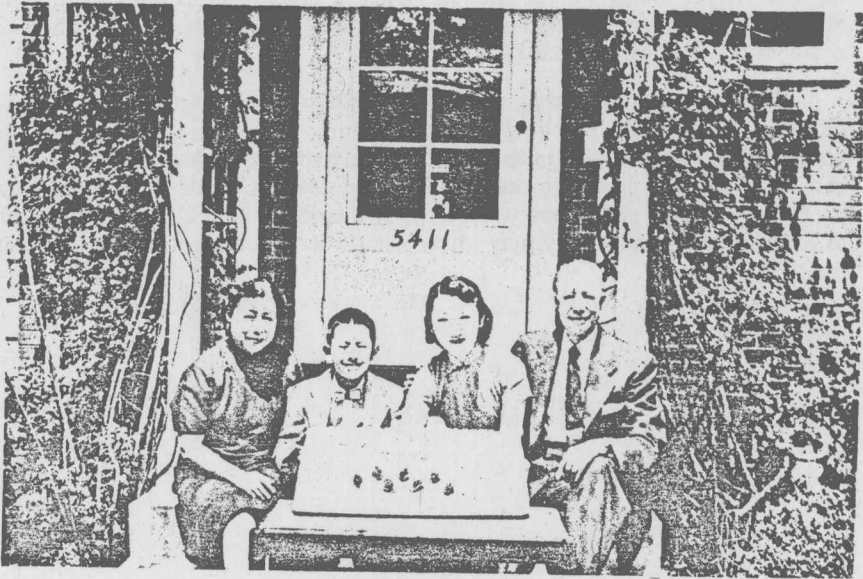
The earliest memory I have of Godfather goes back to the time of 1936. We were staying with the Hos at Kinnear Road in Shanghai then. One day a group of us children held a family festival. I had constructed a homemade movie show, and was charging everyone a small fee for showing it. Godfather came home from work, and as usual entered completely into the spirit of the occasion. He played and joked with us, and paid his fee and saw my movie. Then he quietly disappeared into his study, closing the door. I had never before dared to interrupt him there, but that day my high spirits betrayed me. While playing games, I burst into his study. He looked up from his work on his desk, and the absolutely serious demeanor on his face stopped me dead in my tracks. He was an entirely different person from but a moment ago. In an even but firm voice he told me to get out, and I did so at once. I have never forgotten this experience. Only years later did I fully realize that he had weighty matters on his mind in those trying days. Yet he took time to play with us children. Like the great man that he was, he was all laughing one moment, and all seriousness the next.

Twenty years later the Hos were living in Bethesda, Maryland. I visited them there often. Godfather spent some of his happiest moments putting around in the garden in his old clothes. Also his lifelong love of Chinese opera now had the aid of the latest electronic advances. In his study were boxes of taped performances, and he could play them to his heart's content whenever he wished.

In 1961 I took my family to Taiwan as a 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 This was our first visit to the island, and before our guest house at the Academia Sinica was ready for us, we stayed for a fortnight with Godfather at his residence on Ho Ping East Road, behind the Taiwan Power Co. Even after we moved out to Nankang, we visited him frequently. He was always considerate of our welfare and interested in what I was doing. Knowing that I had worked on the career of Mr. Chang Chien of Nantung, he introduced me to Mr. Sung Hsi-shang, who told me much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Mr. Chang. Just prior to our leaving Taiwan in 1962, my wife and I wanted to give a dinner to our friends in appreciation. Nankang being somewhat inconvenient, Godfather kindly consented to let us use his residence. The charming atmosphere of the house made the party a success. In this and many other ways he showed us every consideration.

By temperament he did not easily shed his last reserve when with us youngsters. Yet over the years I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more and more what he was and what he stood for. He had upright and unyielding moral standards, and in his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alike he succeeded always in living up to the high standards he set for himself. He was also utterly devoted to his family and his friends, giving himself unstintingly for others' welfare. Above all, he had a natural cheerfulness which seldom left him. One of his most endearing qualities was his willingness to make jokes at his own expense. While he lived for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quite at ease in dealing with Americans, his heart was always in his own land. To me, he was the perfect gentleman, in the best and noblest sense of that word, a man who would have been highly admired and respected in old China. I consider myself extremely fortunate to have known him.

Samuel C. Chu



The Ho Family.
Gertrude, Ting, Ying, P.H.

In Remembrance of My Father

My father was a devoted man; devoted to his country, to his friends and to his family.

When the Revolution first started, Dad was fourteen years old. He chose to serve as a foot soldier of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nd did actual fighting. He went through many dangerous and hard experiences, and was often forced to separate from his company, hiding during the day and running at night, so as not to be caught by the Manchu soldiers. It may be said that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his long service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Dad was the ninth child in a family of twelve brothers and sisters. His mother told him when he was young, his eleventh brother died and she asked a Buddhist priest to communicate with his spirit. The departed spirit said: "Our brothers are all good but the ninth is the best. Someday you will all turn to him for help." Dad did give a great deal of help to many members of his family. But his help did not stop at the relatives, because he also helped many of his friends. Once a friend of his said to me that your father was just as kind as a Buddha in a temple, 有求必應 (whatever requests are always answered).

There are many things I can remember about Dad, but I, as his daughter, should not brag too much about him. However, I will say that he was a warm, sincere and proud person. He had left us for five years, yet I can still hear him laughing and singing, and feel his pride and concern for his family, friends and country. The many memories he left me will be retold to my children so that they may know what a wonderful grandfather he was.

Ying Ho Leung

My Dad

I remember —

Sitting in my chair listening
To stories of Chinese life
And his job
In the war;
Going to his Embassy office
And people saying “hi”
Because he was my dad
And I, his son.
And going for a haircut
In our “official” car,
With my first shoe shine
Which was fun.
And working in the yard.
With him on his stool —
We sat pulling out weeds
And talking.

I was naughty —

He spanked me and I cried: “OUCH!”
But then it was over
And we laughed.
And before going to bed
I’d run in and say “papa”
And he’d rub my back —
I miss that.
It was fun, then
And I liked him
Because he was my dad
And I, his son.

Ting Ho '68